

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  
“十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

刘德斌 ◆ 主编

# 东北亚史

DBYS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RENMIN CHUBANSHE

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  
“十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

# 东北亚史

Ji Lin Da Xue Dong Bei Ya Qu Yu  
Zheng Zhi Jing Ji Li Shi Yu She Hui Fa Zhan

责任编辑 关 静  
封面设计 晓 峰

ISBN 7-206-05025-5



9 787206 050251 >

ISBN 7-206-05025-5

定价:35.00元  
(内部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PDFG

# 东北亚史

主 编 刘德斌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亚史/刘德斌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6

ISBN 7-206-05025-5

I.东… II.刘… III.东北亚-历史-研究

IV.K31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1902 号

## 东北亚史

主 编:刘德斌

责任编辑:关 静 封面设计:晓 峰 责任校对:陈余齐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http://www.jlpph.com) 电 话:0431-8537802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7.25 字数:4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5025-5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 000册 定 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知  
舟  
PDG

## 作者简介

刘德斌,1957年生,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硕士,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集刊》杂志主编;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2-1993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事务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1997-199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东北亚区域史和当代美国政治,主要著作包括:《美国世界战略》、《撒切尔夫人传》、《国际关系史》(主编)、《当代国际关系问题》(主编)和《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主译)等。

# 总 序

献给读者的这套由 19 部专著构成的系列著作，是吉林大学“十五”“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两大趋势：一方面，随着冷战体制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终结，经济全球化日趋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区域合作在维护地区和平与促进地区共同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各种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趋加快。

冷战体制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局势出现了缓和。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各国间关系，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以有关国家地方政府间合作为主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与世界其它许多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上，主要领域的合作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深化合作还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该地区在冷战时期是大国矛盾的焦点地区，冷战体制后遗留问题较多，受冷战思维影响较严重，不仅地区内各国之间还没有完全确立互信机制，而且区域外的大国不断插手东北亚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气氛；第二，该地区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领土、领海争端，并且这种争端已经成为影响有关国家间正常关系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三，日本的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对外侵

略的历史罪行和给周边国家造成的历史灾难，甚至美化其侵略行为，结果招致深受其侵略灾难的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并且已经成为阻碍有关国家双边关系发展和多边合作的最主要障碍之一；第四，该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多种社会经济制度并存，历史文化传统复杂多样，各国间相互尊重与认同的基础还较为薄弱。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有效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区域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克服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学术界必须加深理论研究，这是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出版这套系列著作的目的所在。

朝鲜、韩国、蒙古、俄罗斯、日本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富邻、睦邻、安邻”的基本政策取向。上述基本原则和政策取向为我国全面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参与区域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我国实施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中国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需要以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保障，有效地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是实现中国东北振兴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学术界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问题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东北亚地区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而且也为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双边关系和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依据。

吉林大学对东北亚问题的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先后成立了有关日本、朝鲜、韩国及前苏联问题的专

门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东北亚地区国际问题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1988年成立了东北亚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发挥已有优势和充分体现特色，加强综合研究，1994年在原东北亚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实体性研究机构——东北亚研究院，并确立了对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等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研究；1997年，由东北亚研究院牵头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项目，被国家批准为“九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1999年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首批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以东北亚研究院为主联合相关学科，又被国家列入“985二期工程”——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在“九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圆满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之后，2001年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被国家批准为“十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五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东北亚问题研究又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这套“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就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这套系列著作的研究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国内迄今为止有关东北亚问题涉猎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系列性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对国际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种有益探索。希望这套系列著作的出版能够把东北亚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论述如有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王胜今

2006年3月16日



主 编 刘德斌

各编作者

导 言：刘德斌

第一编：杨 军

第二编：张乃和

第三编：张景全

第四编：徐 萍

第五编：王秋彬

## 导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的内政、外交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新时代。区域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焦点，区域史研究也就成为历史学界难以逃避的课题。但是，与国别史和世界史比较而言，区域史的研究和构建更加不易。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我们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

区域史重点研究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特定区域的特殊性及其发展规律、区域之间的互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超越单个社会或国家界限的世界区域化进程，至少从国家产生以来就开始了，从而形成了政治主导的古代区域世界、文化主导的中古大陆性区域世界、经济主导的近现代海洋性区域世界。全球化只是世界区域化的新阶段，即区域世界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的阶段。因此，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史就是区域世界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区域史。

东北亚区域世界的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连续性和完整性，不仅在古代就构成了能够自我说明的独特世界，并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强调区域合作与发展的今天，其历史遗产对东北亚各国发展以及未来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走向都具

## 东北亚史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没有出版一部完整的东北亚区域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国内外学术界对东北亚区域有不同的界定，本书基于地理范围与地缘政治的双重考虑，用东北亚概指今天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部分，尤其侧重作为地理区域的西北太平洋地区。

作为一部区域世界的通史，本书重点分三个层面展开研究：第一个层面——互动，重点研究东北亚区域内部各个族群、国家间的政治与军事互动、文化互动、经济互动。互动强度的不同是研究东北亚历史演进阶段性的重要线索之一。第二个层面——认同，重点研究东北亚区域各个族群、国家的自我认同、对他者的认同，以及对该区域的认同。当族群、国家的认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形成对他者的认同，也才会出现民族自树意识，由此带来的多族、多国的竞相发展，构成区域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线索。第三个层面——结构，重点研究东北亚区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特点。区域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使该地区成为具有自我说明能力的区域世界的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区域结构的发展与变化构成区域史研究的第三条重要线索。

我们认为，区域发展的历史就是族群与国家间由互动形成认同，由认同产生结构的过程。因此，本书研究的重点不是区域内各个国家独立发展的国别史的简单叠加，而是区域内部互动、认同与结构的演进历程。按照互动、认同与结构演进的阶段性及其不同特点，我们将东北亚区域的历史分成五个大的历史时期，即东北亚区域世界萌动与交融时期（10世纪以前）、多元与一体时期（10世纪初至1840年）、转型与博弈时期（1840年至1945年）、两极化与多样性时期（1945年至1991年）和多样性与区域化时期（1992年至今）。

在历史上，东北亚区域世界形成并维系了其独特性、完整性和

连续性的东北亚文化圈、封贡体系、朝贡贸易圈，中国是这一区域世界的中心。然而，日本至少从9世纪后期开始构筑“东夷小帝国”以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都致力于建立与中国对等的国交，除了明朝时期一度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外，在政治上都是自我中心的。东北亚区域世界内部各国之间和平友好的交往共同促进了各国的发展，但是不能否认，7世纪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之间的白村江之战，16世纪明朝、朝鲜联军与日本之间的战争，19世纪中日甲午战争，是东北亚历史上三次大规模战争，对这一区域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全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北亚丰厚的历史遗产将为当今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尽管我们对区域史的概念和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本书还只是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尝试，还不是我们所希冀的一本成熟的区域史著作，期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本书是几位中青年学者集体劳动的成果。其中，杨军教授和张乃和教授已经是卓有成绩的学者，张景全、徐萍和王秋彬是学术界的新人。我们出自历史学科的不同领域，每个人的学术偏好都不一样，但对区域史研究的爱好把我们整合到了一起，并形成了一种学术观点和视野上的互补。在撰写这本《东北亚史》的过程中，我们从彼此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并燃起一股热情，要把东北亚史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为读者奉献一部更为全面、深入和细致的东北亚史研究著作。作为主编，我只是在本书的框架设计与篇章布局方面投入了精力，在统稿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真正的作者是各编的撰稿人。他们以各自的学识使这本《东北亚史》血肉丰满起来。但无疑，本书的偏颇和谬误之处是应该由主编来负责的。

# 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 和社会发展”“十五”期间“211工程”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系列著作

- 中国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研究 王胜今、吴昊 主编
- 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李玉潭、陈志恒、殷立春 著
- 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研究 朱显平、李天籽 著
- 东北亚区域交通物流合作研究 赵儒煜、李晗斌 著
- 东北亚区域贸易合作研究 张宝仁、张慧智 著
- 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研究 庞德良、张建政 著
- 东北亚区域劳务合作研究 于潇 著
- 图们江地区跨国经济合作研究 王胜今、于潇 主编
- 转轨时期的俄罗斯金融市场研究  
——区域经济干预理论的实践 朱显平、邹向阳 著
- 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研究 黄凤志、高科、肖晔 著
- 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研究 刘雪莲、许琳 著
- 日本国家战略与东北亚外交 沈海涛、张玉国、巴殿君 著
-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  
——地缘政治与国家关系 刘清才 主编

- 东北亚史 刘德斌 主编
- 东北、内蒙古地区古代人类的种族类型与 DNA 朱 泓 主编
- 19 世纪中日知识分子比较研究 陈景彦 著
- 18 - 19 世纪俄国城市化研究 张广翔 著
- 论国民素质与和谐社会 王胜今、王国强、林盛中 著
- 战后美国产业结构演变及与欧盟比较研究 景跃军 著

## 目 录

导 言 .....	( 1 )
-----------	-------

### 第一编 萌动与交融 (10 世纪以前)

<b>第一章 一国与多族 .....</b>	<b>( 6 )</b>
<b>第一节 东北亚文明初曙 .....</b>	<b>( 6 )</b>
一、大陆东北亚 .....	( 7 )
二、半岛与海岛东北亚 .....	( 10 )
三、区域与互动 .....	( 11 )
<b>第二节 最早出现的国家：中国 .....</b>	<b>( 14 )</b>
一、“夷夏联盟” .....	( 14 )
二、方国与“封建” .....	( 18 )
三、从诸侯国到秦帝国 .....	( 22 )
<b>第三节 中国与东北亚 .....</b>	<b>( 27 )</b>
一、移民与族群 .....	( 27 )
二、中国对东北亚的经略 .....	( 31 )
三、早期东北亚世界 .....	( 34 )
<b>第二章 帝国与王国 .....</b>	<b>( 37 )</b>
<b>第一节 走向鼎盛的中国 .....</b>	<b>( 37 )</b>
一、汉唐帝国的演进 .....	( 38 )
二、中国东北族系的发展 .....	( 43 )

## 东北亚史

三、汉唐对东北亚的经略 .....	( 46 )
第二节 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形成 .....	( 51 )
一、草原帝国：匈奴 .....	( 52 )
二、百济与新罗 .....	( 56 )
三、从邪马台到日本 .....	( 58 )
第三节 古代早期东北亚格局 .....	( 62 )
一、东北亚文化圈 .....	( 62 )
二、羁縻与封贡 .....	( 66 )
三、盛唐的东北亚秩序 .....	( 69 )

## **第二编 多元与一体 (10 世纪初~1840)**

<b>第三章 多族多国竞相发展 .....</b>	<b>( 78 )</b>
<b>第一节 中国各民族自树意识增强 .....</b>	<b>( 79 )</b>
一、第二次南北朝时期 .....	( 79 )
二、各民族自树意识增强 .....	( 85 )
三、东北地区的统一 .....	( 89 )
<b>第二节 东北亚其他国家的演变 .....</b>	<b>( 92 )</b>
一、高丽的兴起与发展 .....	( 92 )
二、从摄关政治到镰仓幕府 .....	( 96 )
<b>第三节 封贡关系的发展 .....</b>	<b>( 101 )</b>
一、多层次贸易兴起 .....	( 102 )
二、朱子学形成与传播 .....	( 105 )
三、走向封贡体系 .....	( 109 )
<b>第四章 封贡体系的兴衰 .....</b>	<b>( 115 )</b>
<b>第一节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b>	<b>( 116 )</b>
一、中华一体时代 .....	( 116 )
二、东北地区的发展 .....	( 124 )



第二节 东北亚其他国家的重建 .....	(126)
一、李氏朝鲜的兴衰 .....	(127)
二、从镰仓幕府到德川幕府 .....	(135)
第三节 东北亚封贡体系的兴衰 .....	(141)
一、中国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确立 .....	(141)
二、东北亚其他国家与封贡体系 .....	(146)
三、东北亚封贡体系的衰落 .....	(153)
 <b>第三编 转型与博弈 (1840 - 1945)</b>  	
第五章 西方冲击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	(163)
第一节 西方世界对中国、朝鲜的冲击 .....	(163)
一、西方世界的兴起 .....	(163)
二、鸦片战争与中国的危机 .....	(167)
三、朝鲜的变革和衰落 .....	(175)
第二节 明治维新与日本的崛起 .....	(180)
一、幕末的动荡 .....	(181)
二、明治维新 .....	(186)
三、日本扩张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崩溃 .....	(192)
第三节 列强在东北亚的博弈 .....	(200)
一、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 .....	(200)
二、东北亚的结盟时代 .....	(205)
第六章 救亡图存与军国主义 .....	(216)
第一节 中国：从变法到革命 .....	(216)
一、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	(216)
二、从辛亥革命到北洋政府 .....	(223)
三、从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成立 .....	(230)
第二节 日本：构建东亚殖民帝国 .....	(239)

## 东北亚史

一、民主运动与政党内阁 .....	(239)
二、法西斯体制的建立 .....	(244)
三、称霸东北亚 .....	(250)
第三节 欧美列强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	(256)
一、欧美列强的均势政策与日德同盟 .....	(257)
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	(265)

## **第四编 两极化与多样性 (1945 - 1991)**

<b>第七章 走向两极：东北亚国家的分化组合 .....</b>	<b>(278)</b>
<b>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胜利 .....</b>	<b>(279)</b>
一、二战后的国际形势 .....	(279)
二、中国内战 .....	(282)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	(287)
<b>第二节 朝鲜半岛的分裂与朝鲜战争 .....</b>	<b>(291)</b>
一、朝鲜半岛的分裂 .....	(291)
二、朝鲜战争 .....	(296)
三、朝鲜战争的影响 .....	(299)
<b>第三节 东北亚两极格局的形成 .....</b>	<b>(301)</b>
一、中苏结盟与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	(302)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与美韩、美日特殊关系的形成 .....	(307)
三、朝鲜战争与两极格局的固定 .....	(310)
<b>第八章 多样发展：中、日、韩的不同发展道路 .....</b>	<b>(314)</b>
<b>第一节 “东方魔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b>	<b>(314)</b>
一、日本的民主化改革 .....	(315)
二、“倾斜生产方式”与经济九原则 .....	(318)
三、朝鲜战争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	(320)
四、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 .....	(325)

第二节 “汉江奇迹”：韩国经济成“龙” .....	(327)
一、李承晚时期的韩国经济 .....	(327)
二、朴正熙与“汉江奇迹” .....	(329)
三、威权体制的瓦解 .....	(336)
第三节 曲折前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坎坷进程 .....	(337)
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 .....	(338)
二、整风运动与大跃进 .....	(341)
三、经济调整与政治“左”倾的发展 .....	(345)
四、全国大动乱 .....	(347)
第九章 变与不变：70年代之后的东北亚 .....	(350)
第一节 中美建交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	(350)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	(350)
二、中美关系的变位 .....	(354)
三、中日建交 .....	(356)
四、中美建交 .....	(358)
第二节 东北亚局势的变与不变 .....	(361)
一、中韩、苏韩关系的初步发展 .....	(361)
二、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变化 .....	(364)
三、不变的东北亚双边关系 .....	(366)
四、冷战的结束与东北亚 .....	(369)
第三节 中、日走向全方位大国 .....	(371)
一、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 .....	(371)
二、中国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 .....	(375)
三、中国走向经济大国 .....	(377)
四、崛起的东北亚 .....	(382)

## 第五编 多样性与区域化 (1992 - 2005)

<b>第十章 冷战后东北亚各国发展的多样性</b> .....	(388)
<b>第一节 东北亚各国政治</b> .....	(388)
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 .....	(389)
二、日本政治改革与右倾化 .....	(392)
三、韩国“文民政治”的确立与发展 .....	(397)
四、朝鲜的“先军政治”路线 .....	(401)
五、俄罗斯、蒙古的政治转型 .....	(404)
<b>第二节 东北亚各国经济与社会</b> .....	(409)
一、日本与韩国 .....	(410)
二、中国（振兴东北）与俄罗斯（开发远东） .....	(416)
三、朝鲜与蒙古 .....	(422)
<b>第三节 东北亚各国文化</b> .....	(427)
一、东北亚各国宗教 .....	(428)
二、东北亚各国民族特性与传统文化 .....	(431)
三、区域文化互动：“日潮”·“韩流”·“汉风” .....	(435)
<b>第十一章 东北亚区域互动及其前景</b> .....	(441)
<b>第一节 冷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b> .....	(441)
一、东北亚各国外交战略 .....	(442)
二、东北亚双边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	(446)
三、朝鲜核危机与多边外交架构 .....	(455)
<b>第二节 美国与东北亚</b> .....	(461)
一、美国与东北亚的经济联系 .....	(461)
二、美国在东北亚军事部署及其调整 .....	(466)
三、美国的东北亚政策 .....	(471)
<b>第三节 迈向区域化的东北亚</b> .....	(475)

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	(476)
二、东北亚领土领海主权争端 .....	(480)
三、东北亚区域化：问题与前景 .....	(486)
大事年表 .....	(491)
参考文献 .....	(510)

## 图表目录

中国东北考古学文化简表 .....	( 8 )
村落联盟结构示意图 .....	( 16 )
西汉在东北亚的统治体制示意图 .....	( 49 )
东北民族政权简表 .....	( 50 )
百济、新罗官阶表 .....	( 57 )
汉代东北亚区域结构示意图 .....	( 67 )
倭五王时期日本对中国朝贡时间表 .....	( 71 )
1592 - 1598 年朝鲜卫国战争图 .....	( 133 )
中国与周边关系 (以清代为例) .....	( 151 )
1800 年前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	( 156 )
日本农产品价格下跌比例表 .....	( 245 )
吉长、吉会铁路的关系路线图 .....	( 258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北战场 .....	( 271 )
东北亚两大阵营对峙示意图 .....	( 275 )
现代朝鲜 .....	( 292 )
侵朝“特需”日本获利一览表 .....	( 321 )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	( 323 )
韩国的产业结构变化表 .....	( 335 )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表 (1978 - 1991) .....	( 380 )
东北亚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增长曲线图 .....	( 381 )
冷战后日本内阁更迭情况一览表 .....	( 393 )
1990 - 2005 年日本主要政党在众议院席位数一览表 .....	( 396 )

## 图表目录

1951 - 2002 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图 .....	(411)
1990 - 1999 年俄罗斯主要经济指标表 .....	(420)
2004 年东北亚各国经济实力比较 .....	(427)
1992 - 2003 年中日贸易额 .....	(448)
历次六方会谈朝美立场比较 .....	(460)
2004 年美国与东北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 .....	(464)
1998 - 2004 年美国在东北亚直接投资额 .....	(465)
1998 - 2004 年日韩两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数额 .....	(465)
美国在东北亚主要军事基地分布及三线配置示意图 .....	(467)

# 第一编

萌动与交融（10世纪以前）





## 导言

虽然我们尚不敢肯定，发现于东北亚西南部距今5 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是否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但是，东北亚南部地区在石器时代的发展水平决不落后于黄河流域。正是在东北亚与黄河流域这两个比较发达的区域文明的互动与交融中，孕育生成了东亚第一个国家中国。

东北亚最发达的南部地区一直由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西汉鼎盛时期在这里设有7郡近100县。西汉以后郡县辖区不断萎缩，至唐代仅存设于今辽宁省西部地区的营州。汉代也开始尝试以不同于中原郡县制的统治方法管理东北亚各族，其中最典型的是护乌桓校尉与辽东属国，这种尝试经以后各朝的不断完善，伴随着郡县区的内缩而逐渐扩大，至唐代形成与郡县体制并行的另一套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羁縻制。羁縻府州与内地府州最大的不同在于，羁縻府州的长官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并准许世袭，其对中央的隶属关系主要体现在接受册封、朝贡，并在需要时出兵配合中央王朝举行的军事行动。唐代在东北亚广设羁縻府州，将日本列岛之外的东北亚所有地区都纳入自己的统治，构建起古代早期的东北亚世界秩序。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东北亚相关的地区仅有中国步入了成熟的国家形态。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匈奴帝国虽然一度对中国构成威胁，但其与汉帝国较量的结果是，战败后国家分裂，南匈奴降附汉朝、北匈奴西迁欧洲，蒙古草原从此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东汉以后长达400年的中国大分裂时代里，东北亚不仅先后存在过夫余、诸燕、高句丽等中国的地方割据政权，也开始形成中国之外的

其他国家，由朝鲜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发展形成的百济与新罗，在日本列岛出现的大和政权，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开始面对如何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相处的新问题。

我们现在还无法证实，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古人类起源于东亚大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乃至中国步入成熟国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亚与黄河流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其交往的水平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早在尧的时代，黄河流域就曾派人到朝鲜半岛北部测定日影以制定历法；商王朝灭亡后，箕子率 5 000 殷遗民迁入大同江流域；《淮南子》中还记载着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海路赴朝鲜半岛的交通路线；周人则已经把远在长白山以北的肃慎人居住区看成自己的“北土”；在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日本列岛的百余“国”中已经有三十多个与中国形成某种联系。高水平的互动有力地促进了东北亚各地的发展与东北亚各部族的融合，在汉代以后，东北亚六大族系逐渐形成，汉族主要聚居于东北亚的南部，东胡族系活动于大兴安岭东西，肃慎族系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秽貊族系分布于松花江至大同江流域，三韩民族分布于朝鲜半岛南部，日本列岛诸部族也逐渐形成统一的大和民族。

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移民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使得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在形成国家之初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国家形态都是与中国类似的律令制国家。在百济、新罗与日本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对中国的朝贡关系，并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发展至唐代，东北亚各国在律令制度、中国式佛教、使用汉字、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并在音乐、书法、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层面，生产工具、天文、历算、建筑、中医药等技术层面，以及饮食习惯、服饰、筷子的使用、节日庆典、娱乐活动、体育活动等风俗层面，都受到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北亚文

化圈。

由多层面互动到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东北亚逐渐形成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并存在密切经济联系和移民往来的古代共同体。文化方面的相似性不仅证明东北亚地区具有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是东北亚各国之间逐渐形成特殊的东北亚古代国际秩序的基础。

## 第一章 一国与多族

由猿到人的过渡，如果从印度的腊玛古猿算起，大约经历了1 000多万年。但多数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始于距今300~200万年的非洲南方古猿，经历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发展阶段，在距今约3.5万年前，形成晚期智人，这才是与现代人体质差别不大的人类。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考古学上把人类使用石器工具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自大约270~250万年前至1.5万年前，人类主要使用打制石器，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距今1.5万年左右开始的以磨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的新石器时代，在世界各地结束的时间差异非常大。

在旧石器时代，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中国山西西侯度遗址距今180万年，中国云南元谋上那蚌遗址距今170万年，在爪哇岛上也发现了早期的人类化石。此外，距今几十万年的考古学遗址也有若干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起朝鲜半岛、南至爪哇，包括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弯月形地带，是东亚世界最早的人类栖居地。东北亚的南部地区包括在这一弯月形地带之内。

### 第一节 东北亚文明初曙

以朝鲜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距今60~40万年）、<sup>①</sup> 中国辽宁

---

<sup>①</sup> [日] 西谷正著，赵善桐、方红象译：“从考古学看原始、古代社会——〈新朝鲜史入门〉第二章（节译）”，《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1期。

本溪庙后山（距今40~30万年）和辽宁营口金牛山（距今30~21万年）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sup>①</sup> 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是东北亚古人类最早的栖息地。自此以西，在蒙古国的色楞格河流域、土拉河流域、鄂尔浑河流域，以及在北杭爱省、布尔干省、东戈壁省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sup>②</sup> 年代大约都在2~1.2万年之间。<sup>③</sup> 自此以北，在今俄罗斯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较早的库马拉二号遗址，距今也仅有5万年。<sup>④</sup> 而日本列岛陆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都没有超越距今3万年的时限。很明显，在旧石器时代，从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居于东北亚的中心，也是东北亚初现文明曙光的地方。

虽然我们尚无法弄清东北亚古人类自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演进的历程，但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东北亚已经形成不同的文化区则是不争的事实。

### 一、大陆东北亚

包括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北在内的大陆东北亚，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大兴安岭以东至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北地区，其文化方面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平底筒形罐为基本的陶器形态；<sup>⑤</sup> 一是蒙古草原。前者包括东北亚旧石器时代的核心区在内，在新石器时代的东北亚仍旧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内部发展已经

---

① 陈铁梅：“我国旧石器考古年代学的进展与评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H·赛尔奥德扎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遗存简述”，《考古》，1961年第3期。

③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④ 参见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6页。

⑤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 东北亚史

开始出现明显差异。

在今天中国的东北地区，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已识别和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共有二十多个（详见下表），已经发现两种格局的村落遗址。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村落遗址，房屋多成排分布，可以分为不同的小区，而且往往有壕沟围绕——这显然是一种军事防御设施；在下辽河流域发现的遗址，房址多以大型房屋为中心，中、小型房屋分布于大型房屋的周围。两种村落遗址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不仅已经步入农耕社会，而且内部存在比较发达的社会组织。相比而言，前者的社会组织似乎比后者还要严密、强固。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大型祭坛建筑、女神庙及以积石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表明，这里很可能在距今5 000年前已经开始向国家演进，由此看来，东北亚史前社会的发展水平显然并不落后于东亚文明的核心即中国的中原地区。

中国东北考古学文化简表

时间段	考古学文化
前仰韶时代	兴隆洼文化、左家山一期文化
仰韶时代	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小朱山下层文化、小朱山中层文化
龙山时代	小朱山上层文化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西拉木伦河和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玉雕龙”，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时代上最早的龙的雕塑。考古学家们也将玉雕龙称之为“玉猪龙”，因为在其身上我们还可以发现某些猪的特征，学者们由此猜测，龙在现实中的原型很可能是猪。玉雕龙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远古时代东北亚的西南部地区已参加到构建中华文明的宏大的族群与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东北亚是

中华民族吉祥物龙的发源地。

在朝鲜半岛的清川江以北地区，亦即今朝鲜的平安北道和咸镜北道，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以西浦项遗址一、二、三、四期文化为代表。<sup>①</sup>西浦项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房址，说明这里的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朝鲜半岛北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存在简单的农业生产，但是渔猎经济还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俄罗斯远东的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小区，在这三个小区中共发现十多个考古学文化。黑龙江下游区有奥西波夫卡文化、马雷舍沃文化、孔东文化等；黑龙江中游区有新彼得罗夫卡文化、格罗马图哈文化、奥西诺湖文化等；滨海地区有鲁德纳亚文化、博伊斯曼文化等。该区域的文化共性是：虽然长期定居的遗迹和发达的陶器证明，当地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但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其经济形态可能仍旧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的。

自中国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向东至朝鲜半岛的清川江以北，再向北到俄罗斯远东的南部，在新石器时代依次存在比较发达的史前农耕经济区、农耕与渔猎并举经济区和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呈梯级递减的趋势。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今辽西地区已成为东北亚发展最快的地区，这显然主要受益于其联系中原与东北亚的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

蒙古草原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是指今蒙古国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以亚马特湖遗址为代表；第二期以敖包奥特、塔木察格布拉格、都兰乌苏遗址为代表；第三期以克鲁伦河沿岸及西绍尔温湖畔遗址为代表。从第二期开始出现的石锄、石杵等农业工具表明，当时人们的经济活动已由采集发展到锄耕农

---

<sup>①</sup>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李云铎译：《朝鲜考古学概要》，黑龙江省文物编辑室1983年版。



## 东北亚史

业。在此时期，牲畜饲养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日后蒙古草原走向游牧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应该说这种趋势在此时已经初现端倪。但是，狩猎经济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发展并不能做乐观的估计。

### 二、半岛与海岛东北亚

东北亚的半岛与海岛部分，我们主要指今俄罗斯远东北部、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南和日本列岛，在新石器时代，上述地区文化的共性是以尖底或圜底的卵形陶器为基本的陶器形态。半岛与海岛东北亚也可以进一步分为今俄罗斯远东北部、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南和日本列岛三个亚区。

今俄罗斯远东北部与东西伯利亚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这一地区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有伊萨科沃文化、谢洛沃文化、基托伊文化等。该地区的陶器不发达，相反细石器却很发达，而且房屋发现较少，多见墓葬，说明当时的人们尚过着游动或半定居的生活。

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以弓山一、二、三、四期文化为代表，该遗址中发现了房址，证明当时人已经定居。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有些地区渔猎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能是由于地域上的原因，朝鲜半岛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间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很少，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交流比较多。

因当时主要使用绳纹式陶器，日本列岛的新石器时代又被称为绳纹时代，其文化称为绳纹文化。依据绳纹式陶器的演变，可分为早、前、中、后、晚五期。绳纹时代的人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在河边或沿海地区，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直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才出现了稻米种植。人们用弓箭狩猎，捕鱼工具有鱼叉和鱼网。住房是竖穴式的，屋内设有炉灶。居民有青春期拔牙的习俗，学者们推测这可能是被接受为氏族正式成员时举行的一种成年仪式。

日本明治大学于1949年发现的距今大约3~2万年的岩宿遗址，长期被认为代表着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开端。此后日本列岛陆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都没有超越3万年的时限。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一系列考古学发现在不断地刷新其旧石器时代的上限，但在藤村新一骗局被揭露之后，所有新发现的可靠性都成为问题。因此，我们没有采用日本列岛旧石器时代开始于50万年前的新说。<sup>①</sup>从日本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水平来看，其旧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实在也不会很早。

半岛与海岛东北亚的社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大陆东北亚，只有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农耕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渔猎经济仍旧占有较大比重，其他地区基本仍以渔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

### 三、区域与互动

东北亚的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与旧石器时代相同，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的发展仍旧居于领先地位。总体看，今辽西地区代表着东北亚新石器时代的最高发展水平，由此向东、向北，呈发展水平递减的趋势。尽管渔猎采集还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但这里的人们无疑已开始走向农耕与定居。而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朝鲜半岛南部、日本列岛还是今俄罗斯的远东部分，都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在多数地区里，人类尚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蒙古草原的东部地区虽然已经出现简单的锄耕农业，但不仅渔猎采集经济仍旧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始出现重视牲畜饲养的倾向，基本形成经济方面的“复合型”特点。

与旧石器时代相比，在发展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辽东—大同江区域有所扩大，西包今辽宁省西部地区、北达松嫩平原的边缘、东至大同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已经形成南抵渤海沿岸向北部扇形展开的

---

<sup>①</sup> 安志敏：“日本的前期旧石器——高森遗址”，《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2期。

## 东北亚史

东北亚经济文化重心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至盛唐时代，这里一直是东北亚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在此重心区的东部，今天中国东北地区的北部、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南部与日本列岛呈半环状展开，在此时期仍旧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远落后于重心区，但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这一环状结构的北部倾向于保持同时从事农耕、畜牧与渔猎采集的“复合型”经济，南部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农耕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并大量吸纳中华文明，与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差距越来越小，都成为“东北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区。

而在东北亚经济文化重心区西部的蒙古草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简单的锄耕农业，但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此时期已经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比例的畜牧业日后迅速发展，在进入公元前一千纪之后不久，这里已经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草原文化。东部的半环状地带与西部的蒙古草原地区一起，构成了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日本学者甲元真之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认为：“出土谷物的遗址的年代范围，在6000年前，是辽西台地和辽河下游，到4000年前向东推进，到达大同江下游。到3000年前，到达第二松花江，到2500年前，到达朝鲜半岛，到2000年前，则分布到沿海地区的南部。”<sup>①</sup>也为我们上述分析提供了证据。

在新石器时代，上述三个区域已经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存在互动关系。今俄罗斯远东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的器形及纹饰与今中国三江平原发现的新开流文化相近，而朝鲜半岛目前还没有发现新开流文化和俄罗斯远东南部常见的“阿穆尔编织纹”；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常见陶壶，而在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却没有。由此推测，今俄罗

---

<sup>①</sup> [日] 甲元真之著，滕铭予译：“东北亚地区的初期农耕文化——以分析自然遗物为中心”，《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7年第2期。

斯远东地区主要与中国东北的北部地区互动、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北地区主要与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互动。

日本列岛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亚洲大陆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列岛的最初居民来自亚洲大陆，吴新智认为，日本冲绳岛港川发现的人骨与中国广西柳江发现的人骨比较接近，日本古人类可能来自中国广西。<sup>①</sup> 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裴文中都是从日本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石器与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存的相似性出发，认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古人类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sup>②</sup>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种联系更趋紧密，多数学者认为，继绳纹文化之后兴起的弥生文化，就是在大陆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的刺激下出现的。日本列岛还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隔海相望，在新石器时代，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文化上的交流，日本绳纹文化的陶器可能已传入千岛群岛等地的南部，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有些纹饰可能受到日本绳纹文化的影响，但日本列岛与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联系显然不如与中国的大陆部分密切。

大体说来，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的边缘地区之间互动水平较低，而各边缘地区都与经济文化的重心区保持较高水平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模式不仅有利于重心区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向边缘地区传播，也有利于区域内部的整合，使之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

新石器时代的东北亚，也开始与区域外部发生互动关系，由于东北亚东、南临海的特殊地理环境，这种互动主要体现为以辽西为前沿的与中国中原地区的互动。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已指出，约在距今7000~5000年间，源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向西南发展，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与源于华山脚下

---

① 吴新智：“中国与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沿汾河南下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sup>①</sup>

## 第二节 最早出现的国家：中国

传世文献与金文的记载中，都是将中国中原地区以东的居民称为“夷”。从汉字的造字法来看，“夷”字从弓、从大，大就是人，“夷”作为象形字，是指背着一张弓的人，这无疑是对渔猎经济的特点的最准确归纳。因为“夷”人居住区位于华夏族的东方，后世也称之为“东夷”。需要说明的是，东夷并不像学术界通常认为的那样，仅指山东半岛的非华夏族，而是包括东北亚南部地区的居民。东北亚南部的经济文化重心区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这一地区孕育生成东亚第一个国家——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夷夏联盟”

农耕经济的出现使人类由渔猎经济下的不断迁徙状态走向定居，<sup>②</sup> 为便于从事农业生产，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也是由于在原来渔猎采集经济类型下，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游群人数很少，因此，早期自然形成的村落规模都是比较小的。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最初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建立的居民点，逐渐分化为普通的村落与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心聚落，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但二者作为居民点，从本质上讲，其结构是相似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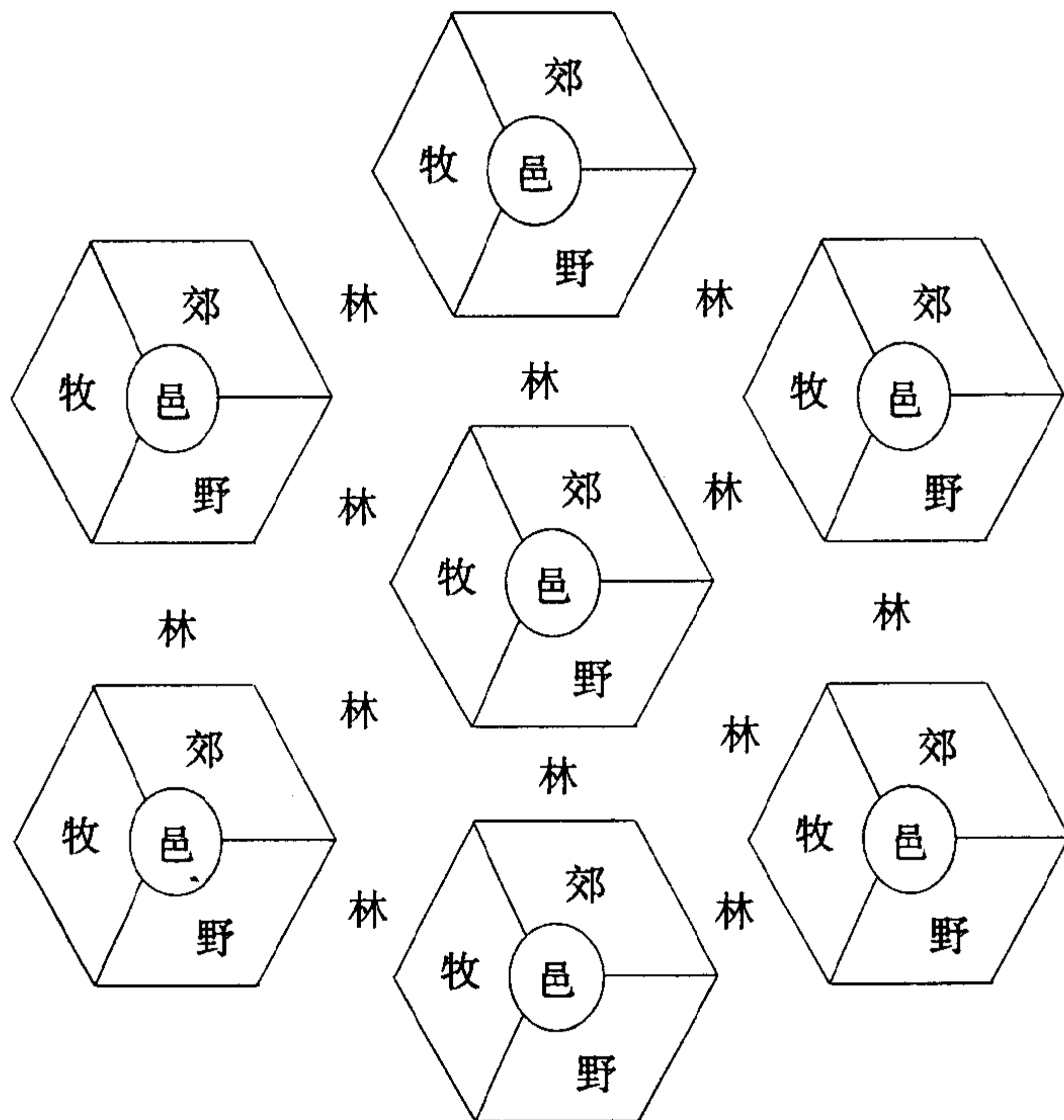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9~160页。

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人类是先定居而后才发展了农业。参见巴里·布赞著，刘德斌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

《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坳。”说的就是早期居民点的模式。当然，上述整齐划一的理想结构，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不是没有，也必定不会是普遍的形态，抛开其他因素不论，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这种整齐划一的结构面对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不易操作的。刚刚转操农业并定居下来的人们，并不是以农业为惟一的谋生方式，在农业之外往往兼营畜牧与渔猎。因此，在环绕居民点的地区，除农田以外，必然还存在用于经营牧业与从事渔猎采集活动的地区，二者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与农业不同，其活动区域也必然要与农田相区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尔雅》的记载，则“郊”是农田所在地区，而“牧”和“野”则是从事畜牧业与渔猎采集活动的地区。“郊”、“牧”、“野”作为人们从事食物生产的主要活动场所，呈环状围绕在居民点的周围，而不是一环套一环的三重环状结构。在此之外，就是尚未开发的“林”、“坳”等原始森林地带了，居民点之间的天然界线也正在于此。但这一地区对生活在居民点中的人们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是“林”、“坳”这一森林地带，为居民点中的人们提供作为建筑材料和作为燃料的木材，也为他们简单的手工业提供原材料。

由于村落在发展过程中的裂变，也由于村落发展的不均衡性，某些村落规模膨胀，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中心聚落，对其他村落有一定的控制力。中心聚落及其控制下的诸村落共同构成一个简单的村落联盟。一个包括七个村落的简单村落联盟的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村落联盟结构示意图



中心聚落的进一步发展，是出现基于血缘关系的中心聚落之间的联盟、或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对其他中心聚落的吞并，从而形成由多个中心聚落组成的复合式村落联盟，这也就是史书记载的方国与甲骨文中经常出现的“方”、“邦方”。

随着人口的增加，村落倾向于自我复制的裂变，而复合式村落联盟的发展，则倾向于不断吞并其他村落或村落联盟。在前国家社会中，人类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演变就在这两种运动方向正好相反的力量中摇摆。当裂变的趋势超过吞并时，人类社会就继续停留在前国家形态之中，当吞并的趋势压倒裂变时，人类社会就开始向国

家演进。当多个复合式村落联盟集合起来，形成规模更为庞大的联盟时，联盟层级的增多与规模的增大使得其管理模式趋于复杂，最终将人类推入国家形态之中。最晚在尧舜禹时代，中国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了。

尽管古籍中对黄帝乃至尧、舜、禹的个人品德大加赞扬，但如果根据《史记》的记载，把这一大联盟的建立上溯到黄帝时期的话，我们就应该注意到，黄帝打败炎帝、蚩尤，正是大联盟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联盟最高首领地位的确立虽然有赖于作为血缘组织的各部落与作为地缘组织的各村落的认可，但其武力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这种大联盟远不是国家，一方面是因为联盟首领还无法对各部落、村落的内部事务加以干涉，也不存在地方统治体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尚未出现任何政府组织机构与暴力机关。联盟首领拥有多大的权力，取决于其能取得多少部族、村落的支持。即使对破坏这种秩序的部落、村落的武力征讨，也是依靠积极支持这种秩序的部落、村落的武装来进行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黄帝以后联盟的最高首领依次是：

黄帝—颛顼—帝喾—挚—尧—舜—禹

我们现在可以证明，颛顼、挚、舜都是东夷人。<sup>①</sup>禹生前先后选定的继承人皋陶与伯益也都出自东夷人的部落。<sup>②</sup>对照上述世系可以发现，尧舜禹大联盟的最高首领每隔一代就出现一位东夷人。由此

---

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少昊挚以鸟为图腾，其后裔郯子又是东夷小国之君，显然挚属于东夷民族集团。《孟子·离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说明舜也是东夷人。据张博泉先生考证，颛顼氏居住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地区，也属于东夷人的活动范围。参见张博泉：《箕子与朝鲜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② 高光晶认为，皋陶与伯益都属于少皞氏集团，即出自东夷。参见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推测，联盟内部可以分成两个系统：炎黄系与东夷系，二者是平等联盟的关系，联盟的最高首领由两系轮流担任。因此，也许我们将这个大联盟称为“夷夏联盟”是更为准确的。

从《尚书·禹贡》的记载来看，活动在朝鲜半岛北部和大同江流域的东夷人分支岛夷，也是夷夏联盟的组成部分。从辽西到大同江流域，东北亚经济文化重心区全部加入了夷夏联盟。

禹的儿子启自立为联盟最高首领时，他破坏了两方面的惯例，一是炎黄系与东夷系轮流担任联盟最高首领的惯例，一是联盟最高首领出于选举而不是世袭的惯例。启受到来自炎黄系内部与东夷系两个方面的反对，但以有扈氏为代表的炎黄系内部的反对派，主要是为了维护最高首领的选举制，或者如王和的解释，是“谁代表姒姓部族出任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的位置之争”；<sup>①</sup>而后羿领导下的东夷人的反抗，<sup>②</sup>则是为夺回东夷系出任联盟最高首领的权力。当启的后裔最终平定了各种反对势力确立世袭制之后，大联盟就开始向国家演进了。中国也随之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

## 二、方国与“封建”

在东夷人的首领后羿推翻夏朝统治的日子里，逃亡的夏王室子孙得到许多方国的协助，最后终于复国，这反映出夏是众方国的领袖，即使在最落魄的时期还受到许多小国的拥戴。夏人在诸小国中的这种影响力显然不是启继位之后所能建立起来的，证明在启以前，诸小部落已习惯于拥戴一个实力较强大的部落做自己的领袖。夏人、商人、周人乃至后羿所在的部落，都是拥有这种领袖地位的部落，

---

① 王和：“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② 《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对晋侯悼公的话：“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都在羿的名字前贯以“夷”字，显然羿是东夷人的首领。

也只有这些部落才具有问鼎最高首领的实力。所谓夏朝、商朝，实质上是以夏人或商人为盟主的各方国间的联盟。

无论夏代还是商代，所谓王室都既拥有自己直接统治的部族，又被其他强大的部落公推为“天下共主”，发挥着调节各部落关系、维护东亚核心地区秩序的作用。其疆域分为两部分：归王室直接统治的核心区，也就是所谓“王畿”地区；承认王室领袖地位的诸部落的居住区。这种内-外双环式疆域结构一直为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

但是，自夏朝开始的方国联盟与夷夏联盟已经存在本质性差异。最高首领已经确立起世袭制度，夏朝如果从禹算起，共传 14 世 17 王，除了仲康和扃是兄终弟及外，其他都是父死子继。其中央设有四辅、六卿、四正、后稷、司徒、太史等官职，还有掌管刑狱的大理和管理赋税的财税官。地方统治结构分为三种类型：在统治中心区设立州师，在中心区以外建立侯国，侯国以外建立五服，形成由内及外统治力度依次递减的环状统治结构。夏人还可能已经形成了军事制度，镇压机关在逐渐完善。这一切都是处于前国家形态下的夷夏联盟时期所无法想象的。杜正胜从学术界通常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出发，考察夏代的宫殿遗址、青铜器、玉器，认为：“商周国家权力的基本要素和性格在夏代晚期皆已具备，二者只有程度之异，没有本质的差别。”<sup>①</sup> 可以肯定，夏代的方国联盟已经步入国家形态。

不可否认，在夏代的社会结构中，氏族制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夏人承认这些氏族部落存在的合法性，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也不试图改变其原有的统治结构，这些氏族部落则承认夏人是他们的“共主”。夏朝的国家形态尚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处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

---

<sup>①</sup> 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 年第 1 期。

商人代夏之后，只是其直接统治的地区与势力所及的范围都有所扩大，其与诸方国间的关系及双环式疆域结构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夏代一样，商代社会结构的根本特点是方国联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商王室与方国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早商时期，方国联盟具有浓厚的原始民主、平等的性质，不存在后世那样的赋役征发，以神权作为维系诸方国的主要纽带，而不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允许敌对势力中被征服者加入自己的联盟。而发展到晚商时期，商与诸方国间更多的是主从关系，商王向诸方国征收贡物、调集人力的记载屡见于甲骨卜辞。神权退居从属地位，也不再允许被征服的敌对势力以平等的地位加入方国联盟，而是将其直接变为商人的辖区。<sup>①</sup> 这些变化表明，同夏人相比，商人对诸方国的统治力度在逐渐加强。

商王朝廷有最高政务官、一般政务官、宗教文化职官、生产经济部门职官、军事职官等五个部门的职官，地方上既有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侯、甸、男、卫、邦伯，也有作为地方基层官吏的“族尹”。为了有效地实施统治，商王们除用物质的手段：军队、监狱、刑罚等外，还大力神化自己。商王和神混一、王权和神权一体，是商代王权的重要特点。<sup>②</sup> 这也对后来东北亚各国的政体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商代并未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但作为早期国家，其各个方面显然都比夏王朝有长足的发展。

商人先世起源于东北亚的西南部，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的

---

① 晁福林：“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杨升南：“商代的王权和对王权的神化”，《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七老图山一带,<sup>①</sup>商人南下取代夏王朝,是东北亚族群在中国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最明显表现。商亡前箕子东迁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立国,是商遗民向本族发源地的回归,掌握中原地区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商遗民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东北亚南部地区的发展。正是东北亚南部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这种互动关系,使两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东亚各地之首。

周人灭商之初面对的仍旧是传统的双环式疆域结构,周人的直接统治区仅有渭水流域。周人建国初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原商人直接统治区上,在东至山东半岛、南达汉水流域、北至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封建了许多诸侯国,迁徙部分周人与商遗民、当地土著民族一起立国。新封建的诸侯国与旧有的方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周王封建的,这些诸侯王对领土、人民的权力都出自周王的授予,而后者是自生性质的。因此,新封建的诸侯国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独立性,但对周王室的隶属关系较强。

通过分封制,周人不仅牢固地控制住原商人直接统治区,而且开创了一种王室与诸方国关系的新模式。以武力为后盾,辅之以宗法制、礼制和同姓不婚原则,采用会盟、朝覲、巡狩等方式,周人逐渐将原有方国都纳入到诸侯国的新机制中来,各方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不再像夏商两代那样,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而是等级森严的君臣隶属关系了。通过这种方式,周人直接统治的领域比商人又有所扩大。

但是,西周中央职官的设置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军政合一性,部分职官的分工不明确,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是不可分的,在任官上实行亲亲与尚贤相结合的原则,史官和宗教官仍具有重要性。虽然其中央职官可以分为民事职官系统、神事职官系统、王事职官系

---

<sup>①</sup> 参见: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载朱东润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干志耿等:“商先起源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统，但在实际运作中，三大类职官系统往往交织在一起。这都反映出其国家形态不成熟的一面。在地方统治方式上，实行世官世禄的诸侯国与后代的地方行政设置也具有本质的差异。因此，西周仅是早期国家的典型阶段，并未发展为成熟国家。

周人将诸方国纳入诸侯国体制，其初衷是扩大周人直接统治的区域，但这样一来，周王室面对的诸侯国的数量空前膨胀，反而使周王室难以控制。周王室无力完全阻止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与兼并，那么，在王畿以外出现势力超过王室的大诸侯国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了。周王室势力的相对衰弱，使大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无序状态。春秋时期的诸国争霸，是试图恢复从前的方国联盟推举公认的盟主的方式，在各诸侯国之间确立起一种新秩序。但现在的各诸侯国比之从前的方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旧秩序是无法解决新的现实问题的，除了发展成熟的几个大国通过武力决定由谁来统一各诸侯国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 三、从诸侯国到秦帝国

公元前 771 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平王东迁，标志着西周的结束、东周的开始。“周之东迁，晋郑是依”，<sup>①</sup> 政治中心转入今河南。随着王室的衰微，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相继成为诸侯的盟主，这就是“春秋五霸”。从贯穿春秋时代的大国争斗的形势入手，可以将春秋时代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东方的齐国称霸的时期、北方的晋国称霸的时期、南方的楚国称霸的时期、晋楚两国南北对峙争霸的时期和兴起于东南的吴越两国北上争霸中原的时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内，东、北、南、东南各方依次兴起，既反映出该区域内各文化亚区的竞相发展，也反映出各地区之间交往日益频繁，逐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为一体。

---

<sup>①</sup> 《国语·周语中》。

经过春秋时代的兼并，西周初年的 1700 多个诸侯国，到战国初期仅存二十余个。其中最强大的是被称为“战国七雄”的秦、楚、燕、韩、赵、魏、齐。此外还有中山、宋、卫、邹、鲁等小国，有所谓“泗上十二诸侯”。上述各国的疆域不仅涵盖了周人直接统治的所有地域，外围的几个大国还有所开拓。燕国在鼎盛时期打败箕子后裔朝鲜侯，其在东方设立的辽东郡不仅统治辽东半岛，东端已经达到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燕、秦长城的东部起点都是在大同江入海口附近。

夏代已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早期国家，后世所说的五谷夏代都已经存在。古人认为，夏代第六个王少康时发明了用黄米造“秫酒”。少康也被称为杜康，因而杜康也就成为酒的别名。但夏商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主要还是石器、骨器和蚌器，发展不大，渔猎经济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至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才由粗放农业发展为精耕农业。随着铁工具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较大提高，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战国时人已经慨叹“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了。<sup>①</sup> 这一系列的变化也势必导致管理体制的变化。

从春秋时代的大国争霸到战国时期诸国关系的无序状态对各国构成持久的外部压力，自春秋时代开始，为保证本国的安全和发展，中原各主要诸侯国都进行了内政方面的改革，至战国时期，更发展为遍及各国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变法运动。各国的变法虽然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变法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变法的大方向却是基本一致的。政治上，最重要的变革是打破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原则不再是以世袭制为主，由国君通过选贤任能、因功授禄等办法选拔任命的官员在政府中占居了主导地位，官员的报酬也以俸禄制为主，而不再以采邑制为主。各国还逐渐确立了对

---

<sup>①</sup> 《战国策·赵策》。

官员的年终考绩制度、监察制度。各国的中央官制虽然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都已经划分为以相为首的政务官系统和以将军为首的军事官系统，实现了军政分开，官员的执掌比较明确。

从春秋时期开始，各国逐渐确立乡里制度为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最基层的单位是由五家组成的伍，或称轨、比、邻，其上是里，也称间，里之上是乡。最初，乡是最高地方行政机构，但随着诸侯兼并的进行，各国的疆域越来越广阔，就必然在乡之上设立另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于是就出现了郡县。春秋时期各国的郡往往设于边境地区，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边境地区也逐渐繁荣，郡的面积过大的矛盾就凸显出来，这才出现郡下划分为若干县的做法。战国时期不仅已经出现成熟的户籍制度、赋税制度，还实行连坐法，对基层的各个方面的控制都是相当严密的。

春秋时代，晋国曾铸造刑鼎，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鼎上公布，这是见于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成文法。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完善法令法规。李悝在魏国变法时编定的《法经》，被誉为“第一部系统化的封建法典”。从湖北云梦发现的秦律竹简可以看出，战国晚期秦国就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而且政府重视法律的实施，要求官吏依法办事。战国时期，各国都设立了常备军，并存在征兵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都出现了一些发挥重要经济功能的城市。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国的贸易也有较大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一国旧境出土其他国家货币的情况带有普遍性，证明战国中晚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已不再是孤立的国别经济，相邻诸国已形成区域性经济，而一个区域性经济又与另一区域性经济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既统一而

又相对区域化的网络状经济体系。<sup>①</sup>

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各国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使战国时代各主要国家都已经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由于历史的关系，各国都没有选择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在进行统一的努力。

晋国分裂前是中原地区的大国，对东方的齐、南方的楚、西方的秦都起到牵制与遏制作用。三家分晋之后，魏国以发达的中原经济为后盾，率先变法，迅速成为强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以后，赵国也强盛起来。但是，韩、赵、魏居于中原地区，外围是秦、齐、楚等强国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很难对外拓展。至战国中后期，幅员辽阔的秦、楚等国经济逐渐发展，国土面积上的优势也就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魏、齐相争，燕、齐仇杀，三国实力受到较大的削弱之后，秦国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秦国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对内以耕战立国，对外强调远交近攻，一开始与齐、楚保持友好关系，重点蚕食与之相邻的韩、赵、魏三国的领土。关东各国感到了秦国的威胁，许多政治家主张各国联合起来抗秦，“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所谓的“合纵”。秦国采取的对策是“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拉拢个别国家与自己联合对付其他国家。在离间齐、楚，夺取巴蜀，又在长平打败赵国主力部队之后，秦国的统一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至公元前221年，秦最终灭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朝的中央政府，皇帝集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权力于一身，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在地方行政上，秦朝废除了分封制，把原来秦国的郡县制度推行到全国。各郡年终均须向皇帝报告税收、户口增减和治安情况，称为“上计”。郡下设

---

<sup>①</sup> 周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贸易及货币的流通”，《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县，县以下有乡、里和亭两种不同的政权系统，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是治安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的官职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所有官吏都由皇帝任免或调动，领取国家俸禄。秦王朝的国家机构，充分显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特点。此外，秦王朝还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sup>①</sup> 改变战国时代货币分布钱、刀货、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的局面，统一货币；“书同文”，以小篆统一原六国文字。

经历夏商西周复杂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之后，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一个文化高于周边地区的新民族：华夏族。春秋时期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即已折射出这个新出现的民族的心理认同感。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主要国家内部都存在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秦的统一既是这一民族融合过程的结果，也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华夏族在融入大量其他民族的基础上，至秦代以后，终于形成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与政治上的双层环状结构相吻合，中国民族分布格局也形成了汉族居于中原、其他民族居于汉族四周的双层环状结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期，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形成深远影响。

中国最早形成国家并率先步入成熟国家的发展阶段，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这对东北亚政治格局的确立以及东北亚各地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

<sup>①</sup>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北亚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东北亚南部地区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东北亚西南部的部族甚至参与了中国早期国家的构建。自中国形成之日起，东北亚的部分地区就已经是这一政治实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了。在中国由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演进的历程中，由于东北亚不存在其他国家，中国的势力得以随意拓展。中国的统治重心虽然不在东北亚，但其势力毕竟已经深入东北亚地区。

燕国的开发与建设使东北亚南部地区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比较接近。与中原各主要国家一样，在战国时期这里也发生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新出现的民族共同体在汉代也被称为“汉人”，应该说，东北亚的南部地区也是汉族的发源地之一。

#### 一、移民与族群

早在史前时代，东北亚地区民族迁徙的规模和距离就已经令现代人叹为观止。东北亚的族群或者说中原的族群北上途经东北亚、通过今天的白令海峡一带迁往美洲，发展为美洲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这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自炎黄时代至商朝中后期，东北亚民族迁徙的方向主要是南下。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东北亚地区的夷人曾先后三次大规模南迁，自东北亚进入黄河流域。夷人的第一次迁徙是在启篡夺领导权之后不久，夷人在羿的领导下迁入中原，并曾一度取代了夏人的统治地位。在夏人复国以后，进入中原的夷人各部也就都处于夏人的领导之下了。这部分夷人渐渐与黄河流域其他部族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源头之一。夷人的第二次南下是在夏代中期。原居于东北亚西南

## 东北亚史

部的西辽河上游一带的商人，作为夷人的一支，逐渐南迁今华北平原。《竹书纪年》记载，商人的祖先冥曾受夏王的任命治理黄河，证明此时商人已由其发源地南迁至易水以北的河北地区了。<sup>①</sup>此后，商人不断南迁，最终取代了夏人，成为中原的统治者。在商王朝统治期间，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炎黄系先民逐渐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夷人的第三次南下是在商朝中后期，此次迁徙的目的地是淮河、泰山一带。终商周两代，这部分夷人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色，并使得先秦时代的山东地区，具有了与中原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风貌。下至秦代，“淮、泗夷皆散为民户”，<sup>②</sup>至汉初，这部分夷人因与华夏族杂居，渐与之融合，成为汉族的来源之一。综上所述，东北亚的民族不仅参与了对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的构建，也参与了中国境内主体民族华夏—汉民族的融铸，是华夏—汉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中原地区对东北亚的移民也开始得很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向东北亚大规模移民是商末箕子率殷民5 000人迁居辽西，又从这里迁往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立国。箕子东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sup>③</sup>在大同江流域立国以后，大力推行殷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大同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这里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辽西甚至是中原，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吸引中原移民东来大同江流域的动力。秦末中原大乱时，即有数万中原移民迁居大同江流域，几乎占当地总人口的半数。西汉时，燕人卫满就是依靠这些中原移民的力量成功取代了箕氏朝鲜，建立自己的统治，史称“卫氏朝鲜”。

箕子率殷遗民在大同江流域立国，也对东北亚夷人的社会发展起到刺激作用。生活在箕氏朝鲜以北的夷人各部逐渐模仿箕氏朝鲜

---

①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② 《后汉书》卷85《东夷传》。

③ 徐居正：《华苑杂记》引涵虚子《天运绍统图》，转引自张博泉：《箕子与朝鲜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的体制形成自己的方国——秽邪头国，这可能是其本民族的名字，而中国史书一般简称为“秽国”。在此以后，为将东北亚的夷人与迁入中原特别是山东半岛的夷人相区别，中原人往往将东北亚的夷人称为“秽人”。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箕氏朝鲜还是秽国，在政治组织的演进方面还仅仅处于早期国家的早期阶段，与中原地区夏商时代的方国性质相同，尚未步入成熟国家。

随着移民活动的展开，东北亚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除通过辽西地区的陆路之外，还开辟出了海上通道。《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搏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指的是自中原渡海、自大同江口的碣石山附近登陆，经大同江流域抵达朝鲜半岛东北部沿海地区的交通路线。

王充《论衡·恢国篇》中提到，“周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sup>①</sup>如果这种说法可信的话，则日本列岛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有人来中国。可能自殷周时代开始，东亚大陆也有移民进入日本列岛。至日本历史的弥生文化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国与日本列岛的交往达到第一个高峰期。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从大陆去日本列岛的移民“少说也在2万人以上”，<sup>②</sup>以至此后的弥生文化时代的日本人的体质与前此相比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进入日本列岛的移民大多途经朝鲜半岛，有的甚至在朝鲜半岛居住多年，才由此跨海进入日本列岛。但也有一些是由中国的东部沿海出海进入日本列岛的。<sup>③</sup>率500童男童女出海为秦始皇求仙药的徐福一去不回，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一行是赴日本列岛定居了。<sup>④</sup>

迁入东北亚的移民也来自蒙古草原方向。在草原游牧社会形成

---

① 《论衡》第58《恢国篇》。

②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12页。

③ 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3页。

④ 于锦鸿：“徐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日本问题研究》，1990年第1期；周延云、官同文：“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 东北亚史

之后不久，大约在西周末期，原游牧于蒙古草原的貊系各部东迁，进入西起松花江流域东至朝鲜半岛中部的广大地域，并与该地区的秽系各部族相融合，逐渐形成秽貊族系各族。东迁的貊系部族逐渐转变为农耕民族，但也将部分游牧民族的文化带到东北亚。从松花江流域到朝鲜半岛北部至汉唐时代都产名马，东北亚东部地区还流行一种称为“貊炙”的食品，据《释名·释饮食》的说法，所谓貊炙是“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是与今天的烤全羊、烤全牛类似的食物。东北亚同时受到来自农耕的中原与游牧的蒙古草原的双重影响，使早期东北亚文化杂糅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形成自己的特点。

早在夏代，东北亚就存在“九夷”。按《竹书纪年》的说法，九夷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其实，古人以“九”泛指多，“九夷”之称不过表明东北亚的夷人部族众多，而不必一一指实为哪九种夷。商人发源于东北亚，其在中原立国以后，在东北亚仍保有较大影响力，控制着一批方国，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孤竹国。发展至周初，见于《逸周书·王会篇》记载的东北亚古族有秽、发、青丘、良夷、高夷、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等。《山海经》中也提到不死民、长臂国、歧舌国、昆仑虚、三首国、周饶国等16个位于东北亚的国与族。总体而言，秦以前东北亚的部族尚未完成融合，东北亚地区的几大族系是西汉时代才最终形成的。

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对东北亚族群的了解更加深入。孔子能识别出远在长白山以北的肃慎人使用的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中，愚公把从太行、王屋二山挖下来的土投放到“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所谓“隐土”就是“殷土”，就是投放到渤海之北和殷人发源地的辽西地区以北。中原人对东北亚的了解证明中原地区与东北亚联系的密切。孔子曾表示，如果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地区得不到实行，也许他会考虑出海去东北亚夷人的居住区，这说明，至少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东北亚是当时的已

知世界中文明程度仅次于中原的地区。

### 二、中国对东北亚的经略

东北亚的夷人各部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与炎黄族系建立联盟关系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考究。但尧曾命羲仲赴朝鲜半岛北部测量日影以制定历法，禹东巡时曾到过东北亚，并曾征询治理东北亚南部的办法，<sup>①</sup> 都证明尧舜禹时期东北亚南部地区是从属于夷夏大联盟的。夏商两代，东北亚的“九夷”隶属于夏商王朝，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箕子迁往辽西仍无法立足，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忠于商王朝的方国的排挤，联系《诗经·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诗句，说明商王朝始终对渤海以北的东北亚南部地区进行着有效统治。

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作为人口仅十余万的周人如何统治原商王朝控制下的人口上百万的辽阔区域，就成为周王朝的建立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对商遗民，周人尽量采取怀柔政策，甚至希望与商人联合进行统治，对原有的方国，周人尽量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只要他们对周王朝表示拥护。

对东北亚南部原商人控制区，周人也采用同样的政策。周武王封立国于大同江流域的箕子为朝鲜侯，任命其为东北亚地区的诸侯之长。箕子接受了册封并到管地晋见周武王，表示对新王朝的臣服。周武王对箕子十分尊重，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现存的《尚书·洪范》就是后人整理的箕子的谈话内容。箕子的态度对东北亚南部原隶属于殷人的诸方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些方国纷纷表示臣服周王朝。

---

<sup>①</sup> 《吕氏春秋·求人》称禹：“东至榑木之地”，“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榑木、青丘、黑齿等地名与族名都在朝鲜半岛北部。《吕氏春秋·知度》记载：“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迹？’”此“青北”，据王念孙、孙诒让说，应为“青丘”（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76页）。因此，禹问的问题是如何治理朝鲜半岛北部。

周人和平地确立了对东北亚南部的统治。也是受箕子的影响，东北亚的商人方国和东夷人诸部多数未参与纣子武庚发动的叛乱。

但是，按《尚书》伪孔传的说法，海东诸夷，“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说明东北亚的夷人方国还是有一些参与了武庚的叛乱，或至少在武庚叛乱期间也表示不再听命于周王朝。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了解到周成王时代对东北亚这些部族进行讨伐的具体过程，但此后远在长白山以北的肃慎人遣使中原，表示对周王朝的臣服，为此，周武王特意命荣伯作《贿肃慎氏之命》，如此看来，东北亚南部各族应该很快就被重新纳入周人的统治之下。

在分封诸侯之后，燕国的势力开始逐渐进入辽西地区，原活动于该区域的商人方国，如孤竹等，逐渐被并入燕国，周人开始直接控制东北亚的西南部地区。大约在西周中后期，周人在燕国之北又封建了韩侯国，并授与其管理北方秽貊系各族的权力。韩国初建时得到燕国的支持与帮助，韩国的都城就是燕国协助修建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周人经略东北亚的策略：以燕国控制原商人控制下的诸方国，以韩国控制其他各族各部。尤为重要的是，周人已将东北亚的已知部分都视为自己的领土，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以及“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说法，<sup>①</sup>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箕侯国在接受周武王的册封以后，一直自居为东北地区的诸侯长。传说中箕子制定的“八条之教”，实际上就是一种调节各方国和村落、部落间关系的盟约，<sup>②</sup>以此为基本纲领，箕侯国逐渐在东北亚的南部地区建立起一个以箕侯国为核心的庞大的方国——村落联盟。在箕侯国以北，仿照箕侯国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夷人的方国——村落联盟“秽国”，也是承认箕侯国的领导地位的。周人势力在东北亚的

---

① 《左传》昭公九年。

② 范树梁：“关于箕氏朝鲜的两个问题”，载《辽金史论丛——纪念张博泉教授逝世三周年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发展，特别是燕国在辽西的扩张与韩国的建立，使箕侯国感觉到压力，箕侯国也开始积极向西发展，与燕国、韩国形成激烈的争夺。韩国在东北亚立国的时间不长，可能后来被箕侯国吞并，箕侯国的势力进入辽西边缘地带，与燕国对峙，加上燕国忙于应付中原各国无力北顾，使燕国在东北亚的发展一度停顿下来。

早在公元前八九世纪，北方蒙古草原上就已经形成游牧社会，这是人类为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所发明的一种最适宜草原环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游牧的经济类型成熟以后，游牧社会内部也开始了部族之间的整合，新出现的规模更大的共同体也表现出明显的对外扩张的倾向。为抵御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战国七雄中处于北方的燕、秦、赵三国都开始在边境地区构筑长城与各种防御工事，在秦统一以后又加以增修，将三国的长城连结起来，成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但在秦统一以前，草原各部始终未能凝聚成一个政治实体。活动在草原东部燕国北方的是东胡。

东胡的得名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因为其居住区在匈奴人以东，因中原人将匈奴人称为胡，故将这一部族称为东胡；也有人认为，称东胡是因为其居住地在“大泽”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达赉诺尔以东。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东胡可能是一个以游牧部族为主体的包括很多部族的联盟。东胡强大时，也曾对燕国的北疆构成巨大的威胁。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东胡受到燕国名将秦开的打击，向北退却，此后史书中再也找不到其与中原战国发生关系的记载。

秦开击东胡之后，燕国与箕侯国之间展开大规模战争。仍旧处于方国-村落联盟体制下的箕侯国自然不是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燕国的对手，燕军势如破竹，东进两千里，一直打到大同江流域，箕侯国退保大同江以南，双方的边界基本稳定在大同江流域。东北亚南部最发达的地带基本都被纳入燕国的统治之下。

为更好地管理新从东胡、箕侯国夺取的领土，燕国在东北亚的南部地区设立了辽东、辽西、右北平等三个郡。在燕国的管理与开



发下，东北亚南部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

荆轲刺秦王失败以后，燕国受到王翦率领的秦军的疯狂进攻，燕王喜率精兵退保辽东。据说指使荆轲刺秦王的燕太子丹曾经隐藏在今辽宁省东部的衍水一带，因此衍水后来被称为太子河，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公元前 222 年，秦军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秦兵一直前进到大同江流域，大同江以南的箕侯国因担心受到秦军的进攻而主动表示臣服。东北亚南部地区被纳入秦的统治之下。秦沿用燕国旧制在东北亚南部地区设三郡，辽东郡的东部也达到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秦长城的东端起点就在大同江口附近。

### 三、早期东北亚世界

夏商以来，东北亚南部地区的内部互动关系明显加强。中国的考古学文化给予朝鲜半岛西部的考古学文化以较为强烈的影响，先进的农耕技术已传到了朝鲜半岛西部地区，青铜器及其制作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由辽东地区传入朝鲜半岛西部地区的。朝鲜著名考古学家都宥浩认为：“罗津草岛的青铜文化可能同中国辽宁地区有联系。”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认为：“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很多中国系统的细型铜剑、铜铎、铜镞等武器的铜铎、装饰品、铜镜等，它们有时与中国古钱一起出土。”<sup>①</sup> 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使该地区一直保持着与中国中原地区比较接近的发展水平。<sup>②</sup>

---

① 转引自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 页。

② 王巍：“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大同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3～244 页。

在充分交流与互动的基础上，东北亚南部地区开始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风貌，考古学上发现的最具特色的器物当数“中国东北系铜剑”。<sup>①</sup>这种铜剑的分布区西起辽宁省西部的努鲁儿虎山脉，东达鸭绿江，北抵第二松花江，与新石器时代以来东北亚最发达的地区是基本吻合的。中国东北系铜剑究竟是起源于辽西、是自西向东传布的，还是起源于辽东半岛、同时向东西两个方向传布的，现在学者之间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东北系铜剑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东北亚的南部，自周代以来，在接受来自蒙古草原与中国中原地区的移民与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也在将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与本地固有的文化相融铸，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北亚新文化。东北亚的南部已经开始成为东北亚区域的文化重心，东北亚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该地区的影响。

随着燕国向东北亚南部的开拓，自辽东半岛至大同江以北都被并入燕国，与今天中国的河北北部处于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极大地促进了东北亚的经济文化重心区与中国中原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东北系铜剑在河北省北部也有发现，就是两个区域间文化交流的证据。大约流通于公元前4世纪末的燕国铸币明刀钱，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都有出土，<sup>②</sup>证明东北亚对外经济联系的广泛性。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上谷至辽东地区“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甚至将河北北部至辽东半岛视为一个经济区，尤其需要我们注意地是，该经济区北与蒙古草原的东部、东与中国东北至朝鲜半岛北部都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东北亚南部经济文化重心区在经济方面对东北亚其他地区的影响。

---

① 林沅：“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皆载《林沅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31页。

战国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间的海路贸易初具规模。根据《管子》一书的记载，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人们就已经把朝鲜所产的“文皮”，也就是豹皮作为珍贵的货物。<sup>①</sup> 甚至有人提出一种理论，“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毳服而以为币”，“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sup>②</sup> 这是建议通过调整对朝鲜特产“文皮”的态度，来影响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贸易至少对朝鲜半岛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绝不是可有可无或时断时续的事情。

《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虽然“倭属燕”的说法现在还无从证实，但从其所载地理方位来看，燕、盖国、倭人呈南北方向分布，则所说的燕一定是燕国打败箕氏朝鲜、在大同江流域以北设立辽东郡以后的情况。燕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使中国对大海中的日本列岛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22年在日本列岛最南端的冲绳县那霸市相当于绳文文化晚期的城岳贝冢遗迹里发现了一枚明刀钱，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年前后。<sup>③</sup> 对这枚明刀钱的时间断代与辽东郡的初设时间正好吻合，证明在燕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以后，其与日本列岛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总之，东北亚南部在先秦时代一直保持在东北亚的领先地位，并在西周以后开始形成本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对东北亚其他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战国以后，作为东北亚经济文化重心区的南部被并入燕国，这不仅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达到接近中国中原地区的水平，也使东北亚各地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普遍得到加强。

---

① 此据《管子》第80《轻重甲》。关于《管子·轻重》诸篇的成书时间争议很大，有战国、西汉、新莽等诸说。参见巫宝三：“《管子·轻重》16篇的成书年代问题”，载《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3年第4期。笔者支持战国说，因此，将《管子》此处的记载归为战国时人的观念，反映的是战国时期的史实，而不是管子与齐桓公所处的春秋初期。

② 《管子·轻重》。

③ 蔡凤书：《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04页。

## 第二章 帝国与王国

在印度次大陆的孔雀帝国走向衰落之际，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完成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与中国的秦汉帝国同时崛起。在汉帝国的打击下西迁的匈奴人引发了草原民族连锁的西向迁徙运动，最终使遥远西方的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浪潮中崩溃。汉帝国瓦解后，中国也失去了控驭内迁草原民族的实力，黄河流域成为北方民族纵横驰骋的政治舞台。但经历400年的大分裂动荡时期之后，中国在隋唐时代重新走向统一，容纳并融合草原民族后重建的帝国更加强大，而蛮族化的欧洲却再也未能重现罗马帝国的盛况。与唐帝国同时兴起的是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欧亚大陆的西端离开了历史发展的聚光灯，而东北亚却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亮点。

### 第一节 走向鼎盛的中国

汉唐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虽然多数时间里，历代政权都对经营西域、参与中亚地区的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其对东北亚的控制却丝毫未因此而减弱。自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之后，中国在东北亚的郡县统治区一直呈内缩之势，至唐代，仅局限在营州一隅。但自西汉开始的用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管理边疆民族的政策却得到发扬，至唐代在东北亚形成完善的羁縻体制——一种与中原地区的府州县不同的、相

对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府州县体制。

东北亚民族仍保持着积极参与中原事务的传统，最明显的例子是，鲜卑人自大兴安岭南下进入蒙古草原，与匈奴人融合形成拓跋鲜卑，<sup>①</sup> 并进一步南迁进入中原，建立了北朝。

### 一、汉唐帝国的演进

自战国时代起，中国不仅步入了成熟国家，农业生产也由粗放农业走向精耕农业。但战国的纷争与秦统一之后北征匈奴、南伐岭南等一系列战争，极大地扼制了变革所能产生的影响。西汉建立后，面临的是“将相或乘牛车”<sup>②</sup> 的残破局面。

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至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天下富足、国力强盛，史称“文景之治”。在此基础上，汉武帝一改前代保和守成的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战。北击匈奴，通使西域并进军中亚，南平西南夷、南越国，东抚东北诸族，疆域比秦统一时又有所扩大。西汉王朝将精耕农业所能带来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西汉末期人口达到5 959万，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人口的最高数字。

东汉初期模仿西汉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发展小自耕农阶层，社会经济有稳步地发展。但总体看，东汉显然没有恢复西汉的鼎盛局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东汉在西域的统治趋于瓦解，这虽然与王朝的首都东迁洛阳、为保证首都安全而不得不重视西疆稳定的因素消失有关，但也证明东汉国力不足，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在下降。

在打败匈奴帝国以后，西汉的势力已经进入蒙古草原。由于北方草原气候恶化，从东汉开始，草原民族纷纷南迁进入黄河流域。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军阀割据混战的结果是

---

①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

形成魏、蜀、吴三国。于265年取代曹魏政权的西晋在280年统一全国，但不久即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中原地区重新陷入混战之中。分裂与战乱导致中央政权的衰弱，使其失去了控驭境内诸族的能力，自307年起，匈奴铁骑横行于洛阳、长安一带，造成“永嘉之乱”，并于316年灭亡西晋。从此开始了东晋十六国的割据时期。439年，拓拔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与继东晋先后在南方立国的宋、齐、梁、陈对峙，中国步入南北朝时代。

江南地区农业起源虽然很早，<sup>①</sup>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很多地区渔猎采集经济尚占有较大比重，农业并不发达。<sup>②</sup>南北朝时期，为逃避战乱，北方人民纷纷南迁，这极大地促进了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大量移民的进入，甚至改变了个别地区的民风。最典型的例子是江浙地区，这里在汉代还是“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sup>③</sup>民风十分彪悍，而南朝宋的建立者刘裕已经认为“吴人不习战”，<sup>④</sup>进入南朝后期，“南人怯懦”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进入黄河流域的草原民族逐渐融入汉族之中，使汉族从血统到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南方经济大发展，北方民族大融合”之后，隋唐时期重新建构的统一帝国在方方面面都与汉帝国存在差异。

西汉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地方的郡县制都是对秦制的沿袭。但西汉设置了刺史和司隶校尉，建立了比秦朝的御史监郡制度更严密的监察体制，并不断削弱丞相的权力，使专制皇权得到加强。出于同样目的，东汉加强尚书台的实际职权，到魏晋时期逐步确立了尚

---

① 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载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辛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的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汉书》卷28下《地理志》。

④ 《宋书》卷1《武帝纪》。

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取代了秦汉的三公九卿制。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还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单于”制，与汉制并行。三省制到隋唐时期发展为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制，每部四司，这种政府组织结构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标准行政机构。

在地方统治结构上，西汉一方面沿用秦的郡县体制，另一方面又恢复了分封制，形成郡国并行的两套体制。但经过文帝、景帝时期的削藩和武帝时的推恩令等政策，封国的势力受到打击，郡县制成为地方行政建置的主流。西汉在郡之上另设作为监察机构的州，东汉以后州的权力逐渐扩张，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建置。地方统治结构由郡县二级体制变为州郡县三级体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实行州、郡、县三级体制，但此后州郡县的数量在逐渐增加，到隋建国前的北周末年，共有州 211，郡 508，县 1 124，平均每州只辖 2~3 郡，每郡只辖两县，其层级结构极不合理。因此，隋文帝取代北周之后即废除了郡一级建置，改地方行政机构为州、县两级。唐朝沿用隋制，又回到西汉的二级体制上来。中央与州之间设置监察区道和作为军卫区的都督府，安史之乱后，监察区与军卫区合而为一，称道，也称方镇，其地方行政建置变为道、州、县三级体制，这种体制为此后的宋、辽、金等朝所沿用。

西汉县以下有着健全的乡里与亭两套组织，乡里负责行政事务，亭负责治安。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战乱导致众多以宗族为核心避乱自保的坞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传统的乡里组织受到很大冲击。坞壁的崛起，造成新的豪强门阀政治格局，由此产生的乡村组织为国家政权所吸收改造，最终形成隋唐的村落制。<sup>①</sup>

西汉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是“察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

---

<sup>①</sup>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后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以致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文帝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不过是察举的另一种形式，至西晋时期发展为巩固世家大族地位的工具。至唐代将隋朝开创的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化，<sup>①</sup>正式形成文官考试制度，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人才选拔方式。

经济方面，西汉起历代王朝都重视培植小自耕农阶层，使之成为王朝和平时期赋税、劳役的来源和战争时期的兵源，重视发展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精耕农业。这种源自秦朝以耕战立国思想的政策为此后历代王朝所继承，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很明显的循环性。由自耕农经济发展带来的天下大治时期经常成为人口迅速膨胀的开始，而过剩人口势必造成自耕农的破产，随之而来的流民问题、土地兼并问题给王朝造成财政困难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改革只能暂时缓解矛盾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有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混战造成人口大规模减员以后，新王朝才有可能依靠大量荒地、无主地重新培植自耕农阶层，使经济迅速恢复并走向新的盛世。但新一轮的循环也正是由此开始。唐代沿用北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将这种耕战结合的自耕农经济发展到极致，造就了唐王朝的鼎盛。安史之乱前唐王朝人口达到8 000万，这已经是实行单一的粮食作物生产的精耕农业下，中国所能负荷的最高人口数字了。

西汉初年完全改变秦代以法家思想治国的方针，推崇黄老无为思想，道家学派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但董仲舒宣扬的儒学已经掺杂进大量的阴阳五行和神仙方术思想，与孔子的儒学差异很大。东汉的儒学神秘主义色彩进一步加强，最终成为左右东汉思想界的

---

<sup>①</sup> 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讷纬政治。魏晋玄学盛行、士大夫阶层重新重视老子的思想，道家学派有复兴的趋势。从西域传入的佛教在民间盛行，传统的神仙方术与道家思想结合形成的道教在佛教的刺激和影响下也迅速发展起来，儒家思想的地位在下降。唐代虽然因王室与老子同姓而定道教为国教，但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重新得到确立，经学成为科举取士的内容之一。

西汉时期汉族正式形成并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随着北方民族大量进入黄河流域，中原汉族大量南迁，中国文化风貌呈现出南北的差异。北方黄河流域受草原民族影响较深，衣着上改为窄袖袍服，饮乳食酪，出门骑马，民风豪放，妇女当家并参与社会活动；而南方长江流域较多地保持着汉族的旧俗，宽衣博带，食惟稻鱼，出行乘车，重视文学修养，妇女极少参加社会活动。隋唐的大一统不仅政治上是北方统一了南方，在文化上，北朝的文化也成为隋唐时代文化的主流。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穿胡服、戴胡帽，吃的是胡饭、胡饼、胡瓜、奶酪，喝的是醍醐、茶酥、胡羹，起居用胡床、百子帐，出行乘马，还采用琵琶、羌笛、胡笳、羯鼓、胡箜篌等少数民族的乐器。<sup>①</sup> 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就对羯鼓情有独钟。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建成毕生最大的愿望竟是去草原做一个游牧人。相对于汉代而言，唐代的文化表现出极强的“胡化”倾向。

继南北朝少数民族内迁之后，唐代仍将部分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地区安置。唐代中原非汉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 - 19%。<sup>②</sup> 唐代活动在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在安史之乱前约有150万户、700万人。<sup>③</sup> 民族杂居导致异族通婚现象非常普遍，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唐太宗皇后长孙氏都不是汉族，从这个角度说，隋唐两代王室都是混

---

① 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7页。

③ 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血儿。陈寅恪甚至认为唐王室本来就不是汉族。<sup>①</sup> 民族杂居与通婚不仅是盛唐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也造就了唐代社会的开放性。

汉武帝时匈奴人金日磾得到重用，在两汉这是少数民族得享高官的非常罕见的例子，而唐代政府中少数民族高级官员非常多，以至有人发出“近日中书，尽是蕃人”<sup>②</sup> 的感叹。唐代的将军出身异族的就更多。不仅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连抵抗安史叛军的哥舒翰，都是北方民族之间的混血儿。少数民族在社会其他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盛唐三大诗人中，白居易祖籍龟兹，李白来自中亚碎叶，其血统恐怕都与汉族无关。晚唐著名诗人元稹则出自北魏王室，是鲜卑人的后裔。应该说，盛唐时代是很多民族在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不再是汉族的专利。

汉唐时代中国的发展对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在学习汉唐文明的基础上，东北亚各国文化面貌趋同，东北亚文化圈开始形成。在此时期所积淀下来的东北亚各国的共性，不仅在历史上使东北亚成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直至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

### 二、中国东北族系的发展

虽然史书中把居住在东北的少数民族泛称为“东夷”，但实际上，自先秦时期起，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古族就明显可以分为胡、夷两个系统。大体说来，东北东部主要是夷人的分布区，西部主要是胡人的居住区。

伴随着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及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形成，在东北东部与西部，也分别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民族融合，最终产生东胡、秽貊两大族系。三个新形成的族系与古老的肃慎族系

---

<sup>①</sup>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sup>②</sup>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东北亚史

一起，构成中国东北四大族系，并形成了北肃慎、南汉族、东秽貊、西东胡的民族分布格局。这种四大族系的民族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以后，随着秽貊族系的消亡，东北的民族分布变为三大族系的格局，并一直沿袭下去。可以说，这一时期形成的分布格局对东北古代历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东北西部的胡系部族中，最强大的当数山戎。春秋时期山戎遭到中原诸侯国的沉重打击，战国时期北方胡人兴起，吞并了东北西部地区残余的山戎诸部，形成了后世的东胡族。东胡族因受到燕国名将秦开的打击而衰落，虽然后来一度复兴，终于在匈奴人的攻击下解体。余部主要分两支，一支退保乌桓山，一支退保鲜卑山，前者后来发展为乌桓人，后者发展为鲜卑人。乌桓族在东汉时南迁，居住在五郡塞外，臣属于汉朝。东汉末，因其在中原的军阀混战中支持袁绍，为曹操所破，相当一部分乌桓人被曹操改编为骑兵入中原征战，从此定居中原，成为汉人的组成部分。留居东北的乌桓人后来发展为乌洛侯。鲜卑人的慕容部建立了南北朝时期的诸燕政权，拓跋部建立了北朝。宇文部后与其他民族相融合，发展出契丹、库莫奚两族。契丹族建立了辽朝，奚族臣属于契丹。辽朝灭亡以后，两族的主体部分逐渐融入汉族之中。又有部分鲜卑遗民发展为室韦族，室韦人中的一部蒙兀室韦，发展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的核心部分。

中国东北地区的夷人也被称为秽人。先秦时代秽人的分布区东达日本海，南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达长白山与肃慎族相邻，西至松嫩平原。原活动在蒙古草原的貊系民族东迁进入秽人的居住区以后，与秽系部族发生民族融合。西汉中后期，居住在蒙古草原东部边缘的夫余人东迁，促进了秽貊族系的最终定型。秽貊族系形成之初就有夫余、沃沮、高句丽、秽貊等不同的民族。夫余与高句丽都曾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夫余国衰弱后，一部分夫余人被前燕所掠，迁往辽西，或作为奴隶卖往中原，以后融入汉族之中。夫余国灭亡以后，

其南部故地为高句丽政权所控制，勿吉各部迁入其北部故地，并与夫余遗民相融合，形成所谓“浮渝靺鞨”。<sup>①</sup>高句丽立国于中国东北东部地区，强盛时据有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北部，沃沮、秽貊皆受其统治，并逐渐融入高句丽族之中。高句丽政权为唐朝灭亡以后，约40余万高句丽人被迁往中原，散居淮河至陇右诸地，后融入汉族之中，留居中国东北的高句丽人与靺鞨诸部融合形成渤海族，留居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人渐融入新罗之中。

在东北四大族系中，肃慎族系的历史最为悠久。汉魏时期，肃慎族以挹娄、勿吉的名称见于史书记载。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呼，有的学者认为，肃慎系是一个大的民族集团，以不同的名称见于史书记载，就是指这一族群中的不同部族。<sup>②</sup>至唐代，肃慎系被称为靺鞨，并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指居住在肃慎族故地的靺鞨诸部，后来发展为黑水靺鞨；南部指西迁至松花江流域及南下至长白山附近的靺鞨诸部，这些部落除粟末部主体部分南迁进入中原地区以外，其他诸部后来联合建立了渤海国，并与高句丽遗民融合形成新的民族渤海族。在渤海国为辽朝灭亡以后，辽、金二代，渤海族作为少数民族仍活跃于中国的历史舞台，至元代以后始被视为“汉人八种”之一，<sup>③</sup>融入汉族之中。由黑水靺鞨发展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王朝。金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族多数融入汉族之中。明代，留居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形成一个新民族——满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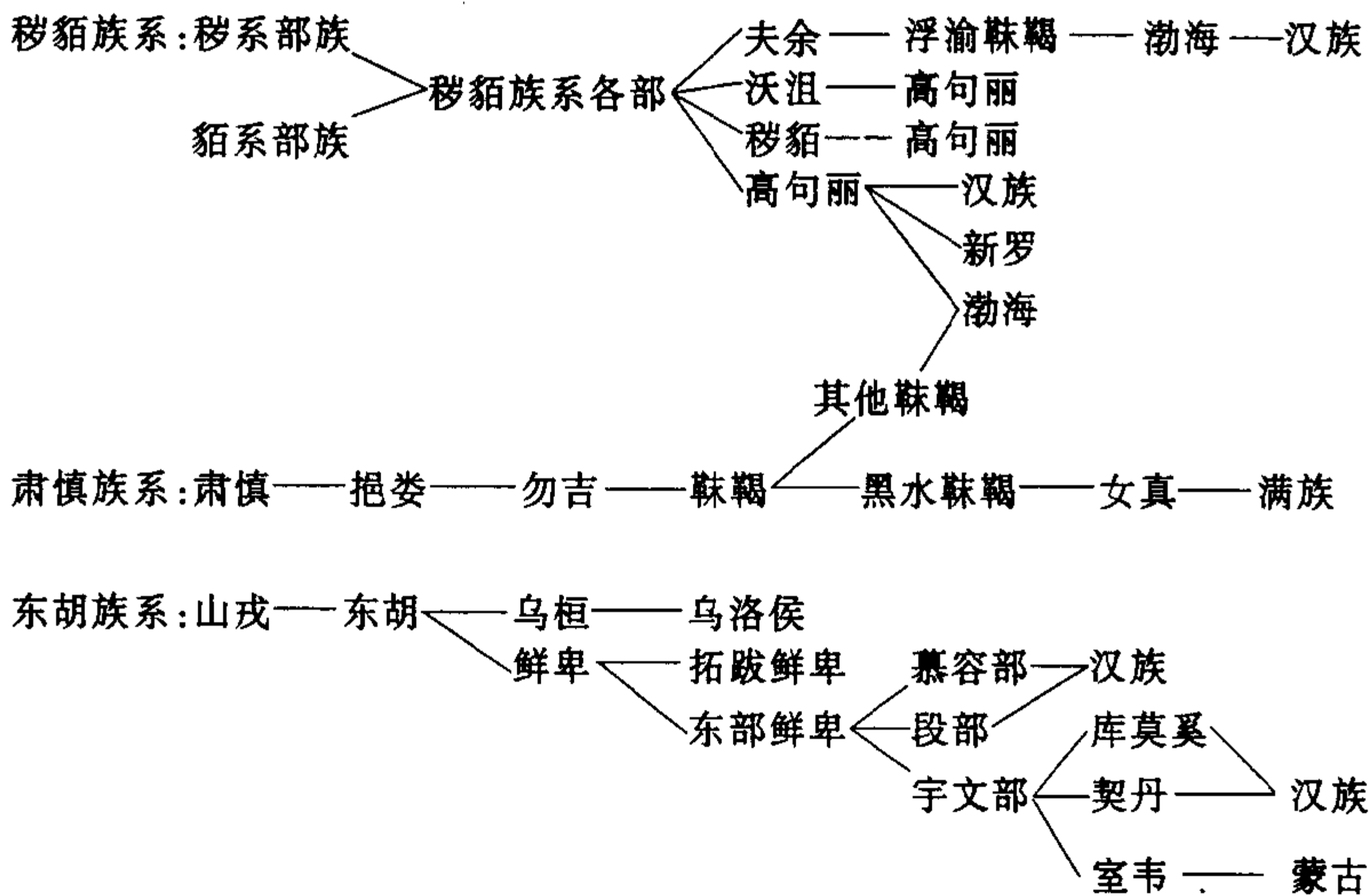
---

①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慎州”条：“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黎州”条：“载初二年（690），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参之《宋史·渤海国传》将夫余写作“浮渝”，证明此浮渝靺鞨也就是夫余靺鞨，即进入夫余故地的靺鞨。

②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85页。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条。

东北少数民族族系



汉唐时代，秽貊族系各族已普遍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类型，发展水平与中国中原地区相当接近。东胡族系各族虽然以畜牧业为主，但也多存在简单的农业，只有肃慎族系仍处于渔猎采集阶段。秽貊族系不仅发展水平较高，而且文化方面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在汉唐东北独领风骚。唐以后秽貊族系各族在历史上消失，东北族系的发展才演变为东胡族系各族与肃慎族系各族竞相发展的局面。

三、汉唐对东北亚的经略

秦王朝灭亡以后，项羽入关中分封诸侯，封臧荼为燕王，秦在东北的疆域转归臧荼控制。西汉建立后，臧荼归汉，但不久就发动了叛乱。平叛后，汉高祖刘邦封卢绾为燕王统治东北。在卢绾叛入匈奴以后，皇子刘建被立为燕王，东北开始受刘姓诸侯王的控制。汉武帝时，燕王刘泽因罪自杀，燕国取消，东北才直接隶属于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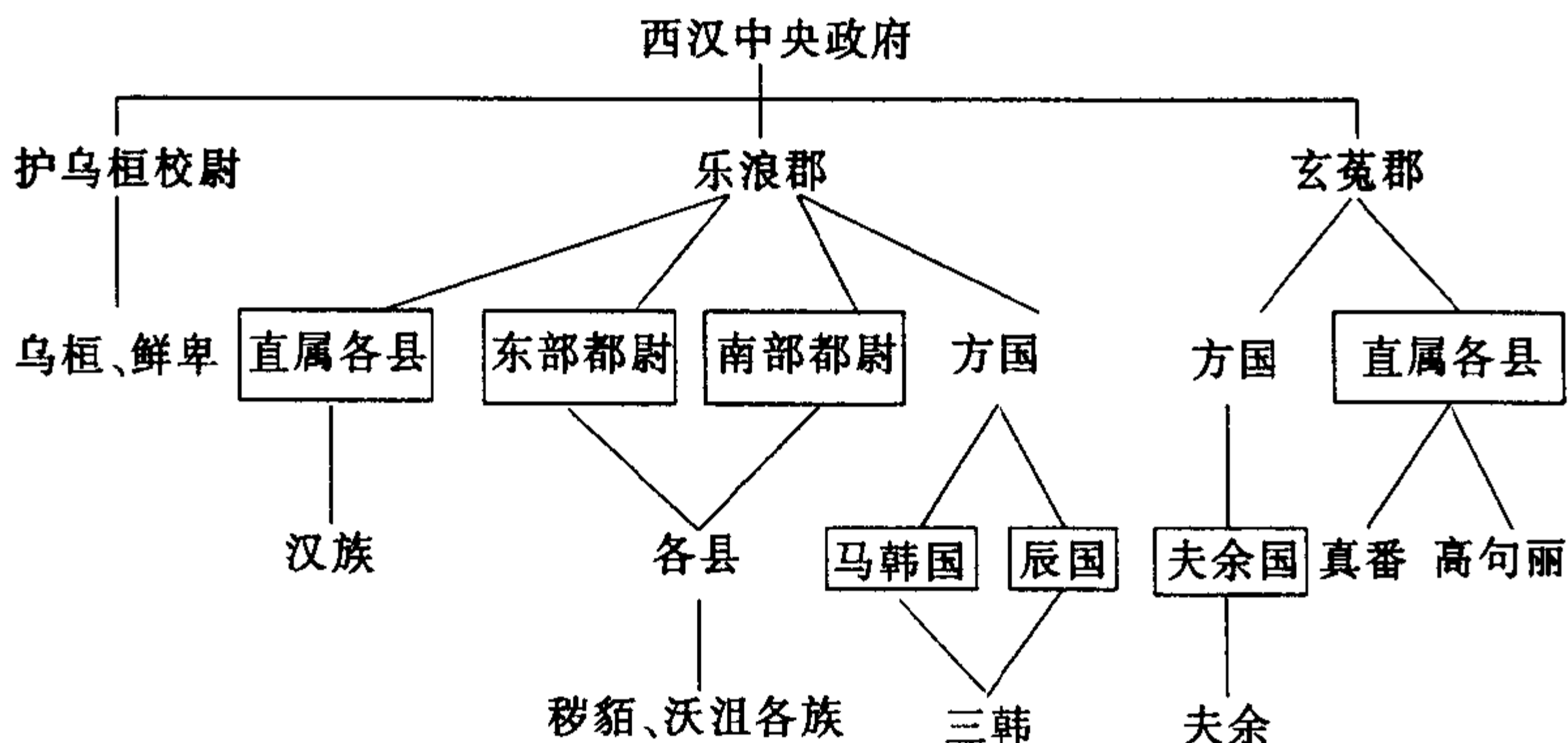
王朝的中央政府。西汉在东北亚最初承燕秦旧制也是设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但因为大同江流域过于遥远，将辽东郡的东部边境后撤，与箕氏朝鲜以清川江为界。

秦末天下大乱，中原人避乱迁居大同江流域的达到数万人，几乎占当地居民总数的一半，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该地区出现比较强的汉化倾向。汉代扬雄所著《方言》一书中，就已经把大同江流域和辽东半岛视为汉语的一个方言区，证明汉语已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在卢绾叛乱期间，燕人卫满率部进入箕氏朝鲜境内，后来就是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强大势力取代了箕氏朝鲜，建立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第41代王准逃往朝鲜半岛南部，开创“韩国”。

卫氏朝鲜建立之初，就表示臣服西汉，属于西汉的“外臣”，归汉辽东太守统辖。在卫满的孙子卫右渠统治期间，却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倾向，因此，在公元前108年，为配合进攻匈奴的军事行动，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其地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至此，西汉在东北亚共设有7郡近100个县。

西汉在东北亚也开始设置与郡县管理方式不同的特殊行政机构。大体而言，是将秽貊族系与肃慎族系纳入郡县体制内，作为特别行政区加以管理，另设护乌桓校尉、辽东属国管理乌桓、鲜卑等东胡族系民族。东北亚此时存在的三个早期国家，夫余人建立的夫余国、箕氏朝鲜遗民在大同江以南建立的韩国与辰国，都被作为西汉地方政权，划归缘边郡守管理。西汉在东北亚的统治体制可以图示如下：

西汉在东北亚的统治体制示意图



在打败匈奴以后，西汉在东北亚的疆域，向北越过贝加尔湖至鄂霍次克海一线，东达日本海，包括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最北的真番郡在黑龙江流域，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一带。<sup>①</sup> 东汉在东北亚的统治虽然比之西汉有内缩的趋势，但上图所示的管理体制基本上得到了延续。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时期，以辽东半岛为中心，东北亚也兴起了公孙氏的地方割据政权。从公孙度开始，经公孙康、公孙恭，至公孙渊时为曹魏名将司马懿所灭，共存在约半个世纪（189 - 238）。从此开始，西汉以来中国在东北亚的疆域大部分落入中国地方民族政权的掌握之下。

夫余人大约于公元前 2 世纪自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区东迁进入松嫩平原立国。《三国志》卷 30《夫余传》记载：“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证明夫余人在进入松嫩平原以后很快转变为农耕民族，但从其对所谓王的态度来看，这时的夫余人远未步入国家形态，所谓王不过是部落联盟

<sup>①</sup> 孙进己、于志耿：“汉真番郡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 年第 3 期。

体的首领而已。夫余族何时步入国家现在我们已无法考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两汉时期，夫余国都是臣属于汉王朝的。新的夫余王即位后，汉王朝即赐给玉匣，安放在玄菟郡，等该王去世后，夫余国去玄菟郡领取玉匣安葬。有的学者猜测，“玉匣”就是金缕玉衣，这是汉代王爵的葬具，证明汉朝皇帝是将夫余王与内地的诸侯王一视同仁的，夫余国的地位相当于汉王朝在中原地区所分封的诸侯国，是中国的地方民族政权，而不是独立的国家。

在夫余东迁的过程中，其一支迁至浑江流域，发展为高句丽族。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高句丽族的居住区设置了高句丽县，对之进行有效的统辖。在汉代，夫余国与高句丽国都是隶属于玄菟郡的。东汉以后，随着中央王朝对东北控制力的削弱，高句丽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为此，曹魏在消灭公孙氏政权之后，曾派毌丘俭两次讨伐高句丽，屠高句丽的都城丸都城。大体而言，曹魏与西晋基本保持了对夫余国和高句丽国的控制。

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北方再一次陷入割据混战之中，慕容鲜卑在东北亚西南部建立了燕国，史称前燕。夫余国、高句丽国也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割据势力。三国中前燕的国力较强。285年，慕容廆攻破夫余都城，夫余王依虑自杀，只是在晋朝的支持下，夫余才勉强复国。但此后其疆域一直受到勿吉人与高句丽的蚕食，至494年，夫余王降附高句丽，夫余国灭亡，其故地为勿吉诸部和高句丽瓜分。342年，慕容皝亲统大军攻克高句丽都城丸都城，迫使高句丽王向前燕称臣。此后，因西向受制于前燕，高句丽转而向东发展，向朝鲜半岛开拓，开始了与朝鲜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百济与新罗的长期角逐。

前燕后期逐鹿中原，重点向南发展，在东北亚没有太大的作为。前燕为前秦所灭，在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复国，史称后燕。后来又有高云和冯跋相继掌权的北燕。但其实力都远不如前燕，这使得高句丽的势力极度扩张。在夫余国灭亡后，高句丽相继征服进入夫余



## 东北亚史

故地的肃慎系各部，据有夫余国大部分疆域，并占领了辽东半岛，成为中国东北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当隋王朝平定江南、统一中国内地之后，如何处理割据东北亚的高句丽就成为隋朝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隋唐两代不断对高句丽加以讨伐，其目的不外是削平割据，恢复两汉对该地区的统治。至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终于完成了对东北亚的统一。

在高句丽灭亡三十年之后，靺鞨诸部乘契丹人发动反唐叛乱之机，联合高句丽遗民建立了新的政权。713年，靺鞨人的首领大祚荣正式接受唐王朝的册封，改国号为渤海。唐王朝以其地为忽汗州，任命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受封为渤海郡王，领忽汗州都督。渤海国成为中国在东北亚的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地方建置上分五京十府六十二州，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制度基本仿自唐朝，而且文化方面受汉文化影响极大。在926年为契丹所灭之前，渤海国号称“海东盛国”，是东北亚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

东北民族政权简表

政权名称	建立者	建立者族属	年代
卫氏朝鲜	卫满	华夏	约公元前194 <sup>①</sup> - 前108年
夫余	解慕漱	夫余	公元前2世纪 - 494年
高句丽	朱蒙	高句丽	公元前37 - 668年
公孙氏政权	公孙度	汉族	189 - 238年
前燕	慕容皝	鲜卑	337 - 370年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384 - 407年
北燕	高云(冯跋)	鲜卑(汉人)	407 - 436年
渤海	大祚荣	靺鞨	698 - 926年

<sup>①</sup> 关于卫氏朝鲜的建国时间，中国史书没有记载，朝鲜史书《箕子本纪》认为是汉惠帝元年丁未，即公元前194年，《东史纲目》认为是汉惠帝戊申，即公元前193年。此取前说。

唐代以设于辽西地区的营州为依托，在东北各族居住地普遍设立都督府、都护府加以管理。包括渤海国在内，唐王朝在东北亚的疆域西北达贝加尔湖、北达外兴安岭、东北达黑龙江下游地区，东及东北抵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东南到朝鲜半岛的大同江、龙兴江与新罗为界。至唐玄宗时，正式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赏赐给新罗，从此，大同江成为唐与新罗的界河。

### 第二节 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形成

公元3世纪以后，东北亚出现了其他成熟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次生性质，在其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都模仿中国，这固然使其得到加速自身历史发展进程的益处，却也使之付出在发展中丧失自身特点的代价。东北亚各国与中国具有同构的特点，东北亚成为独特的区域世界。这是东亚日后政治体制趋同，并能认同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封贡体系的基础。

在中国之外，最早形成的国家是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帝国。面对来自秦王朝的压力，分散的草原诸部日益感到联合对敌的需要，各强大部落的首领们都感觉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最高首领，率领他们东征西讨，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对物质财富的渴求，而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也就出现了，他就是冒顿单于。草原各部在匈奴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形成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这就是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之上的草原帝国。汉武帝时期，匈奴帝国与汉王朝之间展开长期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全面对抗。在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战败的北匈奴西迁，南匈奴降汉，蒙古草原上的各族接受了汉王朝的领导，从此开始了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组成部分的历史。

## 一、草原帝国：匈奴

匈奴是发源于河套阴山一带的部族。<sup>①</sup> 经头曼、冒顿（公元前209～前174年）、老上（公元前174～前160年）、军臣（公元前160～前126年）祖孙四代，匈奴国家的各项制度日益完备。

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由一同游牧的若干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所组成的血亲组织，中国史书中往往称之为“邑落”或“落”，后期也称为“氏族”。由若干个具有亲属关系的血亲组织组成更大的血亲集团，中国史书中往往称之为“种”、“部”。具有相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若干个血亲集团构成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中国史书称之为“类”、“族”或“族类”。其中，血亲组织、血亲集团这两级社会组织是到处都存在的，具有较强的内聚力，也比较稳定。但由血亲集团联合形成的“族”却很不稳定，这种联合也比较松散，常常是各“部”自行其是，只有在对外作战时，才组成一个临时的整体。当草原民族以血亲集团作为最高级社会组织时，他们就不会形成自己的国家。“族”是草原民族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瓶颈”。只有各血亲集团迫于外部的压力建立起长久的联盟之后，——这种压力往往是战争的需要，——草原民族也才开始了向国家的演进。

由于草原民族的频繁迁徙，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族”之间的接触也是非常频繁的。当某一个“族”内部的血亲集团形成牢固的联盟之后，其与外“族”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既可能出现对其他“族”的血亲集团的军事征服，使之臣属于自己，也可能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与其他“族”结成更高一级的联盟。不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联盟的结构都变得更加复杂，不是原有的部落机构所能驾驭的了。最初，联盟的首领委派自己的亲信协助自己进行

---

<sup>①</sup> 舒顺林：“‘匈奴故地’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管理，这就在原有的部落首领之外形成了一套新的领导体系，当出于将权力固定下来的目的而创设部落之外的新机构时，游牧国家也就形成了。但是原有的血缘组织并未被打破。中央存在新的机构，而地方仍旧靠血亲集团进行统治，大大小小的血亲集团现在转化为新出现的游牧国家的地方行政机构，血亲集团的首领仍旧掌握本“部”的行政与军事权力，但由于其获得权力的方式不再仅仅是自下而上的选举，还需要得到自上而下的任命，因此，其身份也就变成国家的地方行政首脑了。

匈奴人是蒙古草原上第一个完成这种转变的民族，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第一个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匈奴帝国。单于作为最高首领，总揽所有的军政大权，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以及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长”，他们被称为“万骑长”，就是由原血亲集团的首领转化来的地方军政首脑。在万骑长之下，又设有千骑长、百骑长、什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小官，这是由原血亲组织的首领转化来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的官员。所有官员都有自己的分地，平时由其负责管理，战时他要率分地内所有成年男子参战。所有机构与官员都是军政一体的。匈奴人将所有统治区分为三部分，除了最高统治者统领的中心区外，东方诸部由左贤王统领，西方诸部由右贤王统领。

总地来看，由于其政权建立在流动、分散的游牧经济基础之上，匈奴人的政治体制还比较简单和松散。<sup>①</sup>但是，这种国家体制最适合草原民族的游牧的生活方式，因而被以后在蒙古草原上建立国家的各族效仿，对草原民族影响深远。

匈奴帝国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类型。随着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

---

<sup>①</sup> 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12页。

不断北移以及汉人入居匈奴地区，蒙古草原上也逐渐出现了农业。汉代中期，有关匈奴农业的记载越来越多地见之于史乘。在诺颜山匈奴墓葬中不仅发现有残存的农作物种籽、农具，而且还出土盛有谷物的大型陶器。<sup>①</sup>但匈奴国内的农业生产尚远远不能满足其对粮食的需求，其粮食供应主要来源于中原农耕地区，主要途径可能是互市贸易和掠夺。<sup>②</sup>

为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求，匈奴人迫切需把牲畜和皮毛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行交换。保持同汉族的产品交换是匈奴游牧经济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匈奴输入内地的物品以马、牛、羊、骆驼和皮革、毛织品为大宗。匈奴人除了和中原汉族进行交换以外，还与乌桓、羌族以及西域各族保持贸易关系。从诺颜山第六号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希腊丝织品来看，匈奴人很可能通过西域间接地与希腊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保持贸易往来。

自冒顿单于至老上单于，匈奴连续几代执行对外扩张政策。向东大败东胡，并迫使东胡余部鲜卑、乌桓等部族称臣纳贡，匈奴的势力达大兴安岭以东。西破大月氏，使大月氏人从阿尔泰山地区西徙至中亚阿姆河流域，又征服了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将匈奴的西部边疆扩张到阿尔泰山以西。匈奴的南疆不仅包括其发源地河套、阴山一带，而且控制着河西走廊、新疆、青海等地，北达贝加尔湖以北、以西，控制着生活在贝加尔湖以西的丁零、坚昆等族。匈奴帝国不仅控制着蒙古草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sup>③</sup>还控制着西域各绿洲城邦，成为东北亚领土面积最为广大的国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命蒙恬率 30 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河南

---

① 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7 页。

② 马利清：“匈奴的城塞及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 年第 4 期。

③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

地”及高阙、阳山、北假等地，匈奴被迫向北迁徙。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乘机越过长城，收复了被蒙恬夺去的阴山河套地区。西汉建立之初，开始执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汉王朝的公主下嫁匈奴单于，每年汉王朝送给匈奴大量的“赐物”，匈奴则保证不侵扰汉王朝的边疆，草原游牧民族达到极盛。东北亚世界呈现出匈奴帝国与汉帝国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这也是精耕农业区生成的统一政权与游牧经济区生成的统一政权之间的对峙。

和亲政策意味着汉王朝迫于现实不得不放弃天下一体的传统思想，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兄弟之国”，并探索一种与之相处的新模式，只不过在汉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这种与其他政权相处的新模式，是在其国力不足以彻底打败对方的前提下的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策。当汉王朝国力强盛之后，必然会放弃这种模式。

西汉王朝在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渐趋强盛。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开始改变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由被动的消极防御转为主动出击，汉与匈奴这东亚地区的两大帝国间展开了全面战争。经昭帝、宣帝时期，在前后七十多年时间里，汉王朝与匈奴间共进行大的战役十四五次。其中尤以武帝时战争最多最激烈。

汉武帝不仅动员全国的力量与匈奴决战，为了形成对匈奴的战略包围，西汉王朝向东灭亡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郡县进行直接统治，向西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匈奴的宿敌大月氏夹击匈奴，试图建立东起朝鲜半岛西至中亚的扇形包围圈。可以说，这一场两大帝国的决战，牵动了东亚大部分地区。汉王朝势力向东西两翼的伸展，最初虽然是出于军事目的，但意想不到的，最终却起到加强与东方的日本列岛、西方的中亚和南亚的经济文化联系的作用。

在匈奴受到汉王朝的打击实力大为削弱以后，曾经是匈奴属部的东方的乌桓、北方的丁零与西方的乌孙不仅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

## 东北亚史

而且纷纷进攻匈奴。匈奴帝国的属国体系完全瓦解。在面临巨大外患的同时，匈奴帝国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还在不断发生，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率部降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东汉政府于公元73年、公元89年、公元91年三次大规模出兵征伐北匈奴，均取得了胜利。北匈奴主体部分西迁中亚，经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入奄蔡（今南俄草原顿河以东一带），先后在今中亚、西亚及欧洲活动了300余年。<sup>①</sup>

匈奴退出漠北草原以后，新兴起的鲜卑人据蒙古草原。留居漠北的匈奴后来融入鲜卑。具有匈奴和鲜卑混血的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建立了北魏。此后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先后兴起于蒙古草原，但草原上再也未出现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权，这些民族都对中国的认同，把进军中原，由被统治民族变为统治民族作为最高的政权追求，而不是在中国之外独立发展。

## 二、百济与新罗

从现有记载来看，朝鲜半岛的箕氏朝鲜、秽邪头国、卫氏朝鲜、韩国、辰国等，或是尚处于村落联盟阶段，或是刚刚步入早期国家。至于所谓檀君朝鲜，就更是传说中事，不能视为信史。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以后，朝鲜半岛北部长期处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已经不具备形成独立国家的条件。

生活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是三韩各部。其中可能是由东夷分支与貊人融合形成的马韩历史最为悠久，辰韩、弁韩是秦末迁入该地区的中原人与马韩相融合的产物。《三国志》、《后汉书》都记载三韩分为70余“国”，但其在3世纪时的状况是：“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

---

<sup>①</sup> 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sup>①</sup> 显然尚未步入国家形态，史书中所说的“国”不过是聚落联盟而已。

约4-5世纪，由辰韩中发展出的新罗、由马韩中发展出的百济，逐渐吞并三韩诸部，其政治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复杂，成为称雄朝鲜半岛南部的两个国家。百济实行三级官阶制，其上品是佐平和几种率，其中品是几种德，下品由武督以下构成。三个品级的服色各不相同，上品着紫、中品着赤、下品着蓝。新罗的情况与此类似。百济、新罗的出现，标志着朝鲜半岛出现成熟国家。

百济、新罗官阶表：<sup>②</sup>

百济 16 官阶	(1) 佐平 (2) 达率 (3) 恩率 (4) 德率 (5) 扞率 (6) 奈率 (7) 将德 (8) 施德 (9) 固德 (10) 季德 (11) 对德 (12) 文督 (13) 武督 (14) 佐军 (15) 振武 (16) 剋虞	紫服 紫服 绯服 青服
新罗 17 官阶	(1) 伊伐濇 (2) 伊尺濇 (3) 迎濇 (4) 波珍濇 (5) 大阿濇 (6) 阿濇 (7) 一吉濇 (8) 沙濇 (9) 级伐濇 (10) 大奈 (11) 奈麻 (12) 大舍 (13) 舍知 (14) 吉士 (15) 大鸟 (16) 小鸟 (17) 造位	紫服 绯服 青服 黄服 黄服

百济定都于汉城时，有过六佐平或大臣，分掌内廷奏折、财政、宗教礼仪、王宫和京城守卫、刑狱和地方军队。在百济的最后125年中，存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政府结构，由22个部门组成，其中12个隶属王宫，10个分管政府事务。在新罗，也出现了中央政府部门，

<sup>①</sup> 《三国志》卷30《韩传》。

<sup>②</sup> 本表引自[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国防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7页。



并按职能各有所司，如军事、监察、内廷机要以及财政等。

百济、新罗都以精耕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与中国中原地区具有相同的经济类型。在引入汉字之后，汉语文学都开始兴盛起来，并出现用汉语写作的记载本国历史的史书。儒学已逐渐为统治阶层所接受，成为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佛教与道教在民间开始流行，正在取代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从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到服装、礼仪等日常生活习俗，百济和新罗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新罗、百济在步入成熟国家的同时，必然走上中国式国家的发展道路。

公元4世纪以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后，高句丽的统治重心转入朝鲜半岛。高句丽与百济、新罗长期相互攻伐。唐王朝建立后，新罗因受到高句丽与百济的夹击而向唐王朝求救，在调解无效之后，唐朝出兵先平百济，并于668年灭亡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新罗在助唐进攻百济与高句丽的过程中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随着唐军的内撤，百济故地皆为新罗所控制，从而形成中国的安东都护府统治朝鲜半岛北部、新罗统治朝鲜半岛南部的格局。唐玄宗正式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赐予新罗，双方以大同江为界。

### 三、从邪马台到日本

在绳文文化时代之后的弥生文化时代，日本已经引入水稻种植，开始步入农耕社会。约在公元前1世纪，按中国史书的记载，日本列岛分为“百余国”，但这个“国”显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国家，而是聚落联盟体。至3世纪，通过不断的兼并，日本列岛已由“百余国”发展为“三十国”，并出现了邪马台政权。邪马台著名的女王卑弥呼在位期间曾遣使中国。

邪马台国内存在着王、大人、下户、生口、奴婢等阶级。大人是对中下层贵族的称呼，包括女王国及其属国的中下层官吏和有势

力的家族集团的首领。最上层贵族称国大人，包括邪马台国及其属国的高级官吏。<sup>①</sup> 他们出入宫室，下户相遇，皆需回避让路。国大人和大人构成支配阶级，有一夫多妻的特权。下户即平民阶级，也拥有一夫多妻的权利。奴婢和生口构成奴隶阶级。服侍贵族的家内奴隶称奴婢，仅女王卑弥呼个人拥有的奴婢就多达千人，她死时还选择一百多名奴婢殉葬。

邪马台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官僚机构，其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共有7级。国王之下是掌管政务的辅臣，辅臣之下的中央一级官吏在官衔之前皆冠以“大”字，分别掌管政治、全国贸易、外交事务、军事等。“大率”这个职位是女王国派驻伊都国的总督，检查和掌管女王国以北各国的事务并兼管外交。<sup>②</sup> “大倭”负责管理全国经济，“大夫”主管外交事务，中央还设有大将负责军事。

邪马台国已经步入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sup>③</sup> 这是日本列岛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的早期国家。与邪马台国并存的所谓“国”，也许有一些也具有与邪马台国相似的政治组织形式，即已经形成早期国家，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4世纪前半期，由崛起于近畿地区的大和国统一了九州北部至中部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结束了地域国家的分裂状态，开始了大和时代。

大和时代最具特色的考古发现是古坟。百舌鸟耳古坟群中的仁德天皇陵（今大阪府大仙町），全长486米，后圆部直径249米，前

---

① 王金林：《邪马台国と古代中国》，学生社1992年版，第148～149页。

② 汪向荣：《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③ 全春元认为邪马台仍旧是部落社会，日本国家是公元4～5世纪在畿内地区首先兴起的（全春元：“关于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异议”，《历史教学》，1990年第7期）。赵步云、王顺利认为，邪马台国尚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赵步云：“邪马台国社会性质初探”，《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王顺利：“论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但沈仁安认为，邪马台国是带有普遍奴隶制性质的早期国家（沈仁安：“论邪马台国的性质”，《日本问题》，1988年第4期）。

方部长 305 米，陵外廊有三重水濠环绕，周围有圆坟及前方后圆坟的陪冢 13 座，被认为是日本最大的古坟。应神天皇陵（今大阪府曳野市），全长 415 米，四周环有水濠，有陪冢，规模居日本第二。大型古坟的出现，是以能够组织庞大的劳动力、建筑工程技术的进步和铁器工具的大量使用为前提的，这不仅可以证明这些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也可以证明当地的政治组织形式进一步复杂化，已经开始由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演进。

大和朝廷的国家组织在 5 世纪末逐渐发展健全。当时的朝廷是以最大的豪族大王家为中心，由在大和及其周围拥有地盘的豪族集团联合组成的。根据贵族出身的高下以及在统一过程中的功绩，大王授予姓氏。上层贵族有臣、连、宿弥、造等姓氏，掌管朝廷的政治，地方贵族中有直、君、首等姓氏，统治地方。有姓氏的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世袭特权。

在中央，由势力较强的葛城、平群、三轮等氏组成最高执政机构。并由中臣氏、忌部氏主持祭祀，大伴氏、物部氏、久米氏等主持军事，苏我氏主持财政。在地方上设置造长、稻置、村主等官职。大和政权在征服各地时，一般不破坏被征服集团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满足于向其征收贡物、征发劳役和兵役，同时，也按其原有的职业和技能，将其编入新设的或旧有的各种不同的部，编入者便称为部民。

5 世纪后半期，大和国内统治着众多土地与人民的豪族间的对立激化。进入 6 世纪后，物部氏、苏我氏先后继大伴氏兴起，6 世纪末，苏我马子打倒了物部守屋，掌握朝政。此后继位的女天皇推古天皇，任命她的侄儿圣德太子为摄政，令其与苏我氏合作，进行改革。这就是推古朝改革。622 年，圣德太子去世后，苏我氏的势力日益强大，威胁到天皇的存在。645 年，中大兄皇子和镰足等人暗杀了苏我入鹿，消灭苏我氏，并在从中国归来的留学生的支持下，开始改革。因其仿效中国，首次确立“大化”年号，此时期的一系列改

革通常被称为“大化革新”。

大化二年（646年）颁布的改新诏，主要内容是：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组织机构；建立户籍和账簿；整顿军事、交通制度；统一实行新税制等。<sup>①</sup> 668年，天智天皇命中臣镰足仿唐朝的《贞观令》制定了《近江令》，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化革新的内容说明，改革的目的是模仿唐王朝的中国建立律令制国家。从推古朝改革到大化革新，通过一系列改革，日本由早期国家步入成熟国家。由于这些改革都是以中国为蓝本的，因此，日本建立起的成熟国家与中国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

元明天皇即位后，在大和北部的奈良仿唐朝都城长安建造了平城京，因此，710-794年以平城京为都城的时代，在日本史上被称为奈良时代。在此时期，日本的社会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并征服北方部分岛屿，领土有所开拓。但社会矛盾也开始激化，班田制面临一系列问题，庄园制开始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趋尖锐。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从此至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时间，被称为平安时代。

自秦汉以来，中国移民不断进入日本列岛。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5世纪末，曾出现两次移民高潮。<sup>②</sup> 大量中国移民的到来，为日本列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将中国文化输入日本，使日本社会的各方面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sup>③</sup> 早在推古朝，由于佛教的流行，首都飞鸟就已经建起许多中国风格的寺院，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日本在工艺、建筑、美

---

① 刘天纯：《日本改革史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7页。

②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9页。

③ 张声振：“两晋南北朝时期移居日本的汉族‘归化人’及其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0-78页。

术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被称为飞鸟文化。而在此后的白凤文化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初唐文化的强烈影响。

### 第三节 古代早期东北亚格局

公元3世纪以后，处于分裂时期的中国历代政权仍都在东北亚地区设置与中原相同的州、郡、县等地方行政建置，但总的发展趋势是与中原相同的地方管理体制的内缩，特殊行政设置与地方民族政权越来越发达，中国因内部分裂，对东北亚的控制力大为削弱。东北亚出现三个新的成熟国家：百济、新罗和日本，中国不得不考虑与东北亚其他国家关系这一新问题，并对自己在东北亚的政策进行调整。

唐代向东北亚大力推广羁縻府州制，在灭亡百济与高句丽之后，唐王朝曾一度将除日本之外的东北亚地区全部纳入羁縻体制之下，形成一种新的东北亚秩序。中华文明在东北亚的传播也达到一个新高度，东北亚文化圈形成。

#### 一、东北亚文化圈

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sup>①</sup> 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

在东亚文化圈的诸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无疑当属汉字。汉字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东亚各国无文字的状态，而且作为重要的先导，

---

<sup>①</sup> “日本史学界关于‘东亚文化圈’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3期。

使各国得以展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也正是以汉字为载体，儒学才成为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各国也才接受了中国化的佛教，引进中国的典章制度，通过改革成为律令制国家。

汉字从黄河流域传播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其他地域，传播到汉语各方言区，传播到非汉语的民族和国家。在汉语方言区的传播大致开始于春秋时期，在非汉语的民族和国家的传播则开始于三国和两晋时代。在熟悉汉字文言以后，汉语各方言区、各民族和国家，在民间开始假借汉字书写本地口语，形成各种汉语方言文字和非汉语的汉字式文字。因感到假借汉字存在诸多不便，于是依照汉字的格式，自造新的本地汉字，并进而创造本民族的汉字式字母。周边各国汉字式字母的创造，早的开始于唐宋，晚的开始于元明。

汉字在东北亚首先传播至朝鲜半岛。商末箕子率殷遗民 5 000 人进入大同江流域，应该已经将汉字带入该地区。朝鲜半岛上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大致始于 2-3 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无一不是以汉字为官方文字。直到 1910 年被日本吞并为止，汉字作为朝鲜半岛的正式文字时间长达一千七八百年。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是在 3-4 世纪，汉字作为日本的正式文字延续到 15 世纪，时间长达 1200 年。在汉字传人的影响下，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人名也开始汉化。日本的天皇一词也是借自汉语，大化革新后，还仿照中国制定了年号。713 年开始，诸多的地名都仿中国改成两字。汉字的传入也结束了东北亚各国没有书籍的历史，在汉字传入之后，东北亚各地开始大量引进中国图书。至平安朝初期，传入日本的汉字书籍已达 1 579 部，16 790 余卷。汉文图书传入各地成为中华文明在东亚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汉文典籍的学习，朝鲜半岛与日本都逐渐形成自己的汉语文学。

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逐渐成为各民族统一的教科书。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他们也引进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包括全套的儒家教学内容。儒学约在公元 4-5

世纪传入日本，<sup>①</sup> 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还要早一些。随着儒学的传播，东北亚各国逐渐形成相似的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这从深层面塑造出东北亚人特有的民族性。

朝鲜半岛早在公元9世纪就已经仿中国实行科举制度，至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时期，科举在朝鲜半岛成为非常成熟的考试制度。日本也曾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实行过科举制度。<sup>②</sup>

自唐代开始，日本、新罗的政治体制也仿自中国。特别是日本，在大和国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受中国官制的影响。至奈良时代（710—794年）和平安前期（794—894年），日本的政府机构、律法典章、土地制度、户籍赋役制度、军事制度、货币和度量衡、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无一不是仿自唐朝。<sup>③</sup> 今天日本政府的“省”和朝鲜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的“道”，都沿自唐代。日本在645年实行的大化革新，即以“中华化”为最高理想。其班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及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都以唐制为蓝本。朝鲜也是以唐制为立国规范，中央机构仿唐而设。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国律令法制体系，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古代的律令制度：《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弘仁格式》、《贞观格式》、《延喜格式》等，都是在直接全面地系统接受中国唐代及其以前各代律

---

① 何德伟认为儒学传入日本是在公元4世纪（何德伟：“儒学传入日本与大化革新”，《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林玄则认为是在公元5世纪（林玄：“传播和影响：儒学在日本”，《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萧瑞峰：“日本有没有实行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年第7期；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越南]潘继炳著，罗长山译：“越南的科举与武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③ 郑彭年：《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6页。

令法体系的基础上，于7-10世纪陆续编纂的。<sup>①</sup> 朝鲜半岛还曾直接沿用中国的唐律。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改革、发展，至唐代，已完成中国化的过程，形成汉地佛教或者说中国式的佛教。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佛教受中国影响极大，所流传的都是中国式的佛教。唐代盛行的佛教宗派，也是朝鲜半岛和日本盛行的佛教宗派，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同样盛行。中国与朝鲜半岛间存在频繁的佛教典籍交流。流传在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大藏经》也是出自中国流传的《大藏经》系统，而与南传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中日佛教交流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鉴真东渡，有的学者认为，鉴真东渡带来中国佛教文化的大量输入日本，对日本的雕塑、建筑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的舞乐、散乐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传入日本，日本的伎乐、能、歌舞伎及杂技都与中国乐舞戏曲存在姻缘关系。日本雅乐源自唐乐。传到日本的隋唐燕乐曲目多达一百多种。隋唐燕乐如潮水般涌入日本，渗透到日本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祭典上演奏着唐乐，宫廷礼仪伴着唐乐进行，达官贵人的酒宴更离不开唐乐助兴，在民间节庆中也喜欢演奏唐乐。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的说，发展至盛唐时代，中国的艺术，包括音乐、书法、舞蹈、绘画、雕塑等方面；中国的技术，包括各种生产工具、天文、历算、建筑、中医药等方面；中国的风俗，包括饮食习惯、筷子的使用、节日庆典、娱乐活动、体育活动等方面，无不对东北亚各地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服饰，也对东到日本、西到西域的广大地区产生影响。有的学者就是把食用稻米和使用筷子作为东北亚文化

---

<sup>①</sup> 吴怀民：“试论中国古代律令及其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日]石田琢智：“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法学》，1999年第5期。



圈的特征。中国人的春节也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节日。

综上，在公元7-9世纪的隋唐之际，东北亚文化圈已经形成。

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东北亚各地在上述各个方面逐渐表现出一致性。至盛唐时代，以艺术、技术、风俗等外在的形式化的物质文明为表层，以制度文化、宗教信仰、文学修养、哲学理想等结构性的精神文明为中层，以内在的抽象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为里层，在东北亚已经形成多层结构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古代东北亚文化圈，这对唐以后东北亚历史的发展形成深远影响，也是我们将古代东北亚看成独立的、有着自我发展规律的古代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羁縻与封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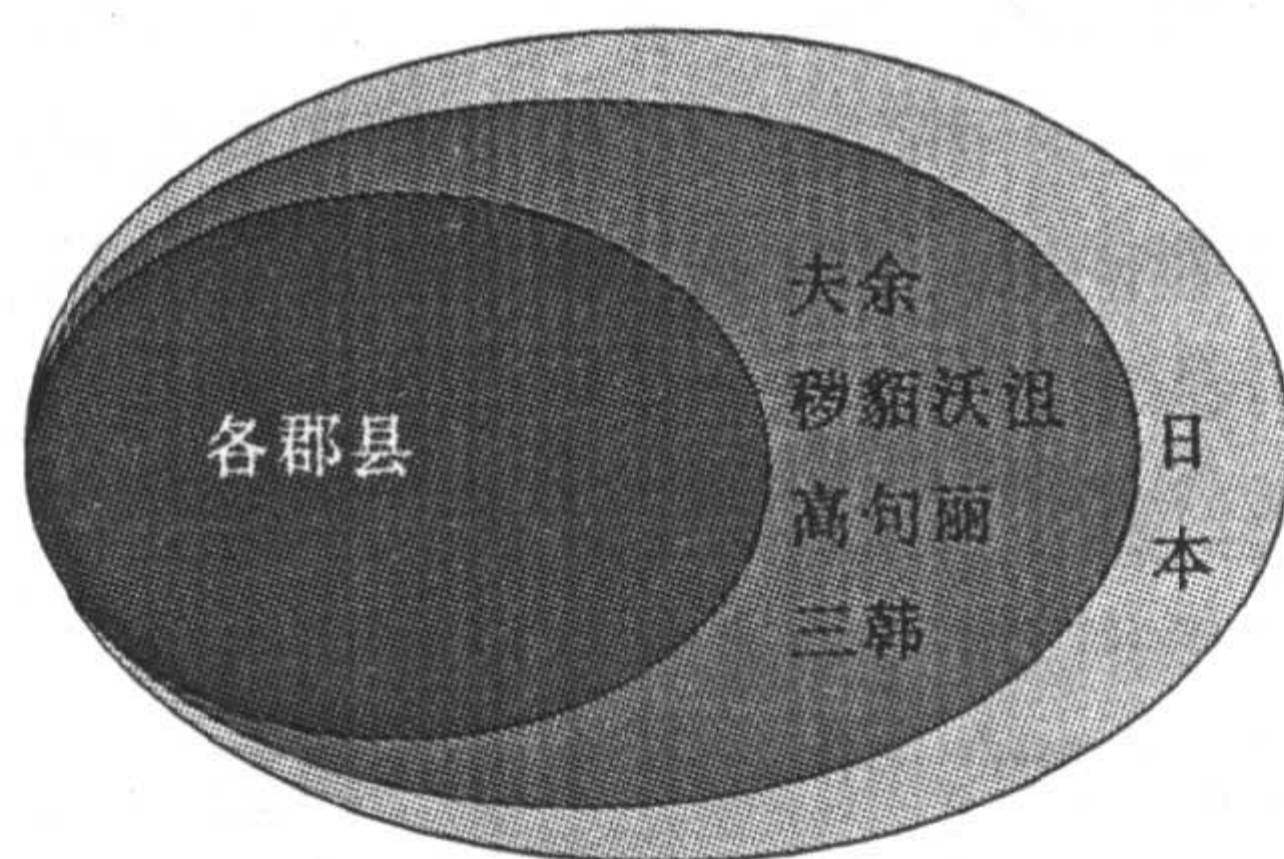
汉王朝不仅将东北亚的大陆部分完全纳入自己的统治，公元57年，因倭奴国遣使洛阳朝贡，光武帝册封倭奴国的统治者为“汉倭奴国王”，使日本在名义上也成为中国的地方政权。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一般认为，这颗印就是光武帝赐给的，这证明中国史书记载的可靠性。

但汉王朝的统治者也已经意识到，将东北亚各地都纳入郡县体制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在一些地区开始实行不同于中原的管理体制。两汉在郡县之外新设的地方管理机构主要是两种：属国；护乌桓校尉。除上述两种特殊地方行政机构之外，汉王朝沿边诸郡往往也具有代表中央管理郡县区以外的少数民族的职能。在东北亚，作为汉王朝的附属国的卫氏朝鲜、夫余、高句丽都不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卫氏朝鲜隶属于汉辽东郡，夫余、高句丽都是隶属于汉玄菟郡。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隶属于乐浪郡，日本对中国的朝贡也主要是通过乐浪郡来进行的。

在此基础上，汉代对东北亚的管理明显分为三个层级：在辽西至朝鲜半岛北部这一东北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核心地区，设置与中原相同的郡县体制加以管理。在此核心区以东、以北的各族、各“国”，由边郡代表中央加以管理，但其内政多由本族首领负责。其

对中央的隶属关系主要表现在接受中国册封和边郡的管理，其首领“四时诣郡朝谒”，<sup>①</sup>必要时提供一定的物资，如战争中为汉军提供军粮。汉王朝在其附近地区驻有军队，可以随时对不服从中央政令者进行武力讨伐。对于日本，中国仅满足于其名义上的服从，并对之加以册封，由于大海的阻隔，而未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以确立对其的统治。很明显，前两者构成中国在东北亚的疆域，而后者则不是。

汉代东北亚区域结构示意图



可以说，后世以羁縻体制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以封贡关系对待外国的政策，在汉代已经初现端倪。但总体而言，汉王朝对东北亚核心区以北的统治力度较强，而对该地区以东的统治力度相对较弱。因此，当中原发生长时间战乱无力东顾时，朝鲜半岛南部对中国的离心力就越来越强，逐渐形成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百济和新罗。但是，由于该地区在汉代曾被纳入中国的统治，中国对该地区的态度始终与对日本列岛的态度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中国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以及后来进入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北魏强盛时虽已基本削平东北的割据势力，却惟独对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发展而来的高句丽政权无可奈何。由于高句丽的疆域横亘于中原与朝鲜半岛南

<sup>①</sup> 《三国志》卷30《秽传》。

部之间，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为其独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作用。但中国认为这些地区和民族是隶属于中国的地区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对上述三个政权采取了介于羁縻统治与封贡关系之间的政策。除册封和不稳定的朝贡关系之外，中国与朝鲜半岛基本上不存在其他政治关系，这一点与汉代对日本的册封是相似的，但中国封给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封号多具有中国地方官的性质，以此证明其对中国的隶属关系和其作为中国地方政权的属性，这一点与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具有相似性。这一特点在对高句丽和百济的册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中原王朝的心目中，朝鲜半岛还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朝鲜半岛上的三国不是独立政权，而是中原王朝下属的地方行政单位。

高句丽、百济、新罗虽然都已形成完善的国家机关，但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都仍旧对中国保有一定的向心力，认为中国有干涉朝鲜半岛内部事务的权力。当朝鲜半岛内的三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时，总是向中国请援、告急，“逼使或诱使后者扮演调停人的角色”。<sup>①</sup> 这种意识也是日本所不具有的。

直到唐代，中国还把朝鲜半岛视为中国领土。裴矩、温彦博积极主张讨伐高句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sup>②</sup> 唐朝最终灭亡百济、高句丽，并在新罗设鸡林州都督府，就是为恢复汉代在东北亚的统治格局。而在白江口之战打败日本增援百济的部队后即对之置之不理，与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一直认为，朝鲜半岛隶属于中国，而日本始终不过是“化外”。

与汉代不同的是，此时的朝鲜半岛已与日本列岛一样，形成成

---

<sup>①</sup> 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sup>②</sup>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熟的国家形态，他们显然与过去汉王朝所面对的部族或早期国家不同，如何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成为唐朝统治者所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

### 三、盛唐的东北亚秩序

隋唐两代在统一中国中原地区之后，都积极恢复汉代对东北亚的统治，至668年唐灭高句丽，这种愿望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唐王朝面对的东北亚形势却与汉代大相径庭。长期的战乱对东北亚核心区造成严重破坏，昔日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辽东半岛与大同江流域都变成人烟稀少的地方。随着契丹人的势力自辽西向东发展进入辽东半岛，和肃慎系民族南迁进入大同江流域，辽东半岛的游牧经济成份增加，而大同江流域甚至出现了渔猎采集经济。东北亚在汉代比较发达的农耕经济区，至唐初仅存辽西一隅，其中还夹杂不少从事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成份。

战乱中核心区的居民向周边地区逃散，客观上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唐灭高句丽后新罗实力的壮大与渤海国的兴起都与此密切相关。原核心区的衰落换来的是周边地区的迅速发展与兴盛，人类对东北亚的开发在向纵深方向发展，东北亚经济文化的整体水平在提高。随着原核心区内汉族的衰弱与秽貊族系各族的消失，肃慎族系各部建立的渤海国与东胡族系的契丹人迅速发展，中国东北开始步入肃慎族系与东胡族系竞相发展的新时代。

唐朝初建伊始即以辽西地区残存的农耕区为桥头堡，开始了对东北亚的经略。面对新的形势，唐代主要采用羁縻府州的形式对东北亚的大陆部分进行统治。唐朝设立松漠都督府管辖契丹人、饶乐都督府管辖奚人、室韦都督府管辖室韦人、黑水都督府管辖黑水靺鞨人。在灭亡高句丽以后，设安东都护府，下辖9都督府、42州、100县，负责管辖高句丽遗民。大祚荣立国后接受唐王朝的册封，唐王朝又在其管辖区设立忽汗州都督府。唐朝还以新罗辖区为鸡林州

都督府。这样，至唐朝的鼎盛时代，中国又重新确立起对东北亚大陆部分的统治，形成东北亚地区新秩序。

唐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时，“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sup>①</sup> 此时唐王朝在东北亚设立的都督府及其所属州县，虽然贯彻羁縻统治的思想，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但同时中央也向各级机构中派遣“华官”，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治理，并向该地区派驻军队。在全国的羁縻府州中，属于统治力度比较强的。但这种方式未能延袭下来。安东都护府不久后内迁、名存实亡，而对其他都督府，除了在黑水都督府“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sup>②</sup> 以外，基本不再派“华官参治”。

唐代设于东北亚各地的都督府多受营州押领，向中央履行充质、人觐、纳贡、捍边、征讨等义务。<sup>③</sup> 羁縻府州是中央领导下的地方行政组织，而不是独立的王国或部族。中央管理羁縻府州的方式不同于内地的普通府州，但二者在隶属于中央政府方面却没有本质的区别。通过这种方式，唐王朝将除日本之外的东北亚地区都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所以后人对于唐太宗才有“以万乘之主、兼为夷狄之君”的评价。<sup>④</sup>

当唐朝在东北亚的大陆部分重新确立起中国的统治时，日本的独立性却越来越强。

在汉代对日本加以册封以后，日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中国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从公元238年到247年间，曹魏与邪马台国相互遣使7次。南北朝时，日本列岛基本被大和政权统一，

---

①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

② 《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

③ 马驰、马文军：“唐代羁縻府州与中央关系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④ 范祖禹：《唐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进入了“倭五王时代”。按日本史家井上清的说法，此时的大和政权“仍按照公元一世纪中叶倭奴国王历来的传统，都和中国皇帝建立君臣关系”，<sup>①</sup> 倭五王时期对中国的朝贡情况见下表：<sup>②</sup>

倭五王时期日本对中国朝贡时间表

公元	王朝	皇帝	事项
413	东晋	安帝	赞王朝贡
421	宋	武帝	赞王朝贡，赐除授
425	宋	文帝	赞王朝贡
430	宋	文帝	赞王朝贡
438	宋	文帝	赞王死，弟珍王朝贡
443	宋	文帝	济王朝贡，赐除授
451	宋	文帝	济王朝贡，赐除授
460	宋	孝武帝	倭国朝贡
462	宋	孝武帝	济王死，子兴王朝贡
477	宋	顺帝	倭国朝贡
478	宋	顺帝	兴王死，弟武王朝贡
479	宋	高帝	赐武王除授
502	梁	武帝	赐武王除授

但随着日本国家形态趋于成熟，其独立意识也越来越明显。第二次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sup>③</sup> 已经

① [日] 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页。

② 本表转引自 [日] 依田熹家著，卞立强等译：《简明日本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③ 《隋书》卷81《倭国传》。

## 东北亚史

明确表达出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态度，从此开始，日本不再向中国请求册封。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认识到其国力仍不足以与中国相抗衡，但日本并未因此而回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中来，而是开始对东北亚的国际事务持消极态度，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对律令制国家的建设和完善上，此后，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地位下降，而其律令制国家成熟及其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

虽然拒绝中国的册封，但隋唐期间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还是相当频繁的。607年7月，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时，有日本僧人随来中国学习佛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外国留学生，佛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自630年至894年的两个多世纪中，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9次，正式派出而且到达唐朝的有13次。在遣唐使团中有不少来华留学生，现在有史可考的达150多人。通过这些使团和留学生，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历法、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医学、建筑学、美学、工艺、典章制度以及衣冠文物，都被介绍到日本。<sup>①</sup>在此时期，也有大批中国人移民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sup>②</sup>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成为东北亚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其维系在东北亚区域世界之内。

---

① 张万钧：“遣唐使小考”，《学术论坛》，1980年第3期。另参见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韩昇：“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及在文化方面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

# 第二编

多元与一体（10世纪初—1840）





## 导言

随着唐朝的衰落，羁縻体制日趋动摇，东北亚各国都经历了动荡与重建的过程。10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多元一体的新时期。从辽、宋、夏、金先后对峙的第二次南北朝到元朝的大一统，此后直至1840年中国不再分裂，由此开创了中华一体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崛起，辽、金、元、清诸朝都是由崛起于中国边陲的少数民族所建立。这说明，从盛唐以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就开始进入了以横向整合为主的新时期。然而，纵向的社会历史突破因素从唐宋之际就已孕育其中了，只是这些新因素的积累和发展始终受到横向整合力量的冲击，未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历史的转型。

东北亚其他国家主要是朝鲜和日本，在中国分裂割据和第二次南北朝时期纷纷开始独立自保。随着律令制国家的逐步解体，他们开始了国家重建的过程。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他们日益突出了本国特色，逐渐形成了成熟、稳定的独立政治实体，自树意识明显增强。13世纪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大一统，使高丽政权名存实亡。元、明易代为高丽政权摆脱元朝的统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李氏朝鲜随之兴起。朝鲜政权的重建推动了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中朝之间确立了更加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关系，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成为稳定东北亚秩序的关键因素。日本则在抗元斗争中获得胜利，以其有利的岛国地理条件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文化上与朝鲜和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随着镰仓幕府的衰落，日本经历了混乱与重建的过程，直到16世纪末才实现统一，并很快就开

始了对外扩张。明朝时期日本曾一度被纳入中国主导的封贡体系，成为一元的、等级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中的成员。但随着国内统一和对外扩张，日本再次游离于东北亚国际秩序之外。

16世纪末中朝抗倭战争，是继7世纪白村江之战以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东北亚大规模战争。尽管明朝与唐朝一样，在战后都牢固确立了中国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但是战争都极大地消耗了国家实力，致使中国北方边疆民族乘机崛起，从而孕育了中原王朝覆灭的危机。日本尽管战败退守海岛，却养精蓄锐、窥伺时机，直至19世纪后期日本再次挑起东北亚大规模战争。

以天下一体和华夷之辨为基础而形成的隋唐时期东北亚世界秩序，从10世纪以来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此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是一个早期的世界社会。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个早期的世界社会都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在中国的引领下，各族各国逐步走向文明，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家形态。因此，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的发展时期。但是，此后直至1279年元朝再次统一中国，东北亚出现了多族多国竞相发展的新局面，进入了多元一体的新时期。在东北亚文化圈的基础上，朱子学的形成和传播为东北亚文化圈共同性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封贡关系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元朝时期，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将东北亚各地全部纳入直接统治的尝试。这种由征服而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帝国秩序，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明朝鉴于元朝黩武的教训，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注重发展封贡关系，从而使封贡关系日趋稳定，形成了制度化的东北亚封贡体系。随着体系内各个国家的发展，封贡体系模式被东北亚其他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关系的主要模式。到清朝前期，东北亚形成了多个中心、多个封贡体系交错并存的复杂局面，一元的、等级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不复存在。16世纪末日本统一后迅速开始对外扩张，率先从内部打破了东北亚世界的统一性。接着，西方和俄罗斯殖民势力东进，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封贡体系

日益缩小。

放眼亚欧大陆，我们发现，从10世纪前后开始，这里普遍经历了动荡与重建的过程，形成了多元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的局面。西欧拉丁世界逐渐形成了两种国际秩序，即一元等级的基督教会体系与三国鼎立（英、法、德）的世俗国家体系。13世纪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蒙古旋风”，不仅席卷亚洲大部分地区，而且直达欧洲多瑙河下游。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死，拔都才停止西进，拉丁世界幸免于“黄祸”之灾。这时，拉丁世界发动的十字军东侵进入最后阶段。在第四次十字军东侵中，西欧封建主联合攻陷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此后，随着教皇势力的衰落，西欧各国开始重建。15世纪以来拉丁世界民族—国家不断成长，16世纪兴起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使宗教民族—国家化，而且使国家间关系日益世俗化。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新教诸侯达成《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传统的基督教会体系被打破，世俗国家体系进入分化重组时期，并开始向近代国家体系转变，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多极均衡的拉丁世界格局。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在重建国家体系的同时，西欧再次掀起对外扩张高潮。地理大发现揭开了西欧向全世界扩张的序幕，到19世纪中叶逐步建立起世界性殖民帝国体系。西欧对历史的纵向突破和在全球的扩张，从根本上冲击并改造了多元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的世界历史格局。

随着东北亚内部的分裂和外部殖民势力的挤压，东北亚封贡体系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 第三章 多族多国竞相发展

从10世纪以来，亚欧大陆普遍经历了动荡与重建的过程，形成了多元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的局面。在与游牧民族的互动和交融中，儒学的东亚世界、印度教的南亚世界、伊斯兰教的西亚世界、东正教的拜占廷世界、天主教的拉丁世界等相继稳定下来。东北亚作为东亚世界的核心区域，开始进入多族多国竞相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在唐朝灭亡后再度陷于分裂状态，但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一时期，宋学的兴起，特别是朱子学的形成和远播，使中国继续成为引领东北亚文化发展的中心力量。伴随着经济重心的战略性南移，政治中心则北移，北方边疆民族政权迅速崛起，从而再次出现了南方经济大发展、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这就为元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0世纪开始，朝鲜、日本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时期。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日益发展成为独立的实体，而且在文化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开始创制文字，致力于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各族各国自树意识的增强，为东北亚区域世界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以天下一体和华夷之辨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隋唐时期东北亚区域结构，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此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世界是一个早期的世界社会。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治上，这个早期的世界社会都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在中国的引领下，各族各国逐步走向文明，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成熟国家形态。因此，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的发展时期。但是，从唐朝灭亡直至1279年元朝再次

统一中国，多族多国的竞相发展使东北亚区域世界进入了多元一体的新时期。随着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封贡关系的发展，封贡体系开始萌芽。

## 第一节 中国各族自树意识增强

在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逐步演变为五代十国。中原王朝五代更迭，南方小国林立。随着混乱局面的结束，中国再次进入了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先后对峙的南北朝时期。<sup>①</sup>此外，在中国边疆地区还存在着党项族、回鹘族、乌蛮和白蛮等边疆民族地方政权。与汉唐盛世之间的南北朝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北方的发展则使中国东北地区开始走向统一，并使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汉民族的政权曾一度向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称臣纳贡；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在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不再全面汉化，而是因俗而治，自创文字，并保留和发展了本族特色的文化，各族自树意识明显增强。但是，汉唐以来的文化传统仍然得以继承和发展。

### 一、第二次南北朝时期

从907年唐朝最终灭亡，后梁政权取而代之，直至960年宋朝建立的53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史称五代。中国南方先后出现了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史称十国。从唐朝后期开始，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族日益强盛，916年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称帝，926年攻灭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把辽的东方边界扩展至今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沿岸。辽的东北边界至今外兴安岭，

---

<sup>①</sup> 张博泉、程妮娜：《中国地方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 东北亚史

西控蒙古草原诸部。阿保机还曾多次侵扰幽州，最后从后晋石敬瑭的手中夺取了燕云十六州之地，从而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

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随着宋朝的建立而告结束。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其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第二年正月，掌握军事大权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建立宋朝。为了收复失地、统一全国，宋朝先后剪灭了南方地方割据政权，并把矛头指向北方的辽帝国。经过多次对辽用兵，直至1004年宋、辽议和，双方订立澶渊之盟，南北对峙的均势局面初步形成。

随着辽帝国的崛起，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靺鞨人的一支黑水靺鞨发展为女真族。12世纪初女真人开始形成了统一的早期国家形态。为了摆脱辽朝的统治，女真族开始了反辽斗争。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并迅速崛起。宋金海上之盟曾约定以长城为界，联手攻辽。然而，宋朝对辽战争一再失败，金朝势力则迅速南下，1122年攻克燕京，1125年俘获辽天祚帝。至此，辽朝正式灭亡。1126年宋朝都城汴京被金攻克，宋徽宗、宋钦宗被虏。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重建宋朝，并把都城南迁至杭州，是为南宋。1127年以前的宋朝史称北宋。由此开始直至1279年元朝灭亡南宋，金朝与南宋以淮河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形成南北对峙。这一时期，中国北朝的势力进一步向南拓展。

宋、辽、金先后对峙的中国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南北王朝都以中国正统自居，特别是辽金两朝在接受汉文化以后，皆标榜正统，并通过寻找德运依据而确立其合法性。<sup>①</sup>但是，南北双方的地位并非对等。从总体上看，北朝是宗主，南朝则处于臣服地位。契丹族建

---

<sup>①</sup>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立的辽朝，在兴起之初曾向中原王朝后梁称臣，但不久即灭唐立晋，扶植起以石敬瑭为首的后晋政权，并使之向辽称臣纳贡。石敬瑭死后，抗辽势力兴起，主张宁称孙也不称臣，引起辽朝统治者的不满，不久后晋被灭。随着宋朝的崛起，尽管南北对峙的均势局面维系了长达百余年时间，但是宋朝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巨额岁币，而且在日益被动中被迫割地求和。契丹族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传统封贡关系荡然无存。

女真族的崛起打破了辽、宋对峙的均势格局。宋金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联手灭辽的海上之盟以后，金朝逐步掌握了主动权，最终于1126年灭亡北宋。此后，南宋政权日益被动，1141年“绍兴和议”，开始向金称臣纳贡。虽然后来有“隆兴和议”、“嘉兴和议”，宋朝改变了臣属地位，但金宋关系仍然保持“叔侄之国”或“伯侄之国”。“在整个宋金交往过程中，宋朝的地位始终低于金朝，宋朝并没有处于中心地位。”<sup>①</sup>因此，金、宋的对峙均势更加脆弱，金朝不但从未成为宋朝的属国，而且往往居于主动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宋朝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土地私有制和租佃关系获得发展，从而出现了根据有无土地来划分的主户和客户。<sup>②</sup>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弱化，劳动者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经济加速发展。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也改变了以往轻商、抑商的政策，允许自主经营商业，商品经济获得空前繁荣和发展。在城市，传统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分离的格局被打破，并日益形成了工商业市镇。在城市周边和一些村落，草市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城市中出现了市民阶层，这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突破。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是中国古代史上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

① 赵永春：“关于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2期。

② 王晓如：“宋代的五等户”，《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辽、金与宋的频繁交往，直接促进了中国北方的经济发展。<sup>①</sup>辽、金统治时期，蒙古草原东部、南部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也开始由农、牧、渔猎并举的“复合型”经济向精耕细作农业转化，旱作农业区向北有较大拓展。由于农业的发展带动了草原地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因此，从辽开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新兴城市。随着这些城市的发展，商业在这一地区也得到发展。金朝统治时期，采取“实内地”的政策，把先进地区的大量人口迁往东北，农业手工业技术得到广泛传播，东北地区的农业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时期。工商业也获得了繁荣，出现了行人同业组织，上京等地也打破了传统的坊市限制，出现了临街的店铺和街市，上京城内还出现了典当业。<sup>②</sup>

从唐末五代开始，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破坏。北宋时期尽管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恢复，但是宋金之间的战争再次掀起北方移民南下的浪潮，江南所有府州都有来自北方的移民，建康、临安、平江三大府的人口以北方移民为主，这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sup>③</sup>北方的旱作农业区虽然在扩大，但是其发展水平却呈停滞不前之势。单一的谷物种植业生产结构，其局限性日益突出。江南地区则以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为基础，逐步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基本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从而使中国继续成为引领东北亚发展的主导力量。

宋代的文化也开始出现了转型的迹象。儒家文化为适应社会发展进行了自我调整，从而形成了宋学，特别是朱子学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影响深远。宋代文学上成就最大的就是宋词，到南宋时，由于社会动荡，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使激扬的爱国主义成为文学主题。

---

① 黄凤岐：“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② 王德厚：“金上京城市经济初探”，《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③ 吴松弟：“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另外，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散文和话本也有了很大发展。宋代也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时期。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继汉代造纸术之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都完成于宋代。

辽、金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较快。他们不仅把尊孔读经、科举取仕的汉族政权的传统继承下来，而且推动了各种文化形式的繁荣。辽朝辽圣宗耶律隆绪（971～1031年）对契丹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曾经在位长达49年，10岁时就能赋诗，一生通晓音律，喜好绘画。他曾经把白居易的《讽谏集》译为契丹大字，并命诸大臣诵读。在他的《题乐天诗》中曾有“乐天诗集是吾师”句，可见他对白居易诗的推崇。他本人还赋有《御制曲》500余首，遗憾地是除了《传国玺》一首外都已失传。在这首诗中，辽圣宗表达了辽朝为中国正统的观念：“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sup>①</sup>

金代戏剧在继承辽和北宋的基础上也有发展，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始有纯粹的演故事之剧。”<sup>②</sup> 儒学在本地也有一定发展，并形成其鲜明的特色，与同时代的南宋相比，其重点不在于哲学、道德思想领域，而是在政治思想、民族思想方面有所突破，强调天命、德治，提倡有德者不分民族皆可做中原皇帝的思想。佛教、道教也继续获得发展，金代河北地区还出现了道教的三大新派：太一教、全真教、真大道教。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的南移也逐步完成。北宋时期，在经济重心加速南移的同时，黄河流域仍保持着文化重心的地位。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仍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传统，作为传统

<sup>①</sup> 阎凤梧、康金生：《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sup>②</sup>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七《古剧之结构》。

的文化中心，人们尊重知识，崇尚儒学。陕西还出现了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唯物主义派别——张载创始的“关学”。<sup>①</sup> 洛阳作为前朝故都，其文化氛围也较浓厚，出现了程颢、程颐所创立的“洛学”，并成为当时宋王朝巩固统治的理论法宝。但是，宋金之间的战争不仅使黄河流域的文化受到严重破坏，而且随着大量移民南下使江南地区的文化得到较快发展。<sup>②</sup> 南宋虽然军事力量不及金朝，但其经济、文化都比金朝发达。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逐渐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乃至东北亚的文化重心。

在政治上，宋朝鉴于唐朝内轻外重、中央权威下降导致地方分裂割据的教训，实行内重外轻、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从而达到内外相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中央，三师、三公地位最高但无实权；丞相分左右，并设副丞相参知政事；三省六部制仍被沿袭，还设置了其他许多机构。在地方，设立路、府、州、县，但州刺史、县令名同虚设，实际由知府、知县任事。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力和权威，宋朝政治体制运行方式的重要特征是官、职和差遣分离，“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sup>③</sup> 临时被差遣任事的官员才有实权。这些措施使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新阶段。辽、金朝则主要吸收了唐宋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因俗而治，辽的南北面官制、金的猛安谋克制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中国的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西夏、西辽，南方的大理、吐蕃等，都是中国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地方民族政权割据一方，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境内呈现出多民族政权竞相发展的局面。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上，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就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向突破与横向扩展并行。宋朝虽然没有像汉唐盛世那样强大而辉煌，却在许多领

①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304页。

② 吴松弟：“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③ 《宋史》卷161《职官志一》。

域率先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出现了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边疆民族纷纷建立政权，竞相发展本土经济文化，把汉民族的传统与本土传统结合起来，从而加速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 二、各族自树意识增强

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崛起，造成了各政权之间的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其中突出的现象是，汉民族的政权曾一度向边疆民族政权称臣纳贡，传统的封贡关系被颠倒。中国境内的边疆民族在政治制度、语言文字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不再全面汉化，而是自觉地保留和发展了本族特色的文化，表现出较强的自树意识。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汉化的同时建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央实行南北面官制，北面官治契丹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则管理汉人和渤海人事务；地方实行相应的部族制、头下制、属国制与州县制。其中作为宫卫组织和行宫治所的斡鲁朵制、以皇帝为中心进行巡狩的四时捺钵制、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契丹部族制、由部族头目制与中原州县结合而成的头下制，以及在选官制度上长期坚持本族的世选制，只对汉人实行科举制，都突出体现了契丹族因俗而治、保留和发展本族政治制度特色的自觉行为。

创制文字成为契丹族开国不久的重要措施。契丹族本无文字，以刻木为信。920年，耶律阿保机颁行契丹大字。它是在汉人的直接参与下，依仿汉字创制而成。925年，阿保机之弟迭剌依据回鹘文拼音法，在汉字和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又创制了契丹小字。随着契丹文字的创制和发展，它与汉字的差异越来越大。契丹大小字均被尊为“国字”，与汉字并行，甚至在辽灭亡以后仍然被女真族沿用。创制文字是契丹族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对其他边疆少数民族起到了示范作用，也是契丹族开始自觉抵制全面汉化的重大举措。尽管阿保机深受汉文化影响，但在颁行契丹文字后他坚持在本族人面前

不说汉语：“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sup>①</sup>

在风俗文化上，契丹族也保留和发展了本土特色。阿保机开国之初，改变旧部以乡里为姓的传统，统一为两大姓氏，即耶律和萧，不改汉姓。契丹族的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sup>②</sup>保留了本族胡服左衽的传统，并对中原及其他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契丹族的诗歌绘画艺术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内容多反映本族神话传说与北漠风情，特色鲜明。契丹族还是第一个自修本族史书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从辽太祖开始就着手编修国史，辽道宗时修成《皇朝实录》70卷。<sup>③</sup>历史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契丹族史学的发展是其民族自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

金灭辽以后，耶律大石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强大的西辽政权，曾使喀喇汗国、花拉子模、高昌回鹘汗国等称臣纳贡，发展了以自己为宗主国的封贡关系，并与金、宋和西夏并立，直至蒙古西征时才最终灭亡。西辽继承辽制，沿袭南北面官制，广泛采用汉人传统的尊号、年号、庙号；通行契丹文字和汉字。<sup>④</sup>西辽把契丹族文化和汉文化传播到更加辽远地区，特别是对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女真族的政治制度初承辽制，到金熙宗统治时期完成了变革，实行一元化的三省六部制；地方则并行州县制、猛安谋克制和部族制。其中体现女真族特色的猛安谋克制，实行军政合一，有效地把女真人组织起来，成为金代的统治支柱。

在建国前，女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以刻木为信。阿骨打称帝

---

①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② 《辽史》卷56《仪卫制二·国服》。

③ 孟庆山：“契丹的文化发展及对中国东北部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④ 冯继钦：“西辽官制简述”，《辽金史论集》（第4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后，开始着手创制文字。在汉字和契丹字基础上，完颜希尹和叶鲁依仿汉字和契丹字制成女真字，1119年颁行。此后，1138年金熙宗曾颁行女真小字，并下令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各用其字。1191年金章宗诏罢契丹字，女真文字与汉字并行。<sup>①</sup>女真族不仅创制自己的文字，而且坚持保留和发展了本族的风俗文化。金世宗和章宗屡次禁止女真人改汉姓、用汉名，禁止学南人衣装。以反映本族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金源文化，不仅是融合了女真、契丹和汉文化的新创造，而且对汉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人重史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金人曾修撰了两部《辽史》，自修本朝历史更受重视，在历史教育和历史编纂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sup>②</sup>

与契丹族相比，女真族日益汉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但本族传统仍然得以保留和发展。这表明，从契丹族崛起以来，中国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已经成熟并定型，边疆民族特别是北方边疆民族为中国历史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并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要力量。

党项族在辽、金和宋的先后对峙中抓住了独立发展的历史机遇。早在李元昊称帝前，他的父亲李德明统治时期（1004～1031年），同时向辽、宋称臣，分别被册封为夏国王和夏王，加紧了称帝的准备。在元昊称帝之初，就极力争取与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自用年号，不再称臣，遭到宋朝统治者的拒绝。1044年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达成协议。西夏借此获得了很大的独立自主权，宋朝统治者也不得不在保留封贡关系形式的前提下，承认这一地位。但不久西夏就叛宋臣辽，接受册封；金灭辽后，西夏“一切依臣事辽国旧例”，<sup>③</sup>基本断绝了与宋朝的封贡关系。

1032年元昊继承王位后，首先废唐宋所赐的李姓和赵姓，改姓嵬，名兀卒，意为“青天子”，与宋朝的“黄天子”并立；以避父

① 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7页。

② 何宛英：“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③ 《金史》卷134《外国上·西夏》。

讳为借口，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后再改开运，三改广运，并建立了一整套类似于宋朝的官制系统。1036年，元昊主持创制小蕃文字，尊为国字，并在国内建蕃学，推广蕃语。西夏文字是依据汉字创制的，与汉字比较接近，被归类为汉字式文字。党项族本族文字的创制不仅丰富了汉字文化圈的内容，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昊时期开始党项族民俗文化备受重视。元昊利用政权的强制力量移风易俗。1032年，元昊下秃发令，推行党项族传统发式，并使蕃属遵行。更衣冠之制，除文官因袭唐宋官服形制外，武官服制则保持浓厚的民族特色，庶民衣青绿以别贵贱。在精神文化领域，元昊提倡本族的尚武传统，并“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进行音乐改革；文学艺术主要反映本族社会生活内容，民族诗文创作获得了繁荣。

尽管党项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是自立官制、自创文字，以及提倡本族风俗、发展本族文化，都充分显示了与汉文化分庭抗礼的民族自树意识。正如元昊称帝后向宋朝奉表云：“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伏从。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sup>①</sup>这是党项族自树意识增强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中，回鹘族、乌蛮和白蛮等都建立过强大的地方政权。11世纪兴起的回鹘族喀喇汗王朝对中亚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其统治者曾自称“桃花石汗”，意为“东方与中国之王”，与中国其他王朝之间关系密切。此外，高昌回鹘政权也曾与辽、宋保持封贡关系，早在8世纪中叶就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回鹘西迁后仍然沿用本族文字和汉字。从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文被广泛使用，13世纪以后的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都曾把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回鹘族的西迁以及在当地所进行的经济文化整合，为

---

<sup>①</sup> 《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

中国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传播汉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乌蛮和白蛮的南诏和大理地方政权则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整合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752年，南诏地方政权开始自立年号，在唐朝末年的混乱局势下日益独立。10世纪初，南诏灭亡，相继出现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和大义宁国。938年以白蛮为主体的段氏大理国兴起，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力量。大理国初期，高升泰篡国主位，曾于1095年改国号为“大中国”。其后还政段氏，高氏世代为相国，人称“高国主”，曾号“中国公”。<sup>①</sup>这集中体现了与中原王朝并驾齐驱的民族自树意识。白蛮是汉化程度较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在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权以后，以汉字为官方文字，与此同时，根据汉字而创制的白文在大理国时期也得到广泛使用，出现了不少以白文撰写的白族古代史书及文学作品。<sup>②</sup>这对白蛮向白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白族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汉人“夷化”即白族化的现象。<sup>③</sup>尽管大理政权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了封贡关系，但是以白蛮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局面充分体现了白族形成过程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综上所述，唐朝末年至元朝统一之前，是中国境内边疆少数民族大发展时期。这些边疆民族政权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不但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政治文明，而且在民族文化上也取得了许多成就，特别是民族文字的创制突出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树意识。

### 三、东北地区的统一

从唐朝末年开始，中国东北地区诸部族加快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孕育着新兴的力量，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据记载，契丹人发祥于辽水上游，唐朝末年逐步发展到部落联盟阶段。901年耶律阿保

① 邵献书：《南诏和大理国》，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5页。

② 同上，第183～185页。

③ 陆韧：“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 东北亚史

机担任部落联盟的夷离堇时，专司对外征讨。由此开始直至他继任可汗、建立国家，先后征服了奚人、于厥、室韦诸部，统一了辽西北地区，掌控了草原地带。925~926年，辽攻灭渤海国建置东丹国，并相继收降女真、铁利等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东北地区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此后，辽朝统治下的女真人也很快发展到部落联盟阶段。到12世纪初，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率众起兵反辽，1115年建立金国。随后女真人仅用了10年的时间，便推翻了辽朝的统治，再次统一东北，并继续对外征讨，最终与南宋政权对峙，建立了强大的北方政权。

在前朝统治的基础上，中国东北地区民族政权的崛起和统一，并走向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舞台，使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更加巩固，东北地区的疆界日益明确。辽朝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疆界东南起自鸭绿江以东地区，经今朝鲜咸兴一带地方，向东北到达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包括鞑靼海峡。北越黑龙江抵外兴安岭。西北则到达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山林地带。金朝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疆界东南起自鸭绿江下游地区，经今朝鲜定平之北，向东北到达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包括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西北则到达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一带。<sup>①</sup> 在以上广大领域，辽金王朝都先后实行了有效的统治。

辽金对东北地区的统治遵循因俗而治的方针，在吸收汉族政权的统治方式的同时，保留了民族特色，为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实质性的整合奠定了基础。辽朝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对新征服的异族维持其原来的社会制度，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北面官制。在实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上，北面官制是辽朝最高权力机关，管辖宫账、部族、属国；南面官制则管辖汉人事务，处于附

---

<sup>①</sup> 程妮娜：《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27页。

属地位。<sup>①</sup> 在地方，辽朝设立五京道，其下设置府州县，其中东京道全部、中京道的大部分和上京道的一部分在东北地区，是对当地汉人和渤海人的统治制度，归南面官统辖。在各民族地区，对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度，部民是国家的臣民，部族各级官员由朝廷任命，归北面官统辖；在边远地区则设置大王府、王府、部族节度使等，实行羁縻统治。金朝兴起以后，在中央政治制度上有所变化，从初期的国论勃极烈制度逐步演变为三省六部制，海陵王时期则改三省制为尚书一省制，中央集权得到强化。在地方，金朝承袭辽制，设置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等京路，全面统辖东北地区，其下分设汉、渤海等族的府州县和女真等族的猛安谋克制度。辽金统一东北地区，并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东北地区在辽金统治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口增长最为明显，其中流民对东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辽金都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把大量战俘和中原地区的百姓强制迁移到东北地区。辽代掠至东北的汉人建立的州县就多达 50 余个；金代仅在天会年间（1123 ~ 1137 年）就掠走宋朝人口达 20 万人。<sup>②</sup> 后晋末帝石重贵、宋朝皇帝徽、钦二宗，都先后被掠往东北。后晋被灭亡后，946 年石重贵及其家眷、随从被押解北上，最后抵达建州，在那里领得土地 50 顷，自建房屋，分耕其地，度过了凄凉余生。这是历史记载第一个被流放到东北地区的亡国之君。1126 年金人攻克汴京后，徽、钦二宗被掠获，最后被押解至五国城，并在那里饮恨而终。汉族政权的屈辱求和不仅使大量百姓被掠走，而且使统治者自身沦为阶下囚。辽金王朝则在与南方对峙和交往的过程中日益强大起来。在长期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东北地区的农耕经济和农业手工业技术进

<sup>①</sup> 程妮娜：《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4 ~ 165 页。

<sup>②</sup> 李兴盛：《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21 页。

步很快，成为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辽代东北地区人口就已经达到 170 ~ 180 万人，到了金代则激增至五六百万人。<sup>①</sup>可见，辽金时期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时期，特别是在金代达到了鼎盛。

## 第二节 东北亚其他国家的演变

随着中国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和第二次南北朝时期的到来，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尚无其他国家能够取代中国而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因此，这一时期东北亚其他国家纷纷开始独立自保。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依仿中国所建立的律令制国家逐步解体，进入了国家重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他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日益突出了本国特色，逐渐形成了成熟、稳定的独立政治实体，自树意识明显增强。

### 一、高丽的兴起与发展

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在中国的直接影响下，这里才逐步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实体。从客观上说，汉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并不巩固。7 世纪末唐朝设置的安东都护府撤出朝鲜半岛，由新罗统一。新罗国家与中国保持了长期的封贡关系，新王即位都要接受中国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远。正是从新罗开始这里才形成了健全的律令制度，建立了律令制国家，也正是在新罗时期朝鲜出现了以汉字为基础的吏读文字，朝鲜半岛国家的自树意识日益增强。

9、10 世纪之交，朝鲜半岛逐渐从分裂割据再次走向统一。918 年王建被拥戴为王，定国号高丽，年号天授。933 年王建遣使人后唐

---

<sup>①</sup> 程妮娜：《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0、207 页。

朝贡，被封为高丽国王。中国的册封使王建在朝鲜半岛获得了合法性统治地位。936年王建统一朝鲜半岛，高丽在中国分裂对峙时期迅速崛起。但是，从政治上看，高丽政权仍与中国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封贡关系。据记载，“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sup>①</sup> 在中国的第二次南北朝时期，高丽先后接受册封，与辽、宋和金都保持着密切的封贡关系。

高丽政权建立后，在不断对外扩张的同时，日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随着新罗律令制国家的解体，朝鲜半岛进入豪族割据时代。王建统一后为了抑制豪族势力，采取了赐姓、通婚等措施，并把西京作为重要基地以牵制豪族。高丽政权日益巩固和发展。光宗时期（949～975年），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致使豪族高官显贵失势，新罗头六品世袭贵族势力逐渐增长。成宗时期（981～997年），在儒家学者的影响下，高丽开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地方豪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然而，随着世袭贵族势力的增长，高丽进入世袭贵族政治时期。

在这一时期，高丽实行两班制，从一品到九品的官阶体制中，文臣和武将身为同样的高丽王朝的两班官员，要享受同等的待遇。但实际上文武官员的差别很大，只有文班才能成为贵族，独占政治权利；武班官的地位下降成维护贵族政权的护卫兵。这种矛盾到贵族政治末期更加严重，终于爆发了1170年的武臣叛乱。随后高丽开始了武臣政治时期。由于武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国内起义不断，高丽政权面临危机。1196年崔忠献夺取政权，武臣政治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崔氏武臣政治时代，虽然国王作为朝廷的象征被保留下来，

---

<sup>①</sup>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

但崔氏的权力已经超越王权之上。崔忠献被国王封授为晋康侯，并设立官府，建立了崔氏幕府统治。为了巩固其统治，崔氏取消了原来武臣联合统治机构——重房，建立了最高统治机构教定都监。崔氏及其以后的武臣统治者名义上是由国王授予其担任教定都监的首脑，实际上这一首脑职位已被世袭，成为武臣专权的得力工具。在最高统治机构之下，崔氏幕府豢养了庞大的私家武装，即都房警卫和三别抄；还设立了政房和书房，对文武两班进行有效控制。<sup>①</sup> 1258年崔氏武人政权被推翻，国王亲政得以恢复。但是，在蒙古势力的冲击下，高丽很快就灭亡了。

高丽政权是在新罗律令制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政治上，高丽与新罗一样模仿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即使在崔氏幕府时期，这些国家机构仍然存在。在中央，高丽实行三省六部制。此外，还设有三司、都兵马使、目都监总管、御史台和翰林院等机关。在地方，高丽的地方统治机构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成宗时期最初设置12个牧州，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995年又把全国划分为10道，以前的12州牧改编为12军，从中央派遣节度使，道下设府、郡、县，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地方郡县制体系。1018年，地方行政机构又有所调整，全国被划分为两界五道。两界设于北方的国境地带，界下设州、镇；其他地区以开城府为中心划分为5道，道下设州、郡、县。两界5道均由中央派遣官吏进行统治。在选官制度上，高丽主要实行科举制和荫叙制。科举制主要仿照中国，荫叙制则是高丽贵族政治的体现，它以家世出身为考核条件，主要从王族、功臣、五品以上官员的后裔中选拔官吏。

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高丽阻止了辽朝在朝鲜半岛的扩张，此后，国内经济文化进入发展和繁荣时期。文宗时期（1047～1083

---

<sup>①</sup> [韩国]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55～156页。

年)，高丽农业生产发展较快，手工业和商业都获得了繁荣。肃宗时期（1095～1105年），在统一度量衡的基础上，高丽开始设官铸钱，陆续铸造了海东通宝、东国通宝和三韩通宝等货币。高丽与中国宋朝及日本的贸易都相当活跃，11世纪甚至有阿拉伯商人多次来高丽进行贸易。

为了从经济上限制地方豪族势力，加强中央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高丽前期主要实行了田柴科制度。<sup>①</sup> 经过景宗元年（976年）始定田柴科、穆宗元年（998年）改定田柴科、文宗三十年（1076年）更定田柴科，高丽前期由国家支配土地的田柴科制度日益巩固和完善。但是在武臣政治时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田柴科制度逐渐崩溃，出现了农庄。农庄是王室、贵族、高级官僚、寺院等特权阶层支配私有土地的特殊形态，又称为田庄、庄园等。它是通过夺占、开垦、赐牌地、农民的寄进、买入等途径建立起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非法夺占和开垦。农庄制度成为武臣政治的经济基础。13世纪中叶，高丽国家为了保证官吏的俸禄收入，曾实行了禄科田制度。官吏卸任时返还禄科田，不能世袭或买卖。

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学是高丽时期的统治思想，从贵族政治到武臣政治，统治者都是按照儒家政治理想来治理国家，特别是在贵族政治时期，儒家思想对高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文宗时期出现高丽著名的儒学家崔冲，他不仅开创了私学传统，而且被尊称为“朝鲜孔子”。<sup>②</sup> 高丽统治者在尊崇儒学的同时还大力提倡佛教。从光宗时期开始，僧侣也可以考僧科科举，合格的人授予僧阶，最高可得到国师、王师的称号。高丽佛教的教

---

① 参见朱寰：“高丽王朝田柴科土地制度研究”，《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李成德：“高丽王朝前期田柴科土地制度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② [韩国]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37页。

宗和禅宗之间的分裂与对立，随着天台宗的创立迎来了新的局面。此后，天台宗的信徒主要是贵族，禅宗则在民间得到传播。11世纪高丽从契丹、日本和宋朝收集佛经，雕版印刷了大藏经4700余卷。13世纪初，高丽在中国泥活字与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创造了铜活字印刷技术。高丽瓷器生产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此外，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和僧一然的《三国遗事》，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表明了高丽国家独立自树意识的增强。

可见，朝鲜半岛在高丽统治时期不仅仿照中国建立了日益完善的国家制度，而且结合其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日益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然而，高丽在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吸收、发展和传播中国文化，并在政治上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封贡关系，对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确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 二、从摄关政治到镰仓幕府

大化改新确立的律令制国家和推行的班田制度，促使日本建立了类似中国的新型国家形态。但是，到8世纪末，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班田制度开始遭到破坏，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庄园制兴起。10世纪以后，许多庄园获得了不向国家交纳租税、不准国家官员进入庄园的“不输”、“不入”的特权。地方豪强割据势力日益增长，律令制国家开始瓦解。统治阶级内部因政治利益、亲疏远近的不同以及土地占有的多寡而分裂为四个政治集团，即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集团，以上皇<sup>①</sup>为中心的中、下级官僚集团，地方豪强的武士集团，以及神社、寺院势力。这些政治集团从各自利益出发

---

<sup>①</sup> 日本天皇让位后被称为上皇、太上皇或太上天皇，让位后出家则被称为法皇、法王或太上法皇。参见吴杰主编：《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563页。

不断分化组合，政治斗争日趋激烈。9世纪80年代至11世纪中叶，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外戚贵族集团独揽朝政；11世纪中叶以后，以上皇为中心的官僚集团风云一时；12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势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最终掌握了国家大权，开始了幕府统治时期。

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集团形成较早。藤原氏是在大化改新的重臣中臣镰足（614-669年）去世后，由天智天皇（668-671年在位）所赐于他的姓，并被其后裔所继承。此后，藤原氏成为最大的权门贵族，并通过与皇室联姻获得了外戚身份。清和天皇统治时期（850-880年），藤原氏开始摄政。941年，天皇成年后赐摄政为关白。由此开始，天皇成年后改幼年的摄政为关白演变为定例，关白成为辅佐天皇、统率百官、执掌国政的重臣。于是，摄政和关白逐渐形成一种政治体制，史称“摄关政治”，独占摄关二职的藤原家族则被称为“摄关家”。从9世纪中叶到12世纪末藤原氏独揽日本国家大权达200余年，被称为摄关政治时代。

在这一时期，天皇曾一度亲政，摄关政治的发展受到制约。从10世纪60年代至11世纪初，藤原氏的摄关政治获得了巩固和发展，藤原氏的家务机关“政所”成了国家的权力中心。从“政所”发出的文书取代了天皇的“宣旨”，朝廷则变成了仅司礼仪的场所。律令制下天皇的权威丧失殆尽，朝廷政治形式化。藤原道长（966-1027年）摄关时期曾有诗句“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sup>①</sup>道出了其执掌国家大权三十多年的得意心情。由此开始至藤原道长之子两代约50年间，是摄关家势力最盛的时期。

天皇为摆脱摄关家的控制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为了抑制庄园的发展，从902年醍醐天皇颁布庄园整顿令开始，禁止新设敕旨田，禁止权贵新设庄园。此后，天皇多次发布庄园整顿令。1068年即位的后三条天皇是自冷泉天皇以来惟一与藤原氏没有联姻关系的天皇，

---

<sup>①</sup> 转引自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这就为削弱藤原氏提供了有利时机。后三条天皇通过整顿庄园，打击了摄关家的势力，提高了天皇的权威。<sup>①</sup>但是，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官僚贵族以分割公领（地）而建立庄园的庄园公领制发展起来。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天皇推广知行国（封国）制度，但收效甚微。

1086年，白河天皇为了抵制摄关政治，将皇位传给年幼的皇太子堀河天皇，自己成为上皇，另立“院厅”继续执政40年，从而开创了院政时代。上皇掌握了国家大权，摄关政治地位下降。由此开始至1156年保元之乱，为前期院政时期；此后直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后期院政时期。这种由退位天皇掌控国家大权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天皇的权威。但是，在天皇与藤原氏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地方豪强的武士集团势力迅速崛起。

武士的兴起是伴随着庄园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制的瓦解而产生的新现象。随着10、11世纪以后寄进系庄园的发展，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把自己的同族子弟和随从中的青壮男子武装起来，组成了军事集团即武士团。这些人平时务农，战时从戎，后来逐渐演变成以武为主，甚至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武士。武士团按照宗族关系、主从关系组织起来，主从关系是其重要支柱。绝对效忠主人、在战时和平时须尽军事和其他义务，使武士团成为极其牢固的军事组织。武士道精神的孕育形成对武士团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约从10世纪开始，武士团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武士团随之得到发展，小武士团开始合并为大武士团，成为维护地方秩序的主要力量。有的武士则被召至京都，充当皇宫的警卫或中央贵族、寺社的卫士。<sup>②</sup>11世纪，日本形成了以桓武天皇的后裔平氏与清和天皇的后

---

① [日] 依田熹家著，卞立强、李天工译：《简明日本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②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裔源氏为首的两大武士集团势力。他们不仅是地方豪强的武装力量，也是天皇与藤原氏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武士团的势力迅速成长起来。

1097年，平正盛将自己领有的土地寄进白河法皇隶属的六条院，正式与院政建立了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平氏势力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经过“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后，平氏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167年，平清盛取得了太政大臣之职。随后，他夺占了大量贵族和寺社的庄园，并把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据为己有。平氏贵族色彩日益增强，已不能代表武士阶层的利益，地方武士也很快丧失了对平氏的信赖。<sup>①</sup>全国上下反对平氏的势力日益增长。1180年，清和源氏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仁王的名义，号召各地源氏起兵打倒平氏。因平治之乱而被流放到伊豆的源赖朝，亲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1185年平氏军队被彻底歼灭，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宣告结束。1192年，源赖朝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并设立幕府于镰仓，由此开始了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年）。

源赖朝的镰仓幕府与天皇的朝廷并存，国家大权被将军独揽，天皇朝廷形同虚设。以将军为首的幕府设立管理臣属的武士侍所、掌管一般政务的政所和负责审判的问注所。在地方，将军委派亲信武士担任守护和地头，分别管理各国和庄园。同时，源赖朝委派“京都守护”以监视朝廷，同时放逐了京都朝廷中对他抱有敌意的贵族；在边远地区设置“镇西奉行”。这样，源赖朝建立了幕府统治体系。

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幕府内部权力斗争激化，最终北条氏完全控制了幕府的军政大权，成为镰仓幕府事实上的统治者。天皇借幕府内讧之机，1221年发动了讨伐北条氏的战争，企图废除幕府以恢复天皇的权力，结果失败，上皇被流放，仲恭天皇被废黜，史称“承久之乱”。此后，幕府加强了对天皇朝廷的控制，幕府的统治

---

<sup>①</sup> [日] 依田熹家著，卞立强、李天工译：《简明日本通史》，第57页。

体制逐渐臻于完善。1232年制定的《贞永式目》51条，成为幕府施政和统制御家人的基本法典，影响深远。

1274年和1281年，日本先后赢得了抗元战争的胜利，但幕府并未能满足御家人因“奉公”而获得恩赏的要求。为了弥补抗元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御家人对幕府的不满日益增长，逐渐开始脱离其控制而走向独立。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武士集团发生分化，守护大名分裂割据势力日益增长。在各地起义和武士集团内部斗争中，镰仓幕府的统治不断衰落下去。

从总体上看，10-13世纪日本的农耕技术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开始了水稻和小麦轮作。这是日本农业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手工业的专业化水平得到提高，出现了诸如镰仓、博多等一些新的手工业中心。定期贸易市场遍布城市和乡村，并出现了职业商人。在一些港湾和重要城市，还出现了专门以物资管理为职业掮客——“问丸”。为了垄断原料和商品销售，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出现了称为“座”的同业公会，“座”的形成对日本封建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交换的发展引起对货币的需求，随着货币的广泛流通出现了汇兑业务，经营这种业务的商人称为“替钱屋”或“割符屋”。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称为“借上”和“土仓”的高利贷商人。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使日本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变化。

日本政治和经济社会变革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在吸收和同化中国文化同时，日本按照本土文化的特点及风俗习惯进行了改造和创新，从而创造了新的日本文化。<sup>①</sup>日本依仿中国的汉字，创制了假名字母文字。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描写武士阶层和民间世俗人情的民族文学新作品，还创作了大批说话集。1019年，藤原道长建造的法成寺最终确立了日本建筑式样。大约从11世纪中叶就形成了摹写日

---

<sup>①</sup> 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本风土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还出现了宫廷画师。日本文化从奈良时代的学习中国文化转向了平安时代突出本国特色的“国风文化”。

镰仓幕府时期文化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在引进宋学和禅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了日本武士文化。宋代儒学对日本新儒学的发展及早期教育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禅学的融入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sup>①</sup> 日本僧人引进宋代新佛教，成立了许多宗派，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其重要特色。佛教各宗派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平安后期日本固有的神道文化的复活奠定了基础。

### 第三节 封贡关系的发展

封贡关系是指中央王朝与边疆部族、方国及周边其他地区之间的册封一朝贡关系。它源自先秦，形成于汉唐。天下一体和华夷之辨，是其遵循的基本原则。随着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封贡关系模式从国内发展到国外。早在南北朝时代，日本倭王武曾东征毛人、西服众夷、渡平海北诸国，开始把日本列岛上其他民族称为夷。新罗人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称渤海人为小蕃。日本史书将散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称刀伊，即朝鲜语外蕃的意思。<sup>②</sup> 这说明，朝鲜、日本都把女真人看成外蕃。日本、新罗等东北亚国家已接受了封贡关系的原则，并自视为文明国家而把文化低于自己的周边民族视为夷狄。在中国第二次南北朝时期，东北亚封贡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推动了古代东北亚国际秩

---

① 刘毅、刘英伟：“宋学对日本镰仓、室町文化的影响”，《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7期。

②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序的形成。

### 一、多层次贸易兴起

随着中国境内各族自树意识的增强，各政权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过程。汉唐时期的和亲、羁縻向和议、互市转变，经济贸易关系在各政权之间的交往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这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因此，尽管中国境内各族自树意识日益增强，经济联系却更加密切。各族政权之间的相互竞争促进了各自的社会发展，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从而形成了多种形式的贸易联系。朝贡贸易的贡、赐物品之间的交换不能满足各政权及各地区人民的需要，除了战争劫掠外，官方主持互市的榷场贸易和民间的走私贸易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形成了朝贡贸易、榷场贸易、走私贸易等多种贸易形式并存的局面。其中榷场贸易成为中国境内各政权之间的主要贸易形式。榷场是由官方控制的定点市场，通过榷场进行商品交易是当时的主要贸易渠道。

唐末至五代时期，辽与中原王朝的封贡关系是主要贸易渠道。后唐时期通过榷场进行的互市贸易有了较大发展，还制定了与契丹互市则例。宋朝建立后，宋辽之间开始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贸易往来。由于双方之间连年战争使榷场贸易时断时续。1004年双方达成和议以后，榷场贸易才得到发展。宋辽双方在边界地带分别设置榷场进行互市，榷场设官收税，并依据有关则例进行管理，另有官方指定的牙人评定货色等级、承揽交易。为了逃避官府课税，谋取高额利润，宋辽双方民间的走私贸易随之发展起来。地方官吏暗中参与使走私贸易更加猖獗。可见，宋辽对峙并没有阻止双方的贸易往来，恰恰促进了双方走向平等的经济交流。

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以后，双方的榷场贸易开始发展起来。与宋辽时期相比，宋金双方榷场的设置数目增加了，榷场的管理也更

加制度化。榷场贸易分官市和商市两种：官市由政府出资或以货物折算作本，榷场主管官负责与对方进行贸易；商市则由主管官监督贸易，根据贸易额度划分为大、小客，大客不得出境，小客具保出境与金朝榷场中的北客进行交易。<sup>①</sup>事实上，各地走私贸易仍然屡禁不止，地方官员参与走私的现象仍然存在。

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也兴起了多层面的贸易联系。

唐朝末年黄巢农民大起义使广州对外贸易联系中断，明州和泉州的海外贸易却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五代时期，中国境内中原的政治混乱局面并没有阻挡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地对外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宋朝的兴起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在发展朝贡贸易的同时，宋朝统治者为了广开财源，主动派遣官员出海招徕海外贸易。地方官僚权贵违禁私自派遣亲信出海贸易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民间的舶商也发展起来。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宋朝沿袭唐代旧制设立了专门的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制定了专门的市舶条法。东北亚其他国家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贸易兴起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

在9世纪以前，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官方贸易为主，遣唐使是主体。除了承担吸取中国文化的主要任务以外，遣唐使还承担了官方贸易的任务。9世纪末日本废止遣唐使以后，中国民间商人成为中日贸易的主体，民间贸易兴起。从839年到907年，仅史书记载唐朝商人去日本贸易就有三十多次。五代时期中日民间贸易往

---

<sup>①</sup> 陈新权：“宋金榷场贸易考略”，载于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靳华：“宋、金榷场贸易的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来不但没有间断，反而更加频繁，甚至形成了明州商帮。<sup>①</sup>

宋朝兴起后，中国与日本仍然没有建立官方贸易关系，民间商人仍是贸易主体。由于日本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本国商人出境，因此，北宋时期中日贸易以宋朝商人为主，民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几乎年年不断。到了南宋时期，日本鼓励贸易，日本商船开始频繁来到中国。中日双方为了加强贸易管理，设立贸易港口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宋朝限定在明州和泉州，日本则限于博多津，并分别设立了各自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和鸿胪馆。但是，违禁出海进行走私贸易的现象仍然存在。民间贸易商人的崛起表明，中日之间经济交流有着深厚的基础和不竭的动力。

日本不但与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民间贸易关系，而且与高丽的贸易也比较频繁。北九州和日本海沿岸的庄园领主不顾日本政府的禁令，私自出海与高丽贸易。仅在1047-1095年间，日本人到高丽贸易的就达二十次之多。<sup>②</sup> 这表明，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的需求日益增强。

高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一直都很频繁。朝贡贸易主要在高丽与辽金之间进行，而与宋朝的民间贸易却得到发展。大批宋朝商人经常渡海与高丽贸易，即使在两国封贡关系中断期间，双方民间贸易仍往来不断。高丽为接待宋朝商人还专门设立多处“客馆”。然而，南宋时期双方的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也远不如北宋时期。这主要是受到宋金战争的影响，以及蒙古族崛起后对双方贸易往来的阻挠。

综上所述，尽管各族各国的自树意识不断增强，但是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更加密切了，从而有力推动了各族各国的经济社会发

---

① [日]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3页；虞浩旭：“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

②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页。

展，加强了各族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推动东北亚区域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多层次贸易兴起不仅削弱了封贡关系的强制性，而且孕育着各族各国之间平等互利贸易关系的萌芽。在日益频繁的经济交往中，东北亚各族各国在保留各自特点的同时，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共同性。农业文明在东亚各国日益走向成熟，朱子学的形成和传播使东亚文化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 二、朱子学的形成与传播

随着东亚各族各国自树意识的增强和多层次贸易的兴起，各族各国竞相发展的局面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东亚文化圈在这一时期更加丰富多彩。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政治上不再是东亚区域世界的中心，但是在文化上中国率先进行新的整合，再次确立了东亚文化中心的地位。随着朱子学的形成和传播，东北亚文化在多样性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统一性。

朱子学，即以朱熹（1130—1200年）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又被称为道学。它是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代新儒学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在古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程朱理学的形成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董仲舒以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提出天人感应神学，是为儒学第一次重大转变。从魏晋玄学到程朱理学，朱熹吸收佛、道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确立程朱理学体系，完成了儒学的哲理化进程，是为儒学第二次重大转变。<sup>①</sup> 这一次儒学的转变影响深远，此后直至清朝的700余年里，中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都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因此，朱子学的形成和传播意味着东北亚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

<sup>①</sup>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引言”，第1~2页；马怀良：《崩溃与重建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中国边疆民族纷纷崛起，使赵宋政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天下一统的儒家观念受到挑战，致使宋朝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由于知道‘中国’不等于‘天下’，面对异邦的存在，赵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设法抵抗异族的侵略之外，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义。”<sup>①</sup>然而，儒学独尊的地位在魏晋以后很快就丧失了，佛教和道教日益兴盛。隋唐时期中国化的佛教不但深入民间，而且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从而使中国成为东亚世界的佛教中心。<sup>②</sup>以老庄为基础吸收佛教思想而形成的道教，在隋唐时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从而形成了儒、道、佛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面对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如何整合异质文化，重振儒学的“道统”，在宋朝建立伊始就成为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宋朝统治者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实行优儒政策，建立了谏官不以言获罪的台谏制度，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使个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冲击，尚利的社会风气使儒士们痛感“世道衰、人伦坏”，义利之辩、理欲之辩随之兴起。

韩愈、李翱在排斥佛道的同时，提出重振儒学道统的主张，是为北宋新儒学兴起的滥觞。在与佛道的斗争中，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们取长补短，着重阐发儒家经典义理，以“致广大，尽精微”为治学宗旨，从而形成了宋学或称新儒学。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宋时期新儒学进一步发展，在学派林立、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中，形成了朱子学。

朱熹把宇宙万物划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存在方式，形而上的就是理，形而下的便是“有情有状”的实际存在。万物都有其本身的理，而所有的理都同出于一源。这就是朱熹的“理一分殊”说。

---

① 葛兆光：“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理通过气而化生万物，气则是万物依循理而生聚离散所赖之基本元素，万物则由理而气所化生之具体形状。在逻辑上，理在先，气、物在后；在时间上，三者共存一体，有理便有气，有气便有万物，不离须臾，不分先后。这样，朱熹把理、气、万物结合为一体，构建了完整的宇宙发生论。通过本体论和宇宙发生论的建构，朱熹系统地整合并发展了北宋五子以及其他新儒家的思想，完成了理学的体系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从心性到理欲、义利，朱熹进一步建构了完整的新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从而再次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朱熹继承了二程“性即理”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心性之关系。心是一物，它所容的是性。人的天性就是三纲五常，这是天赋人理。由此出发，朱熹把心划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即义理之心，人心即物欲之心，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人心追求私欲，道心则追求圣贤之大义，“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sup>①</sup>这样，理欲之分就在于克尽私欲，实现天理。把理欲之分应用到人我关系上就是义利之别，人欲之私即为利，天理之公即为义。存天理灭人欲就要求以理节欲、以义导利，从而进一步阐发了重义轻利的思想，确立了以道德为本位的社会伦理观。

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吸收佛道的本体论思想，排除其空无消极之论，完成了魏晋以来以儒家为主的思想文化的整合。朱熹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政治思想完全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严重阻碍了宋代社会经济变革和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弱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尽管他在重新阐发“格物致知”时，蕴涵了外求万物之理的认识，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而是不断加强伦理道德修养。这种伦理道德取向决定了他不可能提出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思想。尽管有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

---

<sup>①</sup> 《朱子语类》卷12。

适等进一步发展了实学思想，并与理学展开论战，但终归未能成为主流。

程朱理学在当时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朱熹在世时，由于政争不断，学派之间相互竞争激烈，他的学说一再被禁，甚至被斥为“伪学”。朱熹死后，统治者才逐渐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宋理宗时期程朱理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由于中国边疆民族仍然处于接受传统儒家经典阶段，程朱理学的影响较弱。及至元朝兴起以后，元仁宗于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以朱注“四书”为准，再次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此后，直至1905年中国废科举，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维系了600多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和科技发展的严重桎梏。

程朱理学不仅完成了中国的文化整合，而且对东北亚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推动了东北亚各国文化的变革。日本是较早接触并引进朱子学的国家之一。据考证，朱熹在世时，他的思想已经被日本僧人所知晓。12世纪70年代末，来宋的日本僧人就已经接触到了朱熹的思想。12世纪80年代，日本僧人就已经把朱熹的著作带回日本研读宣讲。<sup>①</sup>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在吸收唐朝文化的基础上进入了国风文化时代，禅学是主流，朱子学的传播和影响到了江户时代才日益高涨，逐渐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朱子学。

朝鲜接受朱子学是在元朝时期。据记载，1290年高丽集贤殿大学士安轩随高丽王赴元大都燕京时，首次看到《朱子全书》，于是手抄全书并临摹朱熹画像而归。他回国后开始在太学讲授朱子学。<sup>②</sup>14世纪朱子学成为朝鲜的国学，为统治者所推崇，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高丽的科举考试也非常重视朱子学，进一步推动了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此后，朝鲜出现了一批研究朱子学的著名

---

① 汤勤福：“日本朱子学的起源问题”，《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② 朱七星：《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朱子学新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41页。

学者如白颐正、禹倬、朴溥等。<sup>①</sup>朱子学对朝鲜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10至13世纪，东北亚文化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朱子学的形成和传播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整合的完成，而且对日本、朝鲜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东北亚文化圈进一步发展的新因素。中国从唐朝时期确立的佛教中心转变为新儒学中心。

### 三、走向封贡体系

随着各族各国自树意识的增强以及多层次贸易兴起，各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以政治联系为主导的羁縻体制日趋衰落，各族各国在竞相发展中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日益加强了。唐朝确立的羁縻体制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先进的文化为依托，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强制性。隋唐以后的中国陷入宋、夏、辽、金对峙的分裂时期，羁縻体制实行的范围大大缩小，仅限于边疆地区较为落后的部族。随着朝鲜和日本国家形态的巩固和成熟，以中国为中心的羁縻体制难以推行下去，对于中国而言，内蕃、外蕃的区别日益明显。因此，多族多国的竞相发展，使东北亚区域政治格局日益复杂化。随着封贡关系的发展，东北亚封贡体系开始萌芽。

早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日本就开始改变与中国的传统封贡关系，坚持与中国对等交往。日本使者向隋朝递交的国书中曾明确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使隋炀帝大为不满。在此以前，日本一直是屈居下风，在外交辞令上也从未出现过这样明确的对等意识。“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一

---

<sup>①</sup> [韩]任振镐：“性理学在韩国的传入与发展”，《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个新纪元。”<sup>①</sup> 尽管此后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但不再接受册封。经过推古天皇的改革和大化改制，日本在国内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已经不再需要通过中国的册封来宣示其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从9世纪末，日本毅然停止遣唐使活动，断绝了中日官方交往，成为最早拒绝与中国建立封贡关系、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的国家。但是，日本对外交往的模式仍然沿袭了中国的做法，试图发展以自己为中心的封贡关系。大约在9世纪后期，日本在接受中国传统华夷秩序观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式的华夷秩序观，它以日本为中心，把中国称为邻国，把朝鲜称为蕃国，把其他较为落后的周边部族称为夷狄。随着唐朝的衰落，日本甚至把中国也归入“外蕃”，从而构筑了“东夷小帝国”。<sup>②</sup>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神国意识开始萌芽，13世纪抗元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形成了更加明确的神国思想。

但是，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了。1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铜钱成为日本通行的合法货币。早在唐朝时期，日本就开始大量输入中国的铜钱，并开始模仿中国的钱币铸造了自己的铜钱，与中国的铜钱并行流通。由于铸钱质量低劣，958年以后，日本不再铸造自己的钱币，完全依赖从中国输入的铜钱。此后，中国铜钱长期独占日本货币流通领域。<sup>③</sup> 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书籍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日本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吸收进入全面整合时期。

这一时期东北亚不再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是多元政治中心并立。这是东北亚区域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宋朝特别是南宋，成为长江流域和岭南以南地区的政治中心。辽金则先后成为蒙古草原和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政治中心。日本则在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上走

---

<sup>①</sup> [日]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页。

<sup>②</sup>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4~45页。

<sup>③</sup> 周爱萍：“古代中国铜钱在日本的流通”，《陕西金融》，1996年第7期。

得更远了。各个政治中心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势力范围，其间不存在依附性的封贡关系，而是对等的关系。宋朝统治者迫于各族各国竞相发展的新形势，不得不暂时搁置天下观念，与强大的对手订立盟约。然而，应当看到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国力强大，统治者总是试图北伐收复失地，因此，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进行。至于边远地区甚至更加遥远的地区，宋朝统治者不再强迫他们来朝贡，而是主动走出国门，与远方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这主要是为了招徕外商发展海外贸易，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然而，无论怎样分析其思想观念和行为动机，在事实上，这一时期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复杂化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东北亚政治中心的多元化，使各族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贡关系的政治干预，日趋平等互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随着相对平等的多层面贸易兴起，特别是民间贸易的兴起，使中国作为东北亚经济发展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中国率先对儒学、佛教和道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文化整合，宋学的兴起以及理学的发展，是东北亚文化圈更新的重要标志。朱子学成为此后东北亚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作为东亚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各族各国在汉字的基础上或整体创造新字，或创造新形声字，或创造表音字母补充汉字，使汉字文化圈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北方政治中心的崛起影响深远。除了国内仍残存羁縻体制以外，辽金采用中国传统的封贡关系模式，先后建立了封贡体系。尽管这一时期他们的封贡体系还比较脆弱，但为后来东北亚区域世界形成国际性的封贡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封贡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国家之间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关系就形成了封贡体系。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封贡关系的发展具有典型性。唐朝时期，中国对朝鲜半岛实行羁縻体制，以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新罗国王为鸡林州都督。此后，鸡林州都督历时 200

余年，直至唐朝末年中国才逐渐失去了对鸡林州都督府的控制。<sup>①</sup> 因此，唐朝时期中国是把朝鲜半岛纳入羁縻体制来管理的，虽然也存在频繁的封贡关系，但它还不是国家之间的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关系。辽金时期，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羁縻体制不复存在。随着王氏高丽的崛起，辽金先后与高丽确立了国家之间的封贡关系，封贡体系开始萌芽。

依据《辽史》卷70《属国表》、卷115《高丽传》的记载进行统计，辽代自918-1113年，高丽朝贡共计70次，平均2.8年才有一次，高丽对辽的朝贡没有规律可寻。最多时仅一年再至，无缘无故地连续数年没有朝贡的记载也是常见现象。而且，《辽史》卷115《高丽传》在统和十四年确实记载着“至者无时”，因此，辽与高丽的封贡关系似乎还很不稳定，没有制度化。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辽史》的记载颇多疏漏，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例如，《辽史》卷70《属国表》在大安四年条下，有“免高丽岁贡”的记载，<sup>②</sup> 说明在此之前，高丽每年向辽的朝贡已经趋于稳定，而《辽史》对高丽贡使的记载中却未能体现，说明《辽史》这方面的漏载是比较严重的。

《契丹国志》中不仅详细开列了“新罗国贡进物件”、“横进物件”、“契丹每次回赐物件”、“契丹赐奉使物件”等各项清单，还说明，“本国不论年岁，惟以八节贡献，人使各带正官，惟称陪臣”，契丹派往高丽的使节“并命刺史以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国”，<sup>③</sup> 可见，辽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已经制度化。又据《宋

---

① 都兴智：“唐政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述论”，《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② 《辽史》卷115《高丽传》也有大安四年“免岁贡”的记载。

③ 《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

史》记载，高丽对辽“一周天每修六贡”，<sup>①</sup>这种较强的规律性也证明，辽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已经制度化了。

但是，由于契丹族文化水平相对低于中原王朝，高丽对辽的宗主国身份不完全认同。因此，辽圣宗开泰九年以前，辽曾多次发动讨伐高丽的战争，显然，在此之前，双方不可能保持一种制度化的封贡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辽中期以前，辽与高丽之间不存在制度化的封贡关系。《契丹国志》、《宋史》所载当是辽中期以后的情况。正是从辽代中期，也就是从11世纪开始，中国与高丽的关系才形成了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体系。

金朝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封贡关系则更加稳定，制度化更加明显。根据《金史》与朝鲜史书《高丽史》记载，除金朝初建、双方尚未建立起稳定关系的几年外，高句丽每年遣使朝贡的次数比较频繁，按惯例每年遣使四次。<sup>②</sup>金朝按惯例每年遣使两次。此外，针对突发性事件主要是国丧，两国之间也有相应的使臣往来。金朝有国丧时，要遣使高丽“告丧”，高丽要派出两起使臣，奉慰使、祭奠使。高丽有国丧时，金朝一般要派三起使臣，敕祭使、慰问使，再有就是起复或册封新高丽王的使臣。对三起金使，高丽方面都要逐一派出道谢的使臣。可见，金与高丽之间不仅保持着稳定的封贡关系，而且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化特征。

然而，在以辽金为宗主国与高丽逐渐形成封贡体系的同时，中国南方的北宋、南宋与高丽的封贡关系却日益弱化。北宋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从时间与次数上看，并不存在规律性，显然并未发展为制度化的关系。南宋时期，宋使赴高丽仅有四次，高丽遣使南宋

---

<sup>①</sup> 《宋史》卷487《高丽传》：“自王徽（高丽文宗）以降，虽通使不绝，然受契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书，盖有称甲子者。出贡契丹，至于六，而诛求不已，常云：‘高丽，乃我奴耳！南朝（即北宋）何以厚待之？’……尝诘其西向修贡事，高丽表谢，其略云：‘中国，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贡。’契丹悟，乃得免。”

<sup>②</sup> 《金史》卷61《交聘表》。



仅有八次，<sup>①</sup>从北宋到南宋，与高丽的封贡关系趋于弱化，而同一时期里，高丽与辽金的关系却正在趋于制度化。这说明，该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而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高丽对辽金朝贡的趋于制度化，制约了其与北宋、南宋的封贡关系发展。

东北亚封贡关系的发展首先在辽金与高丽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体系。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裂变，具有重要启示。从最早有《外国传》的正史是薛居正（公元912-981年）主修的《旧五代史》来看，最晚从10世纪起，中国开始以“外国”指称中国之外的属国。这正是11世纪中国与高丽的封贡关系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当然，对于属国、属部，中国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区别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一种观念的定型需要一定的时间，概念混乱在所难免；属国、属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在变化。随着中国影响力以及周边各属国对中国向心力的增强，中国之外的属国也可能会转化为中国之内的属部。考察《旧五代史》以下有《外国传》的各正史，总的趋势是前代的属国在后代逐渐演变为国内的属部，而不再入《外国传》，这反映出周边属国不断融入中国的过程。内蕃、外蕃、外国等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别也随之日益明晰。

因此，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传统的天下一体观念没有改变，但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边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来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体系。中国与高丽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以后中国全面确立东北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

<sup>①</sup> 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 第四章 封贡体系的兴衰

13世纪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蒙古旋风”，不仅席卷亚洲大部分地区，而且直达欧洲多瑙河下游。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死，拔都才停止西进。亚欧大陆西端的拉丁世界幸免于“黄祸”之灾。这时，拉丁世界发动的十字军东侵进入最后阶段。在第四次十字军东侵中，西欧封建主联合攻陷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此后，随着教皇势力的衰落，西欧各国开始重建，经过14世纪的危机后，再次掀起对外扩张高潮。地理大发现揭开了西欧向全世界扩张的序幕，直到19世纪中叶，西欧逐步建立起世界性殖民帝国体系。

在东北亚，元朝的“大一统”试图确立对各地的直接统治，由于政治军事联系的脆弱性而告失败。明朝的崛起使东北亚区域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明朝统治者开始放弃天下一体的世界观念，承认了周边国家的存在，但区域世界内部各国之间的等级差别仍被保留下来。从14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明朝通过发展封贡关系确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随着东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各国纷纷仿效中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封贡体系，东北亚封贡体系模式得到推广。随着体系内各国的发展和封贡体系的复杂化，明朝前期臻于鼎盛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到清朝前期逐步变成了多个封贡体系中的一个。与此同时，从16世纪初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东进和沙俄东扩，东北亚受到前所未有的异质文化的挑战。东北亚各国共同面临着殖民地化的危险，先后经历了从锁国、禁教到被迫开国引进西学的历史性转变。东北亚传统的封贡

体系日趋衰落下去。

## 第一节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12世纪末，金朝统治下中国东北地区的蒙古部落崛起。1206年，部落首领铁木真召集各部贵族和首领那颜，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大会。他被共同推举为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随后蒙古人在攻打金朝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三次西征。1211年灭西辽后，蒙古西征军先后进入中亚、东欧和西亚地区。在西征的同时，蒙古人开始了大规模统一中国的战争。蒙古军队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金、大理等政权，1279年灭南宋，最终统一了中国，从而结束了中国自安史之乱后500余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开创了历史上的中华一体时代。此后历经明清两朝，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日益走向鼎盛。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不仅是东北亚的核心，而且在东亚乃至世界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一、中华一体时代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元中统，开始采用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1279年开始的元朝大一统，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一体中华国家。华夷之辨、中外之别不复存在，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同为中国人；四海不再用以指称国内的边疆地区，而是指国家以外的邻国。<sup>①</sup>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清朝统治者则把全国各族人分为满、蒙、汉三等。这种不分民族而分人等的政策，既有利于加强统

---

<sup>①</sup> 张博泉、程妮娜：《中国地方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治，又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狭隘的旧民族界限，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元、清之间的明朝以正统自居，重申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使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在曲折中发展。纵观元、明、清三朝，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元朝时期的政治制度，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已大体形成，后来有所调整和补充。由于元朝统治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广阔，缺乏对如此广袤疆域进行统治的成例和经验，元朝统治者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总体上看，元朝的政治制度具有蒙、汉混合的特征。元朝皇帝既依汉制在大都举行登极大典，又保留了蒙古传统，照例在上都举行忽里台。忽里台成为决策军国大事的重要形式。<sup>①</sup> 中央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及诸院、诸寺、诸监、诸府、诸司。其中，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下设六部。中央直辖地称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吐蕃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此外，在全国设立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行政机构，并在远离省治的地方设有宣慰司等。在实行统一制度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蒙古族特色。特别是在各路、府、州、县官署的主官之外皆设达鲁花赤，名为掌印官，实为监临官，握有实权，主要由蒙古人担任。元行省制重新调整了国家结构，引起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其社会历史影响极为深远。

在官员铨选制度上，除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可以自选闻奏外，其他官员的铨选大都经过中书省；官员的来源主要是科举、荫叙、推举三个途径，以推举为主。<sup>②</sup> 其中，科举制度的恢复和发展对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入仕，从而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促进汉文化的广泛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

---

<sup>①</sup> 陈高华、史民卫：《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白钢“前言”，第2~5页。

<sup>②</sup> 韩儒林：《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339页。

在经济上，元朝建立之初，忽必烈就采取了重视农业的政策，如招集流民、鼓励开荒、兴修水利、设置劝农机构等，大力发展农业，再加上长时间没有大的水旱灾害，使北方地区的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恢复，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南方地区战争破坏不大，并有大量北方移民进入，使该地区的经济保持稳步的发展。海外贸易也比较发达。但由于元代对该地区的掠夺多于建设，大规模的南粮北运延缓了南宋时期已初露端倪的产业结构的转型。虽然大一统局面为跨区域长途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原有经济模式下，传统的产业结构得到强化。

从总体上看，元朝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处于横向发展阶段，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其主要成就。在蒙古草原，畜牧经济占绝对优势，国家不征收赋税，从而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农耕经济在这一地区也以屯垦的方式获得一定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限制，这里的农业始终停留在较低水平。由于当地无法保证粮食供应，政府不得采用漕运、和籴等方法从中原调运粮食。由于草原游牧经济向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所延伸，东北地区畜牧业经济的扩展使部分地方甚至重新退回到复合型经济类型，这与辽金时期农耕经济的发展相比是一种倒退。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在这一时期迅速赶上了内地。<sup>①</sup>

在思想文化上，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大力提倡儒学。在征服金、宋的过程中，忽必烈就优待儒士，把他们请到燕京讲授儒学。及至元朝统一全国，儒学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元朝接受的是宋朝的新儒学，并对朱子学和陆学进行了初步融合，开明朝王学之先声。<sup>②</sup> 元仁宗于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以朱注“四书”为准，再次确立了朱子学官方地位。和前代一样元朝还广泛修建孔庙，并册

---

① 王玉笙、黄启后：“元代云南经济赶上内地原因初探”，《经济问题探索》，1984年第7期。

② 韩儒林：《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页。

封孔子后人等，在各行省等机构下都设有儒学学校，儒学思想获得长足发展。自由的宗教政策对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基督教、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在元代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随着蒙、藏民族交往地不断深入，一些蒙古人也开始学习藏文，蒙古族的佛教建筑艺术也深受藏族的影响，尤其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深受重视，使蒙、藏两个民族逐渐走向宗教文化一体化的道路。<sup>①</sup>此外，元代史学、诗词、杂剧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元杂剧的形成和兴盛，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朝大一统促进了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使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迅速，各地风俗文化则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

在各地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元朝的统治被推翻。朱元璋翦灭群雄，于1368年建都南京，从此开始了明朝长达276年的统治。明朝建立伊始，沿袭元朝旧制。随着明朝在全国的统治，逐步分其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成为皇帝之下负责全国政务的主要官员。此外，中央还设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翰林院等。仁宣时期，内阁制度正式确立，阁权始高于六部之权。在地方，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全国分设十二个布政使司，并把民政、刑罚和兵权分于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实行“三司”管理制度，下设府、州、县。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降等分封制，把皇子们分封到了全国各地。这不仅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而且有利于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抵御北元残余势力。明朝的宦官制度在皇帝的庇护下得到发展，宦官干政成为一大隐患。宦官统领的东厂和西厂等特务机构得到发展，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在选官制度上，明朝继承和发展了科举制，四书五经成为必考科目，八股文开始定型，皇帝牢牢控制了官吏的选拔和任用。

---

<sup>①</sup> 嘎尔迪、闵文义：“13世纪蒙藏文化关系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在经济上，通过减免赋税和徭役、在全国各地大兴屯田并实行移民屯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措施，明朝初年的经济开始复苏。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朝统治者建立了一系列的户籍和土地管理制度。从1370年设置户帖制度、1381年建立黄册制度和里甲制度，到1387年普遍丈量土地并编制“鱼鳞册”，对每家每户的土地亩数进行详细记录，明朝的这些户籍——土地管理制度大大超出了一般行政管理的范畴，而成为专制国家控制并奴役生产者的重要工具。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体系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前代。江南地区推广了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和复种轮作技术。经济作物和经济林业得到发展，地区专业化日益明显，特别是棉花的种植已经得到普及，并逐渐取代桑麻成为主要经济作物。新作物品种如玉米、马铃薯、烟草等也开始传入中国。明朝中后期随着官营手工业和匠籍制度日益衰落、瓦解，民营纺织业迅速崛起，纺织业生产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部分开放海禁之后，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的领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一般认为从正德年间（1506—152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即近代早期。<sup>①</sup> 1581年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推动了中国税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这表明了明朝中后期中国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在思想文化上，朱子学与陆学的融合，到明朝中期发展为王学，即阳明心学，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泰州学派的兴起，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启蒙学派，在明朝晚期得到广泛传播。随后，李贽的反道学思想把矛头直接指向统治者维护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对君主专制政治进行了深刻批判。尽管明朝文字之祸日益盛烈，思想观念的更新与专制主义的压制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但是这些新思想仍然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儒、佛、

---

<sup>①</sup> 商传：《明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道三教合一，普遍走向世俗化；民间通俗文化开始兴起，戏剧、说唱艺术和市井小说得到发展。晚明出现了以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思潮，极大地推动了有效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西方开始了大规模、实质性的直接文化交流。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这一时期中国人采取了和平、平等的交往态度，重点吸取西方的逻辑和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朝时期一个重大转折是从外向型发展的倒退。1407 - 1433 年郑和先后七下西洋，1410 - 1424 年，朱棣五次出塞征讨北元余部，其间于 1421 年迁都北京，以加强对北元势力的防范。可以说，15 世纪前半叶，明王朝遵循了陆海全面出击的对外发展战略，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但其成就也是巨大的。明朝中后期对外发展战略发生转折。1449 年蒙古瓦剌部南下攻明，明英宗在宦官挟持下亲自率兵 50 万应敌，反被击退，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从此，明朝对外发展战略重点放在北部，海外远洋探险活动终止。直到 16 世纪中叶，明朝才与蒙古诸部确立了封贡关系，来自蒙古诸部的压力一度缓解。但是，16 世纪中后期东北地区的女真诸部落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北疆又一大隐患。17 世纪初女真诸部日趋统一，并屡屡南下攻掠明朝内地，直至明王朝灭亡。16 世纪中后期东南海疆倭寇问题也更加严重。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东南沿海千余里海疆同时告警。从此，明朝对东南海疆严加防范，一度涌现出像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抗倭名将。16 世纪末倭患基本清除。但这时西方殖民者屡屡叩关，使明朝在世界历史性竞争开启之际，难以获得转换对外发展战略的时机。

北虏南倭问题虽然趋于解决，但长期的战乱，使本来就日渐衰败的明王朝更趋委顿不堪。万历中期以后，明朝的“鱼烂”之象均凸显出来。皇帝怠政厌政，权臣宦竖交相弄权；明朝皇室带头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税监矿使四处搜刮，不断激起民变；各级官



僚机构效率低下，形同虚设。明王朝政治实际上已陷入瘫痪状态。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兵革屡兴，特别是历时6年（1592—1598年）之久的援朝抗倭战争，以及与后金（清）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加重了明朝的财政危机。<sup>①</sup>然而，统治者把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结果使农民揭竿而起，开始从根本上冲击着明朝的统治。农民起义军几经起伏，最后逐渐汇集成两股强大的洪流，即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而死，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农民起义颠覆了明朝的统治，代之而起的新王朝却是早就在关外等待时机的清政权。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从李自成农民军手里夺得北京，随后清朝迁都于此。接着清军继续南下，康熙元年（1662年）灭了南明政权和各地义军。在平定三藩之乱后，1683年灭台湾郑氏集团，改置台湾府，归福建省管辖。至此，清朝基本统一全国，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前代的基础上，清朝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把专制政治推向了顶峰。清朝以满洲贵族为统治主体，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空前强化了皇权。在清代，内阁有职无权，皇帝的辅弼机构主要是康熙时期的南书房和雍正以后的军机处。特别是军机处，它的设立是中国封建集权统治走向顶峰的重要标志。它虽地位显赫，但丝毫没有决策权，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这使皇权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为保持皇权稳定交接，雍正时期废除了传统的皇位嫡长继承制，实行秘建储位制度。此后，清朝基本没有因皇位继承问题引起社会动荡，这是古代中国在调整内部统治秩序上的又一大进步。

清朝前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清朝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康、雍、乾时期，清廷在军事压服和政治

---

<sup>①</sup> 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争取的基础上，先后设立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伊犁将军，建立了对青海、漠北、西藏和天山南北路的直接统治，并在中央完善理藩院的职能，加强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在东北，康熙年间清朝挫败了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中俄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经过清朝的长期经营，至乾隆时期，中国的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到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东部库页岛，南至南沙群岛，<sup>①</sup> 奠定了中国的版图。

康熙中期以后，清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这种景象中经雍正朝的巩固，到乾隆中期达于极盛，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古代所仅见。而且，与以前相比，随着人口的骤增和开发地区的扩大，许多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盛世景象，几乎与清朝前期开海贸易相始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设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取消四口通商，只许广州一地贸易。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对外贸易发展的黄金时期，贸易对象和进出口商品种类均有大幅增加。乾隆中期以后，随着闭关政策的实施，康乾盛世逐渐落下帷幕。

清朝虽标榜“满汉一体”，但为了保证满洲贵族的特权，清朝统治者通过种种手段压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从而使国家失去了广泛而牢固的统治基础。尤其是它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的专制政策，几乎窒息了国内各民族的创造力，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sup>②</sup> 对以后社会历史发展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在厉行文化专制方面清朝远超前代。士人为避文字之祸，不问政治，脱离现实，

---

① 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② 李洵：“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载《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

整个思想文化界逐渐陷入了沉闷迟滞的状态。这就使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缺少应有的活力，康乾盛世也只是在社会长期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古代所出现的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已。

从嘉庆开始，清朝走向衰落。道光、咸丰时期，在外来侵略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清朝的统治出现了危机。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以中国禁烟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二、东北地区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相继被纳入全国统一王朝的统治之下。蒙古部落崛起于在辽、金统治时期，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后，开始了统一东北地区的战争。1214—1216年，木华黎率领蒙古军队经过一系列争城夺地的战争，占领辽西地区。接着，木华黎转战辽东，攻取金朝的东京（今辽阳），并直达鸭绿江畔。在成吉思汗西征后，窝阔台再次经略东北地区。在1230年占领辽东后，1233年蒙古军队攻灭女真人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东夏。从1231年高丽王投降蒙古起，蒙古军队多次征伐高丽叛军，1270年改高丽西京为东宁府，隶属辽阳行省，1280年在朝鲜半岛设立征东行省。随后，蒙古军队继续东进、北上，向北推进到黑龙江入海口奴儿干地区。1292年在奴儿干地区设立东征招讨司，1308年库页岛酋长投降。至此，中国东北地区再次统一。

明朝时期，从1369年明军攻陷元上都到1377年在辽阳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明朝一直很重视经略东北地区。1387至1388年，明军大规模征伐北元残部，木华黎后裔纳哈出及兀良哈蒙古相继归附。永乐帝统治时期（1403—1424年），明朝最终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清朝崛起于中国东北地区。16世纪末年，努尔哈赤不仅统一了

建州女真，而且开始向外扩张，不断征服周边诸部，并在这一过程中创设了八旗制度。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称汗，定国号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八旗制度成为后金政权最高地方军政机构。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金大败明军，随后在东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征讨。为了提高族系地位，消除汉人对女真的恶感，1635年皇太极下令改女真为满洲。<sup>①</sup>直到民国后才改称满族。1636年皇太极改汗号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清朝在征服朝鲜、统一蒙古诸部后，继续统一黑龙江地区，至1642年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sup>②</sup>

元、明、清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疆域更加明确了。元朝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走向为，从鸭绿江下游起，向东至今朝鲜咸镜南道与江原道交界一带，东濒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东北至黑龙江下游包括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则远至北极圈一带。明朝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疆界从鸭绿江下游起，与朝鲜交界，东濒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北达外兴安岭或越过外兴安岭，西北到贝加尔湖地区。清朝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疆界与明朝时期基本相同，与朝鲜的边界更加明确，只是西北边界由于沙俄殖民势力的东进而不断内移。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即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1727年《中俄连布斯奇界约》和《中俄恰克图界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即以额尔古纳河和沙毕纳依岭为界。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北部疆区域缩小了。此后，沙俄不断侵入中国东北地区，直至鸦片战争后，中国相继失去大片领土，形成了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sup>③</sup>可见，元朝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疆域最为广阔。沙俄的殖民扩张不仅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而且开始成为影响东北亚的重要力量。

① 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1~452页。

② 薛虹、李澍田：《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403页。

③ 程妮娜：《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287页。

在中国东北地区，元、明、清三朝都实行了有效的统治。元朝时期，东北地区主要由辽阳行省管辖，蒙古汗国时期东北诸王的封地成为行省之下的特殊行政区，与路、府、州、县并存。此外，东北地区的西部一部分地区隶属于中书省和岭北行省。明朝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置都司集中统一管辖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务，下辖卫所。1375年设辽东都司，包括镇守总兵府、镇守太监府和巡抚都察院，是管理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1409年设奴儿干都司，其官员由辽东都司选派，管辖东至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西接兀良哈蒙古、南邻朝鲜的广大地区。清朝初年以盛京总辖东北地区，1653年以后相继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分辖东北各地。

元、明、清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日益融入中国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元朝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在适宜农耕地区广泛屯田，推动了当地农耕经济的发展。元朝还十分重视发展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在各地遍设站和急递铺，发展水陆交通。这不仅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交流，对提高东北地区各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东北各地推广儒学，使各族文化日益凝聚为丰富多彩而又相容相通的中华文化。明清时期继续开展屯田发展农业，农耕经济得到进一步推广。东北地区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与关内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边境贸易也得到发展。但是，由于明朝设立辽东边墙、清朝设立柳条边，阻碍了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合和东北地区的全面开发，致使沙俄殖民势力乘虚而入。

## 第二节 东北亚其他国家的重建

中国的王朝更替对东北亚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13世纪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大一统，使高丽政权名存实亡，沦为元朝的一个行省。

元、明易代为高丽政权摆脱元朝的统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李氏朝鲜随之兴起。朝鲜政权的重建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在中朝之间确立了更加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关系，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成为稳定东北亚秩序的关键因素。日本则在抗元斗争中获得胜利，以其有利的岛国地理条件保持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文化上与朝鲜和中国的交往更加密切。随着镰仓幕府的衰落，日本经历了混乱与重建的过程，直到16世纪末才实现统一，并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明朝时期日本曾经被纳入中国主导的东北亚国际秩序，但随着国内统一和对外扩张，日本再次游离于东北亚政治秩序之外，日益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 一、李氏朝鲜的兴衰

1258年崔氏武人政权被推翻，高丽国王恢复亲政。但蒙古军队的威胁迫使高丽国王求和自保，而原武人政权的三别抄军则继续反抗。1271年高丽和蒙古联军攻陷三别抄军基地珍岛，接着追讨残余的反抗力量，平定济州岛。1280年，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征东行省，委派达鲁花赤实施对高丽的实际统治。从此，高丽政权很快衰落下去。

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新兴的明王朝天下初定，高丽利用元帝国土崩瓦解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了复国运动。恭愍王统治时期（1351—1374年），高丽开始实行反元亲明的外交政策，撤销了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征东行省，夺回曾经被元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并对国内进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由于权门势族的反对，恭愍王被弑身死，改革失败。此后，高丽国内政局动荡，在驱逐入境的红巾军和抗击倭寇的过程中，军事将领李成桂的势力日益增长。1388年，高丽国王派遣崔莹、曹敏修、李成桂等人率军侵犯中国，反对中国收复辽东失地。李成桂拒绝王命，说服高丽官兵撤军还师。高丽国王怒杀李成桂之子，国内政治矛盾迅速激化。李成桂发动兵

变，另立新王，控制了全国军政大权。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1396年迁都汉城，建立李氏朝鲜。从此，李氏朝鲜的统治延续了500余年，直至1910年被日本吞并。

李成桂控制高丽政权以后，开始了国家的重建。首先着手解决国内土地制度问题。高丽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地方豪强的大农庄占据了大量私田，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大量寺庙也像地方豪强一样广占田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解决豪强土地兼并问题，以李成桂为首的两班中小地主要求进行田制改革，从而形成了田制改革派。在赵浚、郑道传等两班改革派支持下，李成桂开始推行私田改革。1388年李成桂发动政变后，首先宣布将寺庙的大量土地收归国库，国家东北部和西北部私田文契一律没收。1390年9月，李成桂下令当众烧毁公私田册。随后，对全国土地重新登记，经核查当时全国土地总计达79万余结。1391年宣布实行科田法。

科田设于京畿道。凡在京城供职的官员依次分为18科，按科授田，从第一科的150结到第18科的10结不等。地方各道设置军田以养军士，授田数量从10结到5结不等，由当地中小封建主领受。后来还设置了功臣田。这些都属于私田。此外，国家还直接控制着大部分土地，由国家直接收租，是为公田。公私诸田皆由国家农民即良人耕种，水田缴租一结糙米30斗，旱田缴纳杂谷一结30斗。科田和军田还需缴纳土地税，数额相当于田租的1/15。公私奴婢及工商业者不得受田。

科田法有效地遏止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限制了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保护了中小封建主的利益，从而加强并扩大了李成桂政权的统治基础。科田法重新确立了土地国有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并扩大了国家的兵源，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因此，赵浚曾称赞李成桂实行科田法，“排群邪之谤，犯巨室之怒，

革私田积年之弊，拯生灵于汤火之中，足兵食于艰难之际”，<sup>①</sup>从而为彻底肃清倭患、促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解决土地制度问题的同时，朝鲜按照儒学治国思想和中国律令制度重建国家政治制度。朝鲜太宗李远芳（1400 - 1418年在位）废除私兵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总归三军府统辖；缩小两班士大夫的议政机构“都评议使司”的权力，由六曹（吏、户、礼、兵、刑、工）分任全国政务，直接对国王负责。在郑道传编纂的《朝鲜经国典》及郑道传、赵浚合纂的《经济六典》的基础上，李远芳下令修订并扩充《经济六典》，把以上军事政治改革的内容写进六典。此后，国家设立集贤殿，在专门研究中国法令制度的基础上，指导朝鲜国家政治制度的重建。经过不断修订和补充，1471年《经国大典》颁行。<sup>②</sup>该大典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典，计六卷，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成为李朝的基本法典。这标志着李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日趋完备。

朝鲜基本上是模仿中国重建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并有所变化。在中央，议政府决议国家大事，送呈国王决策；六曹分任全国政务，承政院负责呈递国王文件和传达国王敕令；弘文馆、司宪府、司谏院合称三司，负责国王的咨询和对各级官吏的监督。在地方，全国分为八道，道下设州、府、郡、县。各级地方官员任期固定，各道长官任期为一年，各州、府、郡、县长官任期五年。各级地方机构设立有类似六曹的六房分任政务。朝鲜的选官制度以科举为主，分文、武和杂科，文官和武官主要通过相应的科举考试选授，杂科则用以选授技术官员。特别是晋升二品以上的高级官职必须通过科举

---

① 《李朝实录分类集》第一《政策一·太祖元年壬申》。

② [韩国]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83页。



考试。中国儒家的四书五经是其中的重要考试内容。<sup>①</sup>

朝鲜的社会等级结构严密而复杂。有权担任文武官职的文武两班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承担国家的服役义务，入仕为官是他们的世袭特权。此外，世袭为业的技术官多由中人担任；乡吏则是世袭的基层官员，他们被禁止上升到文武两班。良人、身良役贱者和贱人都是被统治阶层，不能担任官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国家或各级封建主。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控制，1407年实行邻保制，后改为五家作统法，以连环保的形式牢牢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国家还设置了管理奴婢的机构，把大量奴婢放为良人，大多数都成为国家农民，这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扩大了兵役的来源。1413年实行号牌法，规定10~70岁的所有男子皆需佩戴国家颁发的号牌，作为身份的证明，以防止隐藏漏税。在颁发号牌的同时进行人口登记，查出了大量藏匿人口，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而且加强了国家对广大人民的控制。

李朝的土地制度改革、政治制度重建和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国家和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至1430年，李朝的耕地面积就达到了1600多万结，是高丽末年的两倍多，人口也有了明显的增长。农耕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轮作制和不易田制取代了休耕制，水道种植由直播改为插秧，加上兴修水利、推广良种，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从中国引进的棉花得到推广，棉麻经济作物广为普及。工商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李朝前期减轻对手工业者的剥削，并奖励优秀的工匠；国家制定了适当的纳税规章，避免了官僚的敲诈勒索。因此，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都比前朝兴盛，但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商业也主要由官府控制，在京都设立大市主

---

<sup>①</sup> [韩国] 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85~191页。

管商业，对商品销售地点和销售方式都做了明确规定，并定期收取各种税费。因此，尽管有一些行商往来于大都市之间经营米谷、手工业品及海产品，但数量不大。至于对外贸易则由国家独占，与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频繁。

15世纪中叶以后，朝鲜各地定期集市获得发展，商业日益繁荣。原来以谷物作为交换媒介已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国家开始发行纸币和金属货币。然而，在主导的官营商业领域的交换仍然以实物流通为主，货币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米谷、棉麻仍是一般的交换媒介。在农村，商业高利贷资本有了发展，米谷棉麻成为主要的借贷资本。商品交换媒介不发达是李朝时期商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15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私田急剧增加，土地兼并再起。由于佛教势力的发展，寺庙占据的土地也不断扩大。广大农民丧失土地，甚至沦为奴婢。科田法日渐废弛。1466年废除科田制，实行职田制。但是，由于私田势力膨胀，职田制难以贯彻实施，到16世纪中叶便被废除。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467年咸镜道一带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并迅速波及全国。此后，各地起义连续不断。统治阶级内部也不断发生政争和内讧。两班士大夫中，拥有大量田产和政治特权者形成了勋旧派，根基于乡村地方的两班学者集团形成了士林派。为了维护政治特权，消除士林派政治势力的威胁，从1498年到1545年勋旧派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清洗士林派的政治斗争，史称“士祸”。但是，代表地方新兴势力的士林派仍然顽强地得以成长，直到16世纪后期掌握了国家实权。在绵延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党争”中，李朝政治日益走向衰落。

正当李朝陷于党争之际，日本不但实现了国内统一，而且开始加紧对外扩张。日本统一过程中，统治阶级上层的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大领主、大武士集团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日益激烈。“关白”丰臣秀吉为解决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把这些热衷扩张的

## 东北亚史

利益集团引向国外，开辟海外领地，而离日本最近的朝鲜自然是首选目标。<sup>①</sup>当然，侵略朝鲜仅是日本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侵占朝鲜为进一步征服中国。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日军登陆朝鲜半岛后分兵北犯，汉城、平壤相继陷落。朝鲜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壬辰卫国战争。朝鲜军民奋力抵抗，特别是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在东南沿海连续给日水军以重创，暂时缓解了日军的进攻压力。但陆上日军仍然快速推进，几已控制全境，李朝上下亟盼明军入朝抗倭。

作为“父母之邦”<sup>②</sup>的明朝立即决定发兵援朝。明朝不仅供给物资，而且对朝鲜国王明确表示如势力不支，可以请兵策应，共同歼灭侵略者，并通谕海外诸国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势力。1593年和1597年，明军先后两次入朝抗倭，最终取得胜利。1599年中、朝、日三国开始谈判，1606年朝鲜与日本德川幕府关系正常化。这次战争不仅保证了朝鲜的独立，也粉碎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这是16世纪东北亚地区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但明朝也损失惨重，据《明史》卷320《朝鲜传》记载：“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属国迄无胜算。”由于援朝战争中损失巨大，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女真人乘机迅速发展壮大，入主中原。朝鲜则废墟千里，十室九空，李朝国家已处于崩溃边缘。朝鲜的大量田籍户册化为灰烬，文化典籍和寺庙建筑被日倭焚毁，致使朝鲜为了应付战争开支而不得不卖官鬻爵，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日本则从朝鲜掳走大批陶瓷技术工匠和大量书籍，促进了日本国内的生产发展和思想文化的进步。<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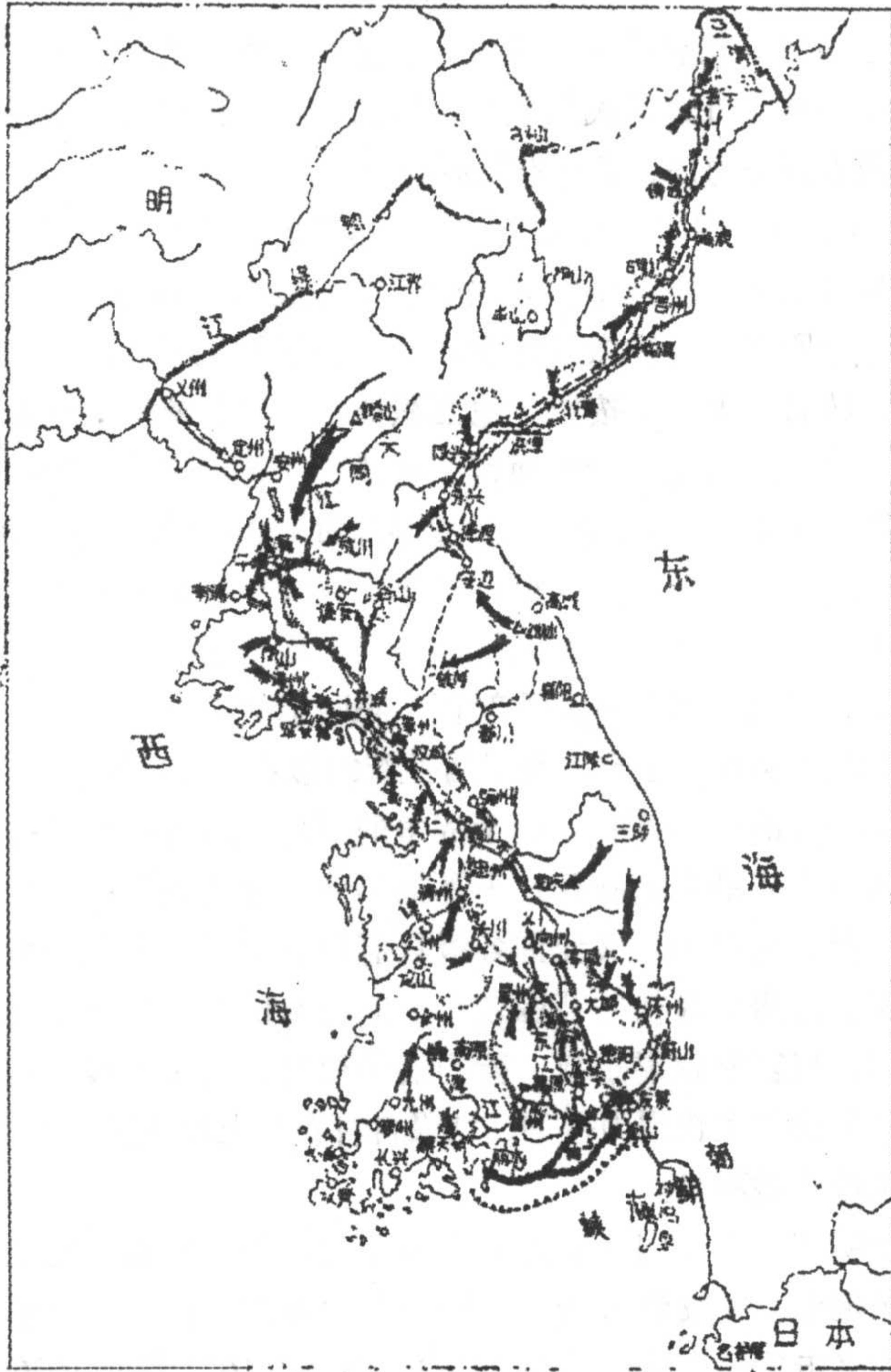
---

① 白新良：《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48页。

② 《李朝宣宗实录》卷24。

③ [韩国]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23页。

1592-1598年朝鲜卫国战争图



此图根据《朝鲜通史》(上卷)第740页改绘,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 东北亚史

16 世纪末中朝抗倭战争，是继 7 世纪白村江之战以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东北亚大规模战争。尽管明朝与唐朝一样，在战后都牢固确立了中国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但是战争都极大地消耗了国家实力，致使中国北方边疆民族崛起，从而孕育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日本尽管战败退守海岛，却日益发展起来。

17 世纪后李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补救措施，以恢复壬辰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其中大同法的实施是最重要的内容。所谓大同法，就是把原来以实物缴纳的贡物，改为缴纳税米，因所收税米称大同米，故名。大同法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税米，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负担，但对地主阶级而言，却减少了土地收入，因而遭到了强烈抵制。从 1608 年开始推行，整整经过 100 年时间，到 1708 年该法才推广到全国。大同法的推行是李朝在整个统治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朝鲜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的土地所有制也出现了两种新的形式：官房田和衙门屯田，它们都是壬辰战争的产物。由于战争的消耗，封建国家已提供不出宫室和各级官府的所需费用，于是把部分土地的收租权赐给各王子和公主，是为官房田；又允许各级官府自行屯田，筹集经费，是为衙门屯田。官房田最初的范围较小，衙门屯田也尽量开垦战争所形成的废田，但官室依靠王权，衙门借助权势，疯狂扩展土地，而两班官僚和庶民地主也竭力搜刮，结果自耕农的土地迅速减少，<sup>①</sup> 李朝的统治基础日益不稳。

由于明朝与李朝国家实力遭到战争的削弱，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乘机崛起。在女真人的后金政权与明朝相持期间，李朝曾配合明朝几次夹击后金军队，引起了后金的反击。1627 年和 1636 年，后

---

<sup>①</sup> 白凤南、李东旭：《朝鲜经济史概论》，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4 ~ 156 页。

金（清）军队先后两次突入朝鲜，李朝统治者望风而逃，最后被迫俯首称臣，奉清正朔。清朝入主中原后，清朝和李朝的封贡关系进一步稳固，双方的互市贸易和朝贡贸易增长很快。经过17世纪的调整，18世纪以后朝鲜一度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获得了发展，思想文化和科技领域也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党争仍然不断，李朝的统治日益衰落。19世纪上半叶，外戚专权使国家陷入危机，李朝已经名存实亡。从19世纪60年代起，法、美、英、俄、日等国已纷纷把目光对准了朝鲜半岛，朝鲜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李朝统治者为图强自存，从1863年起开始刷新“弊政”，对内消除“党争”痼疾，除外戚势力，加强国防建设，镇压天主教徒；对外厉行“国禁”，防止外国势力入侵。但此时朝鲜积弊已深，难以在短时期内强大起来。随着日本的崛起，朝鲜很快就丧失了国家自主权，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 二、从镰仓幕府到德川幕府

1274年和1281年，蒙古大军两次远征，侵入日本沿海地区，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影响。日本虽然赢得了抗元战争的胜利，但镰仓幕府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武士阶层开始出现严重的分化，破产的武士对幕府普遍不满。地方守护和地头的横征暴敛又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起义不断。1333年，天皇乘机联合各地武士推翻了镰仓幕府。但是，镰仓幕府的叛将足利尊氏（1305-1358年）拥兵自重，1336年攻入京都，重建幕府统治，从此开始了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3年）。

1336年12月，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逃亡南方的和州吉野郡，建立朝廷，与京都朝廷对峙，史称南朝。此后，南北朝廷对峙50余年，直到1392年室町幕府才合并了南朝。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南北朝时代。

室町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守护大名。他们在长期战乱中不断扩充

实力，成为地方割据的重要力量。15世纪守护大名地方割据倾向更加突出，室町幕府的控制日益软弱无力。守护大名相互征战不已，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室町幕府很快衰落下去，国家政局陷入一片混乱。在长期混战中，分别以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为首形成了两大实力集团。1467年，这两大集团因幕府将军的继承人问题展开了长期的大规模内战，史称应仁之乱（1467-1477年）。此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573年），战国大名随之而起。

战国大名多由原来的守护大名或国人领主转化而来。他们拥有私兵，控制土地，对地方实行全权统治，不受幕府统辖，成为独立一方的诸侯。因此，战国大名所统治的地区又被称为分国。在各分国中，各大名拥有领内的最高土地所有权，通过“检地”更加直接地控制了耕地和农民，庄园制度已完全崩溃，小农经济获得发展。为加强统治，增强自身争霸实力，各大名纷纷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军事上实行兵农分离，扩充常备军；在经济上鼓励开发农田水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sup>①</sup>各地工商业和城市日益走向繁荣，国内统一市场初步形成。海外贸易更加活跃了，除了继续与朝鲜、中国保持经常性贸易往来以外，还与东南亚诸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建立了贸易关系。

16世纪以后，日本封建制度进入转折时期，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16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各区域的霸主为争夺统一日本的主导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首先颖脱而出的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他在商人的支持下，从葡萄牙购入先进的枪炮，装备了一支强大的武士骑兵队和步兵队，从1558年起，先后击败许多大名。1573年，信长把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逐出京都，流放到河内国。至此，室町幕府正式灭亡，开始了

---

<sup>①</sup> 李文：“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载《日本学刊》，1993年第3期。

日本历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即织丰政权时代（1573 - 1600 年）。此后，织田信长继续推进武力统一日本的大业。1582 年织田信长在驰援羽柴秀吉途中，家臣明智光秀叛变，包围了信长暂居之所本能寺，信长被迫切腹自杀，并烧寺自焚。织田信长的亲信羽柴秀吉继承了信长统一日本的事业，以大阪为根据地，历时 8 年，击败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雄，逐步控制了政权，最终于 1590 年实现了日本的统一。

在推进日本统一的过程中，1586 年农民出身的羽柴秀吉被朝廷任命为政大臣，并被赐姓丰臣。1588 年丰臣秀吉发布《刀狩令》，收缴诸国百姓各种武器，以清除动乱根源。此后，丰臣秀吉开始整顿土地制度，从自己的领地逐步扩大到全国。1585 - 1598 年，他先后三次派人到全国各地重新丈量土地，史称太阁检地。在检地过程中，每村都建立了检地账，把耕地者、土地数目、应纳租税等全部登录在册。在册农民不得随意迁徙，并编制五人组，组内实行连环保制度。通过太阁检地，丰臣秀吉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直辖地，而且把全国其余土地重新分配给各级封建主，成为采邑地，从而初步形成了封地制度。此外，丰臣秀吉还采取了兴修水利，鼓励垦荒，改良农作物品种，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统一度量衡等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促进了日本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为了掠夺财富，转移国内矛盾，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很快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最终被中朝联军击败，丰臣秀吉在忧愤中死去。

丰臣秀吉死后，潜伏的矛盾立即爆发，主持大政的德川家康乘机谋篡。1600 年，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消灭了对手。1603 年，家康迫使天皇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1615 年，家康彻底消灭了丰臣氏势力，独揽全国大权。日本历史进入了德川家族独掌国家大权的德川幕府时代（1603 - 1868 年）。

德川家康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幕府的中央集权。在继承丰臣秀吉初步建立的封地制度基础上，他把全国 1/4 的土地划为幕府的直



辖领地，称“天领”；其余土地则被分封给 260 余个大名，称“藩领”。天皇和寺社占有的土地只有全国土地的 1% 左右。在此基础上，德川幕府逐步确立了幕藩体制，成为国家的基本统治体制，为日本封建社会所独有。<sup>①</sup> 这种体制是集权和分权的结合体。幕府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关，将军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享有政治、军事及外交大权，并拥有庞大的直辖领地，控制了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垄断了对外贸易，这奠定了幕府集权的经济基础。幕府还控制着全国军队。将军直辖的常备军称“家臣团”，各地大名依照封地大小提供数量不等的军队。天皇则“以学问为第一”，成为国家的象征而没有实权。

各地大名又称藩主，在其藩领内享有相当大的统治权，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等诸多权力。<sup>②</sup> 他们设立了自己的藩政机构，设置各级官吏。同时，藩主把自己的武士作为御家人编成家臣团，这些武士被称为藩士。藩主把一半左右的封地再次分封给上层藩士，中下层藩士则被赐以俸禄。为防范藩国作乱，幕府把大名分为三类：德川同族的大名称为“亲藩”，关原之战前归顺的大名称为“谱代”，战中被征服的大名称为“外样”。亲藩和谱代被安置于至要之地，是将军统治的重要屏障；而外样则迁至边远地区，并受到将军的严密监视。这样，在德川幕府时代，全国大名虽仍割据地方，但由于幕府在实力上居于绝对优势，日本仍保持了 260 年的统一安定局面。

幕府统治从镰仓幕府以来，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而逐步完善。德川幕府时期，幕府统治得到加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地的控制，1615 年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又称“元和令”，详细规定了与各大名相关的诸项制度。随后，幕府还颁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

① 赵建民、刘予苇：《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7 页。

②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7 页。

严格限制了天皇和王公贵族的权力。以幕府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幕府和藩政机构共同构成了幕藩体制。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封建等级制度得到发展。士、农、工、商四民分离，职业世袭。此外，还存在被称为“非人”的贱民阶层，他们只能从事殡仪、曲艺等受人鄙视的职业，并被禁止与一般平民交往。农民是主要劳动者，他们终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更换职业或买卖土地。幕府大力发展儒学教育，培养适应幕藩体制的顺民。同时，还极力推崇武士道的忠勇精神，使之成为培养武士、强化幕府统治的得力工具。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日本的世界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原来的“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世界观转变为“本朝、唐、西洋”新世界观。<sup>①</sup> 德川幕府初期，奉行开放的外交政策。为发展经济，保持与西方的贸易关系，原则上允许天主教传播。但天主教不仅在教义上与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念相抵触，而且其活动也逐渐逸出传教的范围。为维护统治，从1612年到1633年德川幕府先后颁布禁教、锁国令。1637年岛原起义曾利用天主教来反抗地方大名的统治，这一事件促使幕府更加坚定地走向闭关锁国。1639年的锁国令颁布以后，日本的锁国体制得以完成。1641年，幕府仅把长崎作为与外国贸易的窗口，并且只许中国与荷兰在此贸易。锁国体制的确立使日本与世界的交往受到局限，妨碍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输入，压制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sup>②</sup> 18世纪中叶以后，沙俄势力东进、南下，日本开始受到威胁。

但是，幕藩体制和闭关自守保证了集权政治的权威，也为封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18世纪初，日本的农业、手工业和

---

①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页。

② 关于日本锁国体制的评价，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参见赵德宇：“日本‘江戸锁国论’质疑”，载《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

商业已有相当发展，城市经济空前繁荣。<sup>①</sup> 民族文化日趋成熟。社会结构变革日益明显，各特权阶层包括上至将军、大名，下至下级武士，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无不竞奢逐侈，追求享乐，结果用度日黜，危机四伏；而商人势力却逐渐兴起，豪商巨贾纷纷涌现。商人致富在于苛剥农民，下级武士维持生存也赖于压榨农民，小农经济因此而破产，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统治基础。为维护幕藩体制，德川幕府相继进行了几次幕政改革，企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恢复小农经济的地位，但都是暂时缓解了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 19 世纪 30 年代西南诸藩进行的藩政改革，则由于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而成效显著，这正是以后西南诸强藩在倒幕运动和维新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的根本原因。

当西方殖民列强叩开日本国门时，幕府危机终于全面爆发。1854 年，美国率先打开了日本大门，此后其他西方列强相继跟进，它们以逼签不平等条约的方式，攫取了大量殖民特权，日本的锁国体制由此结束。开港后日本经济急剧恶化，内外矛盾日益加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强藩大名反对幕府专制，要求还政天皇，维护民族独立。1868 年 1 月，倒幕派以武力为后盾，在京都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组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临时中央政府。新政府军于 1868 年 5 月兵临江户城下，迫使幕末将军德川庆喜投降，6 月彻底肃清幕府残余势力。德川幕府名实俱亡。1868 年 10 月天皇改庆应年号为明治，11 月改江户为东京，次年正式迁都东京。以睦仁天皇（1852 - 1912 年）为首的明治政府，开始了明治维新。

---

<sup>①</sup> 参见娄贵书：“幕藩体制——商品经济的温床”，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孟凡东：“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的发展”，载《江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 第三节 东北亚封贡体系的兴衰

随着中国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东北亚封贡体系开始形成。元朝在对外关系方面过分依赖武力，试图通过征服建立大一统的帝国秩序，东北亚封贡关系的制度化进程在曲折中发展。明朝建立伊始，鉴于元朝黩武的教训，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注重发展封贡关系，从而使封贡关系日趋稳定，形成了制度化的东北亚封贡体系。随着体系内各个国家的发展，封贡体系模式被东北亚其他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关系的主要模式，到清朝前期，东北亚开始出现多个中心、多个封贡体系交错并存的局面，一元的、等级的东北亚国际体系不复存在。日本率先从内部打破了东北亚世界的统一性，接着，西方和俄罗斯殖民势力东进，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封贡体系日益缩小。随着东北亚的分裂和外部殖民势力的挤压，东北亚封贡体系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 一、中国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确立

蒙古的崛起使辽、金时期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受到冲击。1218年蒙古军队追讨契丹余部，至高丽江东城。蒙军与臣属国东夏、高丽联军攻克江东城，并强令高丽称臣纳贡。这样，蒙古与高丽之间初步确立了封贡关系。与以往不同的是，元朝在与高丽的封贡关系中非常注重经济利益的得失。然而，高丽时降时叛，双方的封贡关系并不稳定。从1231年起，蒙古军队开始多次侵入高丽。忽必烈即大汗位之后，蒙古转而采取和亲政策辖制高丽，通过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使高丽成为蒙古皇室的属地。这种政治联姻的后裔正式继承了王位，高丽国王开始改用蒙古姓，在发式、衣着和语言等

方面都蒙古化了。<sup>①</sup> 1280年，元朝在朝鲜半岛正式设立征东行省。

从1266年到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五次遣使日本，均未能与之建立起官方联系。这使忽必烈下定了征伐日本的决心。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攻打日本，由于日本武士的抗击和不利的自然条件，元军均遭失败。此后，尽管忽必烈仍欲征服日本，但终因国内问题的纠缠而作罢。在元朝时期，中国始终未能与日本建立正式的封贡关系。但是，双方这种政治关系的僵局却与依然活跃的民间贸易往来并行不悖。从1305年到1350年的45年中，33年都有日本商船来中国。<sup>②</sup> 此外，还有由日本商人、武士和浪人组成的海盗集团。随着元朝后期国力的衰弱所导致的海防的松弛，这类海盗式的劫掠活动更加频繁，其侵袭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至明朝时期，倭寇终成中国之大患。

明朝初年，华夷一视同仁的思想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sup>③</sup> 中国之外的国家被视为“外国”而不再简单地被归为“藩属”的观念，萌芽于10世纪，在明朝得到了正式确认。这种确认又进一步成为明朝官方对外政策的指导理念。这使明朝不再像以前那样寻求建立天下一体的世界秩序，而是主动与这些国家建立起稳定的封贡体系，从而在东北亚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同样，外交思想的转变也使明朝的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中不再频用暴力。尽管明朝所确立的封贡体系并非平等的国际体系，但是，它与武力扩张政策相比终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以恢复华夏道统自居的朱元璋，改变了元朝大一统的政策，试图通过确立封贡体系来实现“怀柔远人”以期“四方宾服”的政治

---

① [韩国] 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64页。

② [日]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0~392页。

③ 陈戍国：“论明代外交与相关礼制”，载《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理想。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内状况的制约。连年征伐使明朝初年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田地荒芜。朱元璋开国伊始推行和平外交，实际上是为了赢得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的外部环境。这种迫切的心情使得朱元璋在明朝成立的第一年就遣使高丽，次年又遣使日本，表示欲建立明确的封贡关系。1369年，朱元璋下令编订《皇明祖训》，劝诫后世切勿随意对外用兵，并开列了15个“不征之国”的名单，告诫其子孙切勿对这些国家兴兵征伐，朝鲜、日本均在其列。朱元璋对蒙元扩张政策拨乱反正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因此，朝鲜、日本陆续遣使来访，从而建立了稳定的、制度化的封贡关系，东北亚封贡体系开始形成。

根据朝贡次数的多寡、对明朝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中国与朝鲜、日本的封贡关系并不完全相同。<sup>①</sup>中国与朝鲜的封贡关系是典型的、实质性的封贡关系，朝鲜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纳贡，采用明朝年号和年历。这种封贡关系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性，是国内君臣主从关系的延伸。中国与日本的封贡关系，则有所不同。尽管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文化，并曾接受过明朝授予的封号，但不具备君臣主从关系的实质性内涵，其经济意义更为明显。因此，在明朝确立的东北亚封贡体系中，中国的册封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实质性的册封和礼仪性的册封。前者适用于朝鲜，后者则适用于日本。但是，明朝的实质性册封并不意味着对其内政的强力干预，朝鲜在内政外交上仍然保留独立自主权。尽管封贡体系仍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但明朝一般不干预朝贡国的内政，并起到了平衡和仲裁的作用，从而成为封贡体系的中心。中国与朝鲜的封贡关系最为稳定而持久，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

<sup>①</sup>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2页。

明朝确立的封贡体系体制之完备、组织之有序，亦为前代所不及。除了对贡期有所规定外，这种制度化的倾向也体现在明朝对贡道以及入贡规模的限制上。明朝政府规定，若朝贡国不按贡道入贡，可以拒绝其入境。在朝贡规模方面，明朝政府专门规定了入贡的人数、携带物品等。但是，封贡贸易之于各封贡国而言是有利可图的买卖，所以，这一规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在这两方面，明朝对朝鲜的限制程度都是最低的。朝鲜可自海路或陆路入贡，陆路经鸭绿江入境，而海路则多在山东沿海。日本的贡道则被定为宁波。明朝对入贡资格有严格规定。入贡必须持有“表文”即“国书”，否则明朝一般都加以拒绝。在表文中，对明朝的称颂以及对其属国身份的表述都是必需的。此外，还须持有明政府颁发的朝贡勘合。它是一种信用凭证，始于1383年，由礼部制作并颁发，但对勘合的验明任务则主要由各地市舶司执行。<sup>①</sup> 朝鲜只需持有表文即可入贡，而不必受勘合的限制。日本则需表文、勘合俱全。朝贡勘合制度的实行使朝贡贸易成为东北亚国家之间进行海外贸易的惟一合法形式。

明朝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置了一些管理机构以确保封贡体系的正常运转。在中央，与元代一样，明代的封贡事务主要由礼部负责，其下属的主客司负责具体执行。主客司的主要职能在于：规范诸贡国人朝礼仪；辨明贡使身份；约束贡使活动等等。<sup>②</sup> 1405年，明朝在京师设置会同馆作为中央级的接待机构，会同馆设有驿站，主要负责接待来自各朝贡国的贡使。<sup>③</sup> 明代亦有专门培养对外使节的机构，即行人司。明朝还设有四夷馆，这是翻译机构。封贡礼仪主要由鸿臚寺负责。在地方，明朝依宋、元旧制，于广州、泉州和宁波

---

① 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陈伟明、何兰娟：“略论明代中央外交专职机构”，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③ 魏华仙：“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三地设市舶司，其职责是验明封贡国人贡资格，并管理朝贡贸易的具体事务。<sup>①</sup> 市舶司的重要职责还在于执行海禁政策，所以，随着海禁政策的时宽时严，市舶司也时设时罢。

明朝时期封贡体系的确立和发展与海禁政策紧密结合。从1371年到1394年，朱元璋多次下达禁海令，并规定对私下进行海外贸易者处以重罚。朱元璋试图在稳定中国海疆的同时，全力以赴解决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从而实现全国的统一。由于明朝始终没有完全解决“北虏”问题，海禁政策因此也贯穿了明朝始终，尽管明朝中后期有所放松，但并未完全放弃。

海禁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以及东北亚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封贡关系与海禁政策的结合旨在把一切对外事务纳入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从而构成了明朝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支柱。<sup>②</sup> 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国家对海外贸易的垄断，朝贡贸易随之得到发展，东北亚贸易圈开始形成。封贡体系成为东北亚贸易圈形成的必要前提，二者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从封贡体系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确立以来，它就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个方面的内容，亦即包含政治和经济两种关系。以前中国更加重视政治方面，即中国册封、外藩来贡的政治交往模式，经济贸易方面不受重视；海外贸易主要是在民间层次上进行，国家并未对其实行全面垄断。明朝以来则将海外贸易限定于封贡关系形式之下，并由官方垄断，封贡关系才显现出比以往更为浓厚的贸易性质。<sup>③</sup> 海禁政策虽然限制了民间贸易的发展，却推动了官方贸易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朝贡贸易体制。

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运行的方式是，明政府遣使到海外诸国颁

---

① 彭巧红：“明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张钰梅：“简论明初的朝贡制度”，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③ 万明：“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



赐明朝正朔，邀其人朝进贡，而后明政府对封贡国正贡回赐，其附载货物则由官方给价收买或由贡使自行出售。在这种朝贡贸易体制中，经济贸易的重要性相当突出。在封贡体系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所包含的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有所侧重。在明朝初年，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封贡体系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朝贡贸易体制成为一种以经济交流达成政治目的辅助手段。随着明朝统治的日益稳固，经济方面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并发展成为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体制。与此同时，海禁政策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其目的从维护海疆安全转向维护官方对朝贡贸易的垄断。因此，尽管明朝开展朝贡贸易有其确立华夏正统和宣示国威等政治方面的要求，但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对于朝贡国而言，经济方面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大多都是名为朝贡，实为贸易。

朝贡贸易体制的发展主要是在明朝中前期。由于明朝的经济结构难以适应海外贸易扩大所带来的冲击，朝贡国获得的大量回赐物品使明朝财政支出日益增加，明朝统治者不得不对朝贡贸易实行限制政策。这种限制在一定意义上却使明朝中后期的民间海外贸易和走私贸易兴盛起来。明中叶之后，民间商人开始成为海外贸易的主体，朝贡贸易体制日趋衰落。“倭患”的出现集中体现了朝贡贸易体制的内在危机。由于正常的海外贸易渠道受到限制，14世纪末和整个15世纪，为数不少的商业集团勾结日本人和朝鲜人集结在朝鲜半岛周围，并不时侵袭中国沿海，他们要求废除“禁海令”。这时，倭寇的性质已开始出现变化。倭寇的首领和基本成员大都是中国人，也就是一些从事海上走私的贸易商人。<sup>①</sup>

## 二、东北亚其他国家与封贡体系

明朝确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东北亚其他国家相对独

---

<sup>①</sup> 樊树志：《晚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立的地位得到中国的承认。这就为东北亚各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东北亚其他国家在国家形态、民族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日益成熟，并开始接受封贡体系模式，发展对外关系。这样，东北亚封贡体系开始日益复杂化。

从9世纪后期日本构筑“东夷小帝国”以来，日本就开始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国交，未曾再与中国建立封贡关系，与中国的正式交往基本中断。蒙元企图征服日本，使之对中国更加戒备。明朝建立伊始便派遣使者到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由于明朝统治者不了解日本情况，使者把诏书送给了南朝的怀良亲王，他以明朝语气傲慢而拒绝来使。次年，明朝使者再来，责备日本倭寇侵扰，并有征讨之意，怀良怒杀来使5人，拘2人，三个月后放还。1370年，明朝三遣使者，怀良了解到明朝并非先礼后兵，开始引见使者，次年派僧侣出使明朝，中日外交关系出现了恢复的迹象。<sup>①</sup>

明朝使者在1372年回访时，留居日本一年多，逐渐了解到日本处于南北朝的政治局势以及足利义满幕府势力的强大，便转而与之建立联系。从1373年起，中日之间开始了正式往来。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封授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赐金印冠服，日本奉表称臣。从形式上看，日本最终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之中。但是，足利义满与中国的正式交往只是意味着天皇的外交权力转到了幕府，实际上足利氏在国内正式场合并不使用这一封号，而且这种称臣纳贡的做法遭到了国内的指责。<sup>②</sup> 由于倭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日本国内政治动荡，中日官方政治关系并不稳固。日本加入中国确立的封贡体系，旨在进行官方贸易，而中国则是为了通过确立政治关系，消弭倭患。由于倭寇屡犯中国海疆，甚至被怀疑勾结中国国内政治势力，两国之间正常的海外贸易往来受阻。

---

<sup>①</sup> [日]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1~512页。

<sup>②</sup>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页。

中日确立封贡关系以后，明朝准予日本来中国进行朝贡贸易。为了区别官方贸易船和倭寇船，明朝实行勘合贸易制度，只有携带勘合的日本船只才允许以朝贡名义进行贸易。日本加入中国的封贡体系更多的考虑是从中取利，“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从中“大获利”。<sup>①</sup> 因此，日本在两次勘合贸易期即 1404 - 1418 年、1432 - 1547 年，共 30 年间，共派遣勘合船 17 次，远远超过了十年一贡的规定。

明朝统治者本以为通过勘合贸易可以消弭倭患，因而也对违犯规定年期的勘合船同样予以接待，只是到了后期发现倭患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这就促使明朝对中日之间勘合贸易的控制更加严格起来。由于后期勘合贸易不再像前期那样由幕府直接经营，而主要由守护大名、商人等直接经营，各大名之间开始争夺勘合贸易经营权。<sup>②</sup> 特别是 1523 年“争贡之役”后，中国中断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达 17 年之久，1551 年以后则长期陷入僵局，倭患日益严重。民间走私贸易却更加猖獗，并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渠道。

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上，由于日本对蒙元的侵袭仍然是心有余悸，对朝鲜的戒备心理很强。因此，日本对待与朝鲜的官方交往态度消极。1392 年李氏朝鲜初建，太祖李成桂遣使日本通好，并要求日本方面严禁海寇扰边，遭到日本的拒绝。1398 年朝鲜再次遣使，鉴于日本国内已实现南北朝统一，足利义满的幕府统治更加巩固，他便欣然接见了来使，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倭寇屡屡侵犯朝鲜沿海，1419 年朝鲜世宗派李从茂一举捣毁对马岛倭寇基地。<sup>③</sup> 日本国内为之大震，以为又是异族来袭，后来才发现是虚惊一场。由于倭寇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并

---

① 《明史》卷 322《外国传三·日本传》。

② 赵建民、刘予苇：《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7 - 88 页。

③ [韩] 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年版，第 201 页。

不稳定。

但是，在贸易上，日本急于发展与朝鲜的关系。西日本、九州等地来朝鲜经商的人数日益增加。朝鲜政府为了限制人数，1407年实行“路引制”。1419年驱逐倭寇以后，朝鲜实行怀柔政策，开放三个港口与日本贸易，倭寇转而为商人，得以在朝鲜居住经商，甚至有的被委以官职。1443年双方签定贸易协定，实行“信牌制”贸易。日本商人随后开始大量居留朝鲜港口，甚至与当地官员发生冲突。16世纪初日朝双方再次签定贸易协定，日本对朝鲜的贸易受到限制。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朝鲜的贸易主要由地方大名控制，幕府很少直接参与。因此，可以说日本发展对朝鲜的关系的根本推动力量是在地方。这表明日本随着庄园制经济的解体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各地的竞相发展推动了海外贸易的高涨。

日本与琉球之间的官方贸易关系最早始于1415年。足利义持、足利义教任幕府将军时期，把琉球来日的官方贸易品称为“贡物”，并在幕府设置“琉球奉行”之职，来管理琉球的贸易。据记载，1451年琉球官船抵日，当地守护曾挑选货物而不付款，被琉球使者告发于幕府。应仁之乱时期，日本萨摩藩控制了对琉球的贸易特权，贸易地点被限制在九州西海岸的坊津和博多津。<sup>①</sup>日本开始把琉球看作朝贡国家。

这一时期，日本形成了明确的神国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结合起来，使日本的自我优越感更加高涨，“东夷小帝国”观念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牢固了。蒙元两次东征日本无功而返，更加激发了日本人原有的神国意识。“这种认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贵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新思想。就是说原先崇拜中国，而这时产生了一种新思想，认为中国不足道，印度也不足道，没有别的国

---

<sup>①</sup>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页。

家像日本这样高贵，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形成了当时的文化独立。”<sup>①</sup>

在足利义满去世后，足利义持任幕府将军期间（1419 - 1428年），因不满于前任将军对明朝称臣纳贡，毅然断绝与明朝的外交关系。1419年他在派遣使者告知明朝使者的绝交书中说：“本国开辟以来，百皆听诸神”，“灵神托人谓曰，我国自古不向外邦称臣”；足利义教继任幕府将军后，虽然恢复了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但是神国意识更加明确，与明朝恢复外交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通商获利：“日本是神国，无法一一顺从明朝旨意，而朝贡通商才是日本的愿望。”<sup>②</sup>在日本看来，朝贡贸易已经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是获利贸易，尽管为此需要做出形式上的让步，但神国观念已不可动摇。相应的神道理论体系也得到了发展。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伊势神道到室町晚期吉田兼具（1435 - 1511年）创建吉田神道，在吸收佛、儒、阴阳道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神道理论体系。

在外交观念上，日本室町幕府将军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国源某”，朝鲜则称之为“日本国殿下”。幕府将军对琉球国王不称之为国王，而称之为“世主”，比之于国内的臣下。在此基础上，日本形成了“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等级性世界观念。<sup>③</sup>显然，日本试图遵循中国的封贡体系模式，确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封贡体系。

中国与高丽和朝鲜的封贡关系最为稳固而持久。恭愍王统治时期（1351 - 1374年），高丽开始实行反元亲明的外交政策。李氏朝鲜建立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国内统治，积极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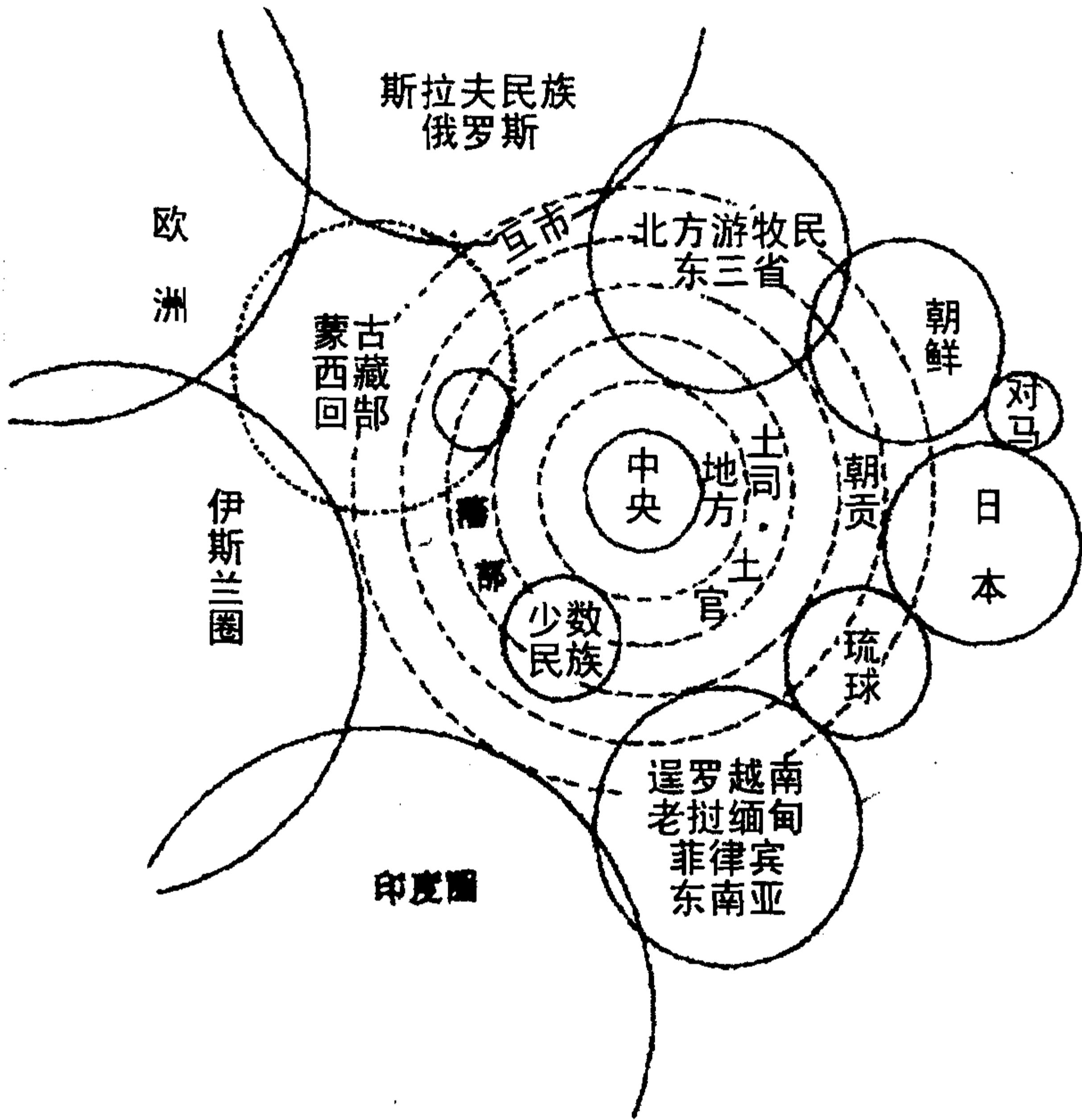
---

① [日]内藤湖南著，储元熹、卞铁坚译：《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7页。

② 陈小法：“日本‘神国思想’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载《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③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48页。

中国与周边关系（以清代为例）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sup>①</sup> 据《明太祖实录》卷221记载，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李氏朝鲜，而且明确表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又据《明太祖实录》卷228记载，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明确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李氏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巩固。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李氏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封贡体系。<sup>②</sup> 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北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朝鲜很早就受到中国的影响，高丽开国之初就全面推行唐朝的“文物礼乐”，到了李朝时期，将朝鲜视为“小中华”已经成为朝鲜官方和私家学者的共识。<sup>③</sup> 李氏朝鲜不仅吸纳了朱子学的思想，而且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在处理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上，朝鲜自比小中华，除了把中国称为天朝以外，把女真人及野人等视为夷狄，从而在东北亚封贡体系之下，建构了以朝鲜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据朝鲜出版的《李朝实录分类集第一·政策一》记载，1392年李氏朝鲜初建，“文治既洽，武威远招。扶桑之寇，奉珍来庭。琉球南蛮，重译入贡。”朝鲜把日本和琉球都视为蛮夷之国，朝鲜则是一个中心。朝鲜世祖三年（1457年）说得更加明确：“野人、倭人俱为我藩篱、俱为我臣民；王者等视无异。”朝鲜的小天朝意识表露无

---

① 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② 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乔治忠、孙卫国：“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载《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遗。可见，朝鲜的华夷秩序观与中国一脉相承，差别在于朝鲜在认同中国为东北亚封贡体系中心的同时，还把自己视为它所建立的封贡体系的中心。

### 三、东北亚封贡体系的衰落

明清易代，东北亚封贡体系得以重建。但是，清朝前期（1840年以前）的东北亚封贡体系日益复杂化，开始出现多个中心、多个封贡体系交错并存的局面。“朝贡体制虽然是以朝贡一回赐这种和中国之间形成的、两国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制，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能完全包容所存在的各种关系，例如处于中国周边位置上的，自成体系的卫星朝贡关系的存在就不止一个，因此形成了既有包容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立体复杂的地域圈。”<sup>①</sup> 随着体系内各个国家的发展，封贡体系模式被东北亚其他国家接受，成为处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关系的主要模式，对中国的认同逐步发生改变。

女真人建立的后金国家，开始摆脱对明朝的藩属地位，并致力于建构自己的封贡体系。1637年，朝鲜被迫向它称臣纳贡。1644年清朝入关直至1683年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中国再次统一。清前期的内政和外交基本沿袭明朝旧制，并以明朝的历史继承者的姿态，要求原来朝贡明朝的诸藩交还明朝的封诰和印敕，重建封贡体系。

但是，日本从16世纪中叶开始，逐步形成了“本朝·唐·西洋”的新世界观，“以丰臣秀吉两度侵攻朝鲜为起点，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意识也彻底取代了边土小国意识，同神国观相辅相成，构成了新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日本已经试图在自己设定的一个区域内，建立一个类似东亚册封体制却是自己执牛耳的国际

---

<sup>①</sup>（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秩序。”<sup>①</sup> 1609年日本迫使琉球臣服，琉球同时还向中国称臣纳贡；1635年日本要求朝鲜称日本幕府将军为“日本国大君”，并改变了国书中使用的明朝年号，只用天干地支。明朝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朝贡就时断时续，从清朝建立以后，日本则不再向中国朝贡。17—19世纪中叶日本处于锁国时代，并开始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因此，清朝封贡体系未能得到认同。由于明朝遗民在反清活动中多次乞援日本，清初厉行海禁政策，旨在禁止与日本的往来。即使在开海以后，中日之间仍然没有建立官方外交关系，两国民间贸易往来也受到局限。

这一时期的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拉丁世界，一种新型的国家体系模式正在孕育形成。15世纪以来拉丁世界民族国家不断成长，16世纪兴起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使宗教民族国家化，而且使国家间关系日益世俗化。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新教诸侯达成《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传统的天主教会体系被打破，中世纪时期拉丁世界的世俗政权之间的均势体系进入分化和重组时期，并开始向近代国家体系转变。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以‘会议’解决争端”，“国家主权平等”、“条约必须遵守”、确立“外交常驻代表机构”制度，等等，构成了“现代国际关系原则”。<sup>②</sup> 由此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多极均衡的拉丁世界格局。这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西方各国在重建国家体系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海外扩张，从根本上冲击并改造了多元中心并存、多个世界并行发展的世界历史格局。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来半岛西南的马六甲，从此开始，西方殖民势力不断东进。在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之后，西班牙的殖民

---

<sup>①</sup> 李小白：《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sup>②</sup>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3页。

远征队进入菲律宾群岛，在占领吕宋岛之后，开始策划进一步远征中国和日本。1596年日本长崎发生处死西班牙传教士事件，从1623年起，日本断绝与菲律宾的一切交往。荷兰殖民势力也开始进入中国和日本。1609年，日本允许荷兰商船在长崎贸易，1641年日本正式限定长崎一港通商。这样，荷兰就成了日本锁国时代惟一与日本贸易的西方国家。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开始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并向日本渗透。但西方国家的早期殖民活动尚未对东北亚整体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

这一时期，沙俄在东北亚的扩张影响深远。1653年沙皇遣使臣进京，“妄想要清朝皇帝对俄国称臣”，在准备进京送达中国皇帝的信中称：沙皇“他以圣谕命令你沙姆沙汗（即顺治皇帝）率领你的全族和所有达斡儿酋长们接受国君的统治，终身为他的奴隶”。<sup>①</sup>《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沙俄并未信守条约，而是在等待时机，以图重新染指中国的黑龙江流域。鸦片战争后，沙俄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俄国人可能在1637年才意识到日本的存在，<sup>②</sup>但直至18世纪早期仍未确定它的准确地理位置。1733年，俄国政府开始组织日本勘察队。1739年该船队从鄂霍次克出发，沿千岛群岛南航，于次年6月抵达日本本州东北海岸，并在海上同当地居民进行了贸易，这是俄国人第一次直接接触日本。半个多世纪后，俄国人于1792年以礼送日本漂流幸存者为名，才踏上日本国土，双方开始了正式接触。

由于德川幕府仍实行“锁国”政策，俄国在同日本建立通商关系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转而向日本千岛群岛殖民。<sup>③</sup>1795年俄国遣

---

①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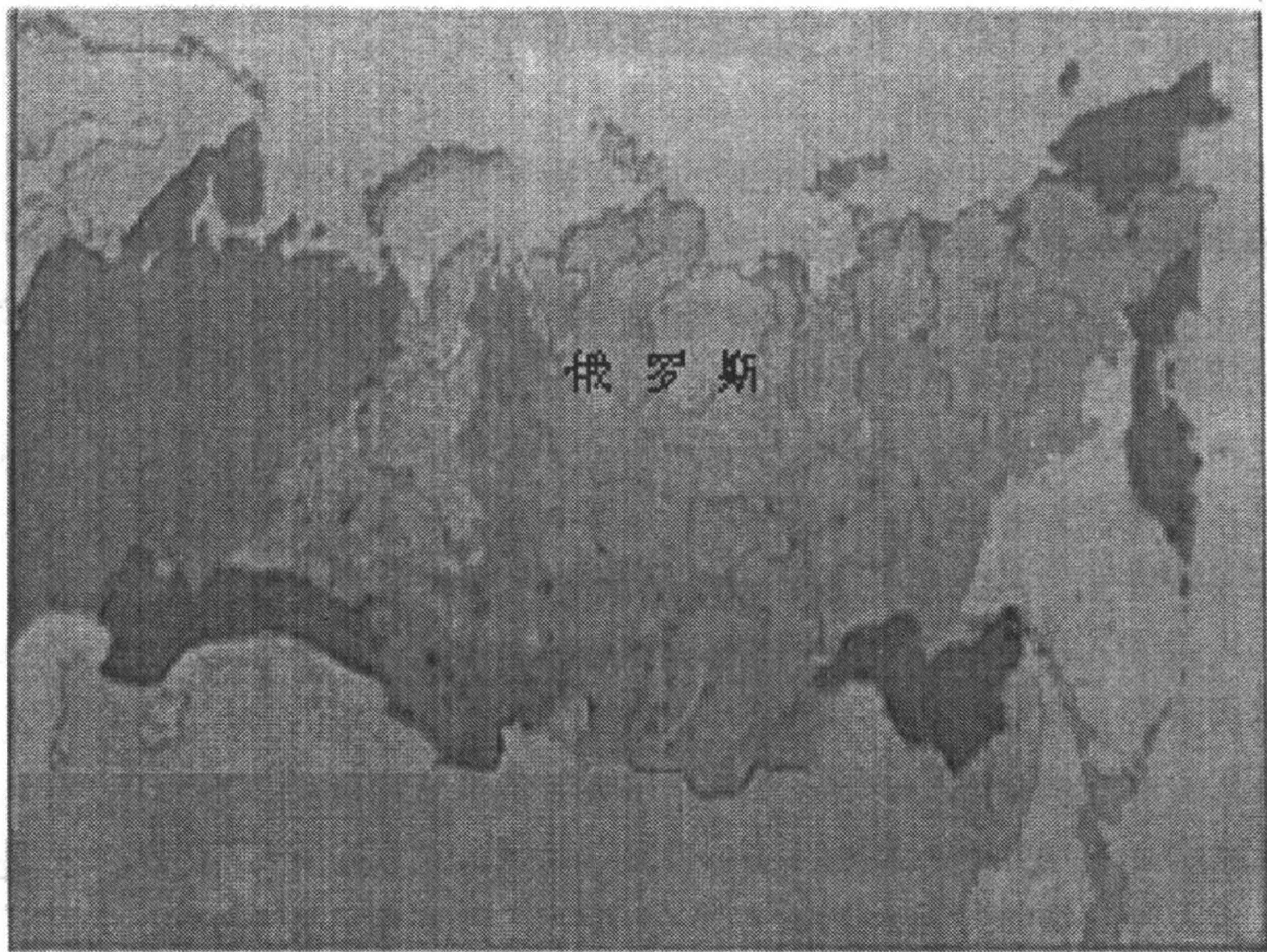
② 黄定天：《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③ 17世纪中期，日本已对千岛群岛行使主权，比俄国人进入该群岛至少要早一个世纪。参见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 东北亚史

送第一批移民定居中千岛的得抚岛，并企图通过移民长期占据该岛。俄国的领土野心，激起了日本朝野的强烈反响。1799年起，幕府将虾夷地（即今北海道）和南千岛由藩领收归直辖，增强防备，加快开发，<sup>①</sup>并禁止当地居民前往得抚岛贸易，迫使俄国人于1805年撤离该岛。从这一年起，得抚岛就成了日本北方与俄国实际边界的标志。<sup>②</sup>

### 1800年前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根据《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62页改绘（出版信息）。

① 刘建强：“江户幕府的虾夷地政策与俄国南下”，载《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② 黄定天：《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但俄国人撤离得抚岛后，其侵略行径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加猖獗。他们采取海盗的手段，劫掠南千岛的择捉岛，袭击在中国库页岛的日本人，企图以暴力手段迫使日本开关通商。对此，幕府针锋相对，于1808年发布“驱逐令”，命令如发现俄国船只，一律驱逐，若敢靠岸，立即逮捕或处死。1811年俄国人又赴择捉岛、国后岛“勘测调查”，被岛上守备队收捕7人。幕府藉此严申，“此后俄罗斯船只在虾夷地无论到达何处，纵使似漂流而来者，亦须无情驱逐，决不允其登岸。”<sup>①</sup>日本的强硬态度，使俄国的西伯利亚当局甚至制定了远征日本的计划。由于此时俄国正面临着拿破仑大军的威胁，无暇东顾，该计划才未能实施。此后40余年间，俄国人基本停止了对日本北方诸岛的侵扰，其在东北亚的扩张进入了短暂的蛰伏期。

从总体上看，西方殖民势力对东北亚的渗透，孕育着近代东北亚各国的民族危机。特别是沙俄的东扩，最终使之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东北亚封贡体系由此遭到破坏。鸦片战争后，在日本的挑战和西方及沙俄势力的内外夹击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封贡体系迅速走向衰落。

---

<sup>①</sup> [日]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 第三编

转型与博弈（1840—1945）



## 导言

如果说 19 世纪以前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变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东北亚区域的传统演进轨迹，那么，随后的百年历史则表明，区域外力量大规模地介入和区域内力量分布决定性地转移，最终改变了东北亚。简言之，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东北亚处于转型与博弈之中，在东北亚各国内部、东北亚各国之间以及东北亚与区域外的互动中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东北亚各国内部，由于变革速度不同，结果迥异。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经自上而下的改良变法、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王朝崩溃。然而，中国随后陷入四分五裂的动荡，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徘徊于锁国与开国、大院君集团与闵妃集团的矛盾之中，或推行内修外攘，或实施有限开国，内争不断，外患频仍，在经历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后，朝鲜继续探索国家独立之路。日本在大规模变革之前，地方变革已经开始；全国性变革建立在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变革是以打碎传统的将军权力中心而构建传统的天皇权力中心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变革受到恢复传统的支持而不是强烈的排斥，这使新的技术、制度、文化进入日本后更容易找到发展的空间。倒幕运动后，日本明治维新变革显著，国家实力大增，对外侵略不断，军国主义色彩渐浓，最终建立起法西斯体制。而俄国（苏联）的东北亚部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及地理位置，既与东北亚存在着联系，又深受其欧洲部分的影响，发展的轨迹具有极大的跳跃性。俄国通过扩张将疆域延伸到东北亚后，其东北亚部分历经沙皇俄国、远东共



和国以及苏联时期，沧桑几度。

由于各国变革速度差异的积累，导致东北亚区域各国关系和区域秩序发生变化。日本逐渐崛起，不断对中国、朝鲜发动侵略，与俄国及其他列强展开地区争霸。区域内力量的分布重心也逐渐转向日本，继区域外力量从外部冲击东北亚传统封贡体系之后，日本开始从内部冲击东北亚区域秩序。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标志东北亚传统封贡体系开始瓦解。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标志东北亚传统封贡体系进一步瓦解。因中日在朝鲜的矛盾激化，甲午战争爆发，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标志东北亚传统封贡体系最终瓦解。随后，日本通过武力进一步确立它在东北亚国际体系的核心地位：不断强化对朝鲜、台湾的殖民统治，入侵俄国远东地区，炮制伪满洲国，全面侵华，直至走向太平洋战争，东北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

随着东北亚各国内部、各国之间关系及区域秩序的变化，东北亚与区域外的互动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作为影响东北亚的一个重要变量，欧美列强一直参与着本地区的历史演变。继鸦片战争从外部冲击东北亚区域秩序后，它们开始推行不断调整的均势政策，联合一方打击一方，从中渔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纷纷组建同盟，俄法同盟、日英同盟建立，中国、朝鲜被迫卷入其中。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德国逐渐接近并支持日本，日德之间形成轴心国同盟。中苏关系因日本的侵略而接近。在日德同盟的刺激下，日本的侵略范围跨出东北亚，中苏美英形成对抗日德同盟的反法西斯同盟。

## 第五章 西方冲击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19世纪中叶，西方开始冲击古老的东北亚。中国、朝鲜、日本被迫开国。鸦片战争之后，东北亚各国纷纷探索图强之路。但是，变革的速度和结果迥异。继西方列强从外部对东北亚封贡体系冲击之后，变革成功的日本开始从东北亚内部对封贡体系进行冲击。内外作用下，东北亚传统秩序最终崩溃。西方列强为了在紊乱的东北亚获得更多的利益，纷纷推行结盟政策，东北亚各国也自觉和不自觉地卷入其中。

### 第一节 西方世界对中国、朝鲜的冲击

19世纪中叶，东北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西方，西方从外部冲击传统的封贡体系。由于中国处于体系的核心，因此在西方与东北亚的冲突中首当其冲。现实迫使东北亚各国开始变革。

#### 一、西方的兴起

19世纪中叶，当东北亚还沉浸在古代的迷雾中时，西方已经通过基于科学技术突破的工业革命及政治革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进行着全球性扩张。

西方的兴起是以西欧为核心开始的。西欧是一个二元特征很强

的区域，即在其内部，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两种体制以及两种文化，即教权与俗权两个权力中心，相应的是宗教管理机制和世俗的管理机制，以及基督教文化和深受基督教影响、古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世俗文化。因此，当西欧内部出现变革的因素时，二元特征的地区为其提供了生存的机会或空间。

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世界，科学技术在 18、19 世纪取得进一步突破。在能源和动力方面。1746 年，莱顿大学发明了能够储存和释放电能的“莱顿瓶”。受此启发，1753 年，美国人富兰克林经过试验，发明了可在实际生活中预防雷击的避雷针。1769 年，瓦特获得了蒸汽机的专利权，蒸汽机走进生产、交通等领域并不断得以改进。于是，继人力、畜力、自然力之后，又出现了蒸汽动力。在化学方面。1755 年，约瑟夫·布莱克成功地分离出二氧化碳。1781 年，亨利·卡文迪证明水分子的具体成分是氢和氧。随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分离出氧。18 世纪末，法国的安托万·洛朗·拉瓦锡经过反复试验，发现所有物质在实验前后除了构成物质的元素组合变化外，其他都没有变化。1789 年，他出版了《化学大纲》。随之，有机化学也出现了。在动植物学、博物学及生物学方面。约翰·雷对植物、动物进行了细致科学的研究，出版了《植物史》、《昆虫史》等专著。卡尔·冯·林奈进一步对动植物进行科学的分类。博物学家布丰写出了 36 卷的《自然史》，对自然界进行了全面而大胆的研究。1859 年，达尔文在经过长期的实际考察和研究之后，发表了《物种起源》，揭示生物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引起了生物学颠覆性的革命。

西方科学技术突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突破本身。因为，任何区域都存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与同期东北亚相比，西方除了具有深度上、数量上、领域上的巨大优势外，一个引人瞩目的不同是：西方科学技术革命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然后又应用于实践的科学技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很快应用到生产领域，出现了工业革命，而

工业革命的巨大需求和刺激，使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

当蒸汽机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良后，整个西方工业的优势就逐渐奠定下来了。新式的动力和新式的机械最终打破了家庭生产和小规模手工工场，建立起大规模的近代工业。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带动西方对钢、铁、煤的需求猛增，而原材料的需求和产品的大量产出，又对交通及通讯提出巨大的要求。以英国为例，1770年，其煤和铁的产量分别为600万吨和5万吨，1800年则为1200万吨和13万吨，1861年则达到5700万吨和380万吨。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改变了陆地交通。1838年，英国的铁路里程时500哩，1850年是6600哩，1870年则达到15500哩。<sup>①</sup>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福尔顿的蒸汽动力船试航成功。蒸汽船开始支配水上交通。频繁的经贸往来以及人类对距离的征服促使通讯领域的革命，电报被发明出来。19世纪60年代，横跨大西洋的洲际海底电缆铺设成功。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交相促进，西方的经济日益产业化。西方经济的产业化表现为：年生产量的递增加速，现代企业组织的建立，以及市场网络的建立，等等。

西方的工业革命在改变了西方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西方的精神和政治世界。西方社会的分化加快，从变革中受益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构建新的政治。因此，西方政治革命出现。西方政治革命主要体现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及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以推翻原有封建王朝统治开始，经过了内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以及王朝复辟、光荣革命等阶段。英国革命对西方的巨大贡献之一是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王虽然被保留下来，但议会拥有制定和废除法律的权力，而其他机构对议会没有约束和否决权。此外，

---

<sup>①</sup>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290页。

议会还享有对行政和财政的监督权，等等。美国革命以摆脱殖民统治开始，经历了抵制英货、武装反抗殖民统治、建立美法同盟、取得战争胜利和制定美国宪法等过程。美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之一在于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根据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洛克等思想家的权力对立学说，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由国会、总统、法院分别行使上述权力，力图达到制约与平衡。同时，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为联邦制国家，联邦地位高于州的地位，联邦和州实行分权的制度。法国革命以召开三级会议开始，经历了君主立宪派统治、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派专政、热月党的统治以及拿破仑统治，等等。法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之一在于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原则：宣布人权是天赋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确立了“人民主权”和“权力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提出了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等法制原则。同时，法国还公布了以民法典为核心、包括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成文法体系。西方政治革命表明，打破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权力的集中化与分权化并行，以法治而非传统人治管理国家等，这一切为近代国家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军事革命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坚硬的外壳。基于科学技术突破的工业革命使火力革命成为可能：“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前膛枪炮（雷管、来复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做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

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sup>①</sup>而工业化和政治变革使军事动员、军事后勤等能力的提高成为可能。工业化在提高了西方的生产能力的同时，使西方获得了投资军事的资本和强大的后勤供应。政治变革使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西方获得了稳定的兵员和有效组织的军队。

总之，基于科学技术突破的工业革命、政治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革命，其巨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强大、有威力的西方，更在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不同类型的西方。19世纪中叶，东北亚正是面临着就是这样一个不同的西方。

### 二、鸦片战争与中国的危机

西方已经兴起，然而作为东北亚的大国，清王朝仍在颓势中维持着统治。王朝的经济基础是相对稳定的灌溉农业，广阔的疆域减少了因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从而保障了基于农业的赋税。王朝的政治基础是科举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体系，如同农业的季节性耕作一样，定期举行的科举，在理论上使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被选拔上来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服务于朝廷的官僚，这种政治运作是单一的：形式的单一，科举考试；知识的单一，四书五经；其政治结果也是单一的，对皇帝的忠诚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央集权。地广物丰、劳动力资源充足和松散但有效的中央集权，在保证清王朝可以自给自足的同时，也压制了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愿对财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寻求科技发展。”<sup>②</sup>例如，它可以通过权力调度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完成庞大的工程，从而压缩了技术创新的空间。而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基础的单一农业，政治基础的单一科举，文化基础

---

<sup>①</sup> [美]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4页

<sup>②</sup> [美]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4页。

的对单一儒教的强调，则压制了制度的创新。因此，当中国需要变革时，与西方不同，新的技术、制度、文化在这里很难找到发展的空间，它们总是受到强大的单一传统的抵制。于是，人们看到近代中国的变革是漫长的从调整到重构。缺乏创新的清王朝在西方兴起之时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龚自珍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市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sup>①</sup>

19世纪中叶之前，西方陆续完成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普鲁士、美国等国，纷纷来到东北亚。从1794~1853年30，欧美国家到日本的活动有记载的就有19次，其中俄国8次，英国8次，美国3次。从1824-1853年这30年间增加到29次、其中俄国6次，英国11次，美国10次，法国2次。<sup>②</sup> 在与中国进行接触的西方国家中，以英国最为积极。英国侵占印度后，把印度视为进军东北亚的基地，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那里抽调兵力，却不花一文。”<sup>③</sup> 然而，当英国站在东北亚的大门时，它发现自己在最初的对华贸易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以文明之国自居的英国竟然开始以鸦片这种毒品为其开辟中国市场。

最初，鸦片贸易在中国是非法的、小规模。但是，随着英国意识到鸦片贸易巨额利润和它对于扭转中英贸易局面的作用后，毒品鸦片对华输入畸形增长。对英国而言，鸦片贸易换来的是中英贸易的“繁荣”；对中国而言，它却严重损害了本来就已经处于衰世的

---

①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② 黄定天：《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③ [美]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4页。

清王朝。当时中国吸食鸦片上瘾者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其总数在200万至300万之间。如果假定一天的劳动收入为100钱，吸食鸦片的费用则为80至120钱。<sup>①</sup> 鸦片贸易以白银为交换手段，一方面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一方面导致国内对白银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民众困苦。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魏源这样描述到：鸦片“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sup>②</sup> 鸦片在侵蚀清王朝的社会风气的同时，也重创了它的社会控制能力。在清王朝，从高级官吏到低级士兵，吸食鸦片者不乏其人。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sup>③</sup> 而为鸦片收受贿赂，则大行其道。尽管官场的丑行与官僚政治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马克思还是以辛辣的笔锋刻画了这种现象对清朝统治机制的腐蚀：“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sup>④</sup> 下层的绝望和上层的堕落使清王朝世风日下。

严峻的形势终于引起士大夫们激烈的争论，道光皇帝决定对鸦片贸易行为进行反击。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派到鸦片走私最为严重的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开始希望从事走私的外国鸦片贩子主动交出鸦片，并写下保证书，但他很快发现这是徒劳的。于是，林则徐派兵包围鸦片贩子居住的商馆，迫其上缴鸦片。从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缴获的2万余箱鸦片。中

---

① [日]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64页。

②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8页。

③ 齐思和、林树惠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国认为在禁止鸦片贸易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正当的中英贸易，但是，英国显然认为终止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是不能接受的，中英贸易之门短暂恢复后又关闭了。英国做出反应，外交大臣巴麦尊表示：“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sup>①</sup> 经过秘密准备，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为全权代表兼侵华英军总司令。1840年6月，一支东方远征舰队出现在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近代东北亚地区与西方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鉴于广东一代中国军队早有准备，英军利用其海军的机动性，沿海北犯。英军攻破定海，到达天津白河口，朝野震惊。道光皇帝改用主和的琦善代替林则徐，并颁布开放烟禁上谕。琦善与英军就割让香港、赔款及开放广州的谈判，重新激怒了道光皇帝，英军也对谈判结果大为不满，战争开始升级。英军袭击广州，进攻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台湾、宝山、上海、镇江；清政府又分别派奕山、奕经率军抵抗。然而，中国的落后在被工业化组织起来的英军面前暴露无疑。仅就军事装备而言，清朝的军队还处于冷兵器时代，而工业革命则使英军享有火力和机动性的巨大优势。尽管清军也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勇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战争的结局对清王朝而言是悲剧性的。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是：废除传统的“公行”制度。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元。中国海关对英国货物的定税需同英国协商。1843年10月，中英又签订了《虎口条约》，该条约又使英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居住及租地权、对中国的海关税率的部分控制权。

---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近代史资料》，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暴露了清王朝虚弱的本质，而中英《南京条约》成为这个庞大而老朽帝国肌体上第一条流血不止的伤口，激起了其他列强的贪欲。1844年7月和10月，美国和法国分别迫使中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随后，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一拥而上，一体均沾。

无疑，中国和列强都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心存不满。清王朝对外丧失的是巨大的权益和尊严，对内则丧失了统治的权威，内外作用下，太平天国运动从民间层面对清王朝的统治发起了挑战。列强对自己仅能在五口行动表现得越来越难以容忍，进而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全境开放、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进一步的要求。1856年，英国和法国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父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末，英法联军攻克广州。次年4月，北犯天津，攻陷大沽。清政府被迫派代表赴天津议和。美俄两国从中调停，坐收渔利。6月，中国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1月，中国又与英、法、美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859年6月，英法以换约为借口，再起战事。一度北犯并占领大连，封锁渤海湾。1860年9月，咸丰皇帝以“秋狩”为名逃往热河。10月，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控制了北京。古老帝国的首都遭到了野蛮的劫掠，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进一步明确了鸦片贸易合法化，列强获得了公使常驻北京、增加通商口岸、扩大外国人在内地的活动、强化对中国关税的控制权等一系列权益和巨额的赔偿。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古老的社会陷入危机之中。作为危机的两个产物，中国在民间及朝廷两个层面做出了反应。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内部已经是危机四伏，导致这种灾难性局面的，除了传统因素自然灾害与朝廷的腐朽统治外，还包括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世界变局的冲击。因此，普遍的社会不

满在帝国内部蔓延，甚至出现了小规模起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太平天国为核心的人民反抗运动爆发了。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是洪秀全。洪秀全最初的人生可以称为中国传统社会危机的缩影：出身于农民之家，苦读诗书，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而事实上，农业和科举作为清王朝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之一，已经严重落后了。于是，洪秀全屡试不中，精神与生活的痛苦使他感到愤懑。在失意中，洪秀全偶尔接触了基督教的宣传手册《劝世良言》，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洪秀全把传统宗教和基督教相糅合，作为指导思想；创作了《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为经典；以“拜上帝会”为组织；以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骨干；以贫困不堪的农民为基础，于1851年1月，发动金田起义。起义军从广西出发，仅用两年多的时间，便席卷6省，1853年3月，攻占南京并定都于此，改称天京，与清王朝分庭抗礼。随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它的治国方略《天朝田亩制度》，实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强调男女平等，官制上实行等级世袭制。1859年，从香港回来的洪仁轩又提出新的治国方略《资政新篇》，强调法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文明开化、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等。但是，《资政新篇》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余年，席卷半个中国，最后，在内部争斗以及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鸦片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在外患频仍、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局面下，一场危机在清王朝的政治核心紫禁城内酝酿着。1861年8月，被迫逃往热河行宫的咸丰皇帝在失意中病逝，年仅6岁的载淳继位，年号“祺祥”。朝廷内部迅速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以载淳生母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和恭亲王奕訢等为首，在内政上主张垂帘听政，对外主张以礼相待、以信义笼络。一派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为首，在内政上主张以先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总理朝政，对外主张继续维持天朝威严。10月，在奕訢

的支持下，慈禧派剥夺了载垣一派的人事权和兵权。11月，反对载垣派的权臣进一步集结力量，握有兵权的兵部右侍郎胜保、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也站在慈禧派一边。随即，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大臣遭到捕杀，大清改年号为“同治”，是为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不仅仅是清王朝的一次内部权力斗争，更由于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备受瞩目。当时中国处于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中，如何应对这场变局，清王朝权力核心的人物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奕訢等在与西方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学习、进行变革的迫切性。早在1861年初，以奕訢为首，上奏《统筹全局折》，提出自图振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政变后，奕訢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以其权势与变革思想，一时成为举办洋务的领军人物。慈禧等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地位，拉拢奕訢，并进一步起用地方实力派：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这些地方实力派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亲身体会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变革之意、学习之心浮动于表。起用地方实力派，在客观上为清王朝日益没落的统治机器注入了一些新力量，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另外，辛酉政变后掌权的集团对西方相对顺从，得到了西方势力的一定认同。政变后，清政府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在激烈的争论中开始了学习西方、自救图强的洋务运动，以挽救濒于崩溃的清王朝统治。

调整机构，建立适应洋务的部门。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业务涉及外交、关税、铁路、矿山、军火等诸项事宜，总理衙门成为清政府管理洋务的机构。随即，设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最初负责天津、牛庄、登州三个通商口岸的业务，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改为北洋大臣，主管直隶、奉天、山东三省的通商及交涉。60年代初，设立总税务司署，管理全国海关业务，但该部门名义上隶属于总理衙门，实质上为欧美操纵。

组建新式陆军、海军。洋务派认为之所以在战场上败于西方，

在于技术、器物不如西方。因此，对军队建设尤为关注，这成为洋务运动初期的核心。在陆军方面，重视京畿及沿海口岸，聘用西方教官，使用洋枪洋炮，组建新式陆军。分别在天津组建洋枪队、在北京组建“威远队”、在直隶成立“练军”。这些京畿一带的新军多在西方的军官指导下训练。随后，把天津练兵的经验向上海、广州、福州等口岸推广。地方的主力湘军、淮军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实战中引进西洋武器、效法西洋作战方法。在海军方面，组建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堪称清王朝的主力海军，无论是在经费，还是在舰艇数量上，均居三支海军之首。北洋水师在旅顺、大连、威海卫等地设防。

兴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军队建设需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支撑，军事工业提供武器军火，民用工业提供资金物资。1861年和1862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分别在安庆、上海创办军械所、洋炮局，这是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开始。随后，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等二十余个军事企业纷纷建立。一些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人自办的民用企业也不断出现，例如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商人自办的南海继昌隆机器丝制厂和上海同文书局等。这些军事及民用工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尽管举步维艰，受制颇多，但还是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内开启了近代工业的先河。

培育洋务人才。无论是组建编练新式军队，还是举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都需要熟练掌握西方语言和近代科技的人才。1862年，在北京成立同文馆，成为洋务派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学习英、法、俄、德、日等国语言，开设算学、化学、医学等专业。后来，在广州、上海、台湾等地也开设了语言学校。洋务运动期间，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

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洋务运动，中国社会经历着缓慢的变化。王朝权威受到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降低。在镇压民众反抗中，一批地方实力派出现。自然经济虽然开始无可挽回的衰落，但是新的产业化经济却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一批主张正确看待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家和学者出现，但受到保守势力的挤压。因此，中国虽然进行了洋务运动，但与邻国日俄相比其进步是极为缓慢的。1884、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对洋务运动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中国及整个东北亚处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 三、朝鲜的变革和衰落

自从中国以清代明，朝鲜就以继承儒学的惟一国度自居，自称“小中华”，推崇朱子学，强调思想上的统一，所谓“五百年来只知有朱子”、“朱子学一尊主义”。<sup>①</sup>两班身份制度，重文而轻武，鄙视农工商贾。与中国的变革相似，新的思想、文化与制度一直受到传统的强烈排斥。

19世纪中叶，朝鲜国内已经陷入危机之中。人才流通渠道被打乱，以门第或党派选用官僚，科举制形同虚设，丰壤赵氏与安东金氏交替干政，王权衰落。同时，西方的冲击也逐渐波及这个东北亚腹地的国家。一方面，基督教在朝鲜传播，开始冲击儒家文化。1839年，朝鲜对基督教进行镇压，捕杀教徒，史称“己亥邪狱”。朝鲜此举也是针对基督教冲击中国所采取的反应。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令朝鲜震惊的消息不断传来，朝鲜官吏一再声称：“西洋人人中国者，播传邪教，陷溺人心”，“彼中邪教，侵袭民间，为患渐炽”。<sup>②</sup>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法国及美国的军舰

---

<sup>①</sup> 李昌植：《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9页。

<sup>②</sup>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14页。

不断侵扰朝鲜。1845、1855年，英国军舰测量济州南海、釜山港等地；1846、1847年，法国军舰侵扰朝鲜海岸；1852年，美国军舰勘测庆尚道东海岸。朝鲜已为列强所环肆。

1862年，朝鲜国王哲宗去世，由于其无嗣，以旁系李熙即位。李熙年幼，由其生父大院君李昞应摄政。此时的朝鲜与自己的东北亚邻国一样更加难以独善其身了，内忧外患进一步出现。新君即位的同年，晋州爆发起义，很快波及三南地区。具有宗教色彩的“东学道”开始在民间流行，它类似于太平天国运动，表达民众对内政和外交的不满。尽管在1864年该运动的领导人崔济愚遇害，但这种普遍的不满却蔓延得更加广泛。

60年代初，欧美开始侵扰大同江和江华岛，朝鲜历史上称之为“洋扰”。西方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进一步引起主张通过封闭以维持传统的大院君的极度不安，大院君把打击目标再次锁定在基督教上。而此时，普通民众对国内经济政治的不满也因西方势力的持续介入而有增无减。因此，朝鲜再次出现了排斥基督教的运动。民间攻击传教士和西方人，大院君则命令搜捕基督教徒，一些教徒被捕、被杀，其中有若干名法国传教士被处死。1866年，由罗兹率领的一支法国舰队被派往朝鲜，试图报复并迫使朝鲜就范。法军炮击江华岛，由于朝鲜激烈的抵抗以及法军缺乏登陆部队，朝鲜击退了入侵者。同年，美国舍门号船向平壤城开炮，愤怒的民众进行反击，烧毁了舍门号。

尽管在大院君领导下的朝鲜暂时挫败了西方势力的入侵，但是，面对列强的压力以及鸦片战争、近邻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倒幕运动的影响，朝鲜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当时主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主张开国，主要代表人物是吴庆锡、刘宏基、朴珪寿等人。一是要求继续锁国，以大院君为代表。由于后者掌握着朝鲜的实际权力，因此，朝鲜开始在国内推行内修外攘的调整。

为了加强王权，大院君力图清除长期执掌实权的外戚贵族，标

榜以才选官，扶植听命于王权的力量。对时常干预朝政、培育地方势力、分利于朝廷的各地书院，给予打击和压制。在军事方面，加强中央对军队的统一管理，提高作战能力。1865年，撤销备边司，建立管理全国军务的三军府。有重点地强化地方防卫，在北方边境设置军屯，提高京畿一带的防御能力。为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开始扩充兵力，在军队中部分地使用步枪，且规定士兵不可乘车，以保持古代军人尚武之风。在经济上，进行税制变革，发行新币。为增加军事投资，减轻民众负担，把一部分军布改由两班贵族交纳。1866年，朝鲜开始铸造新币“当百钱”。然而新币一发行就贬值，引起全国金融的混乱。为了摆脱困境，朝鲜从清朝购买清钱，以求稳定物价。结果两种货币在朝鲜流通，物价、金融的混乱愈演愈烈。对外，继续打击基督教在朝鲜的传播，禁止洋货在国内销售。大院君宣布：“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sup>①</sup>他命令把这一内容镌刻于碑上，矗立在朝鲜各地，以警示民众。同时，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封贡关系，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往来。1869年6月，德国政府“试图通过一位伴随德国使节的日本官员的媒介来打开谈判之门”，釜山的朝鲜官员“认为通过一个日本人来传递这种信息是非常唐突的”，<sup>②</sup>拒绝了德国的要求。1871年5月，美国上将鲁籍寿率领舰队，与美国驻北京公使及其属僚一起抵达江华岛海面，其测量船遭到了朝鲜炮击，在朝美的一次函电往来中，“附有一件朝鲜王致北京礼部咨文的副本，在那本咨文中，朝鲜请宗主国为他排忧解难”。<sup>③</sup>

---

① [朝]李清源著，丁则良、夏禹文译：《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2页。

②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页。

③ [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事实上，带有宫廷权力斗争和面对内忧外患寻求变革意味的大院君改革引起了新的不满，另一批要求一定程度开国的统治阶层开始活跃起来，他们逐渐得到了反对大院君的权力集团的支持。

70年代初，国王李熙的闵妃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实力，在她的操作下，迫使大院君隐退，李熙亲政。由于闵氏集团吸纳了一部分所谓“开化派”，因此，朝鲜在大院君之后开始了开国色彩较浓的改革。然而此时，明治维新初见成效的日本开始对朝鲜进行不间断的侵扰，在改变了朝鲜历史的同时，也改变了东北亚的历史。

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向朝鲜派出军舰，炮击江华岛，要求朝鲜开国。朝鲜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议，一派主张开国，避免战争；一派主张对日强硬，反对开国。最后，朝鲜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于1876年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根据该条约，朝鲜除开放釜山外，还增加新的开放口岸元山、仁川；日本人在朝鲜犯罪由日本审理，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日本可以随时测量朝鲜海岸等。《江华岛条约》成为朝鲜近代史中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正如中国遭遇鸦片战争之后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一样，对朝鲜而言，《江华岛条约》同样开启了恶劣的先例，列强群起效仿。1882年5月，美国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修好通商条约》。随后，英、德、意、俄、法、奥、匈、比利时、丹麦也与朝鲜签订了相似的条约。

在屈辱的条约以及日本对朝鲜的影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闵妃集团继续推动改革。在内政上，提倡发展经济，刺激民族资本，调整军政机构。1878年，在釜山附近的毛头镇设立税关，但在日本的抗议下随即取消。1881年，设立总理衙门，由12司改为7司。同年，把军制由五营制改为壮御二营制，并组建“别技军”，由日本提供武器、教官。在外交上，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并三次派出修信使到日本，考察明治维新。

虽然朝鲜在不断被迫进行变革，但是其国内的传统势力依然强大。1876年，以朝鲜修信使身份从日本归来的金绮秀在《日东游

记》中记载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在日本期间，日本文部大丞九鬼隆一问他：在朝鲜国是否只是崇尚朱子？金绮秀回答说：朝鲜国的学问五百年来只知有朱子。如果有人与朱子学背道而驰，立即会被当作乱贼诛杀。甚至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如果有人不小心引用了佛氏或老子的话，也将立即被流放。<sup>①</sup> 足见朝鲜国内传统力量之大，对变革的掣肘可想而知。然而，随着变革，朝鲜社会也发生着缓慢的变化。在仁川，电话、电信等出现，从仁川到汉城，修建了朝鲜的第一条铁路。80年代初，朝鲜开始推行近代化教育，由国家创办和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纷纷建立。

闵氏集团的掌权和推行改革，不仅引起了与其对立的大院君集团的不满，也引起民众及士兵对日本不断干预朝鲜内政的不满。1882年7月，朝鲜民众和士兵火烧日本驻朝鲜的公使馆，日本驻朝公使逃回日本，国王和闵妃也被迫出逃，是为“壬午兵变”。大院君集团趁机再度掌权。日本以宣战相威胁，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即《仁川条约》）。该条约除了要求朝鲜进行经济赔偿外，还使日本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扩大元山、釜山、仁川口岸的范围，增加开放杨华镇等。《济物浦条约》表明，朝鲜进一步受制于日本。

“壬午兵变”后，大院君集团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清朝的支持下，闵氏集团重新掌握了朝鲜的权力。闵氏集团主张依靠清朝，继续维护封建统治秩序，10月，签订《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而以金玉均、朴泳孝等为代表的“开化派”则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一步变革。金玉均深受早期提倡开国的朴珪寿的影响，主张朝鲜摆脱传统“小中华”观念的束缚，求知识于世界，开国变革。朴珪寿曾一边转动自制的地球仪，一边对金玉均等人说：今日中国

---

<sup>①</sup> 李昌植：《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在何方？转至彼处则美国变为中国，转至此处则朝鲜变为中国，任何转至中央的国家都可变为中国。<sup>①</sup>

两派斗争激烈，国内变革缓慢推进。在此时期，朝鲜出版了《汉城旬报》，向国外派遣了留学生。1883年，关于是否制造和流通新币“当五钱”问题，进一步激化了两派的矛盾。反对制造新币的金玉均被迫辞职，而闵氏集团重新掌权也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一场新的政变开始酝酿：主张依靠日本实现朝鲜进一步开化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日本的支持下，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推翻闵氏集团，由他们来掌握政权。1884年12月，金玉均等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利用京城邮政局开业的机会，发动甲申政变，挟持国王，捕杀政敌。次日，政变者公布施政方针。然而，首都失去控制，中国驻朝鲜的军队开始采取行动。金玉均等见政变失败，随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逃往日本。1885年，日本再度迫使朝鲜就此事向日本道歉、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等。甲申政变后，中日在半岛的对立日益激烈，朝鲜进一步沦为东北亚政治风暴的中心。

## 第二节 明治维新与日本的崛起

日本与中国、朝鲜的变革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大规模变革之前，日本的地方变革已经开始；全国性变革建立在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变革是以打碎传统的将军权力中心而构建传统的天皇权力中心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变革受到恢复传统的支持而不是强烈的排斥。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东北亚内部冲击封贡体系，迅速崛起为地区强国。

---

<sup>①</sup> 李昌植：《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 一、幕末的动荡

尽管日本同中国、朝鲜一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日本与中国、朝鲜在政治结构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自武家政治之后，日本是一个二元政治结构的社会，主要体现为将军与天皇的并立，一方面将军在相当长的时间段中明显占据上风，另一方面天皇的最高权威地位从未淡出。

早在7世纪中期，天皇通过大化改革，以公地公民代替私地私民的班田制为经济基础，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一元体制，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此时武士虽未登上历史舞台，但在日本社会里对天皇的忠已经出现了。8世纪中叶，诗人大作家持就曾写道：“世代为官在朝廷，卫皇不顾死与生，人海为尸水底沉，人山为尸卧草根”，“人子不绝祖名声，进言奉职忠吾君”。<sup>①</sup>但是，随着公地公民向庄园私有化的转变，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丧失，皇权衰微，武士的最高首领——将军逐渐建立起以土地私有制和依附农民为基础的武士政权，12世纪末，幕府将军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尽管由于将军握有经济及军事实权，皇权在数百年里形同虚设，但在日本仍存在着体制和观念的双重性：以将军为首的幕藩体制，以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将军的忠以及对天皇的忠。正如两个体制的不对称一样，以忠为核心的观念也是不对称的。然而，天皇一直是日本的君主，虽然在现实的世界中失去了权力，在精神世界里，其权威的合理性却一直矗立着。正如享保年间的获生徂徕在《政谈》中说：“天下的诸大名虽为将军阁下的家臣，但他们的官位均由京都的诏书和任命状下达，所以在大名当中，不能说没有心里认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君主的人。他们之所以服从幕府，主要因为暂时还畏惧幕府的权势。”<sup>②</sup>

<sup>①</sup> 杨烈译：《万叶集》，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2页。

<sup>②</sup> [日] 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日本的这种二元政治结构对后来日本近代化起了重要的影响：当武士对主君具体的“忠”的条件消失时，贫困化的下级武士就把具体的“忠”转移给了天皇，走向幕府、藩主的对立面，成为参与倒幕、力主维新的决定性力量。更为重要的影响是，与中国、朝鲜相比，日本的变革是以打碎将军的传统权力中心而构建天皇的传统权力中心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变革受到恢复传统的支持而不是强烈的排斥，这使新的技术、制度、文化进入日本后更容易找到发展的空间。因此，近代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相比，变革速度非常之快，对东北亚的历史发展而言，这个速度之差是决定性的。

幕府末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冲击开始挑战将军传统的权威，这与幕藩体制内部对将军的挑战相呼应，从而为天皇重返日本政治生活以及后来的明治维新进行了必要的准备。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舰船频繁地出现在日本沿海，而近邻中国因鸦片战争被迫开国，对日本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佐久间象山曾不解地问道：“周公、孔子之国被抢掠，究竟何故？”随着对答案的寻找，发展军事、开国通商的思想在日本出现了。高岛秋帆认为：小小的英国能战胜中国，其原因则是炮术的进步。主张普遍改革火炮，加强军事准备。<sup>①</sup> 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吉田松阴则主张开国通商，例如横井就提出：“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之理。”<sup>②</sup>

在危机面前，幕府试图进行变革。1841、1844年，水户藩德川齐昭和备后国藩阿部正弘分别出任首席老中，他们起用一批新人，对幕府统治进行改革。在吏治方面，对代官进行调整，规定代官任期满10年后方可调动，以使官吏熟悉地方、安心工作。对于农业，实行归田政策，鼓励农民开荒，强令没有迁移证的农民返回农村，安心进行农业生产。对于财政，大量铸造货币，1841—1842年铸造

---

① [日]井上清著，吕明译：《日本现代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8、21页。

②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页。

了170万两，1843年铸造了更多的货币。对于商业，1841年，取消了株仲間（有幕府执照的垄断集团）和间屋（批发组织），公布降低物价的命令。<sup>①</sup>在军事上，幕府任命高岛秋帆制造枪炮，改革军制；废除对各藩军事设施和造船吨数的限制，在各港口加强海防；从荷兰购入军舰和武器；在江户和长崎设讲武所、海军船习所，以荷兰人为军事教官。在文化上，打击有伤风化的文学，确立出版检查制度；设立洋学所，吸收学者，招收幕臣子弟和藩士子弟，不仅讲授西学，而且翻译西方书籍。

本来德川齐昭和阿部正弘的出发点是维护幕府体制，但是，事态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取消商业行会等组织的目的是降低物价，但这种行为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商品流通混乱，物价反而更高。放宽对各藩军事上的限制，目的是增强国防，但结果是各藩军事能力坐大，反而削弱了将军的力量。在此前后，西方对日本的冲击进一步增强了。

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领4艘军舰开进江户湾浦贺海面，要求日本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提出日本与美国通商、向美国提供煤炭食物补给等。正在病中的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接到美国国书的10天后死去。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鉴于此事关系国家命运，打破200年由将军专断国政的惯例，把美国要求开国之事通报天皇。这一事件表明，天皇开始重新出现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

1854年1月，培理率领7艘军舰再次开进江户湾神奈川。3月，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美亲善条约》）。该条约共12条，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美国派驻领事于下田，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等。《神奈川条约》是日本近代的第一个条约，日本从

---

<sup>①</sup> [美] 约翰·惠特尼·霍尔著，邓懿、周一良译：《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3页。

此开国。随后，英国、俄国、荷兰趁机迫使日本签订了日英、日俄、日荷《亲善条约》。1858年，在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的胁迫下，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新开长崎、新泻、兵庫（神户）为口岸，江户、大阪开市通商；美国人享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以及通商、信教自由和协定关税等权。随即，日本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是为安政五年条约。

幕府改革的缓慢和列强步步的紧逼，使将军与天皇的地位继续发生着变化。1857、1858年，阿部正弘和德川家定将军分别去世，堀田正睦和井伊直弼先后任首席老中。此时的幕府已经受困于改革，但批准安政条约和将军继承问题又接连出现。堀田正睦对是否签订安政条约心怀疑惧，1858年1月，亲自拜见天皇。而要求继承将军的两派争执不下，也纷纷赴京请求天皇的支持。同时，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以此为经济基础的幕藩体制日益松散，广大下层武士的生活也大不如从前，对幕府的统治日益不满，他们纷纷聚集于京都，寄希望于天皇。天皇的地位日益显现。

面对这种情况，以井伊直弼为首形成保守派，主张继续维持现有幕府统治体制，并决定加以回应。在没有天皇授权的前提下，井伊直弼断然批准了安政条约，指定德川家茂为将军。1858年至1859年，捕杀改革派。桥本佐内、吉田松阴等许多著名人士被处死，更多的人被判入狱，是为“安政大狱”。

“安政大狱”非但没有平息内部的混乱，反而促使更多的人彻底远离幕府，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形成尊攘派，公开支持天皇。尊攘派与守旧派展开更为激烈的争斗。1860年，井伊直弼在樱田门被刺杀。1862年，企图调和尊攘派与幕府关系的岛津久光派家臣在伏见“寺田屋”旅馆刺杀尊攘派有马新七等人。次年，“8月18日政变”和“禁门之变”后，幕府军队在英、法、美、荷军舰的支援下，大举进攻尊攘派的基地长州。下关失陷后，尊攘派进一步认识

到西方的强大，意识到片面的攘夷不切实际，转而主张开国倒幕。

当幕府处于内外交困、不能自拔之际，日本转化中的二元政治结构使幕藩体制日益松散，因此，日本的许多藩也开始改革，这使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和朝鲜的变革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在日本全国孕育更大规模的变革之前，以西南诸藩为代表的地方已经开始了先期的改革。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等逐渐转向“割据富国”，实行藩政的近代化变革。这种地方的变革既使各藩利益趋同为倒幕提供了条件，又为明治维新积蓄了力量和经验。自天宝年间开始一直到明治政府建立，各种改革在西南地方从未间断。在经济财政方面，各藩加强专卖制度，扩大与外界的商品流通，增收节支，量入为出，整顿武士债务，灾年减轻农民赋税。在文教科技方面，不拘一格，大量起用下级武士，翻译西方书籍，建立西式学校。在军事及工业方面，提出富国强兵口号，采用西式武器和训练方式，引进西方技术，建立近代工厂。50年代，该地区已经能够自己制造枪炮、蒸汽机等。60年代初，第一次征长战争失败后，长州、萨摩强藩提出“割据富国”，进一步推行藩政的近代化变革，并且因共同的变革使双方的利益趋同，最终结成两强藩同盟。在此时期，新式军队如长州藩的“奇兵队”成为军中主力。西南强藩开始向西方派出留学生，1863年，萨摩藩向英国派出森有礼等留学生，随后陆续不断。西南诸藩的变革为倒幕和明治维新既做了经济及军事准备，又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并称“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均出自西南地区。因此，当幕府与倒幕派再次对决的戊辰战争爆发时，倒幕派迅速击溃了幕府的军队，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向新政府投降。各种力量聚集在天皇周围，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改变日本从而改变东北亚的一场变革出现了。

可见，面临危机与变革，日本的二元政治结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变革受到传统的抵制，然而，日本的变革是在名义上的传统之上的变革。“日本摧毁了镰仓幕府时代以来的双轨制政府，并已



建立起新的统一国家。在紧急关头，天皇又回到了政府的中心。……旧的秩序在超然的、更古老的信念的名义下，受到攻击，而这种信念最有日本特色。”<sup>①</sup> 新的技术、新的制度甚至新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以重构传统天皇权威的名义而被很快接受。然而，传统不可能被丝毫不差的延续和复制，当它把新的技术、新的制度和新的文化注入自己的肌体后，出现的将是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

### 二、明治维新

1868年，倒幕胜利的日本由“庆应”改元“明治”，开始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多领域的大规模近代化变革。

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新政府有效地工作，这既是摆脱咄咄逼人的列强和蠢蠢欲动的国内不满势力的要求，更是进行变革的重要先决条件。对此，日本通过利用天皇的传统权威和削弱或引进藩阀的实力得到了解决。

1868年3月，以天皇的名义公布了《五条誓文》，这是明治政府广开言论加强中央集权、齐心协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求知识于世界振兴国家的施政纲领。4月，公布《政体书》，设太政官，其下设议政、行政、刑法三官，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权，试图建立起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行政权地位突出，远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1869年，模仿古代律令制度，中央设立二官六省（后改为八省），二官高于各省。设立与太政官并列的神祇官（后改神祇官为隶属于太政官的一个省，与其他省并列），其目的在于利用天皇的权威和古代祭政一体来加强新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sup>②</sup>

在利用天皇传统权威的同时，新政府通过削弱或引进藩阀实力

---

<sup>①</sup> [美] 约翰·惠特尼·霍尔著，邓懿、周一良译：《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3页。

<sup>②</sup>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的办法增强中央的实力。在地方上，德川家族大量的土地被没收，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隶属于中央的府、县，府、县等地方管理机构与各藩并立。随之，对各藩控制土地和民众的传统权力进行削弱。1869年，实施“版籍奉还”，即各藩主把土地和人民还给天皇代表的中央政府，各藩主任藩知事。随着中央权力的进一步加强，又实行废藩置县，免去原来的藩知事，藩知事、县令均由中央政府任命。在剥夺封建特权阶层权力的同时，给予藩主、武士以一定的经济回报，藩主还得到“华族”的特权身份。

日本新政府在削弱藩的封建权力的同时，也通过把强藩的人才、军力等引入新政府，以加强新政府的实力和对全国的控制力。根据实力原则，由于萨摩和长州力量最强，因此两派人物占据了新政府的主要部门，明治政府甚至被称为“萨长政府”。而由于萨摩和长州互相猜疑争斗，土佐、肥前以及其他政治势力又以它们为核心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派阀，由此在日本政界出现了“复杂的而且经常变动的联合关系”。土佐藩出身、时任参议的佐佐木高行在其日记中写道：“萨长互有猜疑。而且，佐贺人大隈成了长州帮、副岛成了萨摩帮，吾乡高知人后藤与木户最要好，板垣亦倾向于木户。”“今日之党派，可认为木户、大隈、后藤、伊藤、井上等为一派，大久保、副岛、岩仓为另一派。但副岛稍有附和之谦，而大久保决不屈从。”<sup>①</sup>派阀政治由此诞生。在把强藩的主要人物充实到新政府内之后，为了进一步把强藩的实力引入政府，加强新政府的控制能力，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胜等人的运筹下，1871年6月，萨摩四个营、长州三个营、土佐二个营外加炮兵队被派到首都，组成中央政府军队。中央实力的加强，为其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1871、1873年，日本进一步推进官制改革，完善政治体制。这样，中央政

---

<sup>①</sup> [日] 升味准之辅著，董国良译：《日本政治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4、105页。

府通过把天皇的传统权威与强藩实力的结合得以强化，为日本自上而下的变革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这与同期中国、朝鲜的变革差别是极为明显的：中国、朝鲜在变革时从未出现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对于后发展的国家而言，有效的政府在推进变革中的作用是显著的。

如果说明治政府主要通过对传统的利用获得了对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进行了行政上的变革，那么，明治政府则主要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经济制度，进行殖产兴业、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

1869年，在北海道设立“开拓使”，推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1870年，建立工部省，下设矿山、铁路、造船、电讯、制铁、土木工程等部门。工部省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的领导机构，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封建关系，为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基础的奠定以及殖产兴业提供资金支持创造条件，1871年，日本宣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1873年，公布地税改革法。然而，对于日本的明治政府而言，如何进行系统的经济变革仍处于摸索之中。因此，日本派出了规模庞大的岩仓使团，考察西方的文物制度。由于使团几乎涵盖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使日本对西方的技术、制度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对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岩仓使团回国后，日本的经济变革加速进行。1873年，设置内务省。内务省根据日本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开始调整偏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产品加工业、海运业，培植国内产业、资本及市场，鼓励出口。1874年，参加岩仓使团的大久保利通提出《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大力推动殖产兴业。从60年代至80年代，为迅速建立起一大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企业，发挥国家的带动、示范作用，日本重点发展国家所有企业。1886年，通货紧缩政策结束，开始转为重点发展私人企业，向私人企业或个人贷款，把部分国有企业低价出售给私人企业，扶植民间企业的成长，使日本涌现出一批产业化经营的企业、企业家以及众多的人力资源。总之，引进西方的科技及经济制度促成了日本经济的产业化，

为日本的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力量。

军事领域一直是明治政府变革的一个重点。1871年，改组兵部省，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次年，废除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发布征兵令建立近代常备军。征兵令规定：所有21岁的男子都要登记在册，有义务服三年现役和六年预备役。全国分为六个军事区。随后，分别设立陆军和海军军事学校。日本海军以海上力量最为强大的英国为楷模，聘用英国人为顾问；陆军则以陆地作战能力出众的德国为样板，聘用德国人为顾问。1878年，借鉴德国军制，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行使军令和统帅权，从此，日本的军事权不受政府的行政控制。

尽管初期陆军在军队中地位显赫，但鉴于自己的地缘状况，日本仍高度重视海军建设。早在1868年7月，军务官的奏折中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10月，天皇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5月，兵部省提出“大办海军”。同年，兵部省向太政官呈交了一份由三部分组成的“堪称为创立日本海军基本理论的建议书”，其中第一份文件里写道：“近期世界形势剧变，国际交往频繁，口头高唱公平协商，实则各怀私心，甚至吞并邻国据而有之；或者开辟良港，使之成为贸易的门户；……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竞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第二份文件在论述了日本地理位置的特点后断定，“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且要超过英国”。<sup>①</sup>海军省独立后，为加大对海军的资金投入，日本皇室、文武官员以及普通国民，均拨款、捐钱、购买公债。日本对海军的高度关注，在二十年后其影响得到了显现。

---

<sup>①</sup> [日] 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9~21页。

在文化教育领域，明治政府实行文明开化，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明治政府对本国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变革也给予很大的关注，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废除了一些古老的风俗习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推行“四民平等”、“断发脱刀”、“改历易服”等。例如，1873年3月，明治天皇带头断发，大臣、民众纷纷效仿，一时间短发型、穿西服、吃西餐成为社会的时尚。

一批思想家和社团组织纷纷出现，他们不仅从表象层面、更主要地从精神、制度层面宣传西方文明。在“文明开化”的倡导者中，福泽谕吉最为引人注目。他先后出版《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全面介绍西方文明，主张学习西方。福泽谕吉还同森有礼、西周、津田真道、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组织了日本第一个学术社团“明六社”，“明六社”发行杂志，翻译书籍，传播民主思想。

1871年，日本设立文部省。同年，文部大臣田中不二磨随岩仓使节团专门考察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1872、1879年先后颁布法令《学制》、《教育令》，贯彻义务教育，在全国建立近代教育体制。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把各地的乡校、寺子屋改建成小学，将藩校改为中学，强令学龄儿童就学。随着学校的建立，师资成为重大问题。于是，文部省决定成立师范学校，培养所需师资。1872年，在东京正式成立师范学校，接着从次年起，又相继成立大阪、京都等师范学校。1877年，日本设立东京大学。明治政府重视留学生教育，分别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贷费留学生规则》以及《公费留学生规则》。派出学生逐年增加，70年代至英美居多，80年代赴德国数量增长。1890年，《教育敕语》公布，它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把“和魂洋才”定为教育纲领，从而以最高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以儒家思想道德为中心的国家至上教育。《教育敕语》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教育制度逐渐发展的同时，70年代，一

批近代新闻、杂志及书籍纷纷出现。例如，《横滨每日新闻》、《京都新闻》、《大阪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等。它们介绍西方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报道日本国内的发展现状，褒贬时政。

日本经济、军事及文教上的变革取得了令其东北亚邻国和西方震惊的成就，但是，日本的变革远未使日本完成转型：民众参与的政治民主还没有建立起来。对此，福泽谕吉曾说：“明治维新过去还不到十年，我们就已经全面改革了学校体制和军事，建设了铁路和交通干线，房屋建筑开始使用水泥，铁桥飞架河川。政府行动果断，成就斐然，理应得到赞扬。但是，学校、军队、铁路、交通线路、水泥建筑和铁桥属于政府。我国民众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sup>①</sup> 自由民权运动因此出现。

自由民权运动混杂着对政府改革不满的士族、政治斗争的失意者以及真正要求民权的知识分子。1874年，以板垣退助为首，组织了“立志社”，翌年改称“爱国社”，主张设立议会，自由民权的舆论日益高涨。1881年，以板垣退助为首的自由党成立。1882年，在萨长政府中失意退出的大隈重信则组建了立宪改进党。自由党成立后不久，其基层很快与在改革中遭受打击的农民相呼应。面对日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政府做出反应。设立了起草宪法的元老院，1882年，在伊藤博文的授意下，成立了立宪帝政党。1885年，内阁取代了太政官。1888年，设立枢密院。相关机构建立之后，1889年，日本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皇室典范》、《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贵族院令》等。次年，召开议会。尽管明治宪法的制定和议会的召开表明日本在经历巨大的国内变革后开始重视政治民主化，试图通过法律和政治机构的调整 and 确立来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明治宪法否定主权在民，规定主权在君，议会、

---

<sup>①</sup>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页。

内阁对天皇负责，军部与内阁分立，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据此出现的日本离民主相距甚远，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发展起来的日本充满着不确定性。

### 三、日本扩张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崩溃

1871年，琉球岛民遭遇海难，在台湾登陆后被土著居民误杀。消息传入日本，一时间“征台论”沸沸扬扬。那么，日本政界为何对侵略台湾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新建不久的明治政府此时正处于外交困境之中：作为日本外交的课题之一——同欧美列强修改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修约遥遥无期。另一个外交课题——近邻外交也频频受挫：朝鲜认为日本国书中带有“皇”“敕”字样，而“在朝鲜看来，皇敕等字样只有中华皇帝才可使用”，加之朝鲜强烈排外、对日本心存疑惧，<sup>①</sup>一直不肯与其建交；虽与中国签订了《清日修好条约》，但不断遭到国内外的批评和质疑；同俄国就库页岛问题迟迟争执不下，北方威胁如芒刺在背。因此，当台湾问题出现后，日方鉴于该地险要的位置，将其视为扭转国运、打开外交困境的契机。1873年，外务省官员大原重实与外务卿副岛种臣的往来信函便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原重实写道：“卿（副岛）之意图，认为此番机会乃日本张威于亚细亚之良机。其原因乃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家不少。若我不能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今番之事，乃征韩之役（丰臣秀吉发动的日本和明朝的战争）后之重大事件，皇国沉浮在此一举。今后皇威不仅在亚细亚，且将辉耀于万国，……然若不成功，则必取侮于

---

<sup>①</sup> [日] 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6页。

万国。”<sup>①</sup>

1874年5月，日本派兵入侵中国台湾。由于清朝政府和台湾民众的抵抗，加之入侵日军疟疾流行以及欧美列强的“调停”，日本深感力不从心。10月，日本与清王朝签订了台事《北京专约》。条约规定：清承认“台湾‘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日军撤出台湾。<sup>②</sup>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是刚刚步入近代的日本第一次对外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待其尘埃落定，首次军事冒险对日本及东北亚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

对日本而言，以武力推行“脱亚入欧”的对外战略开始向其外交理念的主流靠拢。日本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背负着欧美列强强加其身的不平等条约，在西力东渐下被迫开国。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当时的日本一方面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欧美列强，另一方面面对的是颓势尽显的中、朝、琉近邻。尽管日本天皇表达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sup>③</sup>的外交志向，但究竟采取何种具体的对外战略，尚处于摸索之中。在日本国内，以下两种外交战略构想曾一度存在着。

其一，联合亚洲的中国、朝鲜共同对抗欧美列强。而持联合之名、实则驾驭之意图者也是大有其人。1871年，虽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清日修好条约》，但主要是为了与中国建立对等关系，从而利用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达到位居朝鲜之上、进而与朝鲜建交的目的。其二，与欧美共进退，掠夺亚洲其他国家，这种构想由来已久。对明治政府领导层有直接影响的吉田松阴早在幕府末期，就在《幽囚录》中说：日本应“告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覲，一如内地诸

---

① [日]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吕万和、熊达云译：《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352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3页。

③ 《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日本评论社1928年版，第33、34页。



侯。责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有如古盛之时。割北满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随后又在进一步指出“我与俄、美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sup>①</sup> 这种一方面屈从于欧美列强，一方面侵夺亚洲邻国的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思想，在当时还只是一种对日本外交有影响力的思索，尚未完全付诸实施而成为长期的、固定的战略。然而，随着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尤其是在日本不惜武力侵台，日本的外交路线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外交决策层的变化是外交战略变化的晴雨表。70年代，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被早年留学欧洲的驻英公使寺岛宗则代替，一批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人随之走上日本外交的决策岗位。例如留学英国的森有礼、上野景范出任外务大辅和少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按照华夷秩序的原则来看待清国和朝鲜的”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宗重正则于1875年离开了外务省。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的“人事更迭，标志着日本对亚洲外交的巨大变化”。<sup>②</sup>

与此同时，一批对日本近代化贡献卓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对外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逆转。例如，启蒙团体“明六社”一度以西方近代思想批判传统思想，一度把日本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然而，该社在日本侵台后的1875年解散，其成员的对外思想渐趋转变。福泽谕吉开始提出“保护亚细亚东方也是我国的责任”，对中国和朝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实力强迫其进步”；<sup>③</sup> 此前高唱天赋人权的加藤弘之也反戈一击，“于是先论述吾之权利决非天赋，全为依

---

① 吉田常吉等编：《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93页。

② [日] 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7页。

③ [日] 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1页。

进化而渐次造成者”，“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日本应“以武国主义为主、为经，以帝国主义置之第二位为纬”。<sup>①</sup> 总之，日本外交决策层以及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对外观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的外交战略思想迅速向强权政治靠拢。

如果说西方东来和鸦片战争是从外部冲击了东北亚传统的封贡体系，那么，1874年入侵台湾则标志着日本开始从东北亚内部对封贡体系进行冲击。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之上的，因此日本对朝鲜、琉球两地的任何企图都将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刺破封贡的外壳。日本入侵台湾就是把中国、琉球及朝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正如日本政府就台湾问题向驻中国公使下达的谈判要领中所指出的：“即一方面向清帝国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此机会否定清帝国对琉球的宗主权，消除琉球对日清两国的领属关系，并应打开‘朝鲜自新之门’”<sup>②</sup>

日本以武力考验了衰败的清王朝的对外意志，使其在随后的吞琉行动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琉球自14世纪起一直是明、清的属国，但1609年又被萨摩藩征服，这样琉球开始有了所谓的“双属”关系。1872年日本单方面强行设置琉球藩，把吞并琉球的进程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琉球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这一历史事实，使自知理亏的日本吞琉举步踌躇。因此，日本视琉球岛民遇难台湾为契机，以为琉球遇难者向台湾土著报复为名，行彻底斩断琉球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之实。大久保利通在1874年12月起草的琉球问题建议书中说：“此番与清国谈判结果，……表现出琉球多少属我版图

---

①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4、222页。

② [日]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3页。

之实迹”，建议“一扫与清国之关系，把镇台支营派赴那霸港内”。<sup>①</sup> 1875年7月，日本政府派官员赴琉球，强令琉球王不接受清的册封、停止向清的朝贡、撤销设在福州的琉球馆。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改称冲绳县。日本吞琉标志着东北亚封贡体系在内部坍塌的开始，而随后日本利用侵台威逼朝鲜就范开国，标志着东北亚封贡体系的进一步瓦解。

明治政府建立后，面对列国纷争，更加关注朝鲜的战略地位，1870年，日本外务省官员指出：“朝鲜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sup>②</sup> 1873年，“换约为名，谒帝也为名，惟因筹划征伐生番而有此行”<sup>③</sup>的副岛种臣渡海赴中国时，就曾询问清政府：“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sup>④</sup>，其意可谓明显。同时在日本国内，“征韩论”则甚嚣尘上。1873年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载：“据市井流言，日本与朝鲜一旦发生冲突，将征寅年出生之男子为兵，派往朝鲜服役。”甚至在1874年1月和2月，连续发生了“征韩派”在日本国内发动恐怖和叛乱事件，使日本政府的统治发生动摇。这样，转移国内对日朝外交受挫的不满情绪、威逼朝鲜就范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又一战略意图。正如依田憇家所说：“征韩论与出兵台湾的关系表明，日本的对华和对朝政策早从那时候起就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sup>⑤</sup>

中国台湾事务大臣沈葆楨在战事未息之时，便致函总理衙门和

---

① [日]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吕万和、熊达云译：《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453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日本国际联合会1938年版，第149页。

③ [日] 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风间书房1962年版，第44页。

④ 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8页。

⑤ [日] 依田憇家著，卞立强等译：《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 第五章 西方冲击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北洋大臣李鸿章，指出台湾之役与朝鲜的关系：“据洋将日意格云：日本尚有五千兵在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sup>①</sup>李鸿章也推测：“东洋平秀吉，昔以全力伐之，师老财殫而退。兹故惮于发难，若得志于台，保不纵情再往。”<sup>②</sup>有鉴于此，1874年8月，中国把日出兵台湾一事通告了朝鲜，指出日本有转战朝鲜的可能，并劝其与欧美列强通商，借西方的力量牵制日本。虽然朝鲜对日本将转战其地的警告及劝其与西方列强通商的用意持怀疑态度，并致函于清，认为日无意对朝“启恤失和”，朝鲜也无意与列强通商，但是仍请求中国“晓谕日本管事人员，俾勿称兵妄动，以全两国生灵”。<sup>③</sup>

此时的朝鲜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长期的锁国使国家经济凋敝，大院君与闵妃两派争权夺利更使政治混乱，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朝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动摇。9月，朝鲜主导对日外交的倭学训导玄昔运会见了驻釜山公馆的日本代表森山茂，这是朝日外交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日本的对朝外交随后再度搁浅时，由于有了武装入侵台湾的先例，日本于1875年断然动用武力，以炮舰相逼，酿成江华岛事件。终于在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在条约的一开头就明确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sup>④</sup>东北亚封贡体系的另一角也开始坍塌了。另外，颇耐人寻味的是，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使一直困扰日本政府的北方库页岛问题也于侵台的第二年得以解决。

至19世纪80、90年代，日本及东北亚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和财政基础，海军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4卷，故宫博物院影印抄本1930年版，第37页。

② 《李鸿章全集》，第5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8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7卷，故宫博物院影印抄本1930年版，第16、17页。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65页。

和陆军的近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经济与中国、朝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日本国内发展所需要的低工资依靠朝鲜的低价粮食，快速工业化需要中国、朝鲜低价的原料。反过来，日本把中国和朝鲜视为其初步工业化的最佳销售市场。同时，曾经因主张征韩而失势的人物借自由民权运动又以政党领袖或中坚的身份重新返回日本的政治生活之中。维新逐渐成功的日本对中国和朝鲜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侵略意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征伐清国策》。1890年，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以朝鲜为重点的“利益线”观念，主张实行大陆计划。日本加强陆军，扩大海军，建立战时体制。1893年5月，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

而中国和朝鲜，仍在艰难地进行着对各自国家的调整。80年代中期，中法战争后签订了《中法新约》，朝鲜甲申政变后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使法国和日本分别在东南亚和东北亚进一步冲击封贡体系。朝鲜的混乱愈演愈烈，1894年，极度不满的农民在全琫准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提出消灭权贵、驱逐倭洋的口号，迅速席卷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面对汹涌的农民起义，无力镇压的朝鲜政府做出了向清朝求援的决定。而日本认识到这是其斩断朝鲜与清朝封贡关系的良机。外相陆奥宗光认为：“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由来已久”，日本一直“力图割断中朝两国间一向存在的暧昧的宗属关系”。因此，在内阁会议上陆奥提出：“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送相当的军队”，日本政府最后制定了如下方针：“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sup>①</sup>

清朝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关于双方或一方若出兵朝鲜要事先通告对方的约定，<sup>②</sup>把出兵朝鲜的事宜通告了日本。6月初，中、日

① [日] 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10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103页。

## 第五章 西方冲击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本军队出兵朝鲜。6月10日，农民起义军同朝鲜政府达成全州协议，朝鲜趋于平静。有鉴于此，朝鲜政府和清朝政府提出中日双方共同撤军。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还提出同清一同改革朝鲜的方案。连陆奥外相自己也坦言：“我也估计到中国政府十之八九不能同意我国提案”，但是“不问与中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若中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政府当独力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现在我国的外交显然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sup>①</sup>

7月23日，日本对力图实现列国调停的中国和朝鲜采取行动。日军突然占领朝鲜王宫，推翻闵妃集团，扶植大院君政权。25日，在日本的授意下，大院君政权宣布废除与清的一切条约。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海军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甲午战争爆发。28日，日本陆军进攻牙山一带的清军。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当中日甲午战争在海陆进行之时，新成立的朝鲜政权试图改革内政，颁布了一系列方案：调整机构，整顿财政，整理土地，严惩贪官，废除科举，破除门阀，取消奴婢制，实行警察制度，开国建交等。日本对朝鲜的自主改革进行打击，以高宗代替大院君，迫使其发布根据日本“二十条改革方案”而制定的“洪范十四条”，<sup>②</sup>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

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清王朝战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日本可以在中国各开放口岸投资设厂，中国赔款库平银2亿两。鉴于日本在东北亚的侵略阻挡了俄国的扩张路线，俄国组织起俄法德三国的临时联盟，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11月，中日在北京签署了“辽东半岛返还条约”，

<sup>①</sup> [日] 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sup>②</sup> 金龟春主编：《中朝日关系史》，下册，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中国再次支付“返还”辽东半岛库平银3千万两。

甲午战争标志着东北亚传统封贡体系的最终瓦解，也标志着该地区力量结构的决定性变化，中国最终丧失在东北亚的传统大国地位，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迅速崛起，开始以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东北亚。

### 第三节 列强在东北亚的博弈

俄国由一个欧洲国家，通过持续地扩张，深深地卷入东北亚事务之中。列强为了在封贡体系崩溃的东北亚获得利益，纷纷组建同盟，东北亚各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东北亚地区成为欧美列强博弈的竞技场。

#### 一、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

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尚未受到西方强国冲击的清王朝依然貌似强大，因此，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主要是沿着西伯利亚中部向东延伸，直到跨过白令海峡，占据北美的阿拉斯加。但是，随着南方的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俄国对中国的顾虑便一扫而光，把东北亚的扩张方向转移为由北向南，扩张也更加有组织化。19世纪中叶至末叶，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可分为两个时段。

19世纪40至50年代，为俄国在东北亚扩张的一个阶段。俄国成立“特别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海军将领普提雅廷建议考察俄国与中国的东部边境。沙皇亲自指令：“采取一切措施，务必查明船只能否进入阿穆尔河，盖因对俄国重要之全部问题即在于此”。<sup>①</sup> 1844

---

<sup>①</sup> [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著，高文凤译：《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9页。

年，俄国外交部授命俄美公司考察阿穆尔河。为进一步推动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1847年，沙皇任命野心勃勃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对俄国占领黑龙江和黑龙江入海口沿岸及岛屿抱有极大的狂热，他在给沙皇的报告中强调：“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至少是外贝加尔以东地带，而且可以控制得很牢固，因为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口，取得了该河的航行权，就能使人口较密、工农业繁荣的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藩属，为之纳贡。”“只有控制阿穆尔左岸并取得该河的航行权，才能建立同堪察加之间的交通联系，以保障俄国牢固地占有这个半岛”。<sup>①</sup> 1849年，穆拉维约夫指令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伊考察阿穆尔河。同年，俄国成立“黑龙江委员会”。1850年，俄美公司与涅维尔斯科伊联合考察阿穆尔河。6月，在黑龙江河口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据点彼得冬营。考察的结果是不断地占领：黑龙江入海口、库页岛被单方面划入俄国版图。在该阶段，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得益于明为私营企业实为政府控制的俄美公司。东西伯利亚总督在向西伯利亚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坦言：“俄美公司在阿穆尔事业开创之初就参加了活动，为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基础，因此它所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众所周知，1850年，我们在阿穆尔地区最初的一些果断行动都是以公司名义进行的，因为当时政府认为不宜公开活动。我们在阿穆尔河口的第一批哨所就是这样建立的。”<sup>②</sup>

在这一时期，俄国占领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口稀少。1841—1850年，东西伯利亚的播种面积是384.2千俄亩，产量为2

---

① [俄] 巴尔苏科夫著，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6页。

② [苏] 谢·宾·奥孔著，俞启骧等译：《俄美公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3、214页。



## 东北亚史

070.5千俄石。<sup>①</sup> 人口主要分为土著居民、流放犯、迁徙而来的农民。1843-1852年，东西伯利亚流放人数为7万多。根据东西伯利亚总督1851年报告，当时东西伯利亚农业人口的成分如下：国有农民355227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农民12643人，在工场干活的农民946人，以上共占东西伯利亚人口总数的40%。<sup>②</sup> 曾任西伯利亚总督（其下设有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总督辖区）的斯佩兰斯基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描述道：“这儿是流刑犯的理想之地，是从事贸易的有利可图的场所，是进行矿物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但却不是生活享受和设置高级行政机构的地方……社会上几乎听不到文明的语言。”<sup>③</sup>

19世纪50年代后，俄国对东北亚的扩张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此时期，俄国开始利用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其他东北亚国家与其签订条约，以条约的形式确认和扩大在东北亚的权益。1853和1854年，俄国军舰“巴拉达号”和“沃斯托克号”分别袭扰朝鲜海岸。1853年，俄国在得知美国遣使日本的消息后，8月，普提雅廷率领四艘舰船组成的俄国舰队进入长崎，要求日本开国通商并与俄国划定边界。此时恰逢俄国与英法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普提雅廷率舰队不久离开日本。1854年，普提雅廷再次返回日本。12月，最终迫使日本签订《日俄亲善条约》（日俄《下田条约》）。该条约除了与日美《神奈川条约》的雷同之处外，还包括如下内容：对千岛群岛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两国进行了划分，择捉岛属于日本，得抚岛及其以北的千岛群岛属于俄国。而对库页岛“不划分界线，依通常之惯例”。“如有犯法者，在逮捕处置时应依各

---

① 徐景学主编：《西伯利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② [苏]彼·伊·卡巴诺夫著，姜廷祚译：《黑龙江问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8页。

③ [苏]彼·伊·卡巴诺夫著，姜廷祚译：《黑龙江问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自国家的法度”，等等。<sup>①</sup>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鉴于清朝疲于对抗英法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国力更加虚弱，1858年5月，穆拉维约夫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璦琿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领土划归俄国，仅保留清朝对璦琿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允许中、俄两国船只航行。俄国商人可以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带自由贸易。清朝政府没有承认《璦琿条约》。

然而，东北亚的形势继续向着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继1857年俄国对东北亚地区进行了行政上的调整，把黑龙江地区与勘察加、鄂霍次克沿海地区合建为“东西伯利亚滨海省”后，俄国向这一地区增调军队。而清朝的处境越来越不利，英法军队已经攻至京津门户大沽口。俄使普提雅廷利用调停为诱饵，1858年6月，抢在英法之前与清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派员查勘边界，俄国获得沿岸通商、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并为后来进一步吞并中国的领土创造了条件。12月末，俄国再次对黑龙江地区进行机构调整，将该地区划分为“东西伯利亚滨海州”和“阿穆尔州”。1860年，俄国迫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朝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涉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内容是：除迫使清接受《璦琿条约》外，改变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中俄“共管”的约定，规定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以乌苏里江为界，“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sup>②</sup>至此，俄国完成了对东北亚陆路纵深的占领。

俄国在占领东北亚内陆纵深后，一方面加紧对该地区移民以使占领永久化，另一方面开始对东北亚的北太平洋一带进一步扩张。

---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5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9、150页。

19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俄国的国内改革以及试图对新扩张的东北亚的永久占领，俄国鼓励向人烟稀少的阿穆尔州和滨海州地区移民。例如，1859年，发给流放到该地区的政治犯为期三年的护照，以使他们能够移居黑龙江，护照期限可无限延长。黑龙江下游的第27海军基地的士兵，服役15年后可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和一些优惠。移民最初由政府供养两年。开放西伯利亚矿产专利权。<sup>①</sup>阿穆尔州和滨海州为了吸引移民，以1俄亩3卢布的价格把土地出售给移民，数量不限，或者以服徭役为条件按每户100俄亩把土地分给农民。1861-1891年，在东西伯利亚定居者达10万人。<sup>②</sup>

在强化内陆管理的同时，俄国进一步把目光投向西北太平洋。1858年8月，普提雅廷迫使日本签订了《日俄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互派外交人员、互设外交机构，俄国人在日本可以居住、逗留和买卖、租赁或建筑房屋，俄国人在日本享有自由贸易，自由信仰，片面最惠国待遇等。1859年，穆拉维约夫率领军舰抵达日本江户，向日本提出俄日两国以库页岛和北海道之间的宗谷海峡为界。这就改变俄日《下田条约》关于暂不划界的规定，把库页岛划归俄国。其手段与俄国吞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如出一辙。日本拒不同意，提出以北纬50度划界的方案。1860年，俄国在太平洋上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这一年，在穆拉维约夫的指令下，俄国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舰队司令卡扎凯维奇占领海参崴，将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起俄国在东北亚最为重要的港口。

19世纪60年代，日本三次遣使俄国，就库页岛问题与俄国谈判，均未成功。库页岛久拖未决，引起英美的注意。为防止他国介入，1870年10月，俄国派驻华公使布策赴日，通告日本：库页岛问题的解决应直接在俄日之间进行，不允许他国介入。1872年，布策

---

<sup>①</sup> [英] 恩斯特·乔治·拉文斯坦著，陈霞飞译：《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21页。

<sup>②</sup> 徐景学主编：《西伯利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277页。

以俄国驻日本首任公使的身份再次来到日本，就库页岛问题与日本展开谈判，俄日在库页岛上的冲突不断，且愈演愈烈。而此时，日本国内对朝鲜、对中国台湾进行侵略的呼声很高，为了防止俄国在日本有所行动时进行干涉，也是迫于俄国的压力，1874年，日本指令库页岛上的日本居民撤离。1875年，俄国外交大臣哥恰可夫与日本代表榎本武扬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完全占有库页岛，俄日以宗谷海峡为界。日本占有千岛群岛最北端的占守岛至得抚岛之间的18个岛屿，俄日以勘察加半岛南部的洛帕特卡角和占守岛之间的海峡为界。至此，俄国继对东北亚大规模的陆地扩张后，其对东北亚的大规模海洋扩张告一段落。

### 二、东北亚的结盟时代

自东北亚各国纷纷被迫开国、逐渐成为列强博弈的竞技场后，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开始以结盟为手段在东北亚展开合纵连横。其中，以英国与俄国的矛盾为主轴，产生了俄法同盟、日英同盟以及中国和朝鲜对英国、俄国的协调。随着美国对东北亚的进一步介入，使该地区的结盟出现了新的变量。

英国和俄国不断扩张，两国沿着巴尔干岛、西亚、中亚、南亚一直到东北亚这个巨大的弧形区域冲突频仍。在东北亚，英、俄从南、北两个不同的方向对该地区构成了挤压和冲击，这既激化着它们与东北亚各国的矛盾，也积累着它们之间的矛盾。直到1854年，英法同盟和俄国之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战火燃至东北亚，英法联合舰队和俄国的舰队在西北太平洋展开战斗。由于俄国舰队与英法联合舰队的实力差距明显，俄国便利用自己地缘上的优势采取守势，而英法则利用自己的机动和火力优势采取攻势。因此，尽管战争在东北亚持续了约两年多，却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海战。但是，这场战争却是东北亚地区第一场列强间的争霸战争，它把东北亚的中国、日本等国甚至北美洲也卷入其中：双方的舰队不断在东北亚

及北美洲出没，把它们作为海军集结地、补给站和维修点。因此，当缔结和约的消息最终结束这场战争时，英俄都进一步认识到夺取东北亚关键性地区的战略意义。于是，双方把目光都集中在介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黄海、日本海之间的朝鲜海峡。

1861年3月，一艘俄国巡洋舰出现在朝鲜海峡对马岛的尾崎浦，要求租界并长期在此驻扎。俄国在对马的举动不仅使日本大惊失色，而且引起英国深深的忧虑。英国驻日公使认为：“俄国垂涎对马的意义有二：其一，确保日本海至黄海的航路自由，而一旦有事之际则可作为破坏欧洲各国与日中两国通商的根据地；其二，阻止欧美列强建立接近俄国新领土（滨海州）的根据地。”他建议“应对俄国军舰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迫令退出，如果俄国拒绝，英国就自己来占领该地”。<sup>①</sup>因此，英国一面向日本施加压力，一面派两艘东印度舰队开赴对马。英俄在朝鲜海峡形成对峙。9月，俄国巡洋舰从对马撤出。但是，第一次朝鲜海峡危机并没有减缓英俄的矛盾，随着两国不断加强对东北亚的扩张，把更多东北亚国家卷入的第二次朝鲜海峡危机出现了。

甲申政变后，不断南下的俄国与日益衰落的朝鲜积极接触，1884年至1885年，朝鲜遣使俄国，寻求俄国的保护，一时间“朝俄密约”的消息在东北亚不胫而走。恰在此时，英国与俄国在阿富汗争夺激烈。于是，1885年4月，英国以“朝俄密约”危及其安全为借口，占领朝鲜海峡的巨文岛，修建军港，阻止俄国南下。朝鲜抗议，但英国不为所动。俄国一向视该地为舰队出入的要道，提出如果英国不撤出巨文岛，俄国将占领朝鲜的永兴湾或济州岛。清朝与朝鲜存在宗属关系，因此，对巨文岛事件也极为关注，清一边向朝鲜政府陈述失去巨文岛的害处，一边向诸列强征求意见。而任何列

---

<sup>①</sup>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强控制紧邻日本的朝鲜海峡都足以令日本惶惶不安，伊藤博文不无忧虑地对李鸿章说：如果英国久占巨文岛“于日本尤不利”。<sup>①</sup>因此，第二次朝鲜海峡危机使整个东北亚笼罩在更为紧张的气氛中。

5月，清朝水师提督丁汝昌与朝鲜大臣乘超勇、杨威两舰赴巨文岛和日本长崎，同英国进行交涉。所幸数月后，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趋于缓和，于是英国提出：“此岛之占领，并不伤害中国及其属国之权利利益，英亦无占领有该岛之意。惟此岛若归他国，则必招中、英两国之不利。以是中国若保证不使任何国占领该岛，则英国可安心撤兵。”<sup>②</sup>1886年9月，李鸿章与俄国驻清公使拉德仁就该问题交涉，在得到俄国不占领巨文岛的保证后，10月，清又与英国再次交涉，直至1887年2月，英军撤出巨文岛。第二次朝鲜海峡危机结束。

经过几次较量，英俄均感到在东北亚的争夺力不从心，于是，纷纷寻找盟友或以“结盟”为手段控制弱国。19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期，东北亚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结盟时代。

1890年3月，俄德的同盟关系因德国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而最终瓦解。同年7月，德国和英国达成了《赫尔果兰条约》，英德关系暂时缓和。而法英在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存在竞争，这更使对德国充满疑惧的法国疏远英国。于是，俄国与法国开始寻求合作的道路，并最终于1894年缔结了俄法同盟。尽管俄法同盟的初衷是针对欧洲，但是“俄国人的野心集中在中国的北部，而法国在那里却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尽管德国拒绝使再保险条约续期，但俄国人对德国并无严重的恶感，并认为法俄同盟是世界性的反英大联合。而法国人则希望最终会与英国和解，这样就会加强它反对德国的地

---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5页。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7页。

位”。<sup>①</sup> 同盟一方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对同盟关注东北亚的预期均表明：俄法同盟也是东北亚地区近代以来的第一个同盟。

早在第一次朝鲜海峡危机的时候，英国逐渐意识到日本在对抗俄国中的地位。正如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所说：“英国在东方已有广大领土，本不必重视日本，但正是因为俄国的存在，遂使英国不能放弃日本。”<sup>②</sup> 随着法国通过中法战争取得对越南的控制，俄法在东北亚北南呼应，“法俄同盟开始了英国真正‘孤立’的时期”。<sup>③</sup> 英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日益成为光荣的过去。作为英国对日政策调整的一个标志，在日本面临与中国开战之际，1894年7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新的条约，英国首相金伯利对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这个条约，比日本打败中国大军的效用更加远大。”<sup>④</sup>

当英国因俄法同盟以及自身的相对衰落而开始调整对日政策的时候，日本也开始感受到同盟的存在及其实际的效用。19世纪90年代，世界历史的演进进入所谓的“同盟互相交错”的时期，<sup>⑤</sup> 对于日本而言，当时的东北亚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同盟和一个被日本怀疑存在的同盟。一个事实上的同盟是俄法同盟。俄国在东北亚的行动得到了俄法同盟的支持，使长期处于俄国威胁之下的日本又开始感到了来自俄国参与的同盟的压力。一个被日本怀疑为存在的同盟是所谓的“英中同盟”。日本的判断是：英国在亚洲和中国的利益最大，“因为英中两国有紧密的利害关系，所以日本……怀疑是否有英

---

① [英] F·H·欣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4页。

② 周启乾：《日俄关系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③ [英] F·H·欣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5页。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152页。

⑤ [英] C·L·莫瓦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中同盟的存在”。<sup>①</sup> 尽管俄法同盟和所谓的“英中同盟”都使日本感到深深的不安，但是，当日本决心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时，后一个“同盟”的实际作用一度提升了：因为如果“英中同盟”存在，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存在了。子虚乌有的“同盟”成为日本是否对中国宣战的决定性因素。据外务次官林董回忆：“在日清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关于宣战问题，总理大臣仍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着相互援助的密约而犹豫，……然而，到7月末，英国看到日清间的和平不能维持，于是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及其通道附近不要成为战区，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于是宣战。”<sup>②</sup> 另据英国学者约瑟夫研究，日本为了弄清中英之间是否存在同盟关系，驻英国的公使专程走访唐宁街，以探究竟。他获悉：英国欢迎在朝鲜实行改革，但警告日本不要占领朝鲜的领土，因为那样会引起俄国的干涉。“从这次谈话中，日本公使得得出结论：中英之间并无同盟，并且只要日本在朝鲜限于实行改革而不占领领土，英国不会以武力干涉来制止战争。”<sup>③</sup>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侵占中国大量领土，直接刺激了俄国。正如当时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所说：“我觉得这个条约对俄国十分不利，因为日本在中国大陆攫取了一块领土，因此就接近我们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沿海地区，滨海边疆地区，原先是同日本隔海相峙的，而现在，日本已登上大陆，在大陆上找到了好处，而在这块大陆上我们也是有切身利益的。”<sup>④</sup> 于是，俄、法、

---

① [日] 信夫清三郎著，于时化译：《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② [日] 信夫清三郎著，于时化译：《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

③ [英] 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8、49页。

④ [俄] 谢·尤·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德出于各自的利益，加之业已存在的俄法同盟的支持，“那些在欧洲处于对立地位的欧洲国家，在亚洲结成了松散的联盟”。<sup>①</sup> 1895年4月，三国的临时同盟照会日本，要求其放弃侵占的辽东半岛，三国海军出现在东北亚海面。

面对三国的临时同盟，日本试图联合英、美、意三国进行对抗，而日本的工作重点是英国。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驻英公使加藤高明专门发出了《关于对英政策之训令》，以日本承认英国霸权、并表示愿意遵从其利益为前提，试图换取英国在对抗三国干涉问题上的支持。正如电文所示：“关于本次事件，日本政府承认英国利益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利益之事实”，以此“探听英国政府之真实意见”，“日本能够希望从英国得到何等援助”。<sup>②</sup> 在此期间，日本对美国、意大利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两国一度表示有条件的支持日本。然而不久，英国答复日本：“英国政府业已决定守局外中立，此次亦欲维持同一之意向。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挚之友情，同时亦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提议，而援助日本。”<sup>③</sup> 英国政府的表态终结了美、意的“支持”，也终结了日本试图建立与英、美、意临时联合的外交努力。日本屈服，答应了三国的要求。

清朝战败后，鉴于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表现以及面临巨额的赔款压力，“联俄拒日”逐渐在清廷内部流行开来。1896年，李鸿章亲自赴俄国参加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临行前李鸿章对黄遵宪说：“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sup>④</sup> 而此时俄国正

---

① [英] F·H·欣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② 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4、500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171页。

④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2页。

在修建贯通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如果该铁路能从中国东北穿过，不仅可强化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也可节省巨额修建和日后运输费用。因此，俄国以建立“中俄同盟”为诱饵，迫使李鸿章接受铁路经过中国东北。在谈判中，维特对李鸿章说：“在中日交战之际我们的某些部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向吉林时，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开得很慢，还没有到达吉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sup>①</sup> 在俄国软硬兼施下，6月，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上签了字。

从表面来看，该条约似乎是一个同盟：法文本称之为《防御同盟条约》，且条约规定“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领土，或中国领土，或朝鲜领土，即牵碍此约，……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中、俄两国即经协力御敌，非有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但是，从其实质内容来看，所谓的“同盟”是俄国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条约还规定：“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该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sup>②</sup> 可见，所谓“同盟”并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同盟，而是俄国对清朝的控制，使俄国大大增强了在中国东北以及东北亚的实力。就连力主构建“同盟”的维特也在表述时把修建铁路置于“同盟”一词之

---

① [俄] 谢·尤·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0、651页。

前：“根据此约我们有权修筑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的同时，建立中俄防御友好同盟。”<sup>①</sup> 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利用所谓的“同盟”，在东北修建了中东铁路，占据了旅顺大连，并对朝鲜加强了渗透。

俄国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频频得手，使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国和妄图吞并朝鲜、染指中国的日本与俄国的矛盾激化。1898年4月，英国向日本提出租借被其侵占的中国威海卫，以抗衡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旅大军港。日本很快同意了英国的要求。日英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协调了关系。1900年，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运动引起了列强的干涉，英国希望日本出兵，日本悍然入侵中国，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日英进一步协调了合作关系。同年，俄国利用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攻占了“盟友”中国的东北全境。俄国的这一行为不仅进一步激化了俄国与英、日的矛盾，而且也引发了俄美矛盾。因为1899、1900年，美国两次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显然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相对立，因此，美国对英日的对俄政策采取支持态度。

俄国在东北亚越来越大的胃口、日本不断膨胀的欲望以及英国对东北亚影响力的相对减弱，最终促使日本和英国开始构建与俄国对抗的同盟。就在被迫接受三国干涉的1895年5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认为：虽然目前日本在中国、朝鲜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迟早会“引起欧洲各国之干涉”，已然不存在日本“单独进行”的可能性。5月18日，陆奥提出以“由于英国和日本有共同利害关系，所以日本希望英国协助”为由，向英国政府提议建立日英联盟。<sup>②</sup> 然而，当日本开始谋求对英结盟的时候，英国认为其最佳的结盟对象

---

① [俄] 谢·尤·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册，日本国际联合会1953年版，第415页。

是德国。1900年，双方签订了英德协定。尽管英德的政治家大谈两国是“天然的盟友”，<sup>①</sup>但是，英德就同盟的适用范围产生严重分歧：英国认为同盟应该把中国东北包括在内，而德国认为同盟的适用范围不包括中国东北，因为德国鼓励俄国在东北亚的冒险，以此转移俄国对欧洲的影响以及降低俄法同盟的威力。

英德结盟很快被证明是一个神话，这对日本来说是个好消息。此时，日本与俄国的对立已经使双方都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如果日俄开战，日本需要有力量在背后阻止或打击法国的海军，因为俄国与法国是同盟关系。1901年6月，桂太郎内阁代替第四届伊藤博文内阁。桂内阁把组建日英同盟作为其施政方针之一，日本驻英公使林董全面启动对英结盟的外交谈判。对于建立日英同盟，日本内部也存在争论。此前，伊藤博文就认为：“英国在朝鲜的利益还没有达到必须甘冒与俄国开战之危险来加以保卫的程度，因此，在关键时刻英国有抛弃日本的可能；由此判断，把日本的命运寄托在日英同盟上是危险的。”<sup>②</sup>因此，他主张“满韩交换”，即日本和俄国各自承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为此，伊藤赴俄就此事与俄国进行协商，但是遭到俄国拒绝。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最终签订了《日英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同盟的覆盖区域是中国、朝鲜，日本或英国的一方如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另一缔约方严守中立并阻止其他国家攻击自己的盟国，如果一缔约方与两国以上作战，另一方投入战争。媾和时，同盟国之间进行协商，同盟有效期五年。<sup>③</sup>日英同盟缔结的第二天，美国给予了支持：它向各国发出照

---

① [英] F·H·欣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页。

② [日] 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7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203、204页。

会，反对俄国独占中国东北。

当得到日英同盟支撑的日本进一步显露锋芒、积极备战之时，俄国的东北亚政策也因一批军人集团的干预而显得更加野心勃勃，别佐布拉佐夫集团认为不应该从中国东北及朝鲜收缩，即使对日作战，那也将是一场短暂而辉煌的胜利。但是，俄国毕竟在东北亚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日本，而是一个同盟，因此，1902年3月，俄法同盟发表了关于“清国和韩国独立的俄法共同宣言”，“如其他列强的侵略行动或中国国内再度发生动乱”，对“两盟国政府的利益”构成“威胁”时，“它们将就保卫此等利益的手段进行磋商”。<sup>①</sup>

分别获得日英同盟与俄法同盟支撑的日俄在东北亚的对立公开化，1904年2月8日，在夜色的掩护下，日本突然袭击俄国驻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爆发。10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宣布“局外中立”。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一直积极进攻，而俄国则消极防守。1905年1月，日军攻占旅顺，逐渐获得了关键性的制海权。此时，日俄盟国的行动也影响了战争的进程。法国事实上是被盟友俄国拖进东北亚的危机之中的，因为法国本来希望俄法同盟主要针对德国，日俄战争使法英战争的危险增强，这显然对法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它将受到英国和德国的夹击。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法国做出了决定性的调整。1904年4月，当它的盟友俄国在东北亚苦战之时，法英缔结了和解的协约。5月，法国为战争中的盟友尽了最后一次义务：向俄国提供了一笔贷款。因此有学者指出：“当俄国遇到战争时，它既没有一个能从形式上保障另一大国直接的军事援助的同盟，也没有可以实际上保证财政援助的同盟。”<sup>②</sup>而英国和美国在向日本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英国还给予日本以军事帮助。例如，俄国的

---

<sup>①</sup> 英修道：《明治外交史》，至文堂1960年版，第160页。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sup>②</sup>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著，陶文钊等译：《俄国在满洲（1892-1906）》，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9页。

## 第五章 西方冲击与东北亚封贡体系的瓦解

太平洋舰队逐步被击溃后，本想调黑海舰队驰援东北亚，但英国却让奥斯曼土耳其封锁黑海海峡，俄国不得不从更遥远的欧洲调遣波罗的海舰队，等待这支跨越半个地球舰队的只能是一场灾难。

在美国的斡旋下，以牺牲中国为条件，1905年9月5日，日俄达成了《日俄和平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日俄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俄国把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日本在俄滨海州享有捕鱼权。<sup>①</sup>

就在日俄战争的尾声中，日英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而由于日俄的盟国英法关系的接近，预示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以英俄矛盾为主轴列强在东北亚结盟时代的结束。

---

<sup>①</sup>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245～248页。

## 第六章 救亡图存与军国主义

中国在经历自上而下的改良变法、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后，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王朝崩溃。然而，中国随后跌入四分五裂的动荡之中，直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遭受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为独立而奋斗。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远东成立了远东共和国，战胜了列强的干涉，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在经历了传统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后，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日本不断强化对朝鲜、台湾的殖民统治，入侵俄国远东地区，炮制伪满洲国，发动全面侵华。随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德国逐渐接近并支持日本，日德之间形成轴心国同盟。中苏关系因日本的侵略而日益接近。在日德同盟的刺激下，日本的侵略范围跨出东北亚、发动太平洋战争，中苏美英形成对抗日德同盟的反法西斯同盟。东北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

### 第一节 中国：从变法到革命

洋务运动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终结，甲午战争后的若干年，清王朝再次出现了危机和调整，这一轮危机与调整表现为：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知识分子力主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清王朝被迫开始新政。

### 一、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马关条约》之前，列强大肆蚕食的是清帝国的遗产和边疆地区，而《马关条约》之后，列强开始侵占和瓜分清朝的核心地区。事实上，对清王朝核心地区的侵占和瓜分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

1896年6月，根据《中俄密约》，清朝被迫与俄国在柏林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在彼得堡设立中东铁路总公司，在北京设立分公司。俄国控制了中东铁路的资金、管理并获得了铁路沿线派驻警察、开矿、关税自主等权利。同年，中、俄双方以及法国驻海参崴舰队司令在中国东北的三岔口附近举行了中东铁路开工典礼。1898年，清朝又与俄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旅大租地续约》。中国把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域租给俄国，租期25年，到期可延长。在俄国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地区，在该地区由中国官吏管理，但不经俄国同意，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该地区的工商、铁路、矿山等权益不得让与他国。从中东铁路干线修建一条通往旅大的支线，支线所经过地方的铁路利益不得让与它国。1899年8月，欲壑难填的俄国又在旅大设立“关东省总督府”，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这一切表明：东北作为清王朝的隆兴之地，利权已经大量沦丧。在此前后，德租胶州湾，法租广州湾，英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则在强占台澎的同时把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国内外环境的急剧恶化，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呐喊。早在1895年，当《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年一度的举人会试便迅速转化为要求变法的“公车上书”。因“公车上书”而名声鹊起的康有为周围出现了诸如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等维新名士。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译著《天演论》等。他们还创办、发行报刊，如《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报》、



《直报》等。一批团体纷纷建立，如“强学会”、“南学会”、“圣学会”、“保国会”等。他们从中国与西方文化中汲取变革之道、寻觅图强之路、宣扬救亡之理。尽管参与者良莠不齐，但中国知识分子议论国事，发行报刊，组织团体，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罕见的现象，既表明国家危机之深，也表明中国变革之风渐盛。

与此同时，在清王朝内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所谓“帝党”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所谓“后党”，也在展开激烈的争斗。“后党”握有实权，掌控朝政，因此，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及其“帝党”与维新派迅速接近。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在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设立矿产总局，鼓励垦荒和开办实业，开采矿藏；建立近代交通邮政，设立铁路总局和全国邮政局，修建铁路，撤销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在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中央设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专门学堂和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自由成立报馆、学会；鼓励新著作、新发明、新创造。在政治方面，广开言论，允许民众上书言事，整顿吏治，裁减不必要的机构和官员。在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对陆军进行西洋式训练，加强海军。这些措施主要是在6月11日至9月21日之间的103天以百余道上谕发布的，故称“百日维新”，也因这一年是戊戌年，亦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试图变革传统的中国，但是，它的发动者的力量却极为有限。在中央，光绪皇帝处处受到慈禧的掣肘，康有为、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分任章京不过百日，梁启超主持译书局，实权全无；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翁同龢在变法的第四天就被免去一切职务；在地方，除了湖南巡抚等抱有一定热情外，其他绝大部分地方官则对变法上谕推诿观望。更为重要的是，戊戌变法掺杂着传统的宫廷斗争，后党更愿意把变法理解为帝党的反击而不是社会进步

的手段。同时，戊戌变法引起了近邻日本的关注。9月11日，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考察变法情况。9月20日，光绪皇帝接见了。一时间维新所造成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发酵。9月21日凌晨，握有实权的后党发动政变，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香港和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慨然赴死。

自上而下的戊戌变法受到重创后，累积起来的危机再次爆发，这次是从民间汹涌而来。自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来，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加之列强在华恃强凌弱，使中国逐渐出现了对抗基督教及西方列强的民间组织，在戊戌变法前后，发展为义和团运动。

该运动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迅速在华中、东北一带蔓延。在华中的义和团运动攻击基督教教堂、教徒及洋人，渗透进京津；而东北的义和团运动由南向北推进，对俄国在东北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支线以及各种殖民机构进行攻击。

刚刚经历戊戌变法而惊魂未定的后党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是矛盾的。“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又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sup>①</sup>义和团运动是对其统治的挑战，但如果镇压，将酿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起义。同时，义和团运动把矛头指向西方列强，而后党对西方列强心存芥蒂：后者对维新派表示同情，一些维新派人物得到其庇护而逃脱；并且在政变后慈禧欲废掉光绪，另立新的皇太子，亦遭到后者抵制。因此，对后党而言，义和团运动又有利用的价值。几经摇摆之后，清廷开始承认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使列强有了再次入侵中国的借口，而在东北亚的历史中，也第一次出现了日本、俄国共同出兵侵略中国的局面。1900年6月10日，日本、俄国与欧美列强英、美、德、法、

---

<sup>①</sup>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4页。

意、奥等8国联军约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6月21日，慈禧在大臣们的一片争吵声中对列强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sup>①</sup>义和团同清军在既合作又斗争中，在天津等地阻击联军的人侵。此时，联军的援兵陆续开来，最高时达到数万人，日军以2万余名的数量高居入侵华北联军之首。因为日本的内阁会议思量再三，得出结论：“从军事策略上说，我国应先派出二至三个师团救援天津，与各国军队合力，分路进扑北京，对清政府施以惩罚”；“从政治策略上来看”，“目前各国援兵未到，天津、大沽之军方为敌军所苦，我国如能派大兵赴援，当可解该地之重围，进而平定北京之乱，则拨乱之功，盖归于我，而各国亦将永念我国之德”。<sup>②</sup>在东北，俄国则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更是抛开其他列强，放手单干。7月，数十万俄军漫过中俄边境，分七路侵入东北。10月末，东北主要铁路沿线及交通枢纽被俄军侵占。在优势的人侵者面前，清王朝的统治者再度暴露出末世的软弱和可悲：由利用义和团转为大肆屠杀之，由对列强宣战转为媚降之。

1901年9月，中国被迫与俄、日、英、美、德、法、意、奥、西、比、荷等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支付巨额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地方各省赔款，届时本息达到天文数字10亿余两。在北京划定“使馆区”，列强在“使馆区”和京津一带有驻兵权。惩办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把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俄国获得赔款的28.97%，日本获得7.7%。<sup>③</sup>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自己都承认：“1900年

---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3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193、194页。

③ 于建胜、刘春蕊：《落日的挽歌——19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2页。

的对华战争，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sup>①</sup>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王朝守旧的统治者已经别无选择：对戊戌变法的抵触和压制并未使自己获得江山稳固或者必要的尊严，对义和团运动的利用也并未把列强驱除于国门之外。因此，在国内尚未出现严重的挑战者之前，盲目地排外让位于改良，清王朝的保守势力自己开始了新政。

1901年，在慈禧的指令下，由奕劻、李鸿章、荣禄、刘昆一、张之洞组成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改革机构，修订新法。1901年，设立外交部。1903年，设商部、练兵处，后改为农工商部、陆军部。1905年，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随后，清政府还公布了《商律》以及经过修改的《大清律》。改革教育、派遣留学生。1904年，颁布了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学堂章程，教育分为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和大学。1906年，废除存在千余年的科举制。同时，大量的中国学生开始走出国门，一部分远赴欧美，更多的留学日本。改革军事、训练新军。1901年，废除武举，设立武备学堂，建立常备军。为了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清廷推行按省分配、限期完成的新军训练计划。一批留学生也从日本等国学习军事。1905年，清廷派出5大臣使团到国外考察政治，此时距日本派岩仓使团考察欧美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随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1909年，各省设立咨议局，作为省议会的“预备”；1910年，在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全国议会的“预备”。翌年，组建以皇族为主的“责任内阁”。

当清廷推行新政之时，东北正遭受日俄的严重侵略。在此期间，俄国借义和团运动占据东北，拒不撤兵，全国民众掀起了拒俄运动，其中留日学生还组织了“拒俄义勇队”；1903年，日本、美国迫使中国签订了通商行船续约，东北的奉天及大东沟一带被迫开放；日

---

<sup>①</sup> [苏] 罗曼诺夫著，民歌译：《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8页。

## 东北亚史

俄战起，东北本已生灵涂炭，日俄战争后，日俄更是分据东北地区之南北。东三省总督惊呼：“东三省非他，乃祖宗陵寝所在，而朝廷根本之重地也。此而不保，全局动摇，中国其尚能自立乎？”<sup>①</sup>因此，新政在东北具有特殊的意义。1907年，东北废将军，设总督，下辖辽、吉、黑三省巡抚，各行省公署下设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等司。徐世昌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随后，东三省编练新军，移民实边，举办实业、测绘边界，等等。可见，由于日俄对东北的侵略，东北新政带有明显的注重开发、抵御外侵的特点。

从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中国古老社会缓慢地发生着变化。在文学艺术领域，继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原则后，19世纪90年代末，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一批新派诗人、新派小说、新文体散文逐渐出现。尽管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提倡妇女禁止缠足、禁食鸦片，但是缠足与吸食鸦片仍作为痼疾而普遍存在。于是，一些提倡移风易俗者组建了团体，例如“试办不缠足会”、“延年会”等，提倡改变社会风气。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时期，又出现了一大批近代报刊。随之，公立学堂、翻译书局也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1865年，英国人在北京铺设了一条500米的小铁路，后被清廷视为妖物而拆毁。1876年，英人在上海修筑了一条铁路，不久又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直至1909年，中国才有了第一条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北京至张家口铁路。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与日本的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靠得最近，学费最便宜，也显然是最宜效法的榜样，于是成了成千上万名学生的第一个目标”，同时，“日本和中国沿海地区有络绎

---

<sup>①</sup> 王彦威、王亮编：《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6卷，故宫博物院1933年版，第11页。

不绝的往来，出版物和译著在这里随意流传”。<sup>①</sup>

然而，与中国国内发展相比，东北亚邻国和世界却几乎一年数变，不同的历史发展速度积累着差距也积累着不幸。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新政是清廷为挽回王朝命运所做出的最后努力，但它的变革却最终使自己走向历史的终点：官僚机构的名称浮华而没有实质性内容，却引发了官僚们的争斗；受到新式教育的学生和新军没有成为封建王朝的奴仆，却转化为革命的先锋；代议机构没有成为王朝的修饰，却成为士绅、商绅发泄怀疑和不满的渠道。

### 二、从辛亥革命到北洋政府

由清政府自身发动的新政，最终也脱离了设计者的航道，一场革命在新旧体制、观念及利益的激烈冲突中生成了。

孙中山就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早年自称“洪秀全第二”，尽管两者的手段有相似之处，但是，孙中山力图建立的是异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封建君主国的复制品。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他试图与流亡国外组建“保皇会”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合作，但双方一个主张以武力革命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一个主张渐进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合作没有成功，但双方的论战还是从舆论上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出版机关刊物《民报》，宣传三民主义。各地分会以及外围组织也纷纷建立。新政中的清王朝已经处在革命的前夜。

1911年4月，清政府以兴办东北三省实业和币制改革为名，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贷款协定。随后，宣布干线铁路收归国有，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当

---

<sup>①</sup>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1页。

时的铁路问题，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1903 - 1907年，全国有15个省创办了18个铁路公司，一个官办，四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商办达到13个。<sup>①</sup>在商办铁路为主的现实情况下，铁路收归国有意味着与商民的经济利益发生严重的冲突，而铁路收归后再把利权让与外国，这又涉及到主权问题。于是，因国际贷款而出现的强制性铁路国有政策，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最终炸毁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

1911年，各地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湖北革命党人决定趁机起义。但是，两个突发事件出现：一是为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清廷调派湖北含有大量革命党的新军前往；一是起义计划意外泄漏，清廷开始捕杀起义领导人及革命党。在万分危急时刻，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部分革命党人断然行动，起义在武昌及全国出现了连锁式反应：新军工程第八营攻占军械库，军械库守军随之起义，接着，新军步、炮、辎重各营及军校学生军纷纷起义。武昌起义后，汉阳、汉口随之起义。武汉起义的冲击波迅速外溢，毗邻湖北的湖南、陕西首先响应。随后，华南、华中、西北各地闻风而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此时，临时政府与中国处于关键性的时期，袁世凯趁势而起。袁世凯在朝鲜壬午事件中开始崭露头角；在小站编练新军而培植了自己的实力；在戊戌变法时周旋于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后把缺乏实力的维新派出卖给保守派，得以掌控王朝战斗力最强的新军，实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当清王朝大厦将倾的时候，握有新军主力的袁世凯成为临时政府、清廷以及列强所瞩目的人物。通过讨价还价，袁世凯利用临时政府迫使清帝退位，利用列强干涉和清廷残余势力迫使临时政府南北议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正式退位。中

---

<sup>①</sup>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8页。

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从形式上结束了。次日，袁世凯宣布支持“共和”，孙中山辞职。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中国东北也在酝酿着革命。早在此之前，宋教仁、林伯渠、柏文蔚、廖仲恺、熊成基等革命党人，鉴于东北是满清发祥之地、日俄纷争之处，纷纷来到东北宣传革命、组织力量，试图发动武装革命。随着国内掀起保路风潮，东北因利权沦丧日俄，也出现了保路运动。1907年4月，中日签订《吉长、新奉铁路协约》，规定日方投资占建筑铁路所需款项的半数，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管理大权全部归日本，吉林人民异常愤怒，掀起东北的保路运动。1908年7月14日，吉林各界爱国人士300多人召开吉林公民保路会成立大会，公布《吉林公民保路会简明草章》，提出《稟请吉长铁路筹款自筑请愿书》。

1910年后，张榕由日本东京返回大连，联络革命党人积极筹划武装起义。是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等联合抵制东北响应武昌起义。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在东北激烈展开。在赵尔巽指使下，成立奉天保安会，吉林、黑龙江仿此亦设保安会，三省府、厅、州、县也大都效法建立了保安分会，其宗旨就是防范和镇压革命。革命党人及进步人士针锋相对，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张榕任会长。随后张榕、张根仁派会员到吉林组织“联合急进会急进分会”，黑龙江成立了“黑龙江国民联合会”。然而，各地“急进会”遭到镇压，张榕等被杀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革命党人奉天新军协统柏文蔚为指挥，派兵北伐。1912年2月，柏文蔚率军在辽东一带登陆。

2月16日，刚刚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通令赵尔巽：“一律改悬中华五色旗，以示画一。”同日，张謇、汤寿潜等也电告赵尔巽，劝其考虑东北及整个东北亚的环境做出决断：“奉天接壤朝鲜，由保护而至吞并，亡国之惨，历历在目，公岂昧乎？现在某国深恐南北统一，不利于彼，百方破坏。”赵尔巽致电袁世凯提出条件：



“凡有兴革章制，三年内不强东三省以必行”，“三年内在东三省官吏，自总督以下，中央不得任意易人”，“三年内东三省赋税、军队，不调拨他处之用”。最后，赵尔巽宣称：“改中华民国，悬五色旗，用阳历。”<sup>①</sup> 1912年3月，东三省督抚制改为都督制，赵尔巽仍任东三省都督，陈昭常、宋小濂分任吉林、黑龙江都督。

东北稍有稳定，外蒙古却形势大变。俄国对外蒙古窥伺已久，不断对该地区进行渗透，据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称：“彼等五十年来着力经营”，“俄国干涉已达极点”，“势力业已根深蒂固”。趁清政府在外蒙古推行新政之机，沙俄便策动叛乱，并提供大量军火支持。9月，沙俄侵略军开进外蒙古。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沙俄的煽动和配合下，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遭到驱逐，12月，外蒙古宣布“独立”。而在此前后，沙俄俨然以其代言人的身份与中央政府进行交涉。1912年6月，沙俄向中国提出：不得干涉外蒙古内政，不得向其征兵、征税、移民，对外蒙古“有何设施或策划，须事先与俄国政府磋商，征求同意”。<sup>②</sup> 中国对外蒙古的“独立”以及俄国的言行给予了否定和拒绝。

俄国在外蒙古的行动激起了日本的贪欲。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认为：“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遇时机即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sup>③</sup> 因此，日本开始利用辛亥革命和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之机，扩大在东北的势力范围。1912年7月，日俄达成三次密约，悍然把中国的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分，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内蒙古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2、159、19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137、139、131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的利益，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内蒙古的利益。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签订了“俄蒙协约”，在该地进一步排斥中国主权，全面树立俄国在该地的特权。

1912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满蒙各地均为中国领土，未经中国政府承认的条约、矿产抵押以及少数王公贵族反对政府的行为等，均属非法。“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加以否定；北京市民行动起来，揭露沙俄的阴谋，抵制俄货；“各省代表均非常激愤”；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大会，“力主取消俄蒙协约，意气甚为激昂”；在京的蒙古王公喇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发表通电“死不承认”“俄蒙协约”。<sup>①</sup>

此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以及中国正在发生惊人的蜕变。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尽管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但是，它还是试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法律至上、分权政治。与之相对应，1912年，孙中山辞职后留下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参议院得以保存。1912年8月，征得孙中山同意，宋教仁以同盟会为核心合并组建了“国民党”，准备通过政党竞选，组建责任内阁，从而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其他政党，如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也纷纷建立。1912年末至1913年2月，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第一届全国范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国民党在国会的参、众两院均占多数，事态发展下去，宋教仁将组建起国民党的责任内阁。

袁世凯不断地做出反击。1912年一年内，在袁世凯的操纵下，迫使唐绍仪、陆徵祥、赵秉均内阁三次重组，最终建立起对其个人负责的“责任内阁”。宋教仁在全国竞选的成功显然令袁世凯坐立不安，他做出了一个拙劣而影响深远的决定：1913年3月20日，袁派人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准备北上组阁的宋教仁。与宋教仁一起倒下的

---

<sup>①</sup> 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

是中国议会政党政治。1913年7月，南方7省组织讨袁军，发动“二次革命”。由于“二次革命”组织涣散、缺乏协调、无民众支持，很快失败。孙中山等人再次流亡日本。

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加快了向封建制度的回归。1914年1月，他下令取消国会。不久，制定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终身享有并传之子孙。随之，祀孔祭天、起用清朝遗老。不久，又开始上演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在政治上的不得人心，进一步削弱了积贫积弱的中国，近邻俄国和日本加强了侵略。

1913年11月，沙俄利用袁世凯急于获得国际承认的机会，与袁世凯政权签订了“中俄声明”，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及“俄蒙协约”，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国不得在该地驻军、移民及设置官员，凡涉及该地政治、土地、交涉事宜需与沙俄协商。1915年6月，又签订《中俄蒙协约》。该协约除继续确认上述两个协约外，规定外蒙古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年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直至十月革命后，1918年北洋政府的军队开进库伦，恢复了对外蒙古的主权。<sup>①</sup>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鉴于欧美强国把注意力转向欧洲，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悍然侵占中国山东。随后，日本向忙于称帝而日益孤立的袁世凯提出了令世人震惊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并将其扩大。以合办为名独占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海湾及岛屿不得租让或割与他国。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兵工厂由中日合办，中国把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

---

<sup>①</sup>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5、456页。

间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享有建筑铁路、港口、开矿的优先权。其中，第二号针对中国东北及内蒙古：把旅顺、大连的租期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管理期限延长99年；把吉长铁路委托日本经营管理99年；日人可在东北南部、内蒙古东部往来、居住，享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以及从事农工商矿业权；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不经日本同意，中国不得允许让他国建筑铁路或向他国借款建筑铁路，不得把各项税课作抵押向他国贷款，不得聘用他国人出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或教习。<sup>①</sup>

如果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将完全受制于日本，重蹈朝鲜的覆辙。当时的英国大使惊呼：“日本对待中国的行径比德国对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更加卑劣。”<sup>②</sup>然而，袁世凯在借英美牵制日本的希望破灭后，在日本的最后通牒面前，还是与之签订了包括“二十一条”大部分内容的《民四条约》。《民四条约》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袁世凯的另一杯政治毒药。就在他于1915年12月宣布帝制后的第二年，在民众的唾骂和护国战争的讨伐中，众叛亲离的袁世凯绝望而死。

引导中国由封建向近现代前进的政党政治没有建立起来，误导中国向相反方向蜕变的袁世凯也归于失败，袁世凯后的中国陷入更大的无序和混乱：当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等北洋军阀在日本及美英的支持下纷纷粉墨登场时，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也在日本的左右下控制了东北。

此时，东北的封建经济虽然逐渐解体，但日渐形成的却是殖民地经济。考虑到东北受到日本不断侵扰和蚕食，清政府曾一度加强在东北的移民实边政策，该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加，1850至1910年

---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4~76页。

② [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版，第497、498页。

间，该地区人口由 200 余万增加到 2000 余万，60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 34.03%。<sup>①</sup> 人口的增加，促进了东北土地的开发。最初民间私垦，后改为对国家持有的荒地进行丈放。辛亥革命后，残存在东北的皇家田庄和官庄也被丈放。然而由于国力衰微、资金匮乏，沙俄及日本等国的政治、资本及商品随着一项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条条铁路的延长而大量涌入，东北的民族经济日益窒息，殖民地经济色彩日浓。以大连港为例，沙俄修建中东铁路和东北南部铁路直线后，考虑到东北的初级资源丰富及其有利的地缘位置，力图把大连建成连接欧亚大陆的远东第一大港。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大连，该港的行政隶属于关东都督府（后改为关东厅），经营权属于“满铁”。大连港大量输出东北的农林产品和矿产，输入日常用品等轻工业产品，其中以输出为主，且输出地主要是日本。另外，东北的文化教育也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例如，清末出现了《东三省日报》、《盛京时报》、《大中公报》、《醒时白话报》和《长春日报》等报刊，它们有的由中国人主办，有的由日本人主办，有的由天主教教会主办。1908 年，吉林自治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公民日报》，这是吉林省第一个新闻报刊。东北的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1906、1908、1911 年，东北三省分别成立了女子师范学堂。1908、1909 年，除女子师范学堂外，东三省的女子学校约为 36 所，女子学生千余人。<sup>②</sup>

### 三、从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成立

历史存在着悖论：作为中国历史中极为混乱的军阀时代，破碎的政治结构和悲惨的现实却为各种社会思潮、文化提供了发展的空

---

①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 页。

②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94、1395、1414、1415、1425 页。

间和被迫思考的动力。

1915年9月5日，曾经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称《新青年》，掀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强调建立民主的政治、确立科学的精神，反对专制与迷信。同时，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旧文学。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以及一大批刊物如《国民》、《新潮》、《每周评论》、《科学》等参与其中，产生了诸如《文学革命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狂人日记》、《女神》等一大批思想文化产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开始大量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孙中山也对十月革命充满期待。正当各种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一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会议、尤其是近邻日本的露骨侵略，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族觉醒。

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战胜国会议。中国代表对和会抱有两大主要的期待：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组建为各国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保证的国际联合机构等十四点建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可以收回丧失多年的利权，收回日本利用一战侵占的山东。“他们希望，中国能借此机会恢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尊严。威尔逊的民主词藻在东亚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反响”，“鼓舞了中国年轻人去期待未来的国际秩序会更为公正”。<sup>①</sup>然而，巴黎和会却很快被证明恰恰是秘密外交和强权政治的典型。尽管中国代表据理力争，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和会宣布把德国在山东的利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积闷已久的民族主义迸发出来，五四运动爆发。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商贩、普通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抨击软弱的北洋政

---

<sup>①</sup>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府。在国内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代表团采取了 80 年中国外交史中空前的举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sup>①</sup>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目睹了这一切后说：“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表现出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征”，“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法国公使波勃也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为了积极行动组织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sup>②</sup>

1921 年 7 月，毛泽东等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随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地方支部，发动工农运动，一种全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此时，愈挫愈勇的孙中山在广东仍在努力，列强对他的革命仍然一如既往地排斥或冷漠，而苏联及共产国际却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新建立的共产党实现了政党合作：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员的身份。国共合作预示着中国处于大革命的前夜。

此时，东北正处于张作霖奉系军阀的统治和日本的间接控制之下。十月革命前，日本和俄国在东北或合作或争夺，东北地方政府软弱无力，无法捍卫国家利益，地区经济被日俄左右。十月革命后，沙俄的残余势力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仍试图控制中东铁路，盘踞在东北北部。日本利用俄国的政治变化，则加紧在东北扩张，支持张作霖以间接控制东北。

张作霖不满足仅做一个“东北王”。1920 年，利用直系和皖系间爆发战争，张作霖联直伐皖，击败因镇压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的皖系段祺瑞，奉系和直系联合执政北京，奉系势力扩张至关内。随

---

①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 - 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9 页。

② 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84、285 页。

后，奉直之间以及支持它们的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由美国发起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联合抑制日本；在中国，美英支持直系吴佩孚对抗奉系张作霖。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了山东的部分利权，但又要中国赎买自己的利权。日本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分赃不均的奉与直和日与美英之间的矛盾。1922年4月和1924年9月，先后爆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奉直战争。在日本的支持下，奉系反败为胜。但是，奉系军阀在东北大规模扩军给地方经济和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又进一步使东北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在南方，国共合作开始显示巨大的威力：建立黄埔军校，设立政治部门，开展工农运动。这样，中国革命第一次有了军队、信念和群众，三者的结合使混战中的军阀在其面前相形见绌。因此，1926年7月，北伐战争一开始，其攻击便势如破竹。仅用半年多的时间，便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并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然而，军事上的胜利与蒋介石个人地位的巩固，最终使国共合作解体：共产党对工农的发动显然触动了地主、城市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蒋介石开始残酷地清洗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1927年4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一系列清除共产党、镇压工农的政变发生。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京津及东北一带。1928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兵锋直指奉系。对于中国出现统一的趋势，日本采取了干涉政策。早在1927年1月，日本外相在议会上发表演讲，宣称尊重中国领土的独立和完整，采取不干涉主义。为了防止日本的干涉，蒋介石派特使赴日本，谋求田中内阁对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统一的谅解。然而，日本对山东和东北却开始增兵，把东北和山东阻隔于中国统一之外的意图昭然若揭。1928年5月3日，日军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出兵山东，迫使北伐军



绕过山东、进攻奉系。张作霖军事上的失败，加之他对日本越来越贪婪的索取进行拖延、甚至拒绝，使日本最终决定放弃他。6月3日，张作霖返回东北，专列行至沈阳市郊皇姑屯车站附近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指挥日本工兵点燃了埋设的炸药，张作霖被炸而亡。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临时保安总司令。7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劝其实行东北易帜。12月29日，张学良顶住了日本的威胁，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国民政府，东北易帜，中国在形式上出现了统一的趋势。

南京国民政府创建之初，采取了一系列对外及对内政策。继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后，1929年收回在天津、镇江的比利时和英国租界，1930年收回在威海卫和厦门的英国租界。继1928年中美签订《整理中美关税两国关系条约》后，南京国民政府又与其他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关税条约，收回了部分关税权，但海关仍由外国人把持、中国人无权自订税率。在内政上，它力图编遣全国军队，整顿经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这些国内措施很快演化为加强个人权威、中饱私利和国民党迅速的官僚化、派系化和惊人的腐化。

更为重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源于其自身。南京临时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代表的是地主及城市资产阶级，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残破的农业社会，城市工人又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共产党被排斥在外，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是跛脚的政府。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外部。国民政府建立不久，世界经济危机便全面爆发。美英忙于内部问题，而被它们视为传统国际舞台重心的欧洲出现了德国法西斯势力。苏联正忙于自身建设，它同样更关注的是欧洲而非东北亚。因此，在东北亚地区，只剩下具有强烈对华扩张欲望的日本。

蒋介石的背叛，并未使中国共产党屈服，这为中国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力量。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7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中国

革命再次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信念与群众，不过这一次的主动权转移到共产党一边，因为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农的利益，它的政策、措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蒋介石试图解决它面临的第一个挑战，遗憾的是其手段仍然是武力镇压。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当中国处于内战状态之时，东北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危机最终使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个可怕的机器加速运转，意大利、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纷纷建立，各国矛盾空前激化。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摆脱困境、攫取利益，把贪婪的目光进一步投向中国东北，东北成为日本妄图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首要区域。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法西斯分子自编自导的柳条湖铁路爆炸声中，日军悍然进攻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为了日本民族向大陆发展和东亚的安定，正想利用这个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的悬案——满蒙问题”，<sup>①</sup>日军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战略要地，次年2月侵占哈尔滨。不久，东北全部沦陷。

当日本法西斯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之时，东北人民便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中国东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早战场。最初，一批批原东北军官兵及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与侵略者进行战斗，这些抗日武装被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袭击吉辽两省城市30余次，焚毁沈阳机场。在嫩江桥战役中，毙伤日军千余人，使日本法西斯遭到入侵中国东北以来的第一次重创。在该年4月，东北的抗日武装一度达到30余万。但是，由于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到1933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势力减弱。就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派遣大批干部进入东北，组建一系列游击队继续对日作战。1936年“汤原会议”后，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

---

<sup>①</sup> [日] 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赵宝库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页。

赵尚志分别任正、副总司令，下辖7个军，后增加到11个军。1937年，又改编为第一、二、三路军，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分任各路军的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战场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几乎隔绝的状态下，在白山黑水之间，在冰天雪地茫茫林海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东北三省的游击战争，……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一份力量。至于其给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sup>①</sup>

东北燃烧的战火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出现了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主张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联合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示同情、援助或善意中立的国家共同抗日。1935年，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日救国。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政治局会议，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

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内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国共之间奔走斡旋，牵线搭桥，为国共两党的沟通建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85页。

立了第二渠道。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向蒋介石兵谏抗日，随后，国共两党由对立走向第二次合作。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族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团结起来，自觉地投身到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洪流之中。在中国战场上形成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以前，以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为主；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两个战场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使侵华日军陷入夹击和包围之中，不能自拔。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体系的重要一环，它处于东西两翼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支撑点上，中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和顽强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中国战场对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支撑作用。当日本疯狂地入侵中国之时，欧洲的局势也在不断恶化。英法等国很快品尝到了绥靖政策这杯自酿的苦酒，希特勒德国的战车闪电般碾过东欧、西欧，英国在德国的轰炸中颤抖，苏联成为欧洲大陆最后一片孤岛。虽然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当事双方都清楚，这只是在争取攻防的时间。苏联当时面临着两难的安全困境，即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从两侧构成威胁，苏联将被迫东西两线作战，这对欧洲战场将是灾难性的。但是，中国持续而激烈的抗日作战使苏联逐渐摆脱了两线作战的梦魇。日本大量的军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抵抗如火如荼，没有稳定的作战基地，日本不敢贸然“北进”苏联。正如苏联人自己所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sup>①</sup>

---

<sup>①</sup> [苏] 瓦·伊·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中国战场也对太平洋战场提供了支撑。1941年12月8日拂晓，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日本“南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太平洋战争爆发，中苏美英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场和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联为一体。在太平洋遭到日本重创的美国坚持“先欧后亚”的作战方针，而该方针得以实现的关键就是中国军队拖住日本。事实表明，日本陆军主力被牢牢地“钉”在了中国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使日军的侵略扩张逐渐达到极限，为盟军全力解决欧洲战场和从太平洋方向逐步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邱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对中国战场评价道：“如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旦崩溃，不但就其本身来说是一场悲剧，而且也会让日本腾出大量军队向北或向南进攻。”罗斯福也不无感慨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会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切断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sup>①</sup>无疑，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历时14年，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最早、结束最晚的中国战场上，为法西斯的棺木打入了最后一颗钉子。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因此，抗战胜利的中国，出现了两种力量、两条道路的激烈对决，直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东北亚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sup>①</sup> [美] 伊里奥·罗斯福著，李嘉译：《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页。

## 第二节 日本：构建东亚殖民帝国

大正时期（1912 - 1926），日本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不平衡、不稳定，传统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过渡。大正末年昭和初  
年，一股强大的法西斯主义浊流泛起，它在吞噬了日本自身的同时，  
也给东北亚和世界带来了灾难。日本强化对朝鲜、台湾的殖民统治，  
入侵俄国远东地区，炮制伪满洲国，全面侵华，直至走向太平洋战  
争，东北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 一、民主运动与政党内阁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继位。日本在经历了内部维  
新变革和外部扩张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以严重的  
社会经济不平衡和不稳定发展、政治上的传统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  
过渡、对外关系上的对东北亚继续扩张和对欧美的继续协调为特征。

经过殖产兴业、大力推行产业化，在政府的扶植下，日本的工  
业部门诸如钢铁、运输、纺织、矿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这些部门  
里，拥有日本最先进的技术、最丰富的人才和最雄厚的资金，日本  
已经能够生产自己的成套车床、自己的军舰，这与东北亚的中国、  
朝鲜等国形成巨大的反差。然而，在这些已经近代化的领域内，其  
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强大的垄断组织例如安田、三菱、住友等开  
始形成，财阀渗透到各个领域。1913年，日本只有52家公司拥有  
500万元以上的资本，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多的中小企业。

自明治以来，农民可以根据市场而选择耕种的作物，农业也在  
商品化。农业是人数最多的部门。1915年，从事农林业的人口占总  
就业人口的54%。包括农林水产也在内，1915年其产值比重为20%

强。1915 - 1935 年，农业平均增长速度仅为 0.3%。<sup>①</sup> 与城市和工业发展相对比，农业传统产业受到冲击、城市化吸引了大量人口离开农业、日本从中朝掠夺廉价的农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等等，这一切表明农业及农村发展明显滞后。

大正时期日本经济发展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不平衡性的同时，也出现了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中日甲午战争获得巨额赔款不同，日俄战争时期和战后，日本向英美大量举借外债，国家财政压力巨大，经济发展受到制约，1907 年开始了经济危机。巨额外债利息和经济危机使初期的大正经济一筹莫展。但是，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柳暗花明。日本一方面大举占领欧美列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市场，一方面向欧洲战场提供军需产品，出现了一战经济繁荣：由外贸入超国变为出超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黄金储备增加五倍，棉布和铁生产增加五倍和七倍，<sup>②</sup> 资本向中国大量输出。然而，随着战后欧美商品重返东北亚，使日本建立在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经济“景气”消失，经济危机再次出现。钢铁、造船、生丝、棉纱等产量锐减，物价股票暴跌、商品滞销，反过来又进一步使生产受到压缩。外贸再度转为入超，大批企业破产，其中仅缫丝业倒闭者就达 3 500 家。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感叹：“全国顿时陷入黑暗，所有交易所停业，棉纱、生丝等地方机制业停工。数十天内都茫然不知所措。”<sup>③</sup>

可见，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为近代化较快的工业部门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表现为明治末期及大正初期的经济危机、大正中前期的战时繁

---

① [日] 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杨宁一、曹杰译：《产业化的时代》，上册，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5、13、14 页。

② [日] 依田憇家著，卞立强等译：《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4 页。

③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07 页。

荣以及大正中后期的再次经济危机。伴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和不稳定发展，日本的政治出现了由传统寡头政治向政党政治的过渡。

明治时代并没有随着明治天皇的离去而彻底消失，以藩阀元老为代表的寡头政治仍然残留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之中。同时，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新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和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也在加深，政党政治呼声渐高。1901至1913年，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组阁。桂太郎以长州藩阀山县有朋和军队为后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桂内阁继承了藩阀传统又加入了军阀因素。西园寺虽然加入元老院，但他主要是以政友会第二代总裁的身份组阁的。在此时期，工人运动、要求普选权运动不断出现。桂太郎对两者进行打压，推行扩军计划，藩阀元老山县有朋和井上馨等给予支持，而西园寺为代表的政党内阁间或出现进行制衡。1913年，桂太郎组建第三次内阁，日本掀起了“打破藩族，拥护宪政”的政治风潮，表达出人们对以藩阀元老为代表的寡头政治的强烈不满。桂太郎也不得不求助于政党，匆忙组建起立宪同志会进行对抗。但维护宪政运动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三次桂内阁被迫辞职。从第二届西园寺内阁垮台到第三次桂内阁辞职，恰好处于明治、大正激烈交替时期，史称“大正政变”。

随后建立起以萨摩派和军阀为背景的山本权兵卫内阁，但是不久该内阁因为“西门子贿赂事件”而垮台。在元老的支持下，又组建起大隈重信内阁、寺内正毅内阁。这两届内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干涉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7月，日本爆发了“米骚动”，民众对粮价飞涨极为不满，由自发行动阻止粮食外运发展为袭击粮店、货栈，甚至暴动。“米骚动”迫使军阀背景的寺内内阁辞职。元老面对民众的不满，只得让政友会的总裁原敬组阁。原敬组阁是日本宪政历史的一件大事。原敬虽出身上层武士，但他既无爵位亦非华族，以这样的平民身份出任总理大臣开日本宪



政历史之先河。内阁的力量不再严重依赖藩阀元老，而是开始依赖政党和政党所联系的利益集团。

政党政治发展的条件之一是普选权，因为只有民众有权参与且广泛参与政治，政党才可能有更大的基础和空间，才能问鼎政权。原敬上台后，修改选举法，通过降低选举财产资格限制的方式来扩大选举权。但是，1921年11月，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不满分子刺杀。原敬遇刺后，高桥是清出任政友会的总裁并任总理大臣，不久因内部矛盾而辞职。随后，出现了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和清浦奎吾等三届内阁，它们都是非政党内阁，并且有很深的藩阀和军阀背景，政党政治受到严峻挑战。

此时，民众及政党进一步认识到普选权的意义。以往，选举权的获得必须有一定的财产资格，且限定在男子。原敬内阁对财产资格做了微调，但大部分男子及全部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1920年，日本出现了要求妇女参政的“新妇女协会”。1924年，发展成为“争取妇女参政权促成同盟会”。为赢得民众支持、赢得选举，政友会、宪政会、革新俱乐部在这一年实行了三派联合，提出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和枢密院、建立政党内阁的口号，再次掀起护宪运动。在选举中，三派联合获得了胜利。清浦内阁垮台，由众议院占议席最多的第一大党政友会总裁加藤高明组阁。

加藤内阁力图实现政党对内阁、各省的控制，加强对军部的制约。在内阁中，除陆相、海相、外相外，都由政党人士担任。修改文官任用令，恢复各省政务次官和参议官制，由政党人士出任。政党内阁从财政角度出发，要求军部裁军。陆军虽然裁减，但用裁减的经费新建了坦克、高炮、空军等新式兵种，军事实力未减反增。1925年，加藤内阁公布了《普选法大纲》和《治安维持法》，前者规定：25周岁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但流动工人及因贫困受救济者没有选举权，妇女也与此无缘。不过，日本拥有选举权的人数由300余万增加至1400余万，其意义还是相当大的。后者规定：对以

变更国体或政体、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煽动及参加者，国家给予镇压。《治安维持法》不仅考虑到日本国内的情况，也充分考虑了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形势：1925年1月，日本与苏联建交，日本担心苏联对其国内产生影响。

日俄战争后至大正时代末期，日本在文化上表现为一定的市民化，在思想上表现为相对的多元化。日本的市民社会发展与城市化密切相关。据统计，日本市和镇的数量在1913年为69和1246，在1920年为83和1365，1925年为101和1532，<sup>①</sup>足见城市化发展之快。城市化的同时，民众受教育数量和受教育程度也在扩大和提高。日俄战争后，日本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就已经超过97%。《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和《国王》等报纸和杂志的发行分数均达到100万份以上。电话、电报、广播、电影等现代事物在日本城市内发展很快。例如，1925年，在东京开设无线广播，次年，听众人数即达到了20万。<sup>②</sup>市民文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化也带来了日本农村人口的急剧流失，村落的解体，农村在无可挽回地衰落。另外，人口集中也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例如，1923年，在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关东大地震。地震引发海啸和火灾，使这一人口密度极大的地区蒙受巨大损失。

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相对的多元化。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发表《宪法讲话》，提出主权不在于天皇，而在于国家，天皇只是国家的机关，而不是国家本身。美浓部的思想为人们认识天皇制度开阔了视野。另一位东京大学的副教授吉野作造发表文章，认为强调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不适合日本，他提出“民本主义”，即天皇“在

---

① [日]西川俊作、山本有造编，裴长洪、连湘译：《产业化的时代》，下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5页。

② [日]依田憇家著，卞立强等译：《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306页。

政治上行使国家主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sup>①</sup>无疑，吉野试图在天皇制度与民主之间构建一座桥梁。1928年11月，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滨田耕作发表演讲，在日本追求西化、摆脱亚洲半个世纪后，强调“以支那为中心，与其东方相接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因天然的地形古来形成了一个亲密的文化团体，这在今日乃自不待言的事实”。<sup>②</sup>社会主义思想也在日本得到传播，十月革命后，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在东京成立。但同时，1919年，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出现，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等组成“尤存社”，提倡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股法西斯主义的不祥暗流。

日俄战争后至大正时期，日本继续采取了对东北亚侵略扩张、对欧美列强协调的外交策略。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随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占中国山东、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入侵苏联远东干涉十月革命、1927-1928年三次出兵中国山东，等等。当日本对东北亚地区表现出积极扩张的同时，对欧美强国则表现出相对的妥协。1918-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对不涉及本国利益的欧美列强之间的争夺，日本保持沉默，但当涉及自身在东北亚的利益时则寸步不让。1921-1922年参加华盛顿会议，列强对日本在东北亚的快速扩张日益不满。尽管日本对英美心存嫉恨，但还是签订了“四国条约”、“九国条约”、“海军裁军条约”，接受了华盛顿体系。

## 二、法西斯体制的建立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出现原因可从三个方面窥其一斑：以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为特点的日本经济现代化的不平衡性，以依托天皇封建传统为特点的日本文化思想现代化的胎变，以军人干政为特点的

---

<sup>①</sup> [美] 约翰·惠特尼·霍尔著，邓懿、周一良译：《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6页。

<sup>②</sup> [日] 子安宣邦著，赵京华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畸形。

1929年10月，经济危机从美国爆发，随后向全球蔓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世界经济出现收缩与对抗的并发：收缩表现为生产及外贸锐减，价格下跌，企业裁员；对抗表现为各国提高关税，保护各自国内产业，加强贸易壁垒，而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则进行冲击。

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国家，它已经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联，因而在经济危机中未能幸免。当时的日本正试图通过解除对黄金的管制，紧缩财政，以刺激大正末期的经济低迷。结果适得其反，当大经济危机扑面而来时，大量的硬通货外流，出口锐减。如上所述，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其中之一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衡。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尽管工业及城市也是伤痕累累，但处于弱势的农业和农村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而国家加强了对重要产业的统制和保护，导致农产品价格比工业产品价格下跌严重，使农民的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农村经济受到打击也比城市经济受到的打击严重。

日本农产品价格下跌比例表<sup>①</sup>

年份	大米	小麦	蚕茧	平均
192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29	70.4	75.2	65.9	70.5
1930.7	70.7	55.7	27.6	51.3

另外，在大经济危机中，工业企业裁减人员，在打击城市工人的同时，也使由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的路径受阻，一些从农村

<sup>①</sup> [日] 依田惠家著，卞立强等译：《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来的失业工人被迫返回农村。因此，农业及农村在经济和人口流动的双重打击下，所处境地可想而知。“农村的贫困化成为战前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多为农村出身的陆军变成反产业主义和反西方主义的据点，进而形成滋生昭和法西斯的温床，并成为导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国内诱因”。<sup>①</sup>可见，尽管经济危机是日本法西斯体制出现的原因之一，但是，人们不能忽视在经济危机掩盖下的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及农村发展滞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法西斯体制在日本的出现，也与依托天皇封建传统为特点的日本文化思想现代化的胎变有关。亦如前文所述，日本的变革与中国和朝鲜有很大的不同，即是直接的变革，其变革是在名义上的传统之上的变革，新的技术、新的制度甚至新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以重构传统天皇权威的名义而被很快接受。因此，封建主义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否定和冲击而被现代化包裹起来。当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的畸变形态就会出现。

明治维新之后，在大经济危机以及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未达到空前激化之前，日本的文化夹杂着封建的传统：得到国家支持、遍布全国各地的神社，灌输家庭国家观的学校教育，宣扬国家和天皇起源的神话，对天皇的崇拜，对父母、国家、天皇忠孝的统一，等等。当然，日本文化仍存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追求，知识分子们所营造的文化氛围是对东方亚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优越感和对欧美文化的热望和劣等感。但是，当大经济危机以及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空前激化的时候，日本曾经崇拜的西方现代文化却成为日本进一步现代化的敌人，否定现代民主、自由价值的呼声在日本出现，它与明治维新后被现代外壳所包裹的封建传统迅速融合，催生出法西斯思想怪胎：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大企业要缩小，军人接管政府，

---

<sup>①</sup> [日] 富永健一著，李国庆、刘畅译：《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122页。

建立起天皇与民众的直接联系，等等。

自从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圣经”的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发表后，大量鼓吹法西斯主义的组织便出现在日本社会各界。例如，大学中的“日会”、“烽会”、“潮会”、“魂会”、“太阳会”等，军队中的“国体社”、“建国会”、“王师会”、“天剑党”、“樱会”等，其他各界也纷纷出现了“爱国勤劳党”、“血盟会”、“国粹大众党”、“爱乡塾”、“爱国工会全国恳谈会”等。这些法西斯组织与老牌右翼组织“玄洋社”、“黑龙会”一起，疯狂鼓吹法西斯思想，推动法西斯体制建立。

另外，日本存在军人干政的政治传统，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而日益加强。自封建时代，武士便参与政治。明治维新，武士成为倒幕主力，虽然后来武士特权被剥夺，但武士道却得以保存甚至光大。富国强兵，武力扩张，日本军人的地位随之得到提高。后来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日本的军事权不受政府的行政控制，日本的现役军人可出任陆海军省要职、甚至内阁总理大臣。尽管在政党政治色彩较浓的时期，日本的陆相、海相等职也要由军人担任。如果说政党政治与利益集团关系密切，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摧毁政党政治的力量之一——军队，恰恰是最强大的利益集团。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日本政治举足轻重的日本军方对政党政治越来越失去耐心。文职政府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引起军方、尤其是那些来自遭受经济危机冲击的、贫困家庭的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不满；在中国东北拥有很大利益的军方流行着日本的出路在于中国东北的观点。而此时，日本文职政府却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削弱军力。因此，军方认为必须消除政府的软弱和腐败。1930年11月，签订伦敦海军协定的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被刺杀。随后，一系列阴谋刺杀事件似乎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且愈演愈烈。1932年5月15日，一批少壮陆军和海军军官与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爱乡塾”成员，在东京发动政变，试图建立以军人为核心的法西斯

## 东北亚史

独裁统治。他们攻击银行、警视厅、首相官邸，犬养毅首相被杀。“五一五兵变”是日本国内军人要求法西斯化统治和东北亚局势发展的产物，在政变者发布的《告日本国民书》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追逐政权党利的政党及与政党勾结、榨取民众膏血的财阀，还有维护政党财阀而日益加强压制的官宪”等等，已经使日本处于危机之中，“对共产俄国东渐的抗争是必然的，因此，必须迅速建成满洲国”，“朝鲜处境也非常危险”，“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因此，“必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sup>①</sup> 政变失败后，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从此直至二战结束，政党党魁出任首相的局面再没有出现，政党政治在日本的发展受到重创。

“五一五兵变”的失败并未阻止住军方推行法西斯的步伐，但是军方内部对采取何种形式的军人法西斯独裁统治产生激烈的矛盾。“皇道派”认为，应摧毁现有国家组织和财阀；“统制派”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现存的国家组织和财阀。两派由相互角力，发展到相互残杀。1935年7月，“皇道派”的荒木贞夫陆相、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先后被迫离任；8月，“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军务局长被刺杀。此时，由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而引发的东北亚危机进一步增强，中日苏矛盾以及日本与英美的矛盾都空前激化。“皇道派”认为，在危机面前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直接的军人独裁势在必行。1936年2月26日清晨，驻扎在东京附近、即将开往中国东北战场的第一师团的大约1400名士兵在部分狂热的青年军官的率领下，断然发动了政变。他们攻占了东京的许多要地，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冈田启介幸免。政变者提出日本实行“昭和维新”等八条要求。“统制派”对“二二六兵变”

---

<sup>①</sup> [日] 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75页。

开始并不抱镇压的态度，因为两者的目的是同一的。但是考虑到任其发展下去会威胁天皇体制的统治秩序，因此，对兵变进行了镇压。

“二二六兵变”使日本的军方进一步获得发言权，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开始大肆推行法西斯化。军方进一步获得政府的人事权，设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军部进一步掌握内政、外交大权。1937年8月，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并成立以海军大将有马良桔为会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组织，加强全国的思想控制，限制集会、言论、出版自由。1938年，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国家总动员法》。同年，通过和公布了《电力国家管理法》、《国民征用法》。1940年，日本各政党被解散，代之而出现的是大政翼赞会。大政翼赞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机构或工具，其功能是整合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消除不满，统一思想。这样，法西斯政治体制在日本建立起来。

在经济领域，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也在不断滋生。经济的军事化对日本摆脱经济危机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1931年4月，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协会法和出口协会法；8月，成立统制委员会，加强国家对产业的干预。1932年取消金本位，使日元贬值。经济统制措施使日本的出口产品获得了竞争力，出口量猛增。1931-1936年间，日本的出口翻了一番。同时，在中国东北和东部的战争所产生的军需，促使日本的军工、金属、机械、化学等重工业飞速发展。日本在列强中第一个摆脱了经济危机。随着日本在中国侵略战争的加强，在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日本提出了战时经济三原则：扩大生产、平衡国际开支、调整物资供应等。1938年，公布《军需工业动员法》。1942年制定《全国金融统制令》。这样，在法西斯政治体制建立的同时，法西斯经济体制也在日本建立起来。



### 三、称霸东北亚

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激烈变化，日本对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强化对朝鲜、台湾的殖民统治，入侵俄国远东地区，炮制伪满洲国，全面侵华，直至走向太平洋战争，东北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不久，西伯利亚一带出现了苏维埃、旧沙俄叛军以及被俘捷克叛军等多种力量，日本伙同欧美列强开始了对俄国的干涉。列强出兵是出于以下目的：军事上的考虑——迫使俄国重新回到对德作战的战场上来，防止战略物资落入德国手中，政治上的考虑——扑灭十月革命，使反对革命的势力重新控制俄国。而日本则有它自己的考虑：控制西伯利亚，使其东北亚的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从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西原龟三的日记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使西伯利亚成为我之领土以在东洋建立永久和平。”<sup>①</sup>

对十月革命的干涉，是继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来列强在东北亚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1918年春，英军第一批在俄国欧洲部分的西北方向摩尔曼斯克登陆，随后法、美军队由此登陆。不久，日、美、英军队在俄国的东南方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在西伯利亚，日军成为人数最多、进攻最凶猛、占领区域最广的一支。不到一年的时间，日军已经占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在各地扶植傀儡：外贝加尔的谢苗诺夫、阿穆尔州的加莫夫、乌苏里地区的卡尔梅科夫。日本的侵略行动不仅引起苏联的抗议和抵抗，其惊人的胃口也引起了共同干涉者美国的震惊。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心要扼杀苏维埃革命。截断俄国和太平洋之间的

---

<sup>①</sup> [日] 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3页。

联系，侵占西伯利亚富饶而辽阔的土地。”<sup>①</sup> 1918年11月，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看到兵力之庞大不禁吃惊”，“日本目前在北满洲及外贝加尔东部所进行的独占控制无疑经常引起猜疑”。<sup>②</sup>

正当日本在西伯利亚加紧干涉的时候，长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发起不断的反抗。1919年2月8日，600余名朝鲜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表《独立宣言书》，引起朝鲜国内震动。3月1日，以为朝鲜末代国王高宗举行葬礼为契机，朝鲜爱国学生在汉城塔洞公园集会，正式宣读独立宣言，“独立万岁”响彻半岛。同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一方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积极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等多边舞台上奔走，呼吁列强支持其独立。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虽据理力争，但强权肆虐、彼此相护，高唱民族自决的美国竟然宣布：“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如同对英国的爱尔兰问题一样。朝鲜问题纯属日本内政，这同在我菲律宾发生的暴动一样。至于有关日本政府镇压暴动的各种报道，是值得怀疑的。”<sup>③</sup> 另一方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近邻中国、苏联等国进行双边接触，寻求合作。临时政府派特使赴广东，向孙中山提出五点要求：（1）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元首及国权；（2）请大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3）请准予收容韩国学生入中华民国军校；（4）请借款500万；（5）请准予租借地带，以资养成韩国独立军；孙中山表示：“对于流亡中国而继续坚持奋斗之贵临时政府，我护法政府自应予以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但由于护法政府目前尚无能

---

① [苏] 维戈兹基等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86年版，第475页。

③ [朝鲜] 朝鲜科学院历史所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朝鲜通史》，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7页。

力，“一切实力援助，须待北伐计划完成之后，届时当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也”。“从此两国外交关系已启，将永保善邻友好之道”。<sup>①</sup> 1920年3月，“以临时政府要人为主”的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与苏联日益接近。同年12月，两者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双方约定：在苏俄宣传共产主义、朝鲜的独立上相互支持。<sup>②</sup> 在中朝边境，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则并肩作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独立斗争。

面对东北及朝鲜半岛不断出现的反抗运动，而日军又深入西伯利亚，日本不得不开始调整在东北亚的半殖民地、殖民地政策，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和同化。在中国东北地区废除关东督都府，设立关东厅，文官可任关东厅长官，首任关东厅长官为文官林权助；台湾地区总督府的总督也可由文官出任，在严格限制下允许当地人参政、扩大受教育机会，适用日本法律。在朝鲜，武官、文官均可担任总督府的总督，实施所谓的“文化政治”，把宪兵制度改为警察制度，取消官员和教师的佩刀，为了消弥和分化朝鲜的反抗，允许部分朝鲜人担任中下级官职和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允许经过审查的朝语报纸和在监督之下的集会或结社。当日本被迫在中国东北、台湾及朝鲜调整政策的同时，苏俄也调整了政策。

苏俄为了防止在东北亚和欧洲两线作战，决定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国。1920年，设立远东局。4月，成立包括外贝加尔、阿穆尔、滨海、勘察加、萨哈林等地的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起着代替苏俄与日本等东北亚国家进行接触和缓冲作用。随着叛军的失败，1920年5至7月，日本与远东共和国进行谈判，日军从外贝加尔等地处退至滨海地区。远东共和国一边抓紧恢复生产、一边继续对叛军作战、一边与日本周旋。此时，日本与其他列强的步调越来

---

① 潘石英主编：《深厚的友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杨昭全：《关内地区朝鲜人民独立斗争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819页。

越不协调。美英法支持高尔察克叛军，而日本则支持与高尔察克素有矛盾的谢苗诺夫。互相矛盾且缺乏必要配合的各支叛军纷纷被击溃。苏俄全新的军队及指导思想，对其核心区欧洲部分经济、交通及人力的控制，这些优势在短暂的收缩后开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因此，面对残局，欧美列强动摇了。1920年，英国、美国的军队开始撤出，日本陷入孤立。远东共和国在进行军事打击叛军的同时，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先后在哈尔滨、大连、长春等地对日本展开外交攻势。美国本已对日本借机扩大在东北亚的影响心存不满，而现在日本又在西伯利亚又久拖不撤，因此，在华盛顿会议上对日本施压。与此同时，中国、日本、朝鲜对俄国革命进行支持的民间呼声日益增高，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1925年1月20日，日苏签订了《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和两个议定书。条约及议定书规定：日苏两国建交；《朴茨茅斯条约》仍然有效；修改渔业协定；日军从北库页岛撤军；双方对库页岛的矿藏资源开发进行约定，等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化、中国统一趋势的增强以及日本与欧美列强矛盾的激化，日本开始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侵略扩张。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国从形式上出现了统一的趋势，中国的发展使日本在东北及台湾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统治将面临失去的可能，而如果失去对中国东北的控制，那么朝鲜也将不保。1929年10月，从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与英国倡议召开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邀请接踵到达日本。经济危机和海军裁军压缩了日本向太平洋扩张的市场和军力。1930年11月，首相滨口雄幸被刺，日本政党政治的色彩在激烈的法西斯主义面前正在迅速褪色。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了可悲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占东北后，开始进一步分裂中国。在关东军的策划下，1932年3月1日，宣布成立“满洲国”，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满洲国”的主要行政长官表面由中

国人担任，但“国务院”总务长官、各部次长、司长以及各省的次长以下的实权职位，都由日本人担任。“满洲国”的经济主要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协定被日本占有，而“满洲国”的防务、治安、铁路、港口、水运、航空则通过所谓的“日满议定书”“委托”给日本。1934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了“日满经济统制方策纲要”，规定要对“满洲国”的交通、通讯、金融、军工、化学、电气、采矿、伐木、开拓移民等重要事业进行统制，日本官方和私人资本、企业大肆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为掠夺东北经济的两个主要代表。为了强化东北的殖民统治，1932年9月，关东军公布了“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1933年，实行连坐制的保甲法。1934年，实行“集体村落建设令”。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对东北推行移民侵略。1932年，实施“试验移民”，10月，第一批“移民团”侵入东北。1936年，日本抛出二十年向东北农业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计划，并被列为“国策”。<sup>①</sup>在文化上，强制实行“皇民化”教育，对教育、新闻、电影控制，宣扬“王道乐土”。另外，日本在东北秘密地进行化学和细菌战试验。可见，中国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和侵略扩张的基地。

日本在东北的迅速得手，进一步刺激了其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战争被作为“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而受到军人的大肆吹捧。1936年8月，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即外交与国防相配合，一方面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sup>②</sup>作为“基本国策”的一部分，日军从东北不断向华北一带侵扰，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仍然一再退让，寄希望于国联。1937

---

<sup>①</sup> 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

<sup>②</sup>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84年版，第344页。

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平津。8月，日军组成华北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分别从北、东两个方面扩大对中国的人侵。国民党政府一边抵抗，一边把首都由南京迁至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随后也离开南京迁往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1941年，中国北起东北、南至海南岛的东部地区，遭到日寇铁蹄的蹂躏。

在日军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的同时，对苏联和朝鲜也不断进行挑衅和压榨。1938年7至8月之间，日军认为苏军在位于中朝交界图们江东岸的张鼓峰越境构筑工事，双方开始小规模冲突。但很快，在冲突区域一度卷入了大量日苏军队，并动用飞机、火炮、坦克，升级为较大规模的作战。8月11日，双方停战，苏军控制了张鼓峰和附近的沙草峰。1939年5月，中国外蒙古东部与黑龙江省交界的哈拉哈河（哈勒欣河）以东诺门坎地区，日军与外蒙古和苏联军队发生冲突。至8月份的时候，日苏双方投入了10余万人、千余门火炮、数百辆坦克、近千架飞机。结果，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9月15日，双方按照苏军实际控制线达成停战。鉴于苏军在东北亚的优势，1939年5月，日本制定了“国境建设施策基本纲要”，即“北边振兴计划”，加强中苏地带的交通、通讯及军事设施，提高军队综合作战能力。而苏联针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巨变，早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就做出相应反应。例如，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中东铁路的交汇点克洛摩斯卡亚以东原均为单线，但在1932年至1937年间，从克洛摩斯卡亚至哈巴罗夫斯克间改建为复线。至1940年，哈巴罗夫斯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间的乌苏里铁路亦建成复线。针对日本构筑的虎林要塞，苏联把乌苏里铁路特意迁回到伊曼要塞的东面。

日本在朝鲜除了继续进行经济掠夺、军需等生产外，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同化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1940年开始，日本强迫朝鲜人按照日本式的姓名进行“创氏改名”；1942年，日本在朝鲜正式开展日常生活使用日语的运动，力图从精神、文化上摧毁朝鲜民族。

但是，朝鲜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朝鲜左翼政党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边武装斗争，一边争取国际支持，独立的力量日益壮大。

日本为了使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成为日本侵略的后方基地，推行所谓的“日满鲜”一体化，高度重视从交通上把朝鲜、中国和日本连接在一起。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曾提出中国东北与朝鲜铁路统一营运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进一步推行其“大陆政策”，再度提出所谓的“满鲜铁路一元化”。1933年，吉会铁路（中国吉林至朝鲜会宁）建成；1937年，图佳铁路（图们至佳木斯）建成。同时，在朝鲜北部修建清津、罗津、雄基三个海港。从而使朝鲜北部三港通过吉会铁路、图佳铁路与中国东北相联系。（如图<sup>①</sup>）不久，“朝鲜总督府”指令朝鲜邮船会社、日本递信省指令日本汽船和北陆汽船二会社投入朝鲜北部三港的海上运输。这样，既实现了朝鲜与中国东北、日本的海路联运，又出现了一条日本掠夺和控制朝鲜、中国东北的交通干线。

### 第三节 欧美列强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欧美列强一直参与着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演变，是影响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期，英美等列强在东北亚推行不断调整的均势政策，德国逐渐支持日本，日德之间形成轴心国同盟。中苏关系因日本的侵略而日益接近，当在日德同盟的刺激下日本的侵略范围跨出东北亚时，中苏美英形成对抗日德的反法西斯同盟。

---

<sup>①</sup> 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 一、欧美列强的均势政策与日德同盟建立

均势政策是世界历史演进中许多国家奉行的古老而持久的策略之一，它主要是指以一定的手段在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之间谋求相对的平衡，以此阻止特别强大的国家获得过多的优势，从而使自身利益不受挑战和威胁。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便“以‘均势原则’来维持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随着欧洲“开始了一个所谓的均势‘黄金’时期”，“它们的势力拓展到全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sup>①</sup> 欧美列强在东北亚也推行均势政策，对东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日俄经过一战，出现了三种发展的趋势：中国尽管持续衰落但开始重新觉醒，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实力大增，俄国在一战、内战及列强干涉中受到重创，与欧美世界渐行渐远，三国家间力量的变化终于导致以英美为主的欧美强国对东北亚均势政策做出调整。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尤其是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之后，日本更可能建立自己的优势，与欧洲的情况一样，战争对远东力量格局的影响也是革命性的。到1918年，甚至欧洲战争还没有结束，威尔逊已经在准备，决心挑战日本的扩张。”<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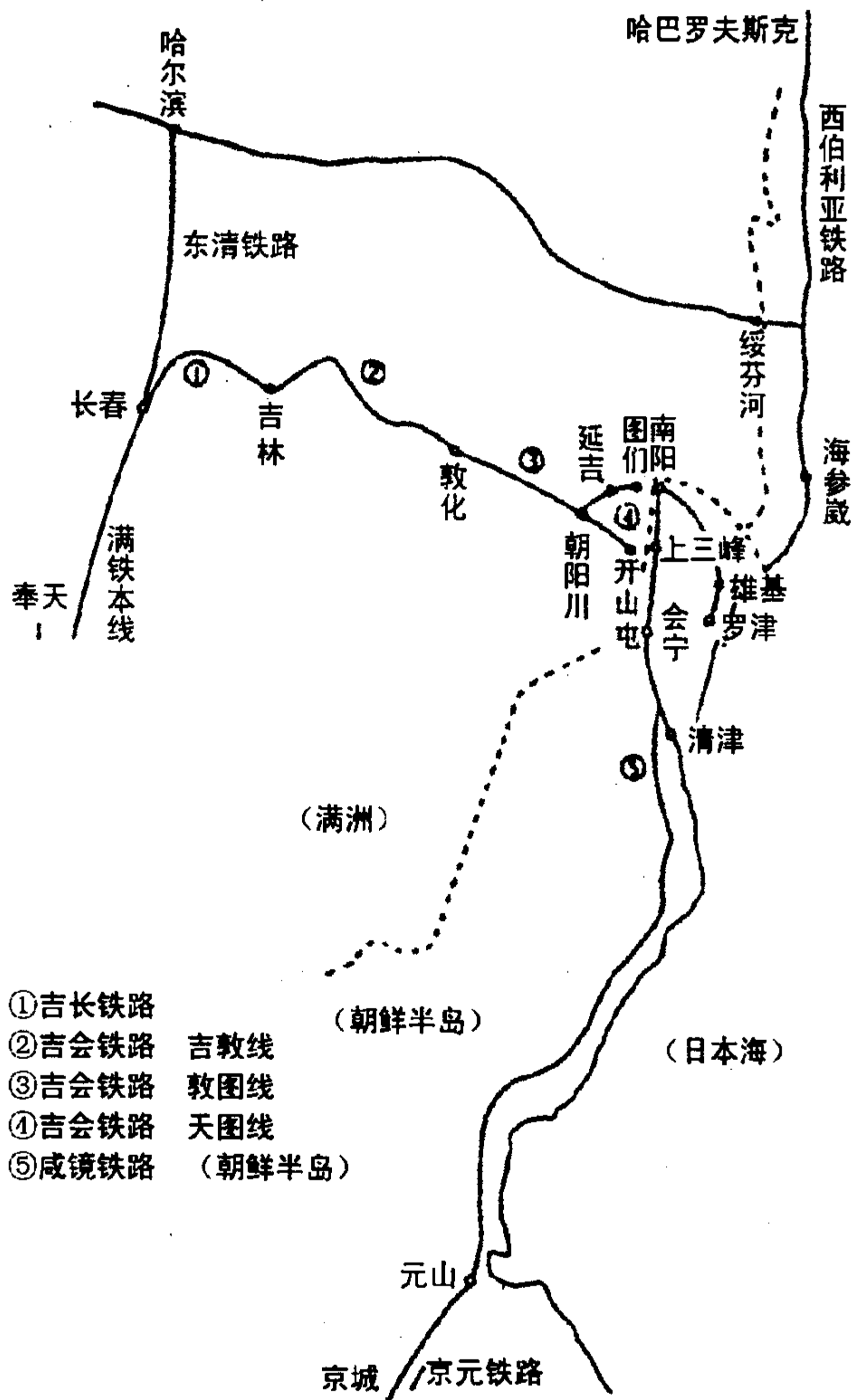
---

①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导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 [美]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著，王宇杰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0页。



吉长、吉会铁路的关系路线图



为了形成东北亚均势，英国最终放弃了英日同盟，英美法一起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接受对其海军力量的限制，并要求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非法侵占的领土及特权。如果从均势的角度看待华盛顿体系，这是在中、俄尚无法形成对日本的均势之前，欧美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抗衡日本的均势力量。

进入30年代，两点原因促使欧美的东亚均势政策发生了变化：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使英法美疲于应对，英法美与德国的矛盾上升，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法美的关注方向。因此，华盛顿体系在东北亚形成的均势发生动摇，日本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在30年代，日本在东北亚频频动用武力：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对苏联发动“张鼓峰”、“诺门坎”事件。对此，欧洲列强的均势政策明显暧昧、无力。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布了对改变中国现状一概不予承认的史汀生主义。不久，国联派出以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在中国东北及日本对“满洲问题”进行调查。6月，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警告日本不要承认“满洲国”。9月15日，日本却宣布承认“满洲国”。10月，国联发表模棱两可的《李顿报告书》，这个可怜的报告不仅得到两个直接的当事国中国、日本的反对，而且引起列强国内民众的不满。为了表明国联的态度，1933年2月，又发表了《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谴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要求日本按期将军队撤至“九一八”事变前的位置。3月，恼羞成怒的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依然武力占据中国东北。国联这一系列软弱的反应表明，欧美国家关心的方向在自身内部及欧洲局势，它们对日本的扩张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对抗。此时，英法美倾向于日本进攻苏联，在日苏之间形成新的对抗性均势，这解释了绥靖政策在东北亚的出现。事实上，日本的确对苏联发动了两次军事冒险，日苏间形成了短暂的对抗性均势。于是人们看到，当日本在1937年转而南进全力进攻中国的时候，中

## 东北亚史

国在抵抗日本入侵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苏联较为实际的支持，而英法美对日本继续采取绥靖政策。1937年11月，在比利时召开了《九国公约》会议，英国首相张伯伦的话充分体现了列强们对战火燃烧中的东北亚的态度：“到这个会议上去谈什么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sup>①</sup>会议在三周后无果而终。然而，当英美列强坐在办公室内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日本已经对在东北亚悄然行动的德国展开结盟外交。

尽管英美列强的态度是软弱的，但日本在东北亚的侵略使其陷入国际孤立却是不争的事实。继退出国联后，1934年4月，外务省情报部部长羽田英二发表“羽田声明”：“各国对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或技术援助，也必然带有政治意义”，“因此，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sup>②</sup>“羽田声明”被视为排斥其他列强插手中国的亚洲版“门罗主义”。日本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于是，日本把目光投向欧洲的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德国也一直是孤立的。随着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取得政权、希特勒把军队开进莱茵中立区，继日本之后德国也退出了国联。当日本入侵中国、欧美其他列强观望之时，孤立的德国向中国派出大量的军事顾问与中国大做军火生意。为了牵制苏联，阻止德国和中国接近，并摆脱因侵略中国东北而陷入的国际孤立，日本开始与德国接近。就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外务省欧亚司司长东乡茂德在提交广田外相的《退出国际联盟后帝国对欧美的外交方针》中提议：“在日德关系上，利用极右党掌权的机会，努力使它了解我国在远东的立场，同时促

---

① [美] 赫伯特·菲斯著，周颖如等译：《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14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84年版，第284、285页。

进日德学术文化的接触和了解，以便把德国引到我方。”<sup>①</sup> 1935年，事态的发展也使日本感到了与德国缔结同盟的必要：在这一年，日本与苏联在蒙古边境不断发生冲突，苏联与法国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

事实上，日德同盟的构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同盟时期。1934、1935年，日本海军舰队访问德国。1934年11月，日本成立了德国研究所。现实的军事需要以及日本的双重外交传统，使日本对德结盟外交深受日本军方影响。在参谋本部的支持下，日本驻德国武官大岛浩与事实上主导德国外交的里宾特洛甫进行接触。1935年11月，为进一步了解德国的意图，促进日德同盟的建立，日本参谋本部派陆战二部德国情报组组长若松只一中佐前往柏林。若松只一与里宾特洛甫、德国国防部长进行接触。

1936年2月，日本外务省从日本驻德国大使馆那里得到了日本军方正在和德国谈判同盟之事。外务省欧亚司司长东乡茂德要求军方做出解释。5月，有田八郎外相指令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从各种情况来看，有必要密切日德关系。”<sup>②</sup> 至此，日本对德结盟政策开始由军方和外务省共同推动。在此期间，国际环境继续变化。苏联批准了1935年与法国签订的军事同盟，并与外蒙古签订了军事同盟。1936年8月7日，日本制定《帝国外交方针》，确定了与德国合作的政策。<sup>③</sup> 外务省开始积极介入日德同盟谈判，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在9月份拜见希特勒。1936年11月25日，武者小路与里宾特洛甫签订了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和《秘密补充议定书》，把目标指向苏联，但没有明确的军事内容，是准同盟性质的条约。

---

① 日本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原书房1969年版，第385页。

② 广田弘毅传记刊行会：《广田弘毅》，广田弘毅传记刊行会1966年版，230页。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84年版，第346页。

然而，对于日本而言，日德准同盟关系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因为《反共产国际协定》表面是针对苏联，但其威慑英美的意图也是世人皆知。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展开，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会与苏联和英美发生正面的冲突，在此之前，孤立的日本加入同盟之中，对苏联和英美都会起到威慑和牵制作用。

日德同盟构建的第二阶段是军事同盟时期。1938年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大岛浩提议缔结日德军事同盟。日本陆军积极回应，试图通过日德同盟，迫使苏联不介入中日战争，进一步威慑英美，从而及早解决日本深陷中国战场的所谓“中国问题”。具体谈判在大岛浩与里宾特洛甫之间进行。此时的日本驻德国大使是东乡茂德，当他得知消息后提出反对，认为如果日本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日本可能被德国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陆军认为东乡茂德不宜做驻德大使，外务省把东乡调任驻苏联大使，大岛浩任驻德大使。1938年7月19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进一步提升与德国的关系。

但是，日本与德国以及日本国内就同盟针对的对象国产生激烈的争论。1938年8月，德国向日本正式提出的同盟方案中认为：缔约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的进攻时，其他缔约国有给予武力援助的义务。<sup>①</sup>这表明德国确认的同盟针对对象国不仅指1936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中的苏联，其范围扩大了；并且要采取军事行动，也表明日德关系向同盟层面发展。

此时，日本国内对同盟的针对对象国产生争论。日本外务省认为：第三国应该严格限定在苏联，针对苏联时，可以进行军事援助。但是，日本陆军鉴于自己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又时刻担心苏美等国突然的军事进攻，因此迫切需要盟国的军事支持。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提出的日德同盟方案认为：缔约国一方与苏联开

---

<sup>①</sup>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5·开战外交史》，朝云新闻社1963版，第73页。

战时，另一方或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或者立即开战，缔约国一方与苏联以外的第三国发生战争或受其威胁时，另一方要保持善意的态度。可见，在陆军的表述中出现了扩大的“第三国”。但是，日本陆军意向与德国的主张仍存在差距。同月，陆军省指令大岛浩，进行日德同盟谈判的时候，“明确主要以苏联为目标的宗旨，不可有以英美等为正面之敌的印象”，日本“不承担立即且无条件提供武力援助的义务……关于武力援助，要先进行协商”。<sup>①</sup>从现实的军事角度出发的陆军态度与外务省的考虑存在差距。海军则对扩大第三国的解释充满忧虑，因为，那样日本海军将面对两个强大的海军强国美国 and 英国。尤其是“根据1939年4月15日的命令，庞大的美国舰队又回到了太平洋水域。日本海军的高级军官，作为一个整体，强烈反对同轴心国缔结任何广泛的公约的政策”。后来在1945年日本海军上将永野修身的供词证明：“海军一贯反对同轴心国家缔结一项可能把日本卷入同英美的战争的公约。”<sup>②</sup>

1938年8月26日，五相会议勉强通过了倾向外务省意见的同盟方案。而日本陆军进一步主张：第三国不仅针对苏联，也不排除其它国家，针对其他国家时也要进行军事援助。双方争执不下。9月，宇垣一成外相辞职。11月，有田八郎外相把外务省的观点向陆军做了倾斜：“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等国一旦加入苏联方面则即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sup>③</sup>其间，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骥一郎组阁，有田留任。1939年1月，日本再次召开五相会议，讨论同盟的针对对象国。此次通过的同盟方案是去年11月有田方案的继续：同盟针对苏联，针对苏联时，进行武装援助；但根

---

① 雄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27、231页。

② [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编，劳景素译：《大战前夕：1939年》，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7、1128页。

③ 《现代史资料》，10，美玲书房1978版，第189页。

据情况，也针对第三国，并且针对第三国时是否援助以及援助到何种程度，也根据情况而定。尽管日本为了构建日德同盟已经对同盟针对的对象国做了扩大解释，但有田外相深知这种对象国扩大化所带来的危险：“在努力减少我国可能蒙受的不利之同时，应对外说明，这仅仅是反共协定的强化，以减少可能来自第三国的恶劣影响。”<sup>①</sup>但是，不仅陆相板垣、驻德国的大岛对有田的方案也不满，而且德国也对日本的拖延失去耐心。1939年4月，里宾特洛甫对日本发出警告：“如果德日间的条约谈判过于久拖不决，德国可能必须以某种方式去接近苏联。”<sup>②</sup>5月22日，德国与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8月23日，令日本及其他列强目瞪口呆的是，德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平沼内阁总辞职。

直至1940年，日本视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为其全力南进的巨大战机。日本北进政策改为南进政策，南进政策必然与英美发生冲突。外务省和海军一直回避的冲突在所难免，逐渐转而支持扩大第三国的解释。而此时的日本外相由松冈洋右出任，他一改以往外务省对同盟的态度，认为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仅仅表示“在不参战范围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合作”，是吞温水不解渴，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sup>③</sup>1940年9月27日，日本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同盟条约规定：三国“承诺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sup>④</sup>

---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84年版，第408页。

② 远东军事法庭裁判所言语部，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页。

③ [日]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50、651页。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84年版，第459页。

总之，尽管在该时期欧美列强的东北亚均势政策乏力，但在中国的英勇抗击下，还是使不断侵略扩张的日本日益孤立，它为了摆脱孤立并扩大战果，与欧洲的德国缔结了同盟，有了同盟支撑的日本挑起了更大规模的战争。

### 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中国以巨大牺牲为代价英勇抵抗日军侵略、苏联在欧洲遭到德国的进攻、日本在日德同盟的支持下跨出东北亚进攻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促使英美列强重新调整东北亚均势政策。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在东北亚的侵略，也促使中苏不断调整两国的关系。最终，出现了中苏美英反法西斯同盟对抗日德同盟的局面，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1940年和1941年，欧洲和亚太的战局使英美陷入巨大的不安之中，促使英美最终放弃了日苏均势政策。首先，1940年，德国在欧洲彻底击败法国、荷兰，英国完全暴露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之下；1941年，德国突袭苏联，苏联的欧洲部分迅速遭到重创。欧洲的战事改变了东北亚的均势。因为一方面，德国占领法国、荷兰进而直接威胁英国，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均势，而且“这三个欧洲强国控制了东南亚的大部分，那一富有资源的地区现在成为日本公开的侵略目标”。日本全力进攻并占领英国、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日本控制的资源进一步增多。骄横已极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另一方面，苏联作为在东北亚“对付日本的巨大平衡力量”也遭到致命的削弱，<sup>①</sup>德国的闪电战使它损失惨重，苏联被迫更加关注来自欧洲德国的巨大威胁，而把来自东北亚日本的压力放到次要位置。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日本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和在东北

---

<sup>①</sup>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363页。



## 东北亚史

亚遏制日本的均衡力量的减弱。

其次，1941年7月，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对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军事基地虎视眈眈；12月，突袭美国用以制衡东亚、防卫其本土的海军重地珍珠港。这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表明，日本对美英东北亚均势政策公开的挑战。因此，英美决定直接作为制衡日本的力量投入东北亚，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英美与中国、苏联联合起来，以重建东北亚的均势。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这样，继日德同盟之后，又出现了中苏美英同盟。

随着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以及英美均势政策调整，东北亚国际关系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日本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在中国迫切需要国际支援的危急时刻，李顿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以孙科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遍访西欧寻求援助，两者均毫无结果，美英未能出手援助。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残余的既得利益消失殆尽，日苏对峙的局面随之进一步强化。此时，中国和苏联共同面临日本的严重威胁。因此，1932年，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为中国抗日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武器援助，还派遣了数千名军事专家、数百名志愿飞行员来华作战，在道义和物资上给与中国以巨大的支持。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苏联摆脱了在国际上的孤立，缓解了日本对苏联在东北亚的压力。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欧战爆发，苏联是中国抗战最大的援助国，两国在对抗日本侵略和威胁中互相支持。

自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国民党政府一直迫切需要苏联、美英直接出兵东北亚，参加对日作战。然而，美国虽然在太平洋上展开对日作战，但是它的“先欧后亚”战略决定了美国不会在东亚陆地上投入过多的兵力，英国更是分身乏术。因此，中国自然寄希望于苏联远东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苏联也有苏联版的“先欧后亚”战略。苏联地接欧亚，这决定了它的地缘战略考虑：避免东西两线作战，

如果迫不得已，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俄）的经济重心一直在欧洲部分，而远东地区经济相对薄弱，地区广阔，战略回旋空间与欧洲部分比相对较大。因此，苏联一直避免陷人与它国的直接战争、尤其是两线的战争，或至少延缓战争的到来时间。正如斯大林所说：苏联要在外交上“小心谨慎，决不让那些惯于假他人之手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sup>①</sup> 无论美国版还是苏联版的“先欧后亚”政策的实现，都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即中国继续以巨大的牺牲阻挡日本的进攻而不崩溃。对此，斯大林和罗斯福观点是相同的：“即遏制日本扩张的最佳途径是使东京的军队在中国被牵制住。”<sup>②</sup>

因此，当中日在血泊中长期厮杀的时候，中国所希望的苏、美直接出兵援助迟迟没有出现。相反，随着欧洲的战局和日本进攻方向发生变化，中苏关系开始有所降温。1939年，苏德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苏关系随之改善，1941年，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德国突袭苏联，为了避免欧亚两线作战，苏联力求全力对抗德国，避免激化苏日矛盾。不久，日本在“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后，最终放弃“北进”攻击苏联计划，全力实施“南进”攻击美英势力的范围东南亚。此时，苏日关系出现微妙的相互需要：苏联需要日本减轻起对东北亚的压力，日本需要苏联减少对其南下的压力，双方分别需要把东北亚的军力抽调至欧洲和东南亚。于是，绷紧的日苏关系相对缓和，中国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

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1943、1944年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德国、日本的进攻被有效的遏制，苏联、美国等开始由防守转为进攻。

---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34页。

② [美] 迈克尔·谢勒著，徐泽荣译：《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7页。

## 东北亚史

苏联欧洲部分的压力明显减轻，苏联在东北亚开始由低调防御转向积极介入，苏联逐渐从战后的角度看待东北亚国际关系。苏联一改以往对华关系的冷淡，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如果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1944年12月，苏联先与美国就此事进行了磋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美、苏、英签署了一份《关于日本的协定》。作为苏联出兵的条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与南满铁路、维持外蒙古现状。在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中写道：“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sup>①</sup> 盟友中国的合法权益淹没在雅尔塔会议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声中。

此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局面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国民党政府的对苏外交陷于矛盾状态。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的斗争，国民党政府害怕中苏关系改善会强化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时需要苏联军事力量的介入，尤其在美国的压力下，这种需要被进一步强化：美国需要苏联出兵以降低美军在东北亚的消耗，因为美军认为在日本本土的作战将是代价高昂的；另外，美国也需要苏联对其单独占领日本和在华享有特殊利益的承认。因此，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展开谈判。美国的赫尔利积极斡旋，在得到莫洛托夫保证苏联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后，蒋介石才同意签订条约。1945年8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互换两个照会及其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中国大

---

<sup>①</sup>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04页。

连之协定》、《关于中国旅顺口之协定》及《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事实上，从雅尔塔会议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侵害了中国的主权。

无论战争处于何时，中苏关系的接近对日本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日本采取了以外交手段笼络苏联，以军事和外交手段对付中国的政策。为调整日苏关系，日本采取了直接和间接两种策略。

日苏直接接触。1943年6月，日本通过了《关于当前对苏施策》，试图通过解决日苏间的北库页岛和渔业问题来改善日苏关系。经过双方的谈判，1944年3月30日，日苏两国缔结了关于日本出让北库页岛石油和煤炭利权的协议书，同时决定日苏渔业协定延长五年。当时日本对日苏关系的期待是：“继续维持中立关系，进而谋求邦交的好转。”<sup>①</sup>然而，日本改善日苏关系的努力很快便被证明是徒劳的。雅尔塔会议后，1945年4月，日本接到苏联的正式通告，日苏中立条约将不再延长。日本不甘心日苏关系的彻底破裂，期盼利用日苏关系挽救处于绝境中的日本，利用苏联实现日本与中美英的和平。1945年7月，日本做出《派遣赴苏使节》的决议，企图让苏联在中国、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不久，苏联给予了拒绝的答复。

促使苏德和解，间接调整日苏关系。1943年8月19日，日本政府作出决议，规定“今后仍将试图反复为实现德苏间媾和尽最大的努力”。25日，外相重光葵一方面指示在柏林的大岛必须斡旋“德苏媾和”，一方面在东京和德国驻日大使施达玛举行会谈，试图通过日本在柏林和东京的努力促使德国改变态度，接受日本的调停主张。9月14日，施达玛奉本国政府指示转告日本外务省：希特勒无德苏

---

<sup>①</sup>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84年版，640页。

媾和之意。但是，日本仍不死心，妄想可能的条件下，“尽量谋求德苏之间的妥协”，“力求缔结针对美英的日德苏同盟”。直至1944年8月19日，重光葵外相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仍然强调：“德苏媾和，使德国得以余力专注于对美英作战，这一向是我们殷切希望的。”<sup>①</sup>

日本在试图以直接和间接外交手段维系脆弱的日苏关系的同时，对中日关系则采取了外交和军事双重手段。1944年5月，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试图谋求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军事压力、为战略后撤做准备两种目标。同年8月，日本制定了《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要纲》，试图以向中国一定程度的妥协为条件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然而，日本的策略均以失败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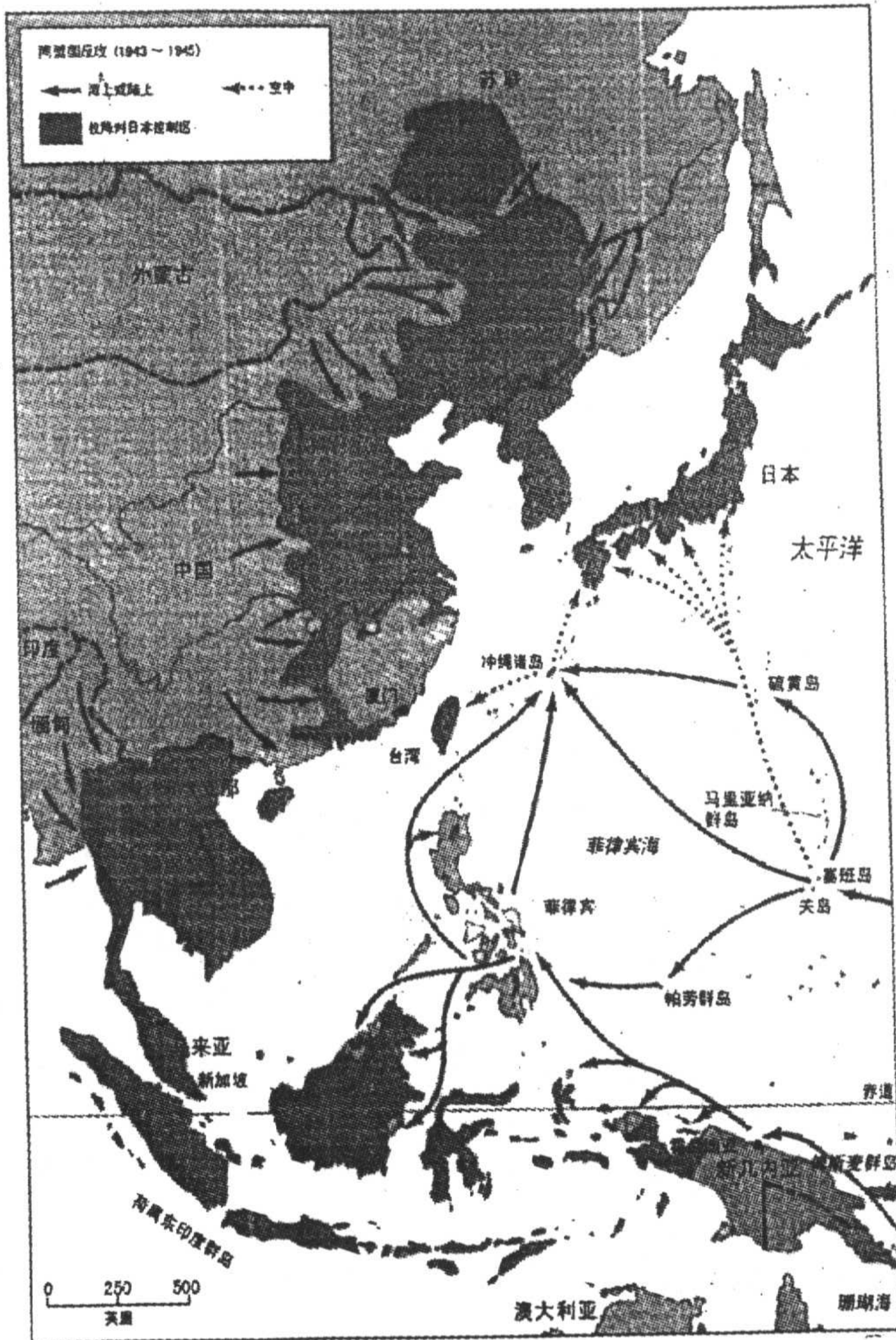
1945年7月，中美苏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的抗战转入反攻阶段，朝鲜人民更加英勇地抵抗。8月6日、9日，两股巨大的蘑菇云在长崎和广岛升起，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两颗威力空前的原子弹。在此期间，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如图<sup>②</sup>）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最终在投降书上签字。一个时代结束了。

---

<sup>①</sup> [日] 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赵宝库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61、1169~1170、1161页。

<sup>②</sup> [美] 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53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亚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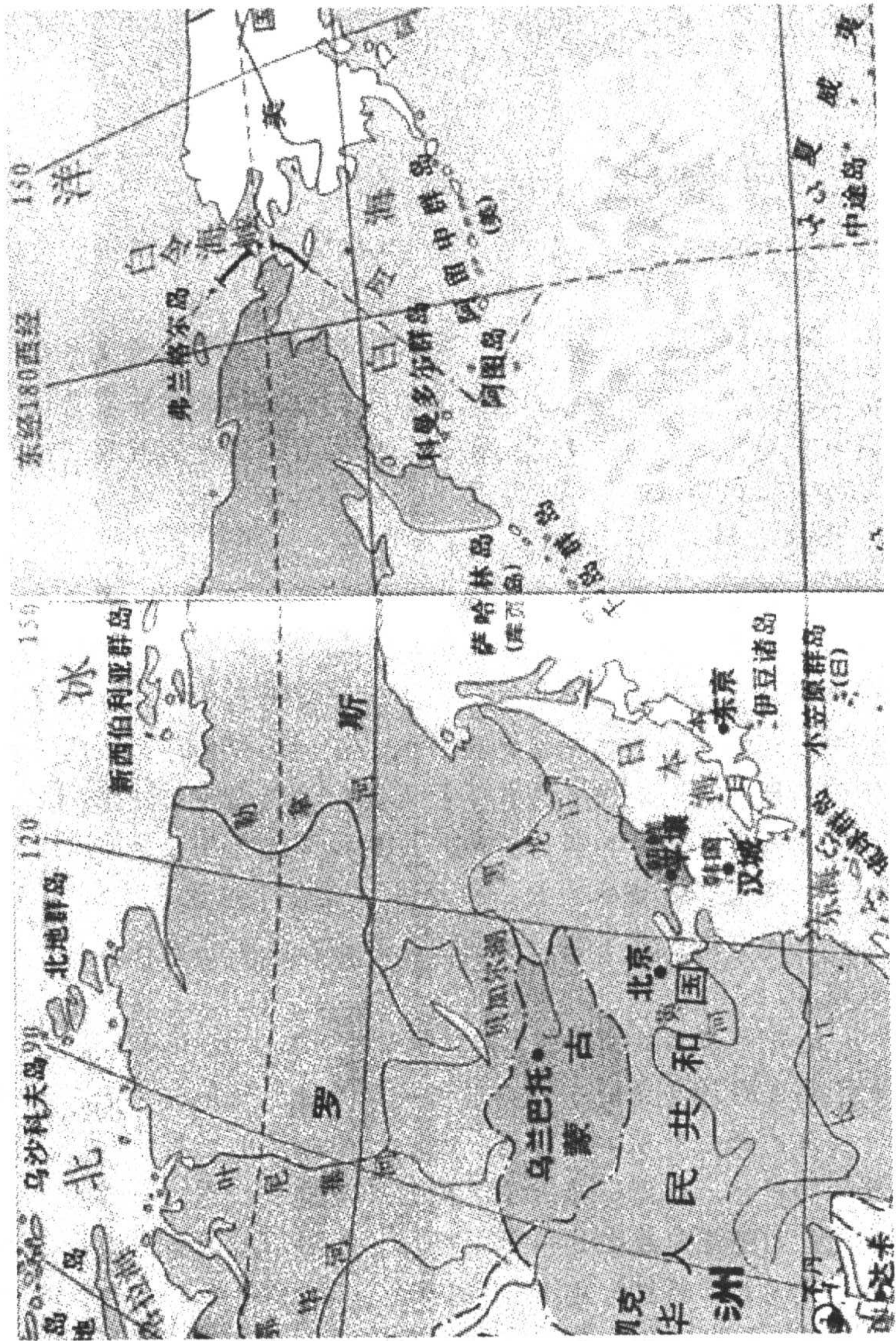
# 第四编

两极化与多样性(1945—1991)





东北亚两大阵营对峙示意图



## 导言

东北亚各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充满了沧桑和动荡。西方列强的冲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和战争的破坏成为这部历史的主题曲。但是随着二战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这种转折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层面。

二战后东北亚地区政治层面的最大变化是东北亚各国都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内战并走向了新生，朝鲜半岛在分裂中走向独立，蒙古的独立得到承认，日本在美国的托管中走向政治的民主化再生。虽然在外部和内部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各国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而韩国和日本则选择了资本主义，但是其共性在于摆脱了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法西斯等非正常的国家形态，走向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和战争的破坏，东北亚各国政治独立之后，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难题。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共性在于国家对于经济的超强干预，并相继采用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国情的差异，各国也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命运。一般认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三波历程，第一波是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于1968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强国；第二波是韩国经济的奇迹，以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为基础，韩国也创造了“汉江奇迹”，跻身于东亚四小龙之列；第

三波是中国，经历过种种坎坷之后，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探索，逐步发展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

在国际关系层面，东北亚地区成为二战后国际格局的一个缩影。二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而这种局面在东北亚地区有非常典型的体现：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结成了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统领的日本、韩国相对峙，使得东北亚地区成为继欧洲之后，冷战特征最明显的地区。而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的第一场热战，则更固定了这种冷战格局，东北亚地区降下了一幅沉重的铁幕。

随着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的缓和，冷战的坚冰率先在东北亚地区开始融化，东北亚各国的发展空间相对扩大，日朝关系、中韩关系、苏韩关系、朝韩关系等都有所发展。但在东北亚局势发生变化的同时，仍然存在不变的因素，朝鲜半岛的僵硬对峙、日本和苏联关系的僵持又标志着东北亚发展在某些层面的滞后。

随着东北亚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形势的变化，各国出现了不同的战略期待，其中中国、日本的全方位发展将再次对这一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1945-1991年的美苏冷战格局加剧了东北亚的分裂，并且为东北亚各国制造了更多的矛盾与冲突，同时给东北亚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但也正是在冷战期间，中国完成了自身的蜕变，不仅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在经历种种坎坷和曲折之后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从而为东北亚新的意义上的区域化创造了条件。

## 第七章 走向两极：东北亚国家的分化组合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二战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特点是和平政治取代了战时政治，和平、民主、独立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的相悖，美苏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冷战。战后国际环境的双重特点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是它使这一地区的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了民族独立国家，其中中国、朝鲜、蒙古等国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美苏冷战的爆发和发展，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内政和外交避不可免地与冷战局势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

在二战及冷战的双重背景之下，东北亚的两极格局下的七方（中国、日本、蒙古、苏联、朝鲜、韩国及美国）局面初步形成。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虽然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东北亚国家，但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基于其覆盖全球的普遍利益、霸权愿望、经济影响等因素，美国一直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从这一区段开始，本书也把美国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一个角色看待。

虽然欧洲一直是冷战的重点地区，但是冷战中的第一场热战却率先发生于东北亚地区，美苏在朝鲜半岛人为划分的38度分界线，虽然几经厮杀却依然如故。它标志着继欧洲之后，又一个重要地区被卷入冷战。之后，东北亚各国的关系经过“热战”的洗礼得到了

彻底的重组，于是在二战后冷战的“大气候”下形成了一个东北亚的“小气候”，并且具有自己的独到特征。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衰落的道路上滑行，但是二战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中国提供了选择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机会。二战后，中国主要面临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势力的抗争，最初，国民党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恢复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还有一支430万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在国际上，其统治也得到美、英、苏等大国的支持。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违背战后大势的战争与掠夺行为使其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强大。中国内战的结果既有内因的决定，也有美苏对峙这一外因的推动，冷战与内战交错运行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的新中国。这一事实对东北亚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二战后的国际形势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书，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结束，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战前的国际舞台上英、法、美、德、意、日等六个强国并存，而且是以欧洲为中心，然而战后的国际形势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战争中被彻底打垮，不仅失去了殖民地、国外投资等海外权益，而且本土被占领，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因此在一段时间

内被排除出大国的行列。英法这两个传统的欧洲强国虽然是名义上的战胜国，但也遭到严重削弱。二战标志着英国百年霸权的彻底终结，英国的财力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已经从战前的债权国变成负债累累的债务国，经济实力的衰弱使英国不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国际地位下降到二流国家。法国的实力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削弱，而维希政权与法西斯国家的合作更是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形象，虽然由于戴高乐将军坚持抗击德国，在英国的提携下勉强进入大国行列，但是国际影响已经沦为三等国家。

与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衰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美国力量的急剧膨胀。战争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在二战中，美国本土没有成为战场，生产能力没有遭到破坏，而自从实施《租借法案》以来，美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上，美国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值的 1/2，外贸出口的 1/3，黄金储备的 3/4。<sup>①</sup> 在金融方面，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合法地控制了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军事上，美国在战后初期一度垄断了原子武器，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美国的军队驻扎在 56 个国家，遍布各大洲，到 1947 年，美国在海外已先后建立了 484 个军事基地。<sup>②</sup> 由于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美国已经跃居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促进了美国政治野心的膨胀，杜鲁门总统表示：“美国今天是一个最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领导人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开始全面卷入世界事务。

---

① 齐世荣主编：《15 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78 页。

② [美] 戴维·霍罗维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63～64 页。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过战争的洗礼，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同步扩大。在战争中，苏联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到战争结束时，苏联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军队；通过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领土调整和出兵境外，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欧“心脏”等重要地区，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而这一时期欧亚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更壮大了苏联的力量，因此苏联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有能力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和政治强国。

综上所述，二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特征是由战前的“多极”转变为“两极”，在这“两极”之间，由于战略目标的根本对立，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在东欧、中欧、中东和远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这种背景之下，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等为标志，美苏之间的冷战逐渐爆发，美苏之间迅速由战时的盟友转变为冷战对手，这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由于美国和苏联在战争中和战后对东北亚地区的介入，这种特点对于东北亚地区乃至中国的前途具有极大的影响。

美国全球战略计划实施的重点是欧亚大陆两端，虽然东亚地区的地位没有西欧重要，但是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美国最初完全把“稳定”、称霸亚洲的支点设在中国大陆，早在二战进行过程中，中国的战略地位就开始引起美国决策者的重视，当时美国不仅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和经济援助，希望中国可以成为抵抗日本的中坚力量，而且在二战后期的大国会议上，罗斯福也极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的设想就是希望中国可以成为美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支点，“充当阻止苏联在东北亚可能扩张的缓冲地带”，并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因此，在二战后，美国积极介入了中国的内部纷争。

苏联在二战后期介入东北亚地区的条约标识是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和8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两个条约直接关系到外蒙古及中国东北的命运。《雅尔



塔秘密协定》规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包括，“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必须恢复”，“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之租用旅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需要中苏共同经营等内容。中国国民党政府几经外交斡旋，最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上承认了苏联的上述权益。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后，苏联红军控制了东北和朝鲜北部，正式介入除苏联远东以外的东北亚地区，成为左右这一地区的重要变量。

由于美苏势力对东北亚地区的介入，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内政外交必然受到这两个大国抗争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主要体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

## 二、中国内战

二战的结束给中国带来一次重新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二战结束后，中国存在三种政治势力，他们代表着中国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种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他们当时在国内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国际上也得到各大国的承认和支持；第二种势力就是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共产党及其军队，解放区是其强大的后备力量；第三种势力是指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三种势力争议的焦点是国家政权问题，在建立什么国家这一问题上，三派亮出了自己的方案。蒋介石的目标是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中国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民主党派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由于建党较晚、没有军队等因素的作用，第三种势力在当时不可能成为竞争政权的主导力量，但是在反对独裁、实现民主的这一目标上，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结盟，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较量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面对中国的形势，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抱有不同

的想法。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完全摆脱一切牵连；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一方面援助国民党，一方面鼓励双方进行协商，尽量避免内战的发生。前两种选择在当时是没有可能性的，放弃中国意味着美国放弃在东亚地区的存在，而在二战刚刚结束后，也不可能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的政策是希望中国既避免革命，又避免内战，从而和平建立以蒋介石为主导的联合政府，期望“将共产党人以一种类似西欧共产党所占的地位，纳入一个宪政政体的政治和军事范围之内。敌对的两党将共同参加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sup>①</sup> 这种政策主观上具有矛盾性，因此客观上在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推波助澜。

出于维护在东北既得利益的考虑和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不信任，苏联表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后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因此力促国共和谈，1945年8月22日，苏联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和谈。

在这种背景之下，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与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并最终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称“双十协定”）。该文件的内容涉及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重庆谈判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解放区政权问题与军队问题的悬而未决，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且在重庆和谈的过程中，国民党就在美国的帮助下，将大批军队运送到内战前线，频频进犯解放区，在此期间，人民军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张家口战役、邯郸战役等保卫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谈判斗争。重庆谈判之后，蒋介石制定了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并在实际上扩大了内战。

---

<sup>①</sup>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64~265页。

“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国共关系“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和中酝酿战，战中酝酿和，斗争是严重的复杂的”。<sup>①</sup> 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作为特使赴中国“调处”国共之间的争端。在马歇尔的建议和调停下，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代表团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月10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青年党代表、民盟代表和社会贤达共五方38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他们代表的三种国家政权主张的复杂的较量进程。会议就政府改组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队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国民党中民主分子的努力，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不同程度地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再次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虽然会议通过的原则没有被贯彻实施下去，但是会议表现出来的协商精神和确定的政协路线，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深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对其统治不力，因此采用种种手段破坏政协协议。同时，蒋介石还推翻停战协定，做全国性的军事部署。早在抗战刚刚结束之时，国民党政府就加紧准备内战，它积极将军队从后方调往内地抢夺胜利果实，布置军队抢夺战略要地。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美国政府经济、军事上的极大帮助，美国动用了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运送蒋介石军队去抢占大城市和主要港口。在蒋介石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谈判尽力争取和平，另一方面也采取种种有力措施积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在东北爆发的。毛泽东很早就关注

---

<sup>①</sup> 转引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东北地区地大物博，是当时国内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东方鲁尔区”之称，而且背靠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是国民党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区”，“如果我们把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sup>①</sup>在二战后期东北成为苏军的实际控制带，美国不能染指，因此具有共产党发展的有利条件。早在重庆谈判进行期间，针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派干部和军队挺进东北地区，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之后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林彪等人先后进入东北，同时经刘少奇提议，中国共产党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发展方针，先后从山东、华中、华北等地调兵遣将进入东北，10月31日出关部队与原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担任总司令。初期进入东北的部队得到了东北苏联军队在装备上的有力支持。当时中共确立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东北之外。

在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的时候，美国出于抗衡苏联影响的考虑，帮助蒋介石把军队迅速运入华北等地，并准备向东北运兵，力图对东北进行武力接收。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通向东北的门户被打开，随后占领锦州等战略要地，同时苏联政策发生逆转，要求中共人员撤离东北各大城市。中共决定将对东北的控制从城市转向农村，东北局也调整战略，相继成立了南满、西满、北满和东满四个分局和各自下属的军分区，从此中共走出东北大城市，“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展开了一向拿手的发展根据地的战略”，由于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劳力等一系列困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与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到1946年初，“中共在整

---

<sup>①</sup>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33页。

个东北的广大乡村已经占据了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优势”。<sup>①</sup>

苏联原定在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撤出中国东北，但是几经延滞，直到1946年5月才撤出。苏联不断延期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对东北的掠夺需要，斯大林曾经指示，“不要留下任何能够移出满洲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压制国民党促成掠夺性的经济合作。但是围绕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国民党不愿让步，美国也公开指责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行为，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为此苏军在撤出的同时，决定以鼓励中共在东北发展的办法给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制造困难，因此将撤出地区的管辖权交给了中共，而美国也协助国民党将大批军队运到东北，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在东北的较量正式展开。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军事较量最典型的体现是四平之战。该战役从1946年4月17日持续到5月18日，这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之间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激烈程度最深的第一场战斗”，战斗的结果以中共的撤退为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长春、吉林等城市，进到松花江南岸，与中共军队隔江相望。之后，部分出于巩固阵地和集中关内作战的考虑，部分出于对苏联的顾虑，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然而东北内战引发的战火已经不可能熄灭，6月26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之后，全国内战全面展开。

内战全面展开后，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从1947年起进行全面反攻。1948年，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其中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从东北暂时停战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利用

---

<sup>①</sup> 张振江著：《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北临苏联、东邻朝鲜和西靠蒙古的有利条件，取得苏联的物资支持，并利用通过朝鲜转运伤兵和弹药的便利条件，逐渐把东北建设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经过“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等战役，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这三个地区，东北地区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上升到30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占有优势，而且，辽沈战役使解放军取得了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东北全境的解放也使解放战争获得了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后方，为解放华北和全国准备了必要条件，东北成为“蒋家王朝”没落的开始。

经历过三大战役的决战，到1948年底，中国战场的胜负已经泾渭分明，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一败涂地，病人膏肓，开始实施“脱身”政策，与蒋介石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拒绝在军事和经济上大量援助蒋介石。蒋介石政府已经在国内外均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其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淘汰了国民党。二战结束初期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蒋介石政府，之所以最终面临失败的命运，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内战政策，正如费正清所分析过的，蒋介石“漠视了公众的和平运动”，“国民政府已经变得如此之军事化”，以至于他对问题“只想到军事解决，至于作为政府应为公众服务些什么，一概置之不顾”。<sup>①</sup>

导致蒋介石失去政权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经济因素。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国民党在经济上的疯狂掠夺更是导致其下台的重要因素。

---

<sup>①</sup> [美] 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47页。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在抢占战略要地的同时，就开始进行所谓的“接收”，它们把沦陷区分为苏皖浙、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七个接收区，又从上到下成立起敌产处理机构，但是由于接收单位是多头的，仅在上海接收单位就多达89个，致使在接收过程中你争我夺，一片混乱。许多机关和官员假“接收”之名，行贪污盗窃之实，大发“胜利财”，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更依靠它们的权势地位和经济实力，打着“官方”旗号进行接收，使它们的官僚资本恶性膨胀。

国民党政府还乘接收的时机，以不合理的比价（法币1元兑换伪币200元）强迫居民用伪币兑换法币，这一“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使得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又乘机大捞了一笔。

经过接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急剧膨胀。国民党政府的搜刮使得收复区的居民对其所抱的幻想很快破灭，当时京沪平津一带流传的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表明国民党不是在接收，而是在“劫收”，国民党的威信在逐步丧失。正如当时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所说：“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

导致国民党下台的第三个因素是出卖主权和民族权益，在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就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得了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的“援助”。美蒋之间签定了许多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和协定，其中最主要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定的《中美商约》，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的底本是美国提出的，名义上该条约是一个通商条约，但实际上美国在中国早已享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特权，都在条文上确定下来。国民党政府还同美国政府签定了《中美航空协定》、《中美救济协定》、《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这些协定涉及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特权，是中美商约的扩大和具体化。在上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几

乎独占了对华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这种出卖民族主权和利益的行径使近百年来深受民族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分外地反感。

由于以上三个因素，在国统区内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从而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它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紧密配合，加速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与国统区的经济崩溃导致失去民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解放区的经济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它成为共产党得到民众支持的重要根基。土地改革是解放区经济政策的核心，它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民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sup>①</sup>自中国共产党发布《五四指示》以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经获得了重要成果。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农民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该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法大纲还规定乡村农民大会或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和区、县、省等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和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各解放区立即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高潮，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解放区广大农民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在土地法颁布后的一年内，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这成为支援革命战争和促进解放区发展生产、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国民党政权的丧钟敲响之时，中国共产党为接管全国政权进

---

<sup>①</sup>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前途以及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中国的外交方针作了明确阐述。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而人民在现阶段所指的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指导思想。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中《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它确定了新政权的基本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纲领还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民族、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9月30日，会议进行选举，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此外，还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下午3时，首都30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震撼世界的开国大典，毛泽东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从此开始“以新的制度和新的形象向世界展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局面，中国历经长期的殖民地命运、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终于迎来了和平与秩序、统一与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它也是东北亚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独

立、统一的新中国重新屹立于东北亚地区，标志着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再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第二节 朝鲜半岛的分裂与朝鲜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日本在朝鲜半岛多年的殖民统治，朝鲜的发展似乎迎来了新的曙光，然而，由于战后在朝鲜半岛形成了美、苏两个军事占领区，美苏冷战的对峙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朝鲜人民建立统一国家的愿望化为泡影，朝鲜又遭到长达几十年的“国土两断”之痛。

### 一、朝鲜半岛的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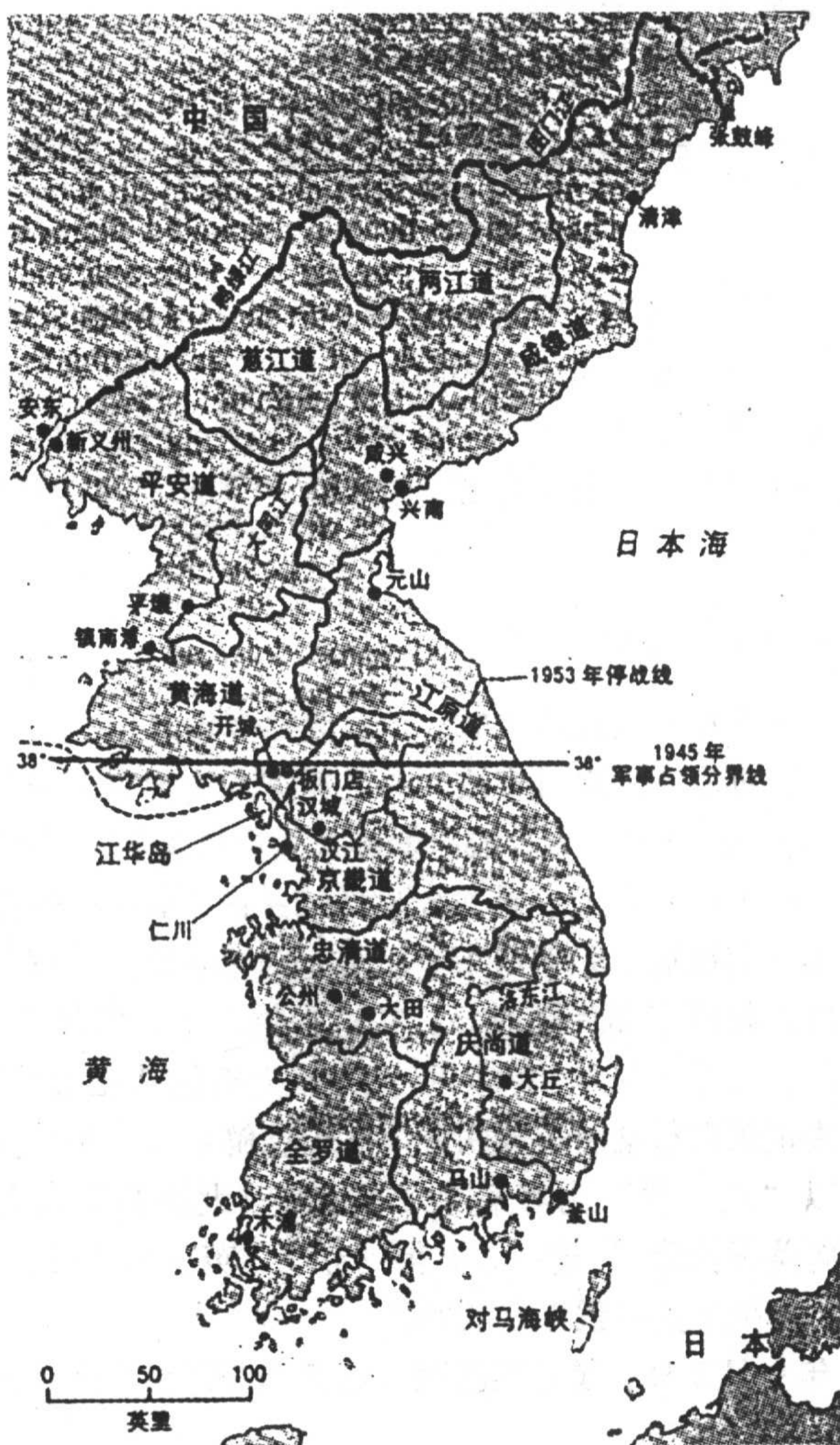
在日本法西斯行将就木之时，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并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击败关东军，向朝鲜半岛挺进，9日，金日成向朝鲜人民革命军下达了解放祖国的战斗命令。8月11-13日，苏军先后登陆并占领朝鲜的雄基、罗津、清津，继续向南推进。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美军还远在琉球群岛，进入朝鲜半岛尚需时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苏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美军也只能望洋兴叹。美国为确保其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决定采取行动阻止苏联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于是美国提出，美苏两军以“三八线”为界解除日军武装，北部日军向苏联投降，南部日军向美国投降。<sup>①</sup>这一方案得到苏联、英国的认可，因而苏军的行动也严格限于这条线以北的地区。

1945年9月2日，美苏两国联军最高司令部发布命令，宣布以

---

<sup>①</sup> Shannon McCune, "The Thirty - Eighty Parallel in Korea", World Politics, Vol. I No. 2 Jan. , 1949, p224.

现代朝鲜



资料来源：罗兹·墨菲著：《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94 页。

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本投降和对朝鲜半岛实行军事占领。当时美国国务卿与助理国务卿都公开声明，“三八线”的确定纯粹是临时性的军事安排。<sup>①</sup>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美苏双方还是谋求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妥协，实现战时确定的国际托管朝鲜的政策。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达成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莫斯科协定》，主要内容包括：美苏两国占领军司令组成联合委员会，同朝鲜半岛各政党和社会组织协商，以协助组成朝鲜半岛临时政府，关于协商组成联合政府的提议应该提交美英苏中等政府共同考虑，这可以算是盟国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措施。但是随着美苏关系的逐步恶化乃至东西方冷战的全面爆发，美苏两大国无法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三八线”变成一条政治分界线，朝鲜半岛的分裂逐步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政治现实。因此，“如果说朝鲜半岛临时军事分界线的划定以及地理大分裂的出现主要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遗产的话，那么半岛南北政治分裂的形成则在根本上属于东西方冷战的产物。”<sup>②</sup>美国和苏联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帮助建立政权，这使得建立统一朝鲜政府的计划难以实现。

在朝鲜北方，以朝鲜共产党人为核心，联合各民主党派，迅速建立起各地方人民委员会。1945年10月，以金日成为书记的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委员会成立。1946年2月8日，在平壤召开了朝鲜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的协议会，通过了在朝鲜北部建立中央政权机关的决议，成立了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1946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7年2月，在各地选举的基础上，召开了各级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建立了北朝鲜人民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并正式成立了以金

---

<sup>①</sup> Myung Hyun Cho, *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s: 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 (Seoul: The Research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 1989), p. 166.

<sup>②</sup> 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日成为委员长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在北朝鲜劳动党和临时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朝鲜北部的经济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改革，1946年3月，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把日本统治者和地主占有的100万公顷土地分到了72万户农民手中”，<sup>①</sup>通过土地改革，朝鲜北部基本肃清了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重要产业的国有化。1946年8月，朝鲜颁布并实施了产业、铁道、邮电、银行等国有化的法令，同时还将原来归属于日本人和朝鲜投敌分子的1034家工矿企业、交通运输结构、银行等都收归国有。国有化的政策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前买办资本家的经济基础，国营经济在朝鲜北部的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苏联的帮助下，在1945-1950年的和平经济建设时期，朝鲜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朝鲜还开始建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没有的机械制造工业和纺织工业。到1949年，朝鲜北部的工业总产值增长到1946年的3.4倍，生产水平超过了1944年日本统治时期的20%。在农业方面，农业经济部门的谷物产量，早在1948年就超过了1944年水平的10%，其中基本作物水稻的产量超过了40%，朝鲜北部粮食缺乏的状况得到了改善。<sup>②</sup>从1949年开始，朝鲜北部开始实施具有斯大林模式特征的、为期两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美军占领朝鲜南部以后，宣布成立军政府，接管一切权力，解散了南方各地的人民委员会。1946年2月，建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议院”作为咨询机构。

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同盟国家都曾承诺帮助朝鲜独立。为了实现盟国的协议，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成立了

---

① 王胜今主编：《现代朝鲜经济》，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② [朝鲜]黄道渊著：《战后朝鲜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 第七章 走向两极：东北亚国家的分化组合

美苏军事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协助朝鲜实现独立与统一。但是，联合委员会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947年9月，美国片面决定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11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定组成“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代表有权监督朝鲜普选，建立全朝鲜政府。这个决议遭到苏联的抵制和朝鲜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反对，苏联主张全部撤出驻朝鲜的外国军队，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如何重建自己的国家。但是，美国以联合国决议为武器，向朝鲜派出了联合国临时朝鲜委员会，开始选举的筹备工作，而1947年2月成立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拒绝该委员会进入“三八线”以北，因此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重新决定，选举于1948年5月10日在朝鲜南部进行。

1948年5月10日，在“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朝鲜南部单独举行选举，5月31日，第一届国会召开，着手制定宪法。7月12日，制宪国会通过了宪法，根据宪法条款的规定，7月20日，国会举行了总统选举，李承晚大获全胜，朝鲜人民委员会首先宣布这次选举无效。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李承晚任总统。

在这种情势下，北朝鲜劳动党联合南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决定建立民主政权，1948年9月9日，在平壤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了宪法，组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内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在朝鲜半岛形成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政府，朝鲜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方控制着9.8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北方控制着12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10月12日，苏联宣布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2月12日，第三届联大通过了美国等国提出的承认朝鲜南部选举结果，大韩民国政府为朝鲜唯一合法政府的决议案（联合国第195号决议）。美国政府也于1949年1月1日承认大韩民国政府。至此，美国和苏联分别支持的朝鲜半岛南北两个独立的、也是对立的政权先后成立，朝

鲜半岛政治分裂局面最终形成。

朝鲜半岛分裂以后，南北双方都宣布自己对整个朝鲜拥有主权。美苏间的军事行动分界线——三八线，成了割裂朝鲜的一道鸿沟。

## 二、朝鲜战争

随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政权的建立，朝鲜南北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美苏矛盾和南北尖锐对立，使朝鲜局势不断恶化。1948年底和1949年6月30日，苏联和美国先后宣布从朝鲜撤出军队，但是两国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淡出朝鲜半岛。

1949年7月，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向联合国报告说，它在朝鲜统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指出“和解”的精神在朝鲜似乎是不存在的。10月，该委员会又接受了就可能引起朝鲜军事冲突的事态发展进行观察并提出报告的任务。但在实质上，“这个委员会没有能够就缓和朝鲜紧张局势做任何切实有效的工作”。<sup>①</sup>

苏美从朝鲜撤军后，朝鲜南北关系更加恶化，朝鲜和韩国都声称自己是朝鲜的惟一合法政府，都以推翻对方、实现统一为目标。政治上的对峙导致军事上的冲突。从1950年春天开始，三八线附近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

三八线附近的小规模冲突最终演化为冷战中的第一场热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从外因分析，根源在于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和冷战对峙，使朝鲜人为地被一分为二，这一结局是朝鲜人民（无论是南方或北方）都无法接受的；从内因观察，它是南北双方矛盾积累并不断恶化的结果，双方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争夺在这片被分割的土地上，谁是朝鲜合法的、正统的政府，因此，两个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推翻对方统一朝鲜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使得双方的利益不可调和，战争成

---

<sup>①</sup>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为一种必然的结局。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朝鲜军队势如破竹，南方军队溃不成军。由于把朝鲜军队的进攻视为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序幕，美国方面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在美国的操纵下，安理会于6月25日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破坏和平的侵略国，要求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6月27日，杜鲁门正式声称：“对朝鲜的进攻使所有的怀疑都冰释了，共产主义已不仅是通过颠覆来征服各个独立国家，而且现在已采取武装入侵和战争。”美国在全力援助摇摇欲坠的李承晚政权的同时，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中国的统一。7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安理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提供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在美国的拼凑下，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司令是美国远东驻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进展顺利，到8月初，已经占领了朝鲜南部80%以上的地区。但是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形势发生逆转，朝鲜人民军被迫撤退。9月27日，杜鲁门又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以“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sup>①</sup>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10月1日，麦克阿瑟指示美李联军越过三八线，侵入了朝鲜北部。10月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把美国提出的“八国提案”通过为联大决议。该决议要求联合国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在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决议的实质是授权美国借用联合国的名义“侵略和占领整个朝鲜，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sup>②</sup>

针对美国的干涉政策，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战火很快蔓延到中国边境，直接威胁到中国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29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页。



的安全。周恩来总理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国政府无视中国的警告，继续扩大战争，在这种背景下，1950年10月8日，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

中朝两国军队共同作战，很快扭转了战局。从1950年12月31日到1951年6月10日，中朝军队和美李军队进行了互有攻守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使得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左右，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无论哪一方都很难迅速地打败另一方，中朝两国虽然士气旺盛，在步兵作战方面占有一定优势，但是在技术装备和技术兵种方面美国则占有绝对优势。正如李奇微所说，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战。”<sup>①</sup>而战争长期化的趋势对于美国尤其不利，因为在美国看来，继续把主要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朝鲜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会削弱美国对抗苏联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决定接受谈判，美国实际上放弃了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原定目标，开始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恢复战争爆发前的原状。

经过反反复复拉锯式的运动战较量，交战双方决定通过谈判走向停战。1951年7月10日，中朝与“联合国军”在开城开始进行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阶段。谈判过程中美国一直对中朝施加军事压力，在1951年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后，又在1952年实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

---

<sup>①</sup>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国的立场有所改变。1953年7月27日，朝鲜、中国和联合国双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两个附件，即《临时补充协议》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7月27日22时，朝鲜战场的交战双方完全停止了一切敌对行为，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 三、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虽然从地域范围、参战兵力和持续时间上而言，朝鲜战争是一场有限战争，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是其他现代有限战争无法比拟的”。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半的时间，在这场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109万人，自己损失60多万人，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2亿元。中朝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捍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新中国的安全，鼓舞和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朝鲜停战给朝鲜半岛带来了和平，但这是尖锐对峙下的和平。朝鲜战争以后，朝鲜南北双方长期处于相互隔绝与对立的状态，朝鲜半岛形成了两个政权、两支军队长期对峙的局面，由于美国的介入，朝鲜不但没有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大业，“反而给朝鲜民族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留下了长期难以治愈的伤痕”。<sup>①</sup>战争之后，朝鲜南北之间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把搞垮对方作为统一的手段，双方的僵硬态度使得朝鲜半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双方在三八线的军事对峙成为冷战的一个缩影。

朝鲜战争揭穿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动用了它陆军的

---

<sup>①</sup> 金正浩：“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3期。

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1/2，<sup>①</sup>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但是仍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朝鲜战争被美国称为“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sup>②</sup>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在面临国内建设困境的同时，不惜以重大的人力和物力牺牲为代价，进行了抗美援朝的作战，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在此前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对列强是屡战屡败，签署了大量屈辱的割地赔款的条约，而在朝鲜战争中，却与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平等地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国的国际威望迅速提高。

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新中国建国前夕，美国政府曾经考虑过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在实际采取了一些试探性的步骤，其目的是防止中国“落入苏联的手中”<sup>③</sup>，避免出现中苏结盟对抗美国的局面。为此，美国当时的政策目标是在中苏实行“楔子战略”，促使中苏发生分裂。但是由于在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使两国在当时和解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两国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的状态。

在政治上，随着美、中在朝鲜的卷入，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遏制”政策，并且使美国拒不承认中国政府的态度更加强化，继续顽固地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参与国际事务。在经济上，朝鲜战争为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提供了借口。早在1950年7月，在美国的压力下，“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把对苏联的贸易管制扩大到中国，12月，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对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实施许可证制度，开始对中国实行禁运。到1950年底，中美之间的贸易完全停

---

① 徐天新著：《世界通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② [美]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③ 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止。更为严重地是，朝鲜战争使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台政策，并由此更深地卷入中国的内争。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宣布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sup>①</sup>同时美国开始改变逐步疏远蒋介石政权的态度，转而加强同台湾的联系，给予蒋介石政权以政治支持和军事、经济援助。1953年9月，美台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国负责。1954年12月，美台又在华盛顿签署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取得了在台湾、澎湖列岛驻军的权利。由于这个原因，新中国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长期占据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长期疏远的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反美态度，毛泽东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一份全国性的宣传提纲也强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分水岭，它确定了之后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基调，“中国与美国互相对峙，保持疏远，成为死敌”。<sup>②</sup>

### 第三节 东北亚两极格局的形成

意识形态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冷战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对于国际关系中的敌友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受制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和各

---

① FRUS, 1950, Vol. 7, pp1397 ~ 1402.

②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 178.

国的意识形态选择，东北亚地区的两极格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初步形成。朝鲜战争则使得这种两极格局固定化。

### 一、中苏结盟与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周边环境和国内问题做出了清醒的判断，并据此先后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三条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sup>①</sup>“另起炉灶”指的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指的是先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所谓“一边倒”，就是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紧张的斗争。其中“一边倒”成为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交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阵线一方面去找。”<sup>②</sup>

战后苏联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二战后期，苏联从维护雅尔塔体制、苏美关系和谋求苏联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确定了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对华政策。同时，苏联对中国国内形势缺乏

---

①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5页。

正确的判断，过低地估计了中共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势力和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因此对中国革命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1945年5月，苏联领导人向来访的美国总统顾问霍普金斯说，中国领导人“没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蒋介石“应成为统一中国的承担者”。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以明确承认和援助国民党政府为交换条件，取得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在东北各项特殊权益的认可，并借此将它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默契公布于世。接着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苏军进入东北后，宣布东北所有的工业企业都是苏联的战利品，苏军大肆拆迁东北的工业设备，给中国造成了高达20亿美元的损失。<sup>①</sup>但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和中国形势的演变，苏联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1947年5月，中共与苏联签定了《哈尔滨协定》，规定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共产党，双方进行全面合作，发展东北经济；苏联在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方面享有特殊权利；东北出产的棉花、大豆及其他战略物资，除本地区所需要外全部供应苏联。<sup>②</sup>它标志着苏联转变了对华政策。这也是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背景。

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新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而提出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从国际环境看，两极格局的确立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外战略的选择余地非常狭小，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不会允许中国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的态度，当时的中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倒向苏联，或者是倒向美国。

从中苏关系观察，南斯拉夫事件发生后，新中国只有做出公开的承诺，才能消除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才能得到苏联对新中国的

---

①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页。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支持，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而且中苏两国虽然在具体问题上矛盾，但是苏联后来对中国革命基本上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而作为与中国北部边境有着几千公里共同边境的邻国，中苏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全。

从美国方面观察，杜鲁门政府虽然对新中国采取了观望态度，但是从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来看，美国政府也不太可能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友好的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有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实践证明，“一边倒”战略并不完美，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它确实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

中苏结盟同样更符合苏联的利益需求，这一方面可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同时也可以抵制日本被美国扶植成为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帮凶。苏联一直为没有参与对日占领而耿耿于怀。苏联一直在与美国争夺对日本的占领及控制权，1945年8月，苏联方面提出盟国对日军队最高统帅可以包括两个人，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杜鲁门明确表示要把日本置于代表盟国的美国指挥官的控制下，“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者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德国和奥地利那样行动”。<sup>①</sup>在美国最终独占日本的形势下，苏联与中国结盟有针对美日关系的考虑。

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苏结盟的法律形式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中苏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双

---

<sup>①</sup>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70~371页。

方不得参加反对其中一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其他措施，缔约一方如果遭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与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的有效期为30年。<sup>①</sup>与此同时，中苏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而中苏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新中国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中苏两国结盟后，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等也有了良好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注意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朝鲜革命者与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大约有10万名朝鲜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半岛北方实际上成为东北解放军的战略后方与供应基地。中共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东北局特别办事处，其首要任务是把伤病员和重要的战略物资转移到朝鲜半岛北部，通过这里维持中共在中国东北北部与东北南部的军队之间的交通与联络，并从此寻求援助及采购战争物资。在此期间，朝鲜方面帮助中共军队把大约2万吨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其领土上。<sup>②</sup>不仅如此，朝鲜方面还为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人员与物质援助，有许多朝鲜的志愿人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sup>③</sup>在1946-1948年间，朝鲜方面向中共军队提供了2000车皮日本人留下的战争物资，为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中朝两国共产党人长期合作的历史，成为

---

① 何春超、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190页。

② 丁学松：《回忆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在北朝鲜的特别办事处》，载《中共党史资料》，1986年3月，第17期。

③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08.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基础。中朝外交关系的建立，也是新中国出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现实选择。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一个稳定、和平、不为敌对大国所控制的朝鲜半岛无疑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之时，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已经形成。在这种形势之下，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有助于维护新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安全。因此，新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继续，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与朝鲜建交，也同中国宣布的“一边倒”外交战略相一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10月6日，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交。

中国还与蒙古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蒙古原称外蒙古或喀尔外蒙古，原来是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12月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在沙俄支持下宣布脱离清朝管辖，实行“自治”，1917年复归中国统治。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苏赫巴脱尔和乔巴山于1918年底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21年3月1日在苏俄的恰克图成立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并开始领导人民革命。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4年5月签署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是在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签定雅尔塔协定，却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并以此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在美苏两大国的压力下，中国国

---

<sup>①</sup> [韩] 李元烨著：《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从对抗走向协调（1945-2000）》，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0页。

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达成协议，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其独立愿望”。1945年10月10日，蒙古根据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举行全民投票。据称，所有具有公民权的蒙古居民都参加了这次投票，并且全部赞成蒙古独立，于是蒙古正式宣告独立。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与蒙古国建交，1952年10月，两国签订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1955年两国签订了中国人员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的协定，1956年又签署了中国对蒙古进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1960年，中国和蒙古签定友好互助条约，1962年签定中蒙边界条约。50-60年代，中国一共向蒙古提供经济援助4.43亿元。<sup>①</sup> 1936年3月12日，蒙古和苏联曾经签定《蒙苏互助协定书》，1946年届满后改为《蒙苏友好互助条约》，有效期为10年，同时还签定了《蒙苏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双方同意扩展和加强两国在国民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内的现有合作。

中苏结盟、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加上在这之前苏联与朝鲜、苏联和蒙古的特殊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初步形成。

###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与美韩、美日特殊关系的形成

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美国以中国为支点的东亚战略彻底破产。为此，在尽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施行楔子战略的同时，美国东亚政策的侧重点在发生转变。美国拉拢日本、韩国，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日本是一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国家，扼俄罗斯亚洲地区东部的出海通道，“又是美国从阿拉斯加跨越太平洋到东北亚的一个绝佳

---

<sup>①</sup> 钱其琛：《世界知识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0页。

落脚点”。<sup>①</sup> 因此美国计划单独占领日本。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日本军国主义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1945年8月底，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进驻日本，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虽然依据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成立了盟国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对日占领的决策机构，但事实上这两个委员会形同虚设，它们的决定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军总部去执行，日本的实际情况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决定高于一切，这两个国际性管制机构的建立，仅仅起了替美国掩盖其单独占领日本的事实的作用。

1945年9月23日，美国发布《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公布了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它指出美国占领政策的目标包括两个，一是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世界和平安全的威胁，二是建立和平的、负责的日本政府。文件还强调美国在占领日本问题上的最高统帅地位，盟国之间如果出现分歧，应该执行美国的政策；最高统帅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间接行使自己的权力；帮助日本实现民主化、非军国主义化，惩罚战犯，恢复和平的经济活动。这个文件强调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要实现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具有进步性。但是该文件也表明美国要独自控制日本，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在这个文件中已经初步被定型。

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美国实行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非军事化政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sup>②</sup>：解除日本的武装，使日本变成了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国家；解散军事机构，包括大本营、元帅府、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军事参议院、陆军省和海军省等机构；废除了军事法令；禁止生产武器、弹药、军舰、飞机和

---

<sup>①</sup> 韩天新：“由日本‘走入非洲’看其‘政治大国’路线”，《日本研究》，2001年第3期。

<sup>②</sup>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799页。

军需物资，禁止研制原子能和航空技术，解散东京大学航空研究所等与军事工业有关的研究机构；制裁战犯；解散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整肃曾经猖狂鼓吹和积极推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骨干，不许他们担任公职，截止1948年3月，共有19.3万人被整肃。

美国采取的这些举措，与政治、经济上的改革是同时进行的，也是相互配合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三位一体，使得美国占领军迅速达到了日本非军事化的目的。

从1948年起，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目的的实现，即日美从属关系的建立，特别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重新调整和制定了远东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开始从中国转向日本，“以日本取代中国”，变“抑制”日本为扶植日本，正如杜鲁门所说，“中国事态的进展，使日本的重要性倍增”。美国停止了解散财阀的工作和中间赔偿计划，力图把日本建设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反共基地。

在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过程中，美国遏制战略的设计师凯南起了重要的作用，凯南当时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他在1947年和1948年两次在报告中分析，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日本应该成为美国在亚洲实行遏制战略的依靠力量，美国现行的政策虽然有利于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但是却不能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因此美国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本的政策。凯南的意见，对于美国转变对日本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转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是在军事上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前哨阵地，在政治上把日本变成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堡垒。1948年以后，美国占领当局极力扶植保守势力，镇压工农运动，迫害共产党人。1948年7月，日本政府颁布《二〇一号政令》，剥夺了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罢工权和集体交涉权。1949年4月吉田内阁又颁布《团体等规正令》，规定镇压“助长和赞成暴力主义方法”的团体和个人，1950年5月麦克阿瑟宣布日本共产党非法，7月对日

共进行整肃，清除了广播和新闻界的日本共产党员。与此同时盟军总部下令释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日本逐渐被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开始了长期的日美从属关系。

美国占领朝鲜南部后，将原来日本的总督府改为军政厅，宣布在朝鲜南部实行军政统治，直接掌管朝鲜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权力。为了把朝鲜南部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大韩民国成立以后，从1948年8月到12月，美国和李承晚政权先后签定了《韩美暂行军事协定》、《韩美移交财政和财产协定》以及《韩美经济援助协定》，把朝鲜南部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部门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韩国也在当时宣布对美国实行一边倒政策。1950年1月，美韩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加强了对韩国的军事援助，美韩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形成。

美国为了加强自己阵营一方的团结，还操纵日本和韩国在1949年4月签署了《日韩贸易协定》和《关于日韩贸易的财政协定》等一系列协定。

总之，随着二战后美苏冷战的展开和东北亚特定局势的发展，以苏联、中国、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一方，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一方的东北亚两极格局初步形成。

### **三、朝鲜战争与两极格局的固定**

朝鲜战争是冷战中东西方阵营的第一次热战，对于冷战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被称为冷战中的“第三个改变一切”，它使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正式固定下来，对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加剧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通过朝鲜战争，中国、苏联和朝鲜的政治和军事同盟得到了加强，冷战的一方阵营得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刚刚诞生不久就出兵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战场上同美国作战，解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在朝鲜战争期间，

## 第七章 走向两极：东北亚国家的分化组合

中国和苏联密切配合，同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也有力地配合了苏联和美国在欧洲的对抗，因此，中苏同盟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加强。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继续给予朝鲜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为了维护朝鲜的安全并帮助它恢复生产，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停战协定签署后继续留在朝鲜半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救济受灾群众，并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人民进行修工厂、修医院、打窑洞、建民宅、整修商店、修复学校、兴办水利、发展交通等等重建家园的工作。志愿军所有的部队都参加了朝鲜战后的重建一直到1958年年底撤出朝鲜。

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人民恢复经济，中国政府还向朝鲜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1953年11月，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朝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底，中朝两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加强两国国民经济部门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方面成就的相互交流。1958年9月，中朝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959-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两项贷款的协定》。通过一系列双边往来，中朝两国的经济合作在朝鲜停战后有了新的发展，从1954年到1958年，中朝两国贸易额年年都有增长，1958年中朝贸易额比1957年增加了50%以上，而同1954年相比则增加了十倍。这几年中，中国供应了朝鲜用以恢复和发展钢铁和纺织工业所需的煤、焦炭、棉花和棉纱等原料，另外还供应了机器设备、钢材、粮食和各种轻工业品等物资。朝鲜方面也供应了中国特种钢材、有色金属、水泥和化学工业产品等物资。此外，中朝两国在水文工作、治水和渔业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sup>①</sup>中朝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强化了两国之

---

<sup>①</sup> 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0~1002页。

间的联系与交往，从而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朝鲜战争之后，促成东北亚局势发生变化的最大可变因素就在于美国对远东政策的调整。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后，不再只把欧洲看作冷战的重点，亚洲也成了美国冷战的重要战场，中国则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敌人。随后，美国对亚太战略进行了调整，采取了扶植日本、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组建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太军事体系等手段，扩展美国在远东的势力。1951年8月底，美国同菲律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9月，美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美澳新安全条约，1953年10月，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这几个条约连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日美安全条约一起构成了美国在东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军事体系，1954年9月，美、英、法、澳、新这5个西方国家同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一起，签订了《东南亚防御条约》，组成了“东南亚防务集团”，美国拼凑起对亚洲大陆的新月形包围态势。美苏双方阵营的加强使冷战格局在东亚地区正式固定下来。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冷战局势，美国亚洲政策的重点彻底转向日本。美国加速扶植日本，积极策划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9月4-8日，在旧金山召开了由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被邀请。会议签订的片面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西沙群岛、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不提这些岛屿的归属。和约还规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协定，驻军日本；日本同意把琉球群岛、笠原群岛等交美国“托管”，这完全反映了美国的战略需求，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同日，美日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取得了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无限制地驻军及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美国可以出动驻军“平定”日本的“内乱”。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日美特殊关系确定下来，日本完全被纳入美国世界战略的轨

道。

朝鲜战争之后，韩国作为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峙的前沿阵地，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分量也有所加重，1953年10月，美国和韩国签署《美国和韩国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NSC170/1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在韩国的强大地位，可见，韩国与美国已经紧紧地捆在了一起，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军队也开始得以在朝鲜半岛驻军，虽然美国驻军的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其军事存在一直延续到现在。

为了构筑东北亚的反共同盟，美国还试图促成日韩和解，推动日韩谈判，1952年日本和韩国开始谈判，但是双方在如何处理日本的对朝殖民统治以及领土、领海主权等问题上严重对立，致使1952年2月开始的谈判竟然延续了十四年之久，一直到1965年6月22日，双方才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日韩基本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相结合，使美日韩三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

总之，朝鲜战争使得战后初期初步形成的东北亚两极格局固定下来，虽然这一时期冷战的重点在欧洲，但是东西方阵营爆发的第一场热战却发生在东北亚地区，它标志着继欧洲之后，东北亚地区也降下了一幅沉重的铁幕。



## 第八章 多样发展：中、日、韩的不同发展道路

二战之后新建或重建的东北亚各国，虽然各自在外交领域受到阵营意识的影响，但是在对内政策上则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各国从不同的理解出发寻求本国致强求富的道路。经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饱经战乱的东北亚各国来讲，如何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他们面临的第一要务。东北亚经济的崛起包括三个依次发生的进程，第一个进程是开始于50年代中期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个进程是开始于60年代的韩国经济腾飞；第三个进程是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增长。在本章，我们主要介绍前两个进程。日本从托管中独立，走上了潜心发展经济的道路，在一片废墟上迎来了经济的复兴，并以此为基础，在东北亚国家中率先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东方魔术”般的经济奇迹。韩国经过初期的动荡与混乱，在朴正熙威权主义的治理下，也创造了经济上的“汉江奇迹”。而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经济虽然在整体上有所提高，但是却经历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剧烈震荡，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 第一节 “东方魔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其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耗和革

命性的打击。二战结束之初，日本国土荒芜，经济衰竭，民不聊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45年，国民的恩格尔系数超过60%，<sup>①</sup>这意味着人们为每日的温饱而疲于奔命。日本的工矿业生产仅仅是战前的26.4%，钢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3%，日本沦为一个“乞丐”国家。当时世界普遍认为，日本的前景是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国地位。

然而，“冷战”这个特殊的环境拯救了日本，使日本得以在经济战为主体的战场上捷足先登，并且通过这一新的历史道路走向了再生。日本在两极体系下，抓住了冷战提供的历史机遇，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免费搭车”，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美国产业调整的机会，倾全力发展经济，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东方魔术般的经济奇迹。经过战后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日本不仅较早地摆脱了二战的阴影，而且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东亚现代化的先驱国家。

### 一、日本的民主化改革

二战后，美国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有利地位，以本国政治制度为模式，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图将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主要涉及修改宪法、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等方面。其中修改宪法和新宪法的制定，是战后改革的最重要成果。新宪法把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天皇制改变为“象征天皇制”，建立了“主权在民”的新体制，并且把放弃战争明文列入宪法条款，这些规定对战后日本新体制的形成和经济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直接干预下实现的。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在接见日本新上任的币原首相时，提

---

<sup>①</sup> [日]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出了日本政治改革的五大要求，即赋予妇女参政权；保障工人团结权；教育制度自由主义化；“杜绝对国民的秘密审问，废除恐怖组织”；促进经济民主化。此后，币原内阁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不情愿地开始了宪法修改工作。币原内阁对修改宪法持消极态度，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对旧宪法仅仅做了某些词句上的改动，依然保留天皇及其特权。

币原的态度和方案引起了美国占领当局的强烈不满，占领当局决定亲自参与修宪。1946年元旦，美国促使天皇发表《人的宣言》（也称《人格宣言》或《否定神格宣言》），否定自己的神格，这样便于在满足日本方面要求保存天皇制的同时，改变天皇制的实质内容。

1946年2月，盟军总部着手修改宪法，麦克阿瑟下令美国人负责的民政局制定修宪草案。2月13日，由美国人起草的修宪草案交给了日本政府，在占领当局的压力下，币原内阁被迫接受了草案。1946年3月6日，《日本国宪法》草案公布。1946年11月，新宪法获得国会两院通过，1947年5月正式生效。

新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的统治权和特权都被废除，成为行使形式和礼仪性国事的“虚君”。日本由战前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改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内阁执掌行政权，并对国会负责，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的惟一立法机关，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由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普选产生。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最高法院成为与国会、内阁并列的独立机构，排除了国会和内阁对司法的干涉，实现了三权分立。新宪法还规定日本永远不以战争为国策，不保留陆海空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放弃交战权，它还宣布人民享有的基本的公民权利。新宪法实现了日本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为日本以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政治条件。

在新宪法实施前后，日本还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性法规，其中主要有《内阁法》、《选举法》、《地方自治法》、《国家公务员法》、《警察法》、《民法》等，这些法规的修改和制定，标志着日本“新宪法体制”的基本形成。

在新宪法体制下，日本在议会制度、内阁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其中1947年3月19日公布的《国会法》的特征在于保证了国会对政府的优越地位，标志着日本形成了政党政治和官僚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体制。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土地关系中仍然保留着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1946年10月，日本制定了实施农地改革的法令，并从1947年到1949年在全国实施。在改革过程中，寄生地主的全部土地，经营地主一公顷以上的土地，都由政府强制收购，转卖给佃农。经过农地改革，日本基本消灭了寄生地主制，建立了自耕农制度，从而为日本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前的日本财阀以家族为中心，具有封建性与封闭性，是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1945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解散财阀的工作，三井、三菱等最大的15家财阀的资产被冻结。但是解散财阀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虽然如此，这项工作仍然结束了战前家族统治的管理体制，以董事会取代家族会议，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了“经营者革命”，为后来日本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在劳动改革方面，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了“劳动三法”，即《劳动组合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和《劳动标准法》，劳动改革“奠定了现代劳资关系的基础，对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起了促进作用”。<sup>①</sup>

战后初期日本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历史上又一次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大变革，对日本现代化进程关系

---

<sup>①</sup> 王斯德主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20世纪的世界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重大。它消除了日本自身生产关系中残存的前资本主义因素，使日本从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 二、“倾斜生产方式”与经济九原则

日本军国主义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自1931年以来的侵略历史中，日本给亚太地区各国，包括中国东北等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日本军国主义在这场战争中是一个害人者。但是，这个害人者不仅贻害他人，而且也危害了日本自己。日本本国在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人员伤亡外，战争给日本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日本经济安定总部的调查，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共损失国家财富653亿日元，加上军舰、飞机等损失的404亿日元，总计逾千亿日元。<sup>①</sup>这种巨大的战争冲击使得日本经济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一直在低于战前的水平上徘徊，整个40年代后半期，日本基本是处于“经济危机”的时代。

战后初期日本出现的这种危机状态，根本原因在于长期战争经济的恶果。在战争中，日本的经济基本是“战时体制”，军工生产部门恶性膨胀，民用生产不断缩小，致使许多日本民用机械设备闲置、废弃，因此，战争结束后，日本的民用生产很难迅速恢复，难以迅速完成经济的转型。

经济危机给战后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困难。首先，由于军需工业的停产和军人的复员，日本的失业人口激增；其次，由于战争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战后从中国、台湾等进口渠道的断绝，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最后，由于物资奇缺，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直线上涨。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就是从这样一个起点上开始的。

---

<sup>①</sup> 王振锁著：《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面对日本经济的重重困境，战后日本第一届吉田茂内阁（1946年5月-1947年5月）成立了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为濒临绝境的日本经济出谋划策。吉田茂是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曾5次组阁，除短暂的间隔外，执政时间持续到1954年12月，经济中心主义是他执政的最大特征。吉田茂认为，无论“纳粹”或“法西斯”都是由于国家贫困引起的，民主是富国的产物。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瘦马论”，声称“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来决定兵力数量”，“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负荷过度的重载，它就会累垮”。“瘦马论”是吉田茂内阁全心全意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据。

根据经济学家的建议，吉田内阁确定了“倾斜生产方式”，也就是优先发展煤炭、钢铁、化肥、海陆运输等产业，其中把煤炭和钢铁定为超倾斜。为了保证倾斜生产方式的实现，吉田内阁首先争取到了“盟总”的许可，进口了石油、煤炭等宝贵物资，把这些物资优先投入钢铁工业，然后将生产出来的钢铁供应给煤炭工业。为了保证给倾斜产业提供资金来源，1946年10月8日，制定了《复兴金融库法》，1947年1月开始把复兴金融库的贷款优先拨给煤炭和钢铁工业。在价格政策方面，吉田内阁采取差价补贴制，例如，把生产的煤以比成本低的价格卖给钢铁等部门；将生产的钢铁以比成本低的价格卖给煤炭部门，其差价由政府来补贴。可以看出，吉田内阁在确定“倾斜生产方式”以后，注意从物资、资金、价格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扶植，以此重点突出地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这项政策富有远见，为其后日本的历届内阁继承。

吉田内阁的政策虽然很有远见，对战后日本整个经济发展具有奠基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不能对广大民众的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同时，吉田内阁对职工和民众也采取了压制政策，更加激化了吉田内阁与民众的对立和矛盾。在民众的冲击下，日本政府发生更替，继吉田之后，片山内阁（1947年5月-1948年2月）上台执

政，片山内阁继承了“倾斜生产方式”，同时，片山内阁还恢复了战后一时被中断的对外贸易，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1947年工业生产总产值比1946年增长约20%。但是片山内阁没有解决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问题，当时工人的工资增长远远跟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工人的工资是“饥饿工资”，而片山内阁却一味地要求工人勒紧裤腰带生活，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导致片山内阁于1948年2月倒台。

片山内阁倒台后，民主党总裁芦田组建了新一届内阁，芦田内阁成立时，由于冷战的演进和中国局势的变化，美国已经力图把日本变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堡垒”，为此要稳定并复兴日本经济。1948年12月18日，美国提出《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即平衡预算；加强税收；严格限制贷款；稳定工资；统制物价；加强对外贸易和外汇管理；改善物资分配；增加重要的国产原料和制成品的生产；改善征粮。为实现这九原则，美国政府指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来到日本，道奇根据九原则制定了一套稳定日本经济的计划，通称“道奇路线”。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编制包括一般会计、特别会计在内的整个预算的超平衡预算；全面废除补贴；停止发放复兴金融金库；制定1美元=360日元的外汇汇率。<sup>①</sup>道奇路线虽然使日本的经济形势出现稳定，但是它毕竟是属于经济上紧缩型的“急刹车”政策，它的主要特点是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从而既抑制了消费，又抑制了投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出现停滞状态，这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日本经济虽然稳定，但是却充满危机。正在这时，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 三、朝鲜战争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重要机遇。美国在单独占领日本期

---

<sup>①</sup>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页。

间强行推行的民主化改革和吉田茂的“倾斜生产方式”为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真正促使日本经济复苏的起点却是朝鲜战争。二战后东亚地区冷战局势的发展，成了日本经济复兴的有利国际环境。1948年以后，鉴于中国大陆的内战局势，美国当局开始考虑把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堡垒，开始扶植日本恢复经济。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更是成为美国侵朝战争的供应基地。日本在朝鲜战争中获得了大笔的特需收入。

侵朝“特需”日本获利一览表<sup>①</sup> 单位：亿美元

年代	特需收入	外汇收入	%
1950	1.49	10.08	14.8
1951	5.91	22.41	26.4
1952	8.24	22.39	36.8
1953	8.10	21.20	38.2
合计	23.74	76.08	

这种“特需”订货不仅为处于困境的日本工业品提供了销售市场，而且使日本获得大量的外汇收入，从而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总之，日本从朝鲜战争中捞到了莫大的好处，奠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基础，“朝鲜战争的大屠杀给日本带来了最大的经济利益”。<sup>②</sup>

与此同时，日本的政治体制也趋于稳定。在1955年之前，日本主要是多党政治，进步党、自由党、社会党、民主党等政党曾先后组阁，但是从1955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1955年11月，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并成为议会中的

<sup>①</sup>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页。

<sup>②</sup>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7页。



第一大政党，日本开始进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时期。这便于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在美国的扶植与支持下，到50年代中期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经济实现了恢复与调整，并完成了从战争经济体制向和平经济体制的过渡。1956年日本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宣称：“今后的增长将由现代化来支撑”。从此，日本进入经济持续增长的高速发展时期。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从1955年到1972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其中1960年以前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由鸠山内阁，经过短暂的石桥内阁，过渡到岸信介内阁，经济出现了“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革新与能源革命，其中技术革命的关键是新技术的引进。日本创造了自己的技术引进模式，即通过引进设备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引进提高—国产（超过外国）的方式。<sup>①</sup>实际上就是把外国的先进工业技术成果，在短时间内吸收、改进生产出能与外国产品相匹敌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竞争，这种独特的技术引进模式成为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技术原因。

1960年以后，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标志，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基本处于池田内阁执政时期和佐藤内阁时期，池田内阁在政治上采取低姿态，而专注于经济发展，他上台后及时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增长一倍”，但是实际增长远远超过了他的计划，在十年内翻了两番，在充实社会资本、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池田内阁还实行了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使日本从1964年开始正式进入开放

---

<sup>①</sup> 《日本战后五十年》，第149页。

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是：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公共投资与交通运输事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这一时期，日本还通过了《农业基本法》，提出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在这期间，虽然日本在1965年出现过短暂的萧条，但是佐藤内阁通过发行公债、降低法人税等手段，使得日本很快度过了短暂的萧条时期，从1965年11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长期繁荣，创战后最长纪录，因此被称为“长期繁荣”，也叫“伊奘诺景气”，这次景气最后完成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全过程，日本在这一进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早在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的经济成就可以在下面的表格中看出来。<sup>①</sup>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1950年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美国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日本	3.9	8.4	12.8	19.8	32.3
西德	8.1	14.2	16.6	18.9	28.1
法国	10.0	12.0	14.3	15.0	21.6
英国	12.9	14.1	14.4	12.2	15.0
意大利	6.0	6.9	8.5	9.4	11.4

日本的经济在这一时期创造了“东方魔术般的经济奇迹”，因此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奥妙一直是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认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既有外因的拉动，即战后的冷战环境给日本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更有内因的推动，在这里，我们主要选择三个因素加以介绍。

<sup>①</sup> 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第一，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培育出了大批优秀的劳动力，战后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教育的发展，这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治国之道”之一。日本人认为，经济的竞争就是技术的竞争，而技术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因此教育投资始终是日本惊人经济成就的重要基础，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一般占国家预算总额的8%以上。战后日本的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到80年代末，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教育最普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小学和初中的入学率达到99.9%，高中达到97%，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50%以上，一般认为，日本的教育发展水平在资本主义世界居于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且日本教育的特点在于结合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进行，非常适合市场的需要。教育的发展使日本拥有一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队伍。

第二，日本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政府起了比较突出的作用，因此被称为是“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政府不仅在政策上给予指导，而且采取了种种干预措施，日本人在评述日本政府与私人企业的关系时所说：“整个日本宛如一家股份公司，日本政府，特别是通产省是总公司，各大企业则是分公司。”而美国的一份报告也曾指出：“日本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把它们时间的90%左右花在工商界上面。”日本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指导性经济计划和行政指导来实施宏观调控。

第三，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的“吸收发展战略”。“贸易立国”一直是日本的“不变国策”，奉行“出口第一”的方针，日本总是把占有和维持日本在国际上拥有的“市场占有率”作为国家、企业、公民的奋斗标尺和荣誉感，为此日本高度重视产品的科技含量。日本在技术方面信奉“综合就是创造”的理念，注意吸收一切国外先进技术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日本政府一向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甚至利用产业间谍来获取科技情报资料，在

得到技术之后，日本对引进技术进行吸收改造，在仿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改革创新，然后再推向国际市场。由于扬百家之长，日本产品的国际占有率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日本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原因。

### 四、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

进入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导致日本经济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经济方面受到的两次冲击，第一个冲击来自金融汇率领域，也被称之为第二次尼克松冲击。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对美贸易持续顺差，1971年8月，日本的美元储备已经超过美国，日美间的经济、汇率摩擦加剧。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试图迫使日元升值。同年，尼克松宣布停止以美元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日本经过促进贸易自由化、实行特惠关税以及收购美元等短暂的反击后，被迫执行浮动汇率和日元升值。这场冲击使日本国内大量中小企业破产，经济遭到重创。

第二个冲击来自能源领域，即“石油危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产油国为了迫使美欧日等国改变对中东的政策，提升石油价格、降低石油产量，石油价格猛涨。这对于一直依靠中东廉价石油支撑的日本经济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物价飞涨、外汇外流、财政紧缩，大批企业倒闭，最终宣告日本战后持续近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田中首相宣布辞职。这一切表明，日本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在对内及对外政策上做出调整。

面临经济上的危机，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开始了适应新环境的努力，具体来说就是省能源、省资源的“合理化”和“减量经营”的努力，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整：调整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向知识集约型产业结构转化；能源向多样化、省能化方向发展，加快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调整出口结构，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广开能源进口地区，增加石油储备。

日本 70 年代的经济调整政策，对于平稳渡过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迅速走出低谷进入稳定增长发挥了作用，1976 年以后日本经济回升较快，保持了 5% 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变经济危机中的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所以在 1980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出现以后，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都出现下降的时候，惟有日本保持了 6% 的高增长率，<sup>①</sup> 被称为战后日本的“第二个奇迹”。同时，面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人口、城乡及工业的不均衡，为了解决城乡人口分布过密和过疏，日本政府提出重新调整工业布局，建设一批田园风光的地方城市，建设新干线等现代化交通网络，使全国在就业、居住、教育、文化、娱乐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均衡发展的同时，保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势头。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工业和农业平衡推进的。60 年代以来日本的农业和农村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1961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它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基本法》为日本农业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主要内容包括：在生产政策方面，优先扩大那些劳动消耗少而又最有利的农产品，贯彻经济合理主义的方针，以适应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新形势；在收入和价格政策方面，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平衡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水平；在结构政策方面，发展“自力经营”农户，优先发展畜牧业和果树业，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土地占有的合理化和农业机构的现代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60 年代后期，日本基本实现了农业方面的机械化，农民收入也由 1960 年的每户平均 43.5 万日元增加到 1970 年的 159.2 万元。<sup>②</sup> 进入 70 年代后，日本政府提出“综合农业政策”的方针，这是日本经济转入稳定增长时期的农业政策。所谓的“综合农业政策”，包括谋求“综合粮食

---

① 《日本史》，第 1101 页。

② 《日本战后五十年》，第 302 页。

的稳定供应”，使生产、结构、价格、流通等各项政策综合推进，并大力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三个方面。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70年代以后，日本农民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有很大提高，总体上已经达到全社会的中等偏上水平。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80年代，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日趋巩固和突出，成为全世界的金融大国、债权大国和投资大国。

### 第二节 “汉江奇迹”：韩国经济成“龙”

继日本的经济腾飞之后，韩国在60年代初也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韩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与朴正熙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采用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确立“经济第一”的指导思想，领导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

#### 一、李承晚时期的经济

朝鲜南部在1945年光复之后，其命运一直与美国联系在一起。1945年8月到1948年8月，是美国对朝鲜南部进行军事占领并实行军管时期。在美国一手操办之下，按美国的模式，组建了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政府，杜鲁门总统曾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韩国成为试验田，在这个国家已经付诸实施的民主理念和原则，正在与北朝鲜人民身上的共产主义展开竞赛”，<sup>①</sup>但是这个民主政府并没有给韩国带来福音，“李承晚的整个政治是失败的，他没有使新独立的韩国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相反却把旧李朝的官僚体制与作

---

<sup>①</sup> 转引自董向荣：“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政策：缘起、演进与结果”，《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风恢复起来”。<sup>①</sup> 在政治上，李承晚政权反对民主政治，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组建自由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反对力量。1952年5月，他利用朝鲜战争的形势，以肃共为借口，将反对他的议员逮捕，他还任人唯亲，导致政府中贪污腐败盛行，政府运转效率低下。李承晚的执政原则是“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承晚忽视经济发展，在他统治期间，韩国的经济不但没有任何进步，反而处于逐年衰退之中，从1953年到1960年韩国整个的出口总额不到2亿美元。<sup>②</sup> 1948年南朝鲜的工农业生产仅及1940年的21%，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大幅度下滑，同年的农业产量也仅仅相当于1940年的72%，<sup>③</sup> 这种状况使南朝鲜物资供应严重缺乏，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但是，在这一时期，韩国也有两个经济政策为日后的经济奇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是关于“归属财产”的处理。美国在占领朝鲜南部之后，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财产，对于接管的日本财产，美国采取了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美军当局直接拍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一种是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归属财产”交给李承晚政权廉价拍卖。“归属财产”的数量多，规模大，定价低，而且还允许购买者在15年内分期付款，当时享受到这一优惠的多是行政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战争中的有功人员，这部分归属财产成了买办资本借以产生的决定性条件，韩国开始出现新兴的官僚资本，在这之后，韩国的这部分官僚资本又相继取得了“美援”物资的分配特权，这在当时物资奇缺的情况下具有特殊意义。后来，他们又获得了进口原材料和部分设备的特权，并得到了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在这些特

---

① 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文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② 同上，第51页。

③ 韩立民、吴刚、谭永春著：《战后韩国经济与中韩经贸关系》，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权基础的支撑下，官僚资本在韩国发展起来棉布、毛纺织品和食品等轻工业，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些新兴的财阀也成为日后韩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二是40年代末的农地改革。战后初期，美军占领当局把战前日本所有的土地作为“归属土地”交给“新韩公司”管理，并实行“三一制租佃”，即按照土地收获量的1/3征收地租。1948年，当局又决定将这部分土地有偿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地价是正常年收获量的3倍，分得土地的农民必须按照年收获量的20%在15年内分期还清。对于其余的一般土地，则在1949-1951年按照“有偿购买，有偿分配”的方式进行改革。

农地改革虽然是有偿进行的，但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土地所有权，使许多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中佃农的比重由1947年的42.1%下降到50年代的5.2%，<sup>①</sup>它虽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收益，但却是实现农村社会趋向相对公平的重要起点，具有一定的政治社会效益。

虽然如此，在李承晚执政时期，韩国的经济仍然是秩序紊乱，市场萧条，战前韩国是粮食出口地区，但是此时却需要每年大量进口粮食，到1959年，韩国的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对当时韩国民众的生活连李承晚也承认，“即便按亚洲的水平也不能说达到了糊口的水准”。1960年4月，张勉政权上台之后，韩国仍然混乱不堪，直到1961年“5·16”政变，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上台，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

### 二、朴正熙与“汉江奇迹”

虽然美国的经济援助在韩国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军事援助却使韩国在传统的政治体制外创造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

---

<sup>①</sup> 《战后韩国经济与中韩经贸关系》，第18页。



对韩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5·16”政变是在美国策划下发生的。扶植一个自己控制的韩国一直是美国东亚政策的组成部分，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使韩国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韩国成为美国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沿阵地，美国开始成为韩国政治经济的监护者。李承晚政权垮台以后，美国曾经计划利用张勉的民主党来实施对韩国的控制，但是张勉政权并没有扭转韩国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情况，令美国非常失望。在民主政治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决定用“军人政治”来取代政党政治。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和支持下，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等人调动军队，佯装进行军事演习，攻进汉城，并很快占领了政府所在地和广播电台，随后立即通过电台宣布“军事政变成功”，从这时起一直到1979年，韩国一直处于朴正熙的控制之下。

朴正熙上台之后，在韩国放弃民主政治，虽然韩国早就建构了民主制度的框架。朴正熙认为，韩国缺乏吸收外国民主思想所需要的内在条件，他认为韩国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文盲，经济十分落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很低，而且韩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因此韩国的社会还不足以马上承受民主政治。如果硬性地实行民主政治，只能使民主“流于形式”，所谓的“民主”只能被腐败的政客所利用，导致政局紊乱和人民的贫困，李承晚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韩国不能“指望以模仿西欧民主主义与代议制的形式，来取得政治上的成熟与经济上的成功”。<sup>①</sup>

朴正熙政府认为，只有在韩国建立一个威权政府，才能稳定韩国的政治局势，清除韩国的腐败现象，完成韩国最迫切的经济现代化任务。秉承这样一种思想，朴正熙在政变后开始建立强有力的军人权威统治。朴正熙执政时期，在中央各职能部门中任职的官员

---

<sup>①</sup> 姚传德：“朴正熙的现代化思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83%都是军人。为了克服韩国的政治动荡状态，朴正熙还在韩国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上台后一方面大肆逮捕反对派领袖，关闭新闻报刊等传媒机构；另一方面在1972年又通过所谓的“维新宪法”，大大加强了总统的权利，将总统的任期改为六年，取消限制连任的条款，规定总统有权在国家一切事务范围内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从而使得韩国的威权主义统治变得合法化、制度化。

60年代军人政权遍布世界许多地区，但绝大多数军人政权上台后只能保证政治稳定，很少能够同时推动经济的发展，然而朴正熙政权却做到了这一点。在朴正熙政权统治期间，韩国经济实现了起飞，并且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韩国创造了“汉江奇迹”，在朴正熙开始执政的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仅82美元，而他遇刺身亡的1979年，韩国人均收入达到了1636美元，年均增长18%，而且在这期间，韩国还创造了年均出口增长38%的奇迹，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化国家。

韩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在政府领导下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具体特征是在实行私有制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增长”。<sup>①</sup>

朴正熙上台后，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朴正熙认为不发展经济的民族没有希望，不能发展经济的政府也不能长期存在下去，所以一开始就把发展经济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朴正熙对李承晚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两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把以前依靠美国援助的消费型经济改变成通过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自立经济”；二是把过去“自由放任”的纯市场经济改变成“计划经济”和市场发育相结合，建立起以政府力量为主体的

---

<sup>①</sup>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sup>①</sup> 为了统管经济，1961年7月，成立了“经济企划院”，具体职责是制定各种旨在经济复兴的综合性计划，并处理实施计划过程中的各项事务，以后又规定企划院长官由内阁惟一的副总理兼任，使得企划院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经济的机构，素有“经济内阁”之称。为了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又成立了两个咨询机构——开发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将韩国的优秀学者和专家汇集在一起，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韩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朴正熙政权制定了切合韩国实际的经济五年计划，从而有步骤地完成了整个工业化的任务。“一五”计划从1962-1966年，由于当时韩国的国内经济机构非常不完善，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在“进口替代”工业方面，重点是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部门。在这期间，由于美国援助的减少，缺乏资金，朴正熙政权除了提高国内的存款利率吸收资金外，还排除重重阻力，在1965年恢复了与日本的邦交，获得了日本方面8亿美元的援助与贷款，有力地支持了“一五”计划的实施。“一五”计划实施期间，韩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3%，<sup>②</sup> 1966年韩国的出口额达到2.503亿美元。

“二五”计划从1967年到1971年，目标是大力发展“出口导向产业”，鉴于自身资本的微薄和技术的落后，韩国这一时期重点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木材加工及玩具等产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同样获得巨大成功，韩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5%，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出口增加到11.3亿美元。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70年代初韩国的轻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70年代西方国家正处于产业调整时期，出现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利益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趋势，同时当时一些

---

① 车哲九著：《南朝鲜四十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② 赵虎吉：《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权威主义：韩国现代政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发展中国家，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也纷纷发展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韩国面临的竞争比较激烈。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如电子、造船、汽车制造、钢铁、金属加工等产业，同时将纺织、服装等出口产品高档化。1972 - 1976 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产品的升级，提出“重化工业立国”的方针。在三五计划期间，韩国对重化工业实行了资金和政策上的倾斜。“三五”计划使韩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总额增加到 78 亿美元，尽管这一期间出现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韩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 11.2%。“四五”计划从 1977 - 1981 年，主要任务同“三五”计划相似，最初两年非常顺利，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0.3% 和 11%，1979 年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增长率下跌，但是仍然达到了 6.4%，1979 年 11 月 26 日，朴正熙被刺身亡。

朴正熙政权在推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在 1971 年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其目标包括三个：第一，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包括建设道路、住宅、自来水等基础设施，进而发展电器、电话、医疗卫生等设施；第二，改善生产条件和扩大收入来源，这是新乡村运动的最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内容；第三是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宣扬健康的社会意识等。“新乡村运动”的实施分为四阶段，1971 - 1973 年是改造“基础村落”阶段；1974 - 1976 年是改造“自助村落”阶段；1977 - 1981 年是改造“自立村落”阶段，1980 年以来是建设“自营村落”和“福利村落”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韩国农村的大部分村落跨入了现代化的门槛，韩国农村的面貌得以彻底改变。

朴正熙遇刺后，韩国成立以崔圭复为总统的过渡政府，但 12 月 12 日军界的实力派人物全斗焕发动了“肃军政变”，军人再次上台执政。1987 年 12 月，卢泰愚当选为韩国总统。朴正熙之后的军人政

府继续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政策，五年计划仍然在继续进行，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韩国的“四五”计划规定的目标，除了出口贸易达到210亿美元完成计划之外，其他指标都没有完成。面对经济衰退的局面，全斗焕政府对朴正熙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继续推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同时，一反过去的“高速增长”，提出了“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改“政府主导”为“民间主导”，把政府积极干预转变成“市场自动调节”；实行低物价、低利率、低汇率的“三低”政策，并紧缩财政金融；增加对外贷款，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开发，注意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sup>①</sup>

1982-1986年是韩国实行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进行了经济调整，加上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看好，“五五”计划取得了成功，韩国基本摆脱了“滞胀”局面，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274亿美元，失业率也达到历史上最低水平。

1987年1月，韩国又公布了“六五”计划，其总目标是：“把效率和平衡作为基础，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增进社会福利。”“六五”计划也取得了成功，1987年的国际贸易收支出现了韩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顺差，达到43亿美元。到1991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增加到2727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316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2名成员国中，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十三位。<sup>②</sup>

总之，从1961年朴正熙上台执政开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被高度压缩，经济实现了迅速腾飞，创造了“汉江奇迹”，成为引人注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从1966年到1970年，在59个发展中国家

---

① 《南朝鲜四十年》，第228页。

② 《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第2页。

中，韩国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均居于世界第一位，因此被视为模范增长国。韩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见下表），在1961年，韩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主体的国家，但是到1980年，制造业和新兴的服务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主体，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奇迹。

韩国的产业结构变化表<sup>①</sup>

	1967 - 1971	1972 - 1976	1977 - 1981	1982 - 1986	1987 - 1991
农林渔业	27.2	23.5	15.5	11.2	7.7
工矿业（制造业）	22.5 (21.1)	28.7 (27.4)	10.1 (28.5)	31.9 (30.8)	29.0 (28.5)
服务业	34.8	32.7	35.7	37.6	37.6
社会基础设施，其他	15.5	15.1	18.7	19.3	25.7

有人认为，探索韩国经济成长的奥妙，在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一个经济发展取向的、能够提供政治稳定的、以理性和效率为诉求的硬政权是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强政府在某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不可替代的。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朴正熙等人所建立的军人统治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力为代价的，但是在韩国最初混乱无序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下，它确实是韩国当时最好的选择。正是政权运用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才排除了当时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调动起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为韩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国经济成功的秘密在于，第一，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朴正熙等军人政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指挥中心，并主持制定了

<sup>①</sup> 张宝仁、金承南、张慧智著：《现代韩国经济》，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一系列发展的具体计划，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注入了计划经济的成分；经济的计划性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而这正是朴正熙政权奠定的基础，这种计划性使韩国的经济发展避免了盲目性。第二，虽然韩国这一时期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但在管理方面却实现了“民主化”，这是政府能够进行有效决策的基础。以朴正熙为代表的韩国政府增加了大量的经济职能部门，启用专家掌管经济。尽管朴正熙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但是他并没有在与经济有关的部门安插一名军队出身的官员，对于经济官员的任命标准只有一个：必须是懂经济的行家里手，从而确保了经济计划的合理性；第三，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这是韩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韩国国土狭小，市场狭小，要想促进经济的发展必须寻求国外市场的支撑，为此，朴正熙提出了“出口第一”的口号，建立起“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采取了诸如向企业提供出口补贴等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从而给韩国企业创造了诸多的机会。

### 三、威权体制的瓦解

虽然美国一直试图在韩国扶植民主政治，但是韩国的民主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李承晚时期民主次于反共，朴正熙时期民主次于经济发展，韩国政治的本质是威权政治。尽管韩国的威权主义政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其专制集权的性质是与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的历史潮流相背离的。正如政治发展理论所认为的：“将政治体制与社会其他侧面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引出一个一般化的结论：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国家越是富裕，坚持民主的可能性相对越大。”<sup>①</sup>经济发展的成功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在经济落后的时候维护军人的威权统治，又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带来的社会进

---

<sup>①</sup> 转引自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步中使威权统治的合法性丧失。在韩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得以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韩国的教育体系受美国影响颇深，西式教育的发展导致威权统治的支持率下降，民主意识不断强化，这是导致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的群众基础。经济的发展还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兴起，到1985年中产阶级已经占到韩国人口的60%，中产阶级的扩大成为推动韩国民主政治的潜在政治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军事威权统治遭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全斗焕政府通过政变上台执政以后，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仅仅从1980年3月到5月就发生了2300多次反对军事管制的游行示威活动。虽然全斗焕对民主化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在内外压力下，韩国的威权统治内外交困，当时执政的民政党代表委员卢泰愚在1987年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主要包括协商修宪、地方自治、修改总统选举法、释放政治犯等内容，该宣言扭转了陷入政治危机的韩国局势，是韩国政治转型的一个关键。1987年12月，卢泰愚当选为总统。虽然这仍然是军人与军人之间的政治交换，但是没有政变的手段，它表明韩国的民主政治相对于以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92年12月，金泳三被选为韩国总统，标志着韩国新政治的开始，因为这是32年以来韩国的第一位文人总统，而且金泳三也是长期为韩国的民主化而斗争的一位民主人士，韩国军人威权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初步实现了威权政治向民主体制的转变。

### 第三节 曲折前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坎坷进程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国内政策的中心回到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轨道上来，“一五”计划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还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从而在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求解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这道难题上，党内给出了两份不同的答卷，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一个是比较正确的社会主义观，另一个是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即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产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思想和实践。二者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左”倾社会主义观点占压倒优势，并随着实践和思想的不断积累，跃升为以“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新世界”为理想目标，以“阶级斗争”、“大跃进”、“穷过渡”为基本路径的“左”倾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sup>①</sup>从1956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种种考验，中国开始进入了曲折坎坷的发展时期。1957年4月，中共中央开始整风运动，1957年5月，又进行了反右倾斗争，并最终演化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与政治上的“左”倾相对应，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冒进倾向也很明显，1958年开始的经济上的“大跃进”狂潮不但没有使经济突飞猛进，反而使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之后，中国经济虽然进行了调整，但是一直到1978年之前，始终没有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拉大了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济差距。

### 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

经济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础，但是如何发展经济各国有不同的探索。最初中国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体现在《共同纲领》中，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

---

<sup>①</sup> 杨发民：“‘左’倾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占上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2期。

目的”，国家应该在各个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纲领中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并且没有规定采取计划经济的模式。

但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为了恢复和加速经济发展，与外交上的“一边倒”对应，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将重点集中在重工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苏联是惟一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是能够提供工业化的原则性和实践性的惟一外国”。<sup>①</sup> 朝鲜停战之前的1952年，中国政府就开始编制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1953—1957年），1955年由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颁布实施。事实上，“一五”计划早在1953年就开始进行，从1953—1955年，“一五”计划是边实施边编制的状态。

“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主的工业化建设，从而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安全的基础；同时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在“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期间，新中国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总共援助了新中国156项建设项目，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联不仅提供贷款支持，而且派出了大约3000人的专家来到中国。苏联专家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试车投产等方面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帮

---

<sup>①</sup> [美] 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O·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助。苏联援助的项目帮助新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的骨架，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苏联专家在华期间，还帮助中国培训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同时，中国还先后派出大约4万名中国公民到苏联学习，这些人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科技队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由于“一五”计划的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加上苏联方面的支援，“一五”计划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56年，计划的大部分指标已经提前完成，中国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实现。1957年，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

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由于“一五”计划的重点是工业，这种成就在工业部门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1957年达到650.2亿元，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41%，平均每年增长18%。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除了原有的工业部门之外，还建起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兴工业部门。<sup>①</sup> 农业、运输、邮电、国内外贸易都发展很快。

经过“一五”计划，新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中国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一五”计划进行的同时，中国还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这个改造也存在一些失误和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在改造目标上盲目求纯，放弃了《共同纲领》中经济的正确指导方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要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没有意识到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和促进

---

<sup>①</sup> 谢春涛主编：《共和国五十年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作用。其二，受苏联模式影响，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起了绝对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甚至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其三，在手段上采取强制手段，并且带有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错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一直在重现。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建设也开始全面展开。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部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 二、整风运动与大跃进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要借鉴苏联模式的经验，但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苏联模式的迷信，而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的波匈事件又对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一切都对毛泽东等领导人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促使他们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到“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

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sup>①</sup>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肯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制定了正确的八大路线，但是正确的政策并不保证能够转换为正确的实践。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去，有的甚至在实践过程中完全走向了反面。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关系问题，前五个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是加速经济建设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经济因素，后五个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主要讲政治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团结稳定有着双重关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后者特别是人民矛盾问题的兴趣逐渐加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56年9月的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导致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因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是主观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官僚主义。1957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正式开展整风运动，并声明这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教育运动，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0页。

评运动，这表明整风运动应当是以和缓的方式进行的运动，目的是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以及党政干部的缺点。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间断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自己，这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正常的的事情，整风运动最初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这种言论虽然属于个别现象，但是引起了毛泽东等部分领导人的警觉。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1957年6月8日，党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从而在全国开始了反右倾斗争。反右派斗争在进行过程中被严重扩大化，它直接导致对党的八大关于社会矛盾正确判断的改变，逐步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加以宣传，从而转移了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反右斗争也造成了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与断裂，而且，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还使大批人才遭到打击，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损失。

与政治上的反右相对应，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冒进倾向也很明显。为了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毛泽东一直在探求一种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办法，并提出在经济领域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实行“多、快、好、省”方针，这标志着八大制定的经济平衡稳步发展方针的逆转。从1958年开始了经济上的“大跃进”狂潮。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大跃进并不是具有一贯指导方针或目标的一项具体计划，而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sup>①</sup>

在大跃进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计划和指标。在工业领域，大跃进主要表现在片面追求

---

<sup>①</sup>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钢产量的高指标。由于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1958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工作重心彻底地转移到工业方面，确定了大办钢铁工业的方针，中央把原定15年赶超英国，35~4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逐步提前为2~3年赶超英国，5~7年赶超美国，并且把1958年全国钢产量的指标由最初的624.8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当时还提出了大办运输、电力、煤炭几十个大办口号，把工业领域的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们片面地认为人的努力和意志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在农业方面的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农业方面的大跃进，主要表现为1958年夏收期间农业生产上的虚报浮夸，当时盛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下，有的地方竟然宣称亩产达到6万多公斤。1958年7月，农业部根据各地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然高达4000亿公斤，而1957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850亿公斤，如此增长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农村还刮起了“共产风”，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指的是规模大，当时把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多者竟然达到几万人，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公”指的是公有化程度高，一切财产上缴公社，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农民的家具等私有财产收归国有的现象，在文教领域，也是浮夸风盛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在3~5年内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sup>①</sup>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1958 - 1960 年紧锣密鼓进行的大跃进，不但没有使经济突飞猛进，反而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之后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它证明了大跃进做法本身的缺陷。五六十年代正是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时期，而中国因为三年的大跃进、五年的调整（1965 年国民经济调整后经济才恢复到 1957 年水平）而耽误的时间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大得无法估算。这也正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上拉开差距的关键时期。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左倾上的严重错误，虽然是受多种因素夹击的结果，但是从区域的角度来说，一个原因在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可以借鉴的经验并不是很多，苏联几乎成了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苏联的影响，“学习苏联老大哥”一度成为热门的口号就是这种反映，而中国的农民公社则处处可以见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子。另一方面，中国同时与苏美蒙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也使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行一种非常规的赶超战略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

### 三、经济调整与政治“左”倾的发展

大跃进运动之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开始走向一条似乎矛盾的道路，在经济方面，困难的经济局面迫使党中央思索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在政治领域，“左”倾错误仍然在变本加厉地重现。

面对经济的重重困难，1961 年 1 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 1961 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党中央对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工作。在农业方面，对公社规模过大、管理方面过多过死、民主制度不健全等缺点进行了纠正，同时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少粮食征购和降低农业税率等措施，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工业方面，压缩调整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如钢产量的基本指标，由 1900 万



吨下降到 850 万吨；精简职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市场供应状况。1962 年 1-2 月，党中央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议总结了 1958 年以来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指出：社会主义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必须注意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计划指标要符合实际。会议决定要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从 1963-1965 年，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调整措施，到 1965 年，基本上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扭转了经济上的困难局面，有些指标还有所提高。

但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不但没有与经济同步进行，反而向更加“左”倾的方向发展。随着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矛盾的发展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深入，作为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在具体的政策上产生了一些分歧，毛泽东把这些分歧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并据此在 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在这次会议的多次讲话中，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批判，并且指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发展了反右派斗争的观点，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这次会议之后，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了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并最终演化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政治上“左”倾错误发展也波及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以 1963 年报纸公开发文批判《李慧娘》为标志，开始了对文艺界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并很快蔓延到学术界和教育界，对知识分子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种过火的政治批判，严重影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曾试图在这方面加以约束和控制，提出要刹车。但是，车不但没有能够刹住，反而是以加速度运行，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四、全国大动乱

1965年11月，在江青的策划组织下，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发生的背景比较复杂，简明地分析问题，有两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因素在于它是党的八大后“左”倾错误长期积累、演变的一个结果，区域因素在于中苏之间的论战成为强效的“催化剂”，中苏之间的论战促使毛泽东等人形成了“反修防修”的思想，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系统化，为文革的发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的《座谈会纪要》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一直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4月10日转发全党。实际上，《纪要》的责难不仅是针对文艺界，而且还隐含着针对中央领导人的内容，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特点，虽然号称“文化”，但实际是针对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并最终演变为波及全国党政军机关的一场政治运动。

1966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罗、陆、杨的“反党集团”问题。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之前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通知》还指出，在文化领域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通知》要求全党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的

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并清洗混进党政军等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由此错误判断出发，毛泽东认为他要发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场旨在夺权、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大革命。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制定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一决定与《五一六通知》一起，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之后，“文革”迅速扩展到全国。

1967年，文革进入一个大夺权年，新年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在社论的号召下，由上海开始，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所谓“一月风暴”，“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由此引发了全面内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狂潮，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1967年也因此成为国民经济状况最差、工农业产值最低的一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sup>①</sup>之后，全国在动乱的路上不断滑行。

在“文革”的进程中，包括刘少奇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遭到了迫害，许多基层干部、知识分子都被迫蒙冤，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严重损失。这一期间，老一辈革命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试图把中国拉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包括“二月抗争”，周恩来主持工作期间的纠“左”措施，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全面整顿等事件，这些虽然被“文革”的进程所打断，但是为文革期间的发展以及以后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由于“文革”期间部分领导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虽然从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总体上国民经济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某些方面仍然有一定的进展。在农业方面，农业的机械化取得一定进展，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3.3%；在工业方面，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等行业也得到了发展；同时，我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核技术方面，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空间技术方面，1970年4月，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75年，中国还成功地进行了人造地球卫星回收试验，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在其他科技领域，中国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所有这些为中国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为中断，使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危机，使中国失去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它也把中国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浓缩的形式推向极端”，加速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旧体制的衰落解体”，<sup>①</sup>从而使中国提前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期。

---

<sup>①</sup> 吴鹏森：“‘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历史影响”，《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12期。

## 第九章 变与不变：70年代之后的东北亚

70年代是东北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转折首先从国际关系层面启动。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冷战坚冰率先在这里解冻，具体表现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日关系正常化。同时，日朝、中韩等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开始松动。另外，中国和日本的道路也在发生转折，中国继恢复在安理会常务理事会的席位，成为政治大国之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正在向经济大国的方向挺进；而日本推行经济外交，经济腾飞为它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东北亚地区的这两个大国的命运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国关系的变位是90年代后影响这一地区的重要因素。在东北亚局势发生变化的同时，仍然存在不变的因素，朝鲜半岛的僵硬对峙、日本和苏联关系的僵持又标志着东北亚发展在某些层面的滞后。

### 第一节 中美建交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朝鲜战争使得东北亚的两极格局固定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美苏之间冷战整体大背景的缓和，双方阵营的整体一致性日趋瓦解。这在东北亚地区的表现，最主要的是中苏分裂所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

中苏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在 50 年代逐步尖锐和表面化，1956 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中苏两党对涉及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对世界局势的看法问题出现了分歧，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本来可以通过平等讨论的方法解决，但是苏联把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使得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转变为控制与反控制之争。1958 年之后，赫鲁晓夫为了谋求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加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干预和控制。1958 年 4 月和 7 月，赫鲁晓夫先后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被中国拒绝。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 1957 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之间的 343 个专家合同，废除了 257 个科技合作项目，并撤走了 1 390 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从 1963 年起，中苏论战进一步升级。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施压的同时，苏联还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整个 60 年代，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其中包括坦克和导弹部队，并蓄意挑起中苏边境冲突。1966 年 2 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包括“导弹部队在内的苏军进驻蒙古，威胁我国心脏地带”，<sup>①</sup> 1969 年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标志。

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于中朝、中蒙关系都产生了影响。由于蒙古与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关系，中蒙关系也全面恶化，苏联在中蒙边境布置了大量军队，直接威胁中国边境。

中苏朝的关系相对复杂。<sup>②</sup>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苏两国都希望朝鲜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上演了争取朝鲜的“拉锯战”。为了支援朝

---

<sup>①</sup> 林村：“结盟·对抗·伙伴——中苏、中俄关系四十五年”，《国际观察》1994 年第 5 期。

<sup>②</sup> 关于中苏朝关系的论述，参考了杨军、王秋彬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9 - 241 页。

鲜的七年计划，中国曾于1960年10月13日提供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同年12月24日，苏联也将朝鲜所欠的76亿卢布债款一笔勾销，另外还有1.4亿卢布的债务延期偿还。<sup>①</sup>1961年7月6日，苏联同朝鲜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在一个月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得以签订。<sup>②</sup>朝鲜在中苏两大国的夹缝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大约在1965年以前，朝鲜在努力保持中立的前提下，倾向于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在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朝鲜都同中国立场大体一致，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国。<sup>③</sup>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朝苏关系较为冷淡，朝鲜宣传机构多次对苏联的作为提出批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以至于苏联在1962年停止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朝苏关系由此降至低点。面对中苏关系恶化，朝鲜一直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因此，朝苏关系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而走向最终崩溃。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由明显倾向中国转为明显倾向苏联，中朝关系曾一度疏远，甚至处于紧张状态。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压力日增。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那里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

---

① 高崇云：《中共与南北韩关系的研究》，（台湾）大学联合出版委员会1989年版，第43页。

② 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9-1280页。

③ 刘金质、张敏秋、张小明：《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力。苏联也看准了朝鲜的这一需求，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次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

朝苏关系的发展给朝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中朝关系时有紧张状态出现，实际上处于两国关系史上的最低谷。但是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还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双方都努力克制自己的行动。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党报、党刊不断表示要珍视中朝友谊，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朝鲜后来也持中立态度。正是基于这些情况，一位学者对这一时期中朝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形象地将1965-1969年间的朝鲜对外政策概括为“偏向莫斯科的中立”<sup>①</sup>。

中苏分裂和中朝、中蒙关系的变化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分裂，而中国因此也面临更加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国家安全处境极为不利。因为在中苏结盟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是“一边倒”，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站在一起，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然而，中苏同盟破裂后，意味着中国“一边倒”战略方针已经继续不下去了，而中美关系又没有任何的改善，在对外战略中中国由“一边倒”转为“两条线”，一边对抗苏联、一边对抗美国。中苏分裂与中美对立使中国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国际局势，中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

<sup>①</sup> Kim Hakjoon, *Korea's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rs in A Changing World*, (Seoul: Hollym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1993), p. 494.



## 二、中美关系的变位

经过近十年的“两条线”战略后，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尤其是1969年的边境冲突后，中国意识到与自己拥有漫长陆地边境线的苏联陈兵百万是对自己最紧迫的威胁。在毛泽东授意、周恩来安排下，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经过多次研讨后提交了国际形势报告，报告认为：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苏矛盾是尖锐的、经常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因此，中美的接近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sup>①</sup> 此时，远交近攻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理念，距离相对较远的美国成为中国抗衡苏联的外部力量。

促使中苏分裂一直是美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之一，尤其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引进第三方的力量对于美国赢得冷战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中苏分裂并没有对中美关系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随着尼克松登上美国政治舞台，美国的外交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1969年8月，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也从中美苏的三角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苏联更具有侵略性，如果听任中国被摧毁，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基辛格在年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sup>②</sup> 同时，借助中国力量结束越南战争也是促使美国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得

---

①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6、197页。

② [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

以形成。1970年1月和2月，中美两国恢复了大使级会谈，随后中美两国以体育为渠道，开始了“乒乓外交”。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中美两国均派出了代表团。在名古屋，中美两国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有一些友好的接触。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借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4月，中国做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于是美国乒乓球队员率先迈入了中国大门，随后中国接受美国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邀请。美国记者写道：“可能成为二十年来在恢复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赛场。”<sup>①</sup>“乒乓外交”对于中美关系的互动起着良性的助推作用，最终起到以小球推动大球的战略功效。

1971年6月，中国向美国正式发出了邀请基辛格以尼克松特使身份秘密访问中国的信件。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在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会谈，就尼克松访华事宜坦诚地交换了意见。15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布了一个举世震惊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正如尼克松曾经说过的：“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中美之间关系的解冻标志着冷战在东亚的缓和。2月27日，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公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中美双方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的看法，包括东亚的印度支那、朝鲜，以及南亚的印巴关系；双方对国际事务的共同观点，主要包括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反对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反对大国间勾结反对其

---

<sup>①</sup> 钱江著：《“乒乓外交”内幕》，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他国家，反对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双方同意扩大民间、贸易的交往。关于台湾问题，中方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即台湾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或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对此作出如下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中美关系的缓和使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开始初步瓦解。

### 三、中日建交

日本在战后与美国构建起同盟关系，日美同盟成为日本外交的基石，日本全力迎合美国的东亚战略，虽然中日之间有贸易往来，但是政治上日本一直对华采取敌视政策。而美国对华政策的突然逆转对日本二十年来习以为常的日中关系、日美关系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次冲击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尼克松冲击”使日本政府突然发现自己的利益被美国冷战外交策略所忽视，日本意识到自己几乎处于一种孤立的境地，随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出现了思想与行动的不协调。一方面，它要继续和美国一起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不满，试图采取较为独立的行动。当时执政的自民党多数意见认为：既然美国搞越顶外交，开始搞美中和解，日本现在也应着手实现二十年来悬而未决的日中关系正常化。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最终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消息传至日本，佐藤政府受到冲击被迫下台。1972年7月，田中角荣组阁。田中在内阁成立的当天就提出：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中国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国一直重视中日关系，积极推动民间外交，对田中的表态也做出了迅速反应。7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也门客人时表示欢迎田中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声明。<sup>①</sup>11日，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歌舞剧团访日，同日本各界接触交流。13日，自民党内部成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协会，协调自民党内的意见。7月，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周恩来与竹人就双方复交所关心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交流。8月，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宣布，周恩来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同月，田中会见孙平化，接受了访华邀请。

当然，日本对中关系的改善的前提是不影响美日关系。1972年8月31日至9月1日，田中飞赴美国与尼克松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田中向尼克松保证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体制，同时表示不管成功与否，要着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尼克松表示：“对于前者表示感谢，对于后者预祝成功。”<sup>②</sup>

得到美国的首肯后，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随后，双方开始就中日建交的具体细节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中日双方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主要在于台湾问题。在谈判中，中国提出了中日建交的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废除“日台条约”。但是没有得到日本的回应。经过协商，29日，中日双方终于签订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双方调整了上述分歧。《联合声明》重申了中日建交的三原

---

①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② [日]大平正芳著：《我的履历书》，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则，共同确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不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任何一方谋求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还同意继续就缔结和平条约以及贸易、航空、航海、渔业等协定进行谈判。双方宣布结束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本与台湾签订的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宣告结束”。<sup>①</sup> 1972年12月，日本和台湾相互派驻对方的“大使馆”关闭。1973年1月和2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分别开馆。

中日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尽管明显受到中美关系的巨大拉动，但还涉及如下几个因素。<sup>②</sup> 一是共同安全利益的需要。中国、日本当时都面临着苏联的巨大威胁，苏联在中国边境不断增兵，甚至出现了小规模军事冲突。日本与苏联一直存在北方四岛的争端，而日本与苏联的对手美国又存在同盟关系，所以日本视苏联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共同的安全利益促使中日之间接近。二是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相互需要。中国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大国地位，但是经济发展缓慢，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使中国容易在国际政治中处于被动。日本经济发展显著，但是它自始至终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极不协调。日本需要在继续拓展经济市场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日中恢复外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两国的这种需要。三是中日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共处东亚的地缘现实，这一点与前两点相比，无疑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 四、中美建交

1972年2月《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一方面标志着中美

---

① 《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

② 参见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之间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另一方面关于台湾问题的提法又显示出两国的巨大分歧，这预示着中美关系将经历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从1972到1978年，中美关系走向建交的道路充满曲折。台湾因素、苏联因素、越南因素以及中美两国的国内因素再度对这一进程构成了影响。

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延宕的主要原因。虽然在中美缓和及中日建交过程中，中方明白无误地向国际社会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台湾是其东亚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与台湾难舍难分，迟迟不能下决心实现中国提出的建交、撤军、废约的要求”。<sup>①</sup>虽然中美联合公报已经明确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仍然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一再表示负有保卫台湾安全的义务。仅仅从1972年2月到1974年8月，尼克松政府就在不同场合表达要对台湾安全履行义务的次数多达50余次。<sup>②</sup>

苏联因素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南希·B·塔克曾经说过的，长期以来，中美关系是不正常的，中国的重要性“总是与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危机相关联，美国从未从两国间关系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sup>③</sup>美苏争霸促进了中美和解。但是中美和解又促进了美苏关系的缓和，而美苏关系的缓和使中美和解的迫切性、重要性对美国来说相对减弱，因此美国并没有急于同中国建交。直到1978年，由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等原因，美苏的缓和遭遇到了挫折，美国对华改善关系的势头才大大增加。

越南问题也是促使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中国一直支持北越的

---

① 陶文钊：“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见陶文钊等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

② 郝雨凡著：《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37页。

③ Nancy. Bemkompt Tucker, “China and America, 1941 - 1991”,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 - 1992.

抗法、抗美斗争，1972年5月和12月，美国出动B-52轰炸河内，加大对北越的空中打击力度，这一举动也影响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随着战局的进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sup>①</sup>直到1973年1月27日，美国与越南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和附属议定书。中国表示：“结束战争，恢复和平，这不仅符合越南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同时，这对于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sup>②</sup>因此，越南战争的结束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创造了条件。

1975年，越南统一后提出了“印度支那联邦计划”。1977年，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下设的金融机构。同年，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访问苏联，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越南，苏联为越南提供物资和贷款。在苏联和越南的关系增强的同时，中越关系迅速恶化。越南掀起了排华运动。1978年11月4日，越苏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处于南北夹攻的不利的地缘政治的地位，这一事态促使中国要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而美国则日益关注到，当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东南亚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同时，苏联在中东、非洲、拉美地区的进攻性也越来越强，卡特政府最终认识到，美苏之间的均势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就会出现倾覆的危险。中美建交的时机日趋成熟。

1978年5月，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重新开启了始自尼克松政府、中经福特政府的中美建交谈判的实质性进程。又经过半年的磋商，1978年12月16日，两国同时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宣告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

---

<sup>①</sup> 官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sup>②</sup> 《人民日报》，1972年1月28日。

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声明：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方军事人员，“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

## 第二节 东北亚局势的变与不变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变化使得东北亚的两极对峙格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冷战的冰块率先在东北亚地区开始消融，除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演变之外，中国与韩国、朝鲜南北双方、日本与朝鲜的关系也在发生变位。

### 一、中韩<sup>①</sup>、苏韩关系的初步发展

相对于中朝关系而言，冷战时期中韩关系的发展表现得较为简单。由于分属于不同阵营，双方立场明确，彼此泾渭分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韩两国隔海对峙，相互口诛笔伐，几乎没有任何往来。

20世纪70年代，随着大国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缓和，中韩关系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对韩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冲击。韩国开始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韩国开始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途径和时机，以结束多年来相互对峙与隔绝的不正常状态。1973年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声

---

<sup>①</sup>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51页。



明”，宣称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韩国将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一切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差异。<sup>①</sup> 它表明韩国准备同一切不敌视且能平等对待它的共产党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这也是韩国政府对所宣称的“全朝鲜半岛人民惟一代表”的实质性让步。<sup>②</sup>

但是，“6·23宣言”发表后，韩国谋求改善同共产党国家关系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冷战格局没有根本突破的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中朝关系的特殊性，中国对韩国方面种种改善关系的信号，未能作出积极回应，但是这一时期中韩之间在发展非政治性关系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中国驻外官员开始同韩国外交官进行接触，中国开始允许驻香港及国际机构的官员为谈判或参加国际会议去韩国等等。1974年9月，中韩建立了邮电通信联系。从1975年开始，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侨民或朝鲜族居民可以到韩国探亲访友，持有韩国官方护照的人也可以到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或从事各种训练等等。

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独立发挥作用的愿望与信心也空前增强。韩国开始自主实施“北方政策”，即所谓的“北方外交”，表明韩国将外交政策优先定位在改善同苏联、中国的关系上。难能可贵的是，在80年代初，中韩两国在抨击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篡改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两国的舆论与外交行动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无形中拉近了两国的距离。为了推进同中国的关系，韩国政府制定了实现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阶段具体计划，即扩大体育交流、增加经贸往来、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韩关系升温也基本上是

---

① 刘金质、张敏秋、张小明：《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② Kim Hakjoon, *Korea's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rs in a Changing World*, (Hollym International Corp., 1993), p. 27.

通过这几个阶段来实现的。

一次偶然的事件为中韩官方代表的最初良性接触提供了契机。1983年5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劫往韩国，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团赴韩国进行处理，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到访韩国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劫机事件成为两国官方接触的开始，也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两国在体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展开，民间往来不断增加，经贸关系也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

然而，韩国同中国的关系总体仍然是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中韩政治关系仍处于僵化状态，未能像中国与苏东国家关系那样取得迅速突破。两国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在不断增强。1988年，中国派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汉城奥运会。会后，中国政府正式邀请韩国参加广州贸易交流会。1990年，韩国派出700人的庞大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同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和韩国贸易振兴会社签署了在北京和汉城互设代表处的协定，次年春季正式运作。与此同时，韩国开始增加在华投资，双方签订了促进投资保障协定，有关通讯、空运和海运业务也相继开通。

在经贸关系和民间往来迅速发展的推动下，中韩两国也在为彼此改善政治关系而努力。1991年9月，朝鲜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解决了中韩建交的一大难题。此后，中韩之间加强了官方层次的交往与沟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明显加快。

由于分属不同阵营，一直到70年代之前，苏韩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的官方接触，苏联曾经连续19次否决韩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但是随着7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双边的关系开始松动，韩国方面指出“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已经失去了意义与效率，韩国必须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sup>①</sup>而苏联在这一时期也基本上

---

<sup>①</sup> 陈峰君、王传剑著：《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承认了朝鲜半岛分裂的事实，对朝鲜半岛的缓和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双方的关系以非官方接触为起点开始增多。但是1979年入侵阿富汗和1983年的韩国飞机误入苏联领空被击落事件，使苏联和韩国之间关系重新被置于冷战的气氛之中。直到1985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推行对外政策“新思维”，苏联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才再次得到发展。1990年9月30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二、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变化

日本长期对朝鲜半岛推行殖民统治，这成为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障碍。在二战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内，由于各自阵营的影响，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日韩关系的发展。

美国为了强化东北亚的反共同盟体系，一直力促韩国与日本加强联系。在美国的斡旋下，从1951年10月起，韩国与日本开始了旨在建立正常邦交关系的会谈。但是李承晚政权对日本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政策，双方围绕几个主要历史遗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尤其是“财产请求权”问题成为双方争议的核心。所谓“财产请求权”问题，一方面是指韩国要求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殖民统治进行赔偿（对日请求权），另一方面，日本也向韩国提出以其战前在韩国的“财产”与韩国的“对日请求权”相互“抵消”。而且，在谈判中日本代表还向韩国提出归还其在朝鲜半岛的“财产”，引起韩国的强烈不满，使得会谈无果而终。

促使韩日关系发生根本转折的重要人物是朴正熙，他上台后，迅速向日本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1961年11月，朴正熙访问日本，在请求权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姿态，他没有要求日本提出道歉和反省，对赔偿问题也是轻描淡写，对推动韩日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朴正熙的政策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朴正熙采取秘密外交解决问题。他的重要助手金钟泌多次与日本进行秘密沟通，最终与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达成“大平·金备忘

录”，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向韩国提供无偿援助3亿美元，有偿援助2亿美元，其他资金1亿美元。日本的主要考虑是力图通过提供资金使日本对韩国殖民统治的责任一笔勾销，备忘录标志着请求权问题的基本解决，为实现韩日邦交正常化扫清了最大障碍。1965年6月22日，《韩日条约》签定，日本承认韩国是朝鲜半岛的惟一合法政府。

朴正熙因为与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在韩国引起争议，但是，这一行为在当时有其客观必然性。朴正熙上台时，美国缩减了对韩国的经济援助，使长期依赖美国援助的韩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局面，而要发展经济，需要资金和技术。在朴正熙政府主持制定的经济开发计划中所需要的7亿美元中，需要对外借款的比例高达62%，但是当时韩国从美国及西欧引进资金的尝试都宣告失败，韩国的眼光只能转向日本。日本当时正实行经济外交，加紧开拓海外投资和贸易市场，因此也日益看重韩国的经济价值，这使得韩日关系改善成为可能。韩日关系的改善对于韩国的经济发展从外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被规避，也影响了日后的韩日关系。

50年代以来，一直到韩日关系正常化，尽管韩日关系历经曲折，但是毕竟一直在接触，而日本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一直处于隔绝状态。在70年代初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下，日本各界要求改变对朝鲜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日本政府开始调整对朝鲜的政策，日本关于“韩国是朝鲜半岛惟一合法政权”的立场出现松动，开始探索打开对朝鲜关系的可能性，朝鲜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971年11月16日，日本众参两院246名议员成立了超党派“促进日朝友好议员联盟”，1972年派出首次访朝团，与“朝鲜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缔结了《贸易协定》，1973年以后，朝鲜和日本的高级官员开始进行正式接触，日本对旅日朝鲜人的政策也进一步放宽。

日本对朝鲜政策的动向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韩日之间的关系一

度陷入紧张状态，在美国的协调下，日韩双方相互作出妥协，双方关系才重新得以改善。

1974年8月，日本的木村外相公开表示“韩国不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权，在北方也存在着合法政权”，这意味着日本政府的政策由“一个朝鲜政策”转变为“两个朝鲜”的政策，日本的政策得到了美国的认可，1975年8月，日美发表《三木—福特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强烈希望南北之间进行对话，以便缓和紧张局势，最后实现统一”。<sup>①</sup>在这一背景下，70年代日本和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明显增加。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美苏之间出现了“新冷战”局面，日朝关系出现倒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又开始推动对朝鲜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在东北亚冷战局势缓和的大背景下，蒙古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蒙古和日本在1972年建交，但最初双方关系冷淡。随着蒙古开始政治经济转轨，蒙日关系迅速发展。1989年，日本外相首次访蒙，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蒙古，这是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蒙古，也是第一位访问蒙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1990年，蒙古同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蒙韩签署了一系列互助协议，双方经贸、文化关系发展迅速。1987年1月，蒙古与美国建交。1990年和1991年美国国务卿贝克两次访问蒙古，蒙美关系迅速发展，形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交往与合作的局面。

### 三、不变的东北亚双边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朝鲜和韩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由于社会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迥然不同，双方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韩国一直主张“北进统一”，朝鲜民主主义人

---

<sup>①</sup> 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民共和国则主张“光复南方”，双方都在三八线两侧集中了大量的军队，致使朝鲜半岛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

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变化后，朝鲜半岛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中国要求撤销联合国1950年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那些既承认韩国，也承认朝鲜的“二重承认”国家日益增加，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也出现调整迹象，基辛格最先提出由美日苏中四大国对朝鲜和韩国实行“交叉承认”的设想。<sup>①</sup>在这个背景之下，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松动，对话成为双方寻求统一的新方式。首先是朝鲜和韩国的红十字会开始进行接触，而后是朝韩政府秘密接触，在朴正熙和金日成的倡议下，1972年5月，当时的朝鲜第二副首相朴成哲和韩国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进行了互访，并在1972年7月4日，发表了《七四南北联合声明》，提出了“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祖国统一的三项基本原则。1973年6月，朴正熙总统发表声明，同意“南北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而朝鲜也在1973年5月，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为向联合国派遣观察员打通了道路。1984年夏天韩国汉城地区暴雨成灾，朝鲜政府通过红十字会向韩国提供了5万石大米、50万米布匹、10万吨水泥和其他一些救灾物资，<sup>②</sup>实现了自南北分裂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物资交往，推动了朝鲜和韩国多层次、多渠道的接触与对话。1985年9月，经过双方红十字会九轮艰难的会谈，终于实现了南北离散家属的首次团聚，

冷战结束前后，朝鲜半岛互动频繁。1990年，双方举行了自分裂以来的第一次总理级会谈。1991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12月，第五次朝韩高级会议在汉城举行，双方签订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这是朝鲜半岛分裂后双方达成的第一个框架性文件，是引导双方消除对抗、走向和解

<sup>①</sup> 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sup>②</sup> 刘德斌主编：《当代国际关系问题》，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页。

的重要步骤。12月31日，朝韩双方代表在板门店草签《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同时，双边贸易额由1990年的1.347亿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1.1亿美元，1992年则达到1.7亿美元。<sup>①</sup>因战争以及长期分裂，朝鲜半岛存在数量庞大的离散家属，在时断时续的交流中，离散家属和双方人民看到了一丝曙光。

尽管朝鲜和韩国都试图付出努力，实现半岛的政治和解与统一，但是，长期对立所产生的误解和敌意，对美国军事存在的不同理解，东亚大国关系的不断变化，都使朝韩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一波三折。双方关系虽然有进展但是并没有突破，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作为冷战的标志仍然隔离着朝鲜和韩国。

东北亚关系的不变还体现在日苏关系上，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历时46年，日本和苏联的关系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二是两国历史上的纠纷，三是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的领土纠纷。

1951年召开的旧金山和会，由于受到冷战气氛的影响，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让日本能以合法的身份加入冷战中的西方阵营。因此，苏联等国家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之后由于日本紧紧追随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对美国亦步亦趋，日苏两国关系成了冷战的牺牲品，日苏关系严重对立。受制于这一局面，日本三次申请加入联合国都被否决。为了加入联合国，1956年日本鸠山首相访问莫斯科，10月19日与苏联签署了关于日苏恢复邦交的联合宣言和通商议定书。12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推荐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决议，日本得以加入联合国。至此，两国关系改善的动力已经基本消失。随着1960年1月《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的签定，日苏关系急剧恶化，此后虽然双方试图修补，但是由于北方领土问题成为日苏关系

---

<sup>①</sup> 张慧智：《大国关系中的朝鲜半岛》，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

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收效甚微。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与海部俊树首相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在领土问题上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 四、冷战的结束与东北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的东西方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终结，这是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北亚地区冷战格局的瓦解是从70年代初开始，这使得冷战的结束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没有欧洲那样的戏剧化，但是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苏联的解体使东亚地区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并促使东北亚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分层，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彻底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蒙古也开始实现转型，而朝鲜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探索出一条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演变，蒙古逐渐脱离了苏联的直接控制，开始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1990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19届8中全会，5月《政党法》颁布后，蒙古开始实施多党制，随后蒙古出现了24个政党，蒙古从此“揭开了拥有不同政治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及政治精英相互角逐的多党制的历史”。<sup>①</sup>1991年起，蒙古的改革也在经济上起步，在经济领域开始了私有化进程，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但是这种转轨并没有给蒙古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反而使蒙古经济经历了持续衰退，1991年蒙古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989年的1340美元骤然降低到85美元。<sup>②</sup>在对外政策方面，蒙古长期与苏联东欧国家保持高度的一致，素有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之

① 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② [日]栗林纯夫：“蒙古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世界经济译丛》，1993年第6期。



称。苏联东欧剧变对于蒙古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蒙古开始表现出强烈参与东北亚合作的愿望，开始把外交目光投向东北亚，1989年中蒙关系正常化。1990年5月，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奥其尔巴特应邀访华，1991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蒙古，这是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对蒙古国的首次访问，标志着中蒙关系的新发展。之后中蒙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在蒙古转轨的过程中，蒙古与日本、韩国、美国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基本延续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上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及农业”的产业发展政策，实际上是推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政策。朝鲜实行经济的计划发展模式，从1954年到1984年先后推行了三年计划（1954 -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 - 1961年）、七年计划（1961 - 1967年，后来延长了3年，到1970年完成）、六年计划（1971 - 1976年）、第二个七年计划（1978 - 1984年），早在1970年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布，朝鲜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成为拥有现代工业和发达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然而实质上朝鲜的经济仍然是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朝鲜的经济政治体制并没有随之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变位，东北亚地区的两极格局开始瓦解，在整个世界具有率先性，然而，其中朝鲜半岛的对峙情况却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结局，致使率先融化冷战冰层的东北亚一直到冷战结束也没有完全摆脱冷战的阴影，成为冷战的重要遗产之一。率先与滞后的并存，也是东北亚地区多样性的一个体现。

### 第三节 中、日走向全方位大国

东北亚是一个存在巨大变化潜力的地区，这种变化的潜力自 70 年代以来主要体现在中国、日本的发展战略上。回顾冷战时期，最具革命性的两件大事，一是日本通过一条新型的国家发展道路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另一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确立了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而在这之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在奉行全方位的发展战略，追求成为全方位的综合性大国。

#### 一、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

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日本对外政策的思想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日本不甘心只做一个经济大国，而是奉行全方位发展战略，这就是在确保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决意成为军事大国，进而成为政治大国，参与全球事务。

日本追求全方位大国地位，在冷战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隐性的大国战略目标，这主要是借助经济外交的手段完成，第二个阶段是从 80 年代开始，日本明确提出了“政治大国”的口号。

在 80 年代之前，日本外交的重要特点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以经济手段开路的经济外交，经济外交这个特点的形成既有客观背景，也有主观因素。客观背景包括日本作为战败国在政治和军事外交上受到的制约；主观因素在于日美基轴的路线使日本推行独立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降低，因此在战后的形势下，经济外交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特点。日本依靠日益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拓展起了外交空间，而且在政治和军事外交能力严重受限的情况下，日本在处理安全、政治问题时也往往以经济外交为重要手段。

日本的经济外交按照对象和作用划分,表现为三种形态:<sup>①</sup>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的通商外交;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经济合作外交;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战略援助(或)制裁外交。其中三者对于政治的支撑起渐次提升作用。三种类型的经济外交既是出于日本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有借机发展政治影响的含义,并内涵为以后国际地位的提升奠定基础之意。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对象的通商外交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同时与这些国家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它对日本的重要政治影响在于日本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密切联系,加入了各种国际组织并且地位逐渐得到提高。1952年8月,日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9月加入关贸总协定。最初日本在这种西方强国建立的经济体制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和相应工作,逐渐取得了平等地位,并且在1964年4月加入了素有“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这表明日本在西方影响的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经济合作来确保市场和原料,并以此来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力图提高国际地位。

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战略援助(或制裁)外交在日本三种类型的经济外交之中政治作用最大,这种外交包括替代美国而提供的政治性援助和经济合作对象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日本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1973年3月,日本决定对蒙古实行无偿援助,这是日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初援助,之后又于1975年对北越进行援助。又如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日本决定对巴基斯坦、土耳其、泰国等“冲突周边国”进行援助。同时日本使用经济制裁手段的例子也在逐渐增多,日本曾经先后运用减少或停止经济援助的手段对

---

<sup>①</sup> 关于经济外交三种形态的论述见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付越南、柬埔寨、古巴、安哥拉等国家。日本经济外交中的政治色彩日趋浓厚。

日本通过经济外交达到政治目的的是一种间接路线战略，在 80 年代以前具有隐性特征。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要求提高大国地位、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愿望也在同步增长。早在 1964 年 11 月，当时刚出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就曾经声明要对“世界政治积极地发言”，其后，历届政府都表现出这种愿望，并有一定的行动。但是这种目标的明确表述却是在 80 年代以后。1981 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出版的《日本型成熟社会》一书明确提出：“日本正面临着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关头……迄今为止的 100 多年里，日本一直以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以发展经济为轴心……日本今后的发展重心不再只在发展经济这一个轴心上，而将是多方面的或者是多轴心式的发展。在今后走向 21 世纪的过程中，日本将提高作为先进国家的成熟程度。”<sup>①</sup>而铃木首相在访问美国时，宣布日本要开始“第三个新起点”，也有人把它称为“第三次开国”或“第三次远航”。第一次指的是 1853 年美国舰队迫使日本开国；第二次是指二战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第三次就是从 80 年代开始，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正式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口号的是中曾根。早在 1982 年，他就任首相的前几天，就曾经说过：“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为追赶坡上的一朵云而努力，而现在这朵云已经消失了，我们要创造更新的一朵云。”1983 年 7 月 28 日，他在故乡群馬县发表讲话时说：“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这是日本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目标和口号。其后，中曾根多次强调，日本要以经济

---

<sup>①</sup>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5 页。

力量为后盾，以强大的常规军为保证，以自主外交为手段，辅以传播大和文化，使日本成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自强、自主、自卫、自立的世界性大国。随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以国家和党的最高文献的方式，确立“政治大国”为日本基本的国家战略。其后历届的日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战略。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战后型日本社会模式的颠峰期。尤其是1989年日本改元之际，恰逢日本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平成景气”给改元平添了几多喜庆气氛。这与当时美欧发达国家同时陷于萧条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有人此时提出了“21世纪是日本世纪”的预言。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直逼美国的冠军宝座。这一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总额（ODA）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援助大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为背景，日本对成为冷战后国际秩序主导力量的自信溢于言表，在一些日本人看来，21世纪出现“日本治下的和平（Pax Japonica）”似乎也未必只是幻想了。

日本确立“政治大国”目标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经济贡献与政治地位的不平衡，在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下，日本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被称为“经济大国，政治小国”，这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心理极为不平衡，因此，追求政治大国地位成为日本孜孜以求的目标。其次，是由于资源缺乏所导致的安全感的匮乏，日本是一个资源稀少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有严重的依赖性，国际环境的微小动荡都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冲击，因此对日本来说获得政治大国的威慑力、影响力和发言权十分重要。第三，大国意识的重新抬头也是重要原因，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自认为是“黄种人中的佼佼者”，应该在亚洲享有重要地位。二战时期的日本大国意识迅速膨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种意识才一度消沉下去。但是，随着经济实力奇迹般的恢复，日本的这种大国意识又重新膨胀。

总之，在美国忙于冷战之际，日本却悄然完成了一场经济上的

革命，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科学技术，奉行多面发展战略，追求全方位的影响，力图再次走上权力的巅峰，只是这种权力形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

日本在这一时期虽然提出政治大国口号，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前，日本政治大国的口号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除了继续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之外，还表现为力图通过“雁型经济结构”引领东亚经济。从80年代开始，日本在东亚倡导实施了“雁型战略”，率先将国内成熟化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而后四小龙又将其成熟化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各国和中国，依次转移的产业是纺织、化工、机械、电子等产业，这种产业转移的结果是在亚洲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就像一群大雁，日本位于雁首，之后是亚洲四小龙，再后是中国和东盟国家。日本这一战略的目的是为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提供理论依据。1988年5月，日本总理大臣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曾提出一个“东亚经济圈”的构想，成员包括日本、“四小龙”和东盟，其借用的经济模式就是“雁型经济结构”，而日本成为圈中的头。但是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现象的出现、中国经济的腾飞，日本的这一设想逐渐受到挑战。

### 二、中国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

几乎在日本完成经济革命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以一种新型的政治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1971年，第26届联大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全体会议，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虽然在这之前中国已经通过自己的辽阔国土、地理位置等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且通过自己外交的实践

对国际局势发挥重大影响，但是从总体来讲，由于在对外政策上向苏联“一边倒”，其国际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冷战”的冰川所覆盖。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国际舞台。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形成，更表明中国战略地位的上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恢复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全面恢复以后，派出官员和专家参加了联合国许多机构和组织的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重要职务，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并参加了联合国在纳米比亚和柬埔寨等地的维和行动，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中国成为新型政治大国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它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向了全世界。自近代以来，强权政治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在列宁提出和平共处原则之后。但是在其后领导人的政治实践中，苏联领导人逐渐背离了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所以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应有作用。而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着手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印度独立以后，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在我国西藏的特权。为了妥善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我国政府从1953年12月31日起，与印度政府代表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在1954年1月8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我国政府提出了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上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文中，正式确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周恩来总理把五项原则带到了亚非会议上，亚非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对大千世界的永恒奉献，它的原则

与核心思想为构建未来国际关系新格局做出了超前的杰出贡献”。<sup>①</sup>在这一原则指引下，中国与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得到了解决，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签订《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是亚洲国家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和平条约，为亚洲各国解决边境争端提供了范例。之后，中国又相继同尼泊尔、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议定书。

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它的重要标志还在于外交的独立自主性。虽然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一直是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等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独立自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直到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真正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被1982年12月召开的中国五届人大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认。“独立自主”对外战略方针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它表明中国外交的成熟，这也是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

### 三、中国走向经济大国

作为政治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它作为经济大国的潜能也日益为世人瞩目。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这一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结束，从而为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刚刚与“文革”告别的中国，百业待兴，冤案满地，问题成山，中国迫切需要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惯性，中国并没有立即完成这一历史的重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批判江青反革命集

---

<sup>①</sup> 王家福、徐萍著：《国际战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27页。



团的群众运动，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革”错误，但是这种正当要求却遇到了严重阻碍。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会议，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转折点，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会议取得了出乎不少人意料的丰硕成果，会议正式停止使用长期干扰中国社会进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同时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而为历史转折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证。三中全会的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开始了全面地纠正1957年以来党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生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解决了党自从1957年以来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以来，“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其后二十多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在这条线上前行。

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发展与开放的进程。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进行了改革的探索。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的，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项“包产到户”的改革是逐步推开的，并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得到肯定。这项改革使农村公社制度在我国彻底瓦解，农民获得了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农民的劳动成果和利益直接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也在逐步推进，最早的改革探索体现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随后在经济建设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在城市积极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扩大企业自主权，对企业实行扩权、

让利、搞活，并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对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利润包干，同时，还对城市经济的流通、交换、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配套改革。

经过几年的探索，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独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从而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会议郑重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认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这一阶段，以城市为重点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城市中，企业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建立和健全了责权利相结合的制度，进行了股份制的试点，厂长经理责任制也从试点到全面推开；价格改革也在进行，在价格的管理权限上，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企业定价和自由定价三种定价方式；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改变了国家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的方式，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解的范围和比重；在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与城市改革相适应，在农业领域，也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取消了三十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转变。农村改革带来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开辟了一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道路。在城市、农村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扩展了沿海开放地区，从而逐渐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递进式的对外开放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搞现代化经济建设，

## 东北亚史

全面推进改革与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从1983年到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0.6%；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进一步趋于协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10亿人口中的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参见下表。<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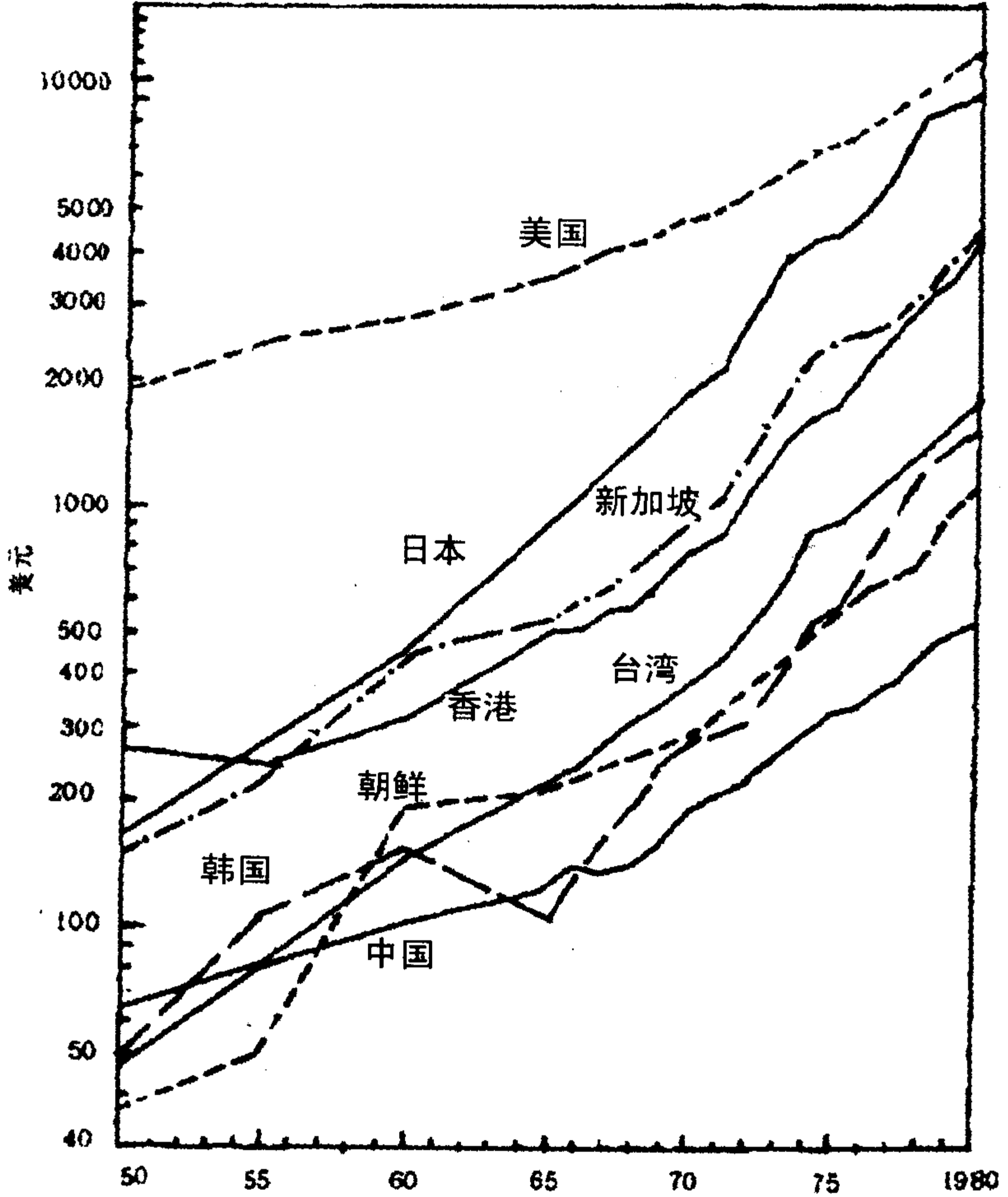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表（1978 - 1991）

年份	国民生产总值 (绝对值, 亿元)	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 (元)	国民生产总值指数 (以1978年为100)
1978	3 588.1	375	100.0
1979	3 998.1	413	107.6
1980	4 470.0	456	116.0
1981	4 773.0	480	121.2
1982	5 193.0	515	131.8
1983	5 809.0	568	145.5
1984	6 962.0	671	166.9
1985	8 557.6	811	188.2
1986	9 696.3	909	203.5
1987	11 301.0	1 042	225.7
1988	14 068.2	1 277	251.2
1989	15 993.3	1 430	262.2
1990	17 695.3	1 559	272.7
1991	19 854.6	1 725	293.8

<sup>①</sup>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第九章 变与不变：70年代之后的东北亚

东北亚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增长曲线表（1950-1980）



根据〔美〕小R 霍夫亨兹、K E 柯德尔著：《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图改编制。

经过一段期间的发展，中国已经初步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中国以政治大国为起点，开始向经济大国的地位挺进。

### 四、崛起的东北亚

与之前的东北亚历史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冷战期间东北亚局势的最大特点是东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影响日益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经济层面，由于日本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工业国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进程，东北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在逐渐加大，在亚太地区，中、日、韩三国的 GNP 总额占东亚地区 GNP 总额的 88.96%，其经济影响已经是世界性的。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霍夫亨兹和柯德尔曾经惊呼冷战期间美国错误地判定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而忽视了其面临的来自“东亚的挑战”，<sup>①</sup>而这才是美国将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在国际关系方面，东北亚地区的世界性影响也日益发挥出来，东北亚地区发生的事件不仅受制于冷战国家格局的影响，而且它反过来也对国际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加速了冷战的形成。而中美、中日关系的演变又提前预示着冷战的结束，所有这些都表明东北亚地区具有影响世界局势的能力。

虽然说冷战打乱了东北亚区域性自身发展的道路，但正是在冷战期间东北亚才开始摆脱了百余年来屈辱的历史，走上了经济和政治的崛起之路，并因此成为继欧洲之后对世界最有影响的地区。

---

<sup>①</sup> [美] 小 R·霍夫亨兹、K·E·柯德尔著，黎鸣译：《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 第五编

多样性与区域化(1992—2005)



## 导言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冷战格局结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尽管东北亚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冷战结构的遗留问题，但该地区已经“今非昔比”，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区域多样性空前凸显。与此同时，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得以培植与发展，正在探索走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地区失序状态的途径，力图构建全新的东北亚区域秩序。

冷战时期，东北亚各国对外部力量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外部力量反过来又影响了各国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一时期东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带有明显的东西方对抗色彩。冷战终结后，东北亚告别了依附于大国或者大国集团的历史，各国的自主性增强，东北亚的地缘环境因此得到巨大改善。为了能够适应冷战后新的时代要求，各国对政治、经济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俄罗斯、蒙古进行了政治多元化与经济私有化改革；中国、朝鲜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推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与调整措施；日本、韩国在政治上结束了旧体制，在经济上实行了结构性改革。

冷战的结束也为东北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政治上，原东方阵营的中俄蒙与韩日美双边关系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朝鲜与韩日美尽管依旧对峙，但已经开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各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入，国家间关系呈现发展互利的趋向，各国的经济依存度也随之增强，中日韩均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区域内文化交流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历史上该地区受儒家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各国在吸收的同时进行了再创造，再加上近代西方文明（包括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介入以及冷战期间的对峙与隔绝，东北亚各国文化的独特性变得更为明显。这种建立在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使得各国比较容易接受对方的文化，韩剧、日剧所宣扬的诸如集体主义、崇尚权威、勤劳勇敢、忍耐的品格在东北亚地区具有普遍性，因而风靡各国。频繁的文化交流增强了文化间的吸引力，各国间的旅游人数、留学生人数也不断攀升，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认同。

东北亚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1992年，该地区的GDP为4.5万亿美元，2004年超过7.5万亿美元，估计到2013年将达到10.7万亿美元，区域内贸易额届时将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伴随着东北亚地缘经济的增长，贸易的发展，技术和资本的转移将加速，这势必会促进区域内各国的相互开放，使双边和多边地缘经济联系加强、一体化进程加速。以“图们江开发计划”为起点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一定进展，其他形式的地区合作形式在探索与建构之中。在此基础之上，关于东北亚共同体的建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

但也应当看到，东北亚地区仍然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热点问题，这些被冷战遮盖的问题在后冷战时代纷纷冒尖，成为各国关系的症结所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日韩独（竹）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其他的海域划界争端时常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这其中，日本几乎与所有邻国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而且，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保守化色彩日益浓厚，美化、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日本领导人不顾邻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破坏了中日、韩日国家正常交往的基石，致使日本与中韩在政治上的不信任感增加。朝鲜核危机

的爆发则在安全上考验了该地区，该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美朝之间的交锋，而是一个区域性问題，若不能化解朝鲜核试爆带来的不良后果，可能加剧该地区的“逆裁军”趋势，并直接挑战核不扩散机制。

展望未来，东北亚地区既存在着走向一体化、建构区域共同体的条件，也存在着走向对抗乃至分崩离析的因素。至于走进哪一种场景，钥匙掌握在东北亚国家手中。

## 第十章 冷战后东北亚各国发展的多样性

冷战的结束大大改善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环境，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各国相互竞争的重点纷纷从政治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成为各国共同的利益诉求。为此，无论是发达国家（日韩）、经济转轨国家（俄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朝），都依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内部改革与调整，以增强经济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经过冷战后十几年的发展，东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获得长足发展，其中的多样性特征更加明显。

### 第一节 东北亚各国政治

随着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消失，东北亚各国纷纷在政治层面“辞旧迎新”，政治发展道路出现多元化趋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日本“1955年体制”结束，非自民党政权短暂执政，自民党在痛定思痛之后重新夺回政权，能与之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日益势微，日本政治总体趋向保守化、右倾化；韩国彻底告别了军人威权统治，确立了文人民主政治；朝鲜顺利实现了从金日成时代向金正日时代的过渡，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

确定了“先军政治”路线；俄罗斯、蒙古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西方民主制，但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政局的持续动荡，历经数年才逐步走上正轨。

### 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

1992年初春，在中国大地乍暖还寒之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论断。<sup>①</sup>这对于肃清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思想顾虑、解放思想起了及时而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再度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建设再度被紧迫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十四大提出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职能分工进一步明确，执政党自身建设不断加强。理顺党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党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干部的任免监督和考核，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等关键领域，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随着执政党职能的规范，政府职能进一步趋向规范、合理，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政府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宏观调控以及对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管理方面的权力和职能不断提高。<sup>②</sup>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大力加强自身建设。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对县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新论

---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sup>②</sup> 杨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

断，随后发展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并在十六大上成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三条准则：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200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此外，中共中央还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十几年来，执政党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高到新水平。

中国的基层民主得到较大发展，政治参与的范围和程度明显扩大。以城市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基层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广大城乡居民增强了自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全国各城镇建立起了十多万个居委会，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中国农村已经全部实现了直接选举，农村人民群众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民主讨论决定本村重大事务，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有十亿农村人口，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普遍推广，是中国基层民主取得的最主要成就。“虽然基层民主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即便是在基层民主发展比较好的村一级也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混乱和问题，而在乡镇和社区则是刚刚起步”，但这“开创了一个民主创新的政治格局，出现了大量的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念”，<sup>①</sup>而且从长远来看，它对推动中国乡县以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

人事制度改革深入发展，公务员制度初步建立。十几年来，中

---

<sup>①</sup> 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01）》，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央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使干部的录用、管理、考核和监督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扩大民主，引入竞争机制，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干部民主推选、民主测评和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制度。2002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的选拔任用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在干部管理上，改变了干部集中统一管理的情况，建立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分类管理制度。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务员制度诞生。1994年，人事部组织了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首届招考，此后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也开展了公务员录用考试。该制度实行后，众多报考者对于报考国家公务员趋之若鹜，公务员岗位可谓炙手可热，个别岗位甚至出现了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现象。2005年4月27日，《公务员法》正式颁布，它是国内第一部属于干部人事管理总章程性质的重要法律，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并在1993年和1998年进行两次机构改革。1993年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具体内容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理顺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划分职责权限，避免交叉重复，调整机构设置，精简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和人员。经过改革，各级政府普遍精简了机构和队伍，并把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作为重要目标。1998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压缩为29个，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减少了四分之一，有100多项职能下放给地方政府、企业或社会，还有100多项职能在国

务院各部门内部进行转移、合并。<sup>①</sup> 在国务院改革的同时，中国还有计划地在地方推进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此外，对政府行为进行规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例如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被称为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标志着中国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十几年来，中国从具体的国情出发，扎实稳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突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框架初步建立。在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的同时，中国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为下一步中国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日本政治改革与右倾化

20世纪90年代初，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金权政治”侵蚀下，成为众矢之的，日本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自民党除了改革方案与口号外，没有任何实际进展，国民已经对自民党失去了信心，宫泽喜一内阁垮台。自民党也因此发生严重分裂，改革势力决定与传统势力分道扬镳，“先驱新党”、“新生党”先后成立。1993年7月18日，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自民党因未能获得半数议席而失去组阁权。打着“改革”旗号的八个在野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新党党首细川护熙出任首相，从而结束了存在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日本政坛进入了所谓的“平成战国时代”，各党派角逐激烈，内阁如走马灯般更迭（见下表），改革成为各届政府的主要任务。

---

<sup>①</sup>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问题与趋势分析》，引自 <http://www.bo-kee.com/new/display/87662.html>

## 第十章 冷战后东北亚各国发展的多样性

### 冷战后日本内阁更迭情况一览表

首相	执政时间	执政党派
宫泽喜一 (自民党)	1991. 11. 5 - 1993. 8. 5	自民党
细川护熙 (日本新党)	1993. 8. 9 - 1994. 4. 28	新生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日本新党、社民联、先驱新党、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
羽田孜 (新生党)	1994. 4. 28 - 1994. 6. 30	新生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日本新党、社民联、先驱新党、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
村山富市 (社会党)	1994. 6. 30 - 1996. 1. 11	社会党、自民党、先驱新党
桥本龙太郎 (自民党)	1996. 1. 11 - 1998. 7. 30	自民党(社会党、先驱新党于1996年10月众议院选举后退出执政联盟,实行“阁外支持”)
小渊惠三 (自民党)	1998. 7. 30 - 2000. 4. 4	自民党、自由党(1999年1月14日参加政权)、公明党(1999年10月6日参加政权)
森喜朗 (自民党)	2000. 4. 5 - 2001. 4. 26	自民党、公明党、保守党(从自由党中分离出来)
小泉纯一郎 (自民党)	2001. 4. 26 - 2006. 9. 26	自民党、公明党、保守党(2002年12月25日由保守新党取代,2003年11月10日并入自民党)

细川内阁成立初期获得了71.9%这一前所未有的支持率,可见国民对日本政坛新气象的企盼。新内阁不负众望立即着手改革,成立刚一个月就向国会提交了由《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和《众议院议员选举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组成的政治改革法案。在联合政权的推动下,上述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改革问题讨论开始以



来日本国会通过的第一部改革法案。根据新法案，日本的选举制度做了重大改变，即由过去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众议员的定额从过去的512名改为500名，其中300名来自小选区，200名来自比例代表区。<sup>①</sup>此外，新法案在筹集政治资金及其使用方面也做了更严格的限制，如只允许企业和团体向政党而不是政治家个人提供捐助，并有数量限制，对政治资金的收支与使用也要求必须公开等。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号称“改革旗手”的细川首相在踌躇满志之际，被揭露出担任熊本县知事期间收受政治资金，这一丑闻不但迫使细川辞职下台，也使刚刚启动的政治改革蒙上阴影。紧随其后的羽田内阁则为如何维持多党联合政权内部的团结而疲于奔命，国民热望的改革一时搁浅。同时，八党联合政权内部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导致社会党和先驱新党退出联合政府并投向自民党的怀抱。1994年6月，社会党、先驱新党与自民党组成新的三党联合政权，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但内阁中的重要职位大部分为自民党所占据。三党联合政权与前任联合政权一样，也打出了“改革”的旗号，继续推进政治改革。1995年1月，内阁向国会提交了“推进地方分权法案”，随后又制定了“推进地区分权计划”。根据上述法案与计划，将缩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力，相应加大地方自治权力，并确定更加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与税收分配比例，提高地方积极性。

1996年1月，刚上任的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夺回了首相宝座，尽管联合政权的形式得以保留，但它却标志着持续仅29个月的非自民党执政的历史结束。随着政权的稳固，桥本提出了“六大改革”口号，其中，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有：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中央与

---

<sup>①</sup> 2000年2月，日本国会决定将比例代表选区议席数削减至180席，于是众议院总议席数变为480席。

地方关系；精简和重组中央政府机构，把原有的一府 21 省厅组成的中央政府精简为一府 12 省厅；改革特殊法人（即官办企事业组织），或废除、或合并、或交给民间经营，等等。

就在桥本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偏偏碰上日本经济不争气，总也难以摆脱萧条状态，而且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前景似乎更加黯淡，连续几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再加上自民党在 1998 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失利，桥本辞职。小渊惠三临危受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日本经济在 1999 年末摆脱了持续负增长的颓势，刚可以松口气，不料 2000 年 4 月初，小泽一郎率领自由党中的一部分议员要退出三党联合政权。小渊一气之下，中风不起，从此再也没有醒来。自民党各派系在权衡之后选定了森喜朗继任首相，但森首相的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他不仅多次失言（例如称日本为“神国”），而且在国民热望的发展经济方面也是毫无建树，任职一年后黯然辞职。

2001 年 4 月 24 日，前厚生大臣小泉纯一郎因无派系色彩、大力宣传“改革”而获得较高支持率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成为新一届首相。小泉一上台，就树立改革的形象，打破以往按照派系之间进行平衡的原则，起用了一批新人。5 月初，他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声称自己将要推行的改革是“新世纪维新”，要进行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尽管政治改革一直是冷战后日本政坛的显著问题，但“作为一个术语，‘政治改革’是大多数政治野心家在选举期间积极倡导的一个极有价值的赢得选举的工具”，“那些在政治体系中掌握权力的人，害怕系统改革将损害他们的利益”，<sup>①</sup> 因此对改革进行抵制。2005 年 8 月，小泉内阁提出的邮政改革计划在国会受阻，小泉决定背水一战，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

冷战后，长期制衡自民党的左翼力量日益衰微，被迫放弃原有

---

<sup>①</sup> Purnendra Jain, “Much ado about nothing? The limited scope of political reform in Japan”, in Javed Maswood, Jeffrey Graham and Hideaki Miyajima (eds.), *Japan—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 9.

路线，日本政坛出现了保守化倾向。社会党为了维持执政地位，在许多问题上对自民党做了让步，为了显示与传统路线决裂，1996年初还将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其结果是力量进一步萎缩。2000年日本共产党对党章进行重大修改，将最终奋斗目标由“共产主义社会”改为“共同社会”，表明日共立场的重大修正。另一方面，新保守势力异军突起，1996年成立的民主党的主要人员来自自民党的激进派以及原社会党的右派。虽然民主党在党纲和政策主张上与自民党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基本政治理念并没有根本区别，所不同的仅仅是具体政策上的差异，而这是为了选举的需要。<sup>①</sup> 民主党在日本向海外派兵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等问题上与自民党有着共同语言。民主党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发展迅速，已经成为议会最大在野党。

1990 - 2005 年日本主要政党在众议院席位数一览表

政党	1990	1993	1996	2000	2003	2005
自民党	275	223	239	233	237	296
民主党			52	127	177	113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	136	70	15	19	6	7
共产党	16	15	26	20	9	9

数据来源：1990 - 2000 年数据见 J. A. A. Stockwin,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Japa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75 ~ 77; 2003 年数据见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3-11/10/content\\_1169166.htm](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3-11/10/content_1169166.htm); 2005 年数据见 <http://news.sina.com.cn/w/2005-09-12/07516919728s.shtml>

伴随着日本政治结构保守化的出现，日本政治出现了右倾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再三篡改历史教科书，内阁

---

<sup>①</sup> 梁云祥、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 页。

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更是创造了内阁首相年年参拜的“纪录”，“成为日本最右翼的首相”；<sup>①</sup> 右翼势力经常兴风作浪，甚至发展成为冲击中国驻日外交机构的严重事件；1999年夏，国会通过“国旗国歌法案”，将“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定为日本国旗国歌，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就此指出，“‘日之丸·君之代’的法制化便是日本国家与那个帝国日本具有连续性的露骨而不知羞耻的认知要求”；<sup>②</sup> 努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日本以各种借口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目标，并着手修改和平宪法。另一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日本政坛的右倾化现象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自民党在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完胜就是一个明证。自民党单独占据了61.7%的议席，整个执政联盟在国会议席比重达到68.1%，自民党在国会中的议席15年来首次单独过半。这个结局从某种程度也反应了日本社会的保守化与右倾化。

### 三、韩国“文民政治”的确立与发展

韩国从卢泰愚执政时期就开始构建民主政治的尝试，但由于他曾经长期在军界任职，本身就是威权主义的一个代表，而且与前任军人政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靠威权主义势力本身进行民主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如在全斗焕政府中任要职的一大批人继续留在卢泰愚的权力核心之中，卢泰愚政权因此被称为“温和的军事政权”。1992年12月，金泳三当选总统，成为韩国32年以来第一位文职总统，<sup>③</sup> 从此结束了军人主导韩国政治的历史，开创了文人执政的新时代——“文（人）民（主）政治”时代。金泳三上

---

① [日] 本泽二郎：《小泉纯一郎面面观》，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② [日]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③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以后的三十余年中，除1979-1980年崔圭夏的短暂统治外，所有的总统都是军人。

台后，宣布自己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三大改革，即清除腐败、振兴经济、整顿国家纲纪建立新韩国。

在惩治腐败方面。金泳三政府从完善相关制度入手，防止职务犯罪。1993年3月10日，政府决定实施《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使高级公务人员公布个人收入和财产制度化、法律化。8月，韩国宣布实行“金融真名制”。1995年7月，韩国开始实行“不动产交易真名制”，有力地打击了政商勾结和政客非法敛财的渠道。12月19日，国会通过了《选举法》和《政治资金法》，进一步规范选举过程、政治资金的筹措与使用。在金泳三掀起的反腐风暴中，一大批贪官落马。据统计，从1993年2月到1995年6月，被揭发犯有腐败罪行的公职人员共有2042名，分别被予以拘捕等处理。<sup>①</sup>其中，廉政风暴的最大成果是将前总统卢泰愚送进监狱。金泳三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形象，得到了广大国民的赞许，称这场反腐败斗争为“不流血的革命”，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清算威权主义遗毒方面，金泳三通过匡正历史，特别是为在军人执政时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平反昭雪，对发动政变和煽动内乱的责任人进行了审判。全斗焕、卢泰愚等人受到审判，法庭最终宣布全斗焕犯有发动“军事叛乱”、“内乱”主谋罪，在执政期间大肆以权谋私，受贿金额高达2259亿韩元，判处死刑。卢泰愚因犯有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金泳三也试图通过此举与威权主义势力划清界限。金泳三的总统宝座是在1990年三党合并的基础上得到的，与卢泰愚的支持分不开，因此，金泳三本身就与威权主义势力有扯不断的关系。1995年12月，金泳三将执政的民主自由党改名为新韩国党，旨在表明与传统势力的决裂。

---

<sup>①</sup>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在军队改革方面。由于三十多年来韩国一直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执政，军人在社会各界拥有庞大的势力，军人干政习以为常。因此，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推行军队改革，实现军队的职业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为了彻底铲除军人统治的根基，金泳三对军队进行空前的改革和调整，大胆地改革军队要职的任命程序，取消以前一直实行的“军队认可”制度，即军内高级将领的任免不再由军队内部控制，而是直接由总统和国防部长官决定。这项改革铲除了军队叛乱的萌芽，军队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队的职能被严格限定于捍卫国家主权和防止外来侵略的范围之内。<sup>①</sup>同时金泳三政府还严肃查处了军队中的腐败问题，为建立文人政府领导下的现代军队体制打下了基础。

在地方自治方面。韩国早在1949年就颁布了《地方自治法》，但在军事威权主义时代地方自治制度遭到彻底破坏，韩国民主人士和政治反对势力始终把实现地方自治当作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泳三上台后就积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推动地方自治的全面实现，扩大地方权限，鼓励市民直接参与与他们生活问题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1996年1月3日，总务处发表《国家机能转让地方政府方案》，地方政府事务在全体国家事务中所占的比率从13%提高到18%，进一步强化地方自治功能。<sup>②</sup>在地方自治制度实行后，地方政府和议会就会更加重视地方居民的意见和利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听中央政府的指令。这就必然会而且实际上已经引起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变化，即把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上负责的体制逐渐转变为对下负责的体制，谋求发展地区经济和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

金泳三上台后进行的大刀阔斧改革，给韩国政坛注入了一股活

---

<sup>①</sup> 崔志鹰、徐漪：“试论韩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

<sup>②</sup> 李敦球：“韩国民主政治的变迁与走向”，《国际论坛》，2000年第2期。

力，一度赢得国内外的广泛好评。但是1997年初曝光的“韩宝丑闻”却给了这位“反腐旗手”一记响亮的耳光，执政党新韩国党的许多高官以及金泳三的次子金贤哲均接受过韩宝集团的贿赂。金泳三政权的支持率急剧下挫。

在1997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在野的新政治国民会议候选人金大中当选，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地实现了轮流执政，此举不仅标志着韩国政治转型和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且也为韩国的民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对于刚上台的金大中来说，无论在金融和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和对外关系方面，面对的是问题成堆、前途未卜的“烂摊子”。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他将精力主要放在经济金融改革方面，政治方面也启动了相配套的改革，并提出“民主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政策方针。

作为新政府整体改革的一环，金大中试图将沿袭下来的“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也就是由“政府主导”转向“社会主导”。金大中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已成为韩国社会各个领域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的基本需要。削减政府开支，提高工作效率，追求实际效益，最大限度地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更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sup>①</sup>为此，金大中对政府进行了改革：（1）合并、撤销不合理的部处，以提高工作效率。合并、撤消了7个部处，原有的2院16部5处缩编为16个部。（2）减少高层次的领导职位，一些部门降职使用。国务委员由21名减为16名，部长级长官由33名减为24名，副部长级次官由67名减为57名。（3）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工作，设置了由总理亲自领导的“金融监督委员会”。（4）外务、通商部合并建立新的“外交通商部”。

从金泳三执政以来，无论是执政力量还是在野党都信誓旦旦地要杜绝政治腐败，割断与财阀的联系，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反腐败

---

<sup>①</sup> 吴德烈：“金大中的政府机构改革和经济政策”，《当代亚太》，1998年第5期。

法律，但结果却是越反越腐，官商勾结的现象像幽灵一样困扰着韩国政坛，成为许多政治家挥之不去的梦魇。金大中的继任者卢武铉因为3个亲信在总统选举中收取非法政治资金事件被媒体曝光，在野党对此不依不饶，并向国会提交了弹劾总统案。这些状况表明，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军人威权主义基础之上的，“文民政治”确立的时间还不长，很难立刻改变韩国政治的一些潜规则。因此，要解决困扰韩国社会发展的腐败问题，就必须从变革权力结构本身切入，通过政治上的革新与发展将滋生腐败的土壤彻底清除。

### 四、朝鲜的“先军政治”路线

苏东社会主义大厦的相继坍塌给朝鲜以巨大冲击，特别是随着韩国与原东方阵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朝鲜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与此同时，朝鲜与美韩的实力差距不断加大，朝鲜半岛和平机制迟迟未能建立起来。朝鲜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外部环境之中，进行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1992年朝鲜对二十年前颁布的“社会主义宪法”进行了修改，增设了国防一章。主要改动之处有：把原来隶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国防委员会升格为独立机构；删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规定了“主体思想”为指导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分设了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职位；新增了允许建立宗教建筑和举行宗教仪式等内容；强调了尊法精神和技术革命等。<sup>①</sup>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防地位的提升，可见在特殊时期朝鲜领导层对国家安危的高度关注。宪法规定，国防委员会是国家主权的最高军事指导机关，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指挥统帅一切武装。金日成主席亲自担任委员长，金正日担任副委员长。时隔一年，1993年4月金正日接任委员长。

---

<sup>①</sup> 韩今玉：“朝鲜新修订宪法简析”，《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3期。



1994年7月8日，朝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朝鲜实行“三年守孝期”，冻结了政府机构的变动。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和1996年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出现严重粮荒，朝鲜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最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金正日执政后快则一年，慢则三年就会崩溃”的说法首先在韩国而后在世界上迅速传播开来。因此，朝鲜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需要，1995年朝鲜开始实行“先军政治”，并成为朝鲜政治生活的指导方针。其含义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突出军队地位，视军队（军事）为国事中的国事。（2）执行“先军”领导、管理方式。由领袖重点抓军队工作，再以治军方式推动全社会工作。（3）保障军费投入，增强军事威慑作用。（4）启迪军魂，重塑国民之魂，增强凝聚力。<sup>①</sup>简言之，“先军政治”就是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军事是国事中的首要方面。金正日一直对朝鲜人民军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最大的关心，他外出视察工作有半数以上的时间是在部队营房。仅以2002年为例，金正日共外出视察了207个单位，其中就有120个是部队及其下属机关。这些部队中，有的驻守在边防小岛，有的驻扎在距离“三八线”仅几百米的最前沿哨所。与重视军事相对应的是，军人在朝鲜的地位颇高。姑娘嫁到部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选择军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是很多朝鲜女性追求的目标。

1997年7月8日，“三年守孝期”结束，以劳动党中央为首的五大机构共同发表决定，对金日成的一生业绩做出高度评价，将1912年金日成诞辰年定为“主体元年”，将4月15日金日成诞辰日定为“太阳节”，并正式宣布新时代的开始。10月，金正日就任劳

---

<sup>①</sup> 徐文吉：“朝鲜‘先军政治’与‘秩序调整’解读”，《东北亚研究》，2003年第1期。

动党中央总书记。1998年9月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十届一次会议召开，这是自金日成去世后首次召开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会议，因此备受关注。会议在再次选举金正日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同时，取消了国家主席职位。此次会议还对宪法进行了多处修改和补充，并对国家机构及其职能做了重大调整。在新增加的序言中，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共和国的永远主席，并将维护、继承发展金日成同志的思想业绩，将主体革命事业完成到底”。<sup>①</sup> 朝鲜将政务院改为内阁，实行国防委员会、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内阁领导体制。取消了地方行政经济委员会，强化了地方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地位提高、权力加强，是“国家主权的最高军事指导机关，是总体的国防管理机关”。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扩大，即“指挥统帅一切武装、全面指导国防事业”。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在礼仪上外交上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内阁总理代表政府，重点抓经济工作。新内阁由原政务院的37个部门压缩成31个部门，副总理由原来的9人减少为2人，提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和一线工作经验的干部，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能力。

朝鲜新的国家机构调整反映了金正日的愿望，即面临困境的行政经济工作由内阁直接处理，礼仪上更多的对外工作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负责，自己作为后继领袖，以党的总书记和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控制全局，主要抓政治、思想和军事，以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

---

<sup>①</sup> 韩今玉：“朝鲜新修订宪法简析”，《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3期。

## 五、俄罗斯、蒙古的政治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苏联先后发生剧变，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但转轨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两国经历了经济急剧滑坡、政局动荡，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才逐步走出转轨带来的困难。

俄罗斯独立之初，总统与议会之间围绕建立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国家以及私有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俄一度出现了“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政局动荡不安。分别支持总统与议会的俄政党、社会团体、群众之间在街头的冲突不断，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总统叶利钦于1993年10月动用武力，炮轰议会所在地白宫，逮捕以议长、副总统为首的反对派人士，持续一年多的“府院之争”最终以流血的方式结束。1993年12月俄举行议会选举，同时就新宪法进行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这为俄罗斯政治斗争朝着有序方向发展奠定法律基础。1993年宪法确立了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突出地位。根据宪法，总统居于国家权力结构的核心，拥有广泛的重要权力。

这种“强总统”、“弱议会”的政坛格局，使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政局颇具戏剧性。由于总统权力过大，不少重大政策的决定由叶利钦个人作出，使政府和议会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较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它也是导致俄政局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叶利钦执政的八年里，撤换了七个总理，六个总检察长，七个安全部门负责人，九个财长，六个内务部长和三个外交部长。尤其是在1998-1999年间，叶利钦屡次解散政府，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加剧了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同时，总统和国家杜马在总理人选上的多次交锋，加深了彼此的矛盾。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国家领导人无暇顾及经济问题，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和牺牲品。

在俄罗斯政局动荡的同时，地方的离心倾向加剧。受原苏联各

加盟共和国独立大潮的影响，再加上中央控制能力减弱，俄地方分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开始膨胀。地方分立主义并非完全主张脱离联邦中央，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争取联邦主体的平等地位，在经济上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权，追求地方利益。地方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30%以上的地方法律与联邦法律相抵触，90%以上的总统令地方政府根本不予执行。1996 - 1997年，地方行政长官由直选产生，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联邦的分权过程。叶利钦及联邦中央无权解除民选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使地方行政长官无视中央的权威。车臣武装分裂活动更是俄罗斯的心头大患，分裂分子制造的恐怖和破坏活动使俄罗斯蒙受了巨大损失。

金融寡头势力十分猖獗。俄罗斯政府最初扶持金融工业集团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试图培育起促进经济转轨的社会阶级，使经济走出危机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俄罗斯的金融资本得到迅速发展。仅七大金融工业集团就控制了俄50%以上的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金融工业集团的产生虽然符合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同时，作为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金融工业集团在俄经济困境中坐大，产生了寡头政治。寡头资助政治势力，介入政府决策，左右政局，给俄罗斯经济政治改革大政方针的制定带来负面影响。金融企业家人数虽不多，但他们活动能力大，手中握有巨额资金，有的甚至控制宣传工具，掌握舆论界的政治导向，他们支持哪一个党，对该党的竞选活动甚至命运就有重要影响，反过来，该党竞选成功后必然要回报他们。

叶利钦是领导俄罗斯脱离苏联走向独立的重要人物，但却没能成功带领俄罗斯走出转轨带来的困境。对于这位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政治强人来说，要复兴俄罗斯，已显得力不从心，在挑选好了接班人之后，决定激流勇退。1999年12月31日正午12时，叶利钦突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宣布了一个令世界吃惊的决定：“我决定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说，“俄罗斯应由有

智慧、精力充沛的新政治家带入新世纪。”<sup>①</sup> 随后，他把总统权力交给总理普京，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结束。

普京主政后，即以全面振兴俄罗斯为己任，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家权力机关权威、增强中央集权的措施：（1）加强中央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建立联邦区和任命总统驻联邦区代表，俄联邦划分为七大联邦区：中央区、西北区、北高加索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区、西伯利亚区、远东区。每个联邦区下辖若干联邦主体。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由总统任命，直接对总统负责。（2）整顿联邦宪法秩序和纪律。俄政府出台的《关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组织的普遍原则》规定，俄联邦中央权力机构和总统有权整顿国家的法律秩序。对于一些与联邦法律和宪法相违背的共和国，令其限期修改。2004年规定国家杜马实行比例选举制，议员完全由政党得票比例产生，取消各地区的单席位选举。（3）精简政府机构，强化垂直领导。2004年俄罗斯对政府构成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与改组，加强了对强力部门的控制，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由总统直接领导。各联邦主体的高层官员由总统提名、经地方议会选举产生，取消地方长官由当地选民直接选举的办法。（4）整顿金融寡头。为了消除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政治体系，普京加大了对各路寡头的攻势，通过反腐败，严惩犯罪，展开“法律专政”，削弱寡头势力，将头号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投入监狱。经过整顿，基本结束了金融工业寡头左右俄政局的时代。

这些措施有利于形成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制约的垂直领导体系，加强总统权威，削弱地方集团实力，实现自上而下权力机构的统一，权力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出现了良好合作的局面，在俄罗斯形成了“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强人治国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提高政权效率，保证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

---

<sup>①</sup>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保障。普京推行的这些强权治国理念，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一种专制集权的表现，但从该理念所获得的国内支持来看（2004年3月普京以71.3%的得票率蝉联总统），却体现了俄国的民族思想和特性，“来自于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国抛弃了存在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政治多元化，引进西方民主制度。1992年2月，蒙古颁布新宪法，将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国，宣布生产资料私有化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蒙古采取一院制议会，称国家大呼拉尔，拥有76名议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国家大呼拉尔是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可提议讨论内外政策的任何问题。议会多数党团拥有组阁权。依规定自1992年6月起，每四年举行一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并自1993年起每四年举行总统直接选举，但规定只有在议会拥有席位的政党才有资格提名总统候选人。

在1992年的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人民革命党因自身的改革而得到国民支持，获得总席位76席中的71席。1993年的总统选举，人民革命党未推荐当时的总统奥其尔巴特竞选连任，而是推出了纯书生型的《真理报》总编图德布为候选人。反对党蒙古民族民主党及蒙古社会民主党因推不出45岁以上的候选人（宪法规定的条件之一），遂决定提名奥其尔巴特代表反对党竞选。最后选举结果是奥其尔巴特当选，实现第一次所谓“共治”与“政党轮替”。

在1996年6月举行的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由于执政的人民革命党内部分裂、改革不力造成经济下滑以及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原因，人民革命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仅获得25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宗教徒民主党组成的“民主联盟”获得50个席位，得以上台执政，成为蒙古建国以来第一个非人民革命党政权。但“民主联盟”政权采取的激进改革措施，造

---

<sup>①</sup> 田春生：“俄罗斯转型：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转折”，《读书》，2005年第8期。

成物价急剧上涨，引起国民不满，不仅导致“民主联盟”在同年10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惨败，而且在翌年的总统选举中败给了人民革命党候选人巴嘎班迪。这样一来，蒙古出现了人民革命党出身的总统与“民主联盟”政府共治的局面。

党派差异所造成的矛盾很快地在总统与政府之间爆发，使蒙古政局处于不稳定状态，“民主联盟”政权在4年任期里换了4位总理。1997年10月，巴嘎班迪总统以经济危机为由批判政府，并由人民革命党提出了内阁不信任案，虽然被否决，但“民主联盟”是四个政党的联合体，内部也存在矛盾和分歧，最后在1998年4月自己罢免了政府。1998年至1999年之间因为经济问题又接连发生了一连串倒阁事件，短短两年先后更换三位总理。同时，由于宪法规定的国家大呼拉尔、总统、政府之间的职能存在重叠，因此分工不明确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总统巴嘎班迪与总理恩赫赛汗在任免“额尔敦特”铜钼矿总经理和“蒙古罗斯茨维特麦特”集团公司总经理问题上发生争执。总理认为任免国有公司经理问题是自己权限之内的问题，而总统认为，任免对国家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占国内生产总值1/4）的企业领导是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大事，不能随意更换领导。<sup>①</sup>

蒙古于2000年7月2日举行修宪后的第三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人民革命党获得总席位76席中的72席，比1992年的选举还多一席，人民革命党主席恩赫巴亚尔出任总理。2001年5月总统选举中，人民革命党推出的候选人巴嘎班迪获胜，蝉联总统职位。在人民革命党执政期间，蒙古政局相对稳定，经济走出了低谷，逐渐开始稳定增长。然而，蒙古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只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而占全国人口达1/3的牧民没有得到好处，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

---

<sup>①</sup> 巴音吉日嘎拉：“蒙古国修改宪法的原因及结局分析”，《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2期。

他们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比过去更加艰难。2004年的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人民革命党仅获36席，称得上是一次重大挫折，而在野的“祖国—民主联盟”获得34席。这标志着蒙古国议会一党独大的历史结束，两大政治力量在议会中的席位相对平衡，蒙古的民主政治趋于成熟。但联合政府并没有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增多等。政府工作不力也导致多次发生集会游行，社会秩序混乱。2006年1月，来自人民革命党的阁员辞职导致联合政府倒台。

总之，蒙古国在经过十几年的政治转轨之后，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建立起了政治运行架构，但在此过程中，影响政局稳定的隐患始终存在，特别是国内各种力量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争论，而经济发展裹足不前更成为历届政府的隐忧。

### 第二节 东北亚各国经济与社会

与政治多样性相似，东北亚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多样性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经济结构差别明显、资源条件各具特色等方面。在东北亚地区，至少形成了三个经济发展层次。日本韩国是该地区的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拥有先进技术和大量资本；朝鲜、蒙古过去严重依赖外援，东方阵营瓦解后，国内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属于该地区的落后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属于中间层次，中国的综合国力日渐强盛，发展潜力巨大，但地区发展仍不平衡，针对东北地区相对落后的状况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俄罗斯在渡过困难期之后，经济发展有了较大起色，对远东地区的开发也提上了日程。



## 一、日本与韩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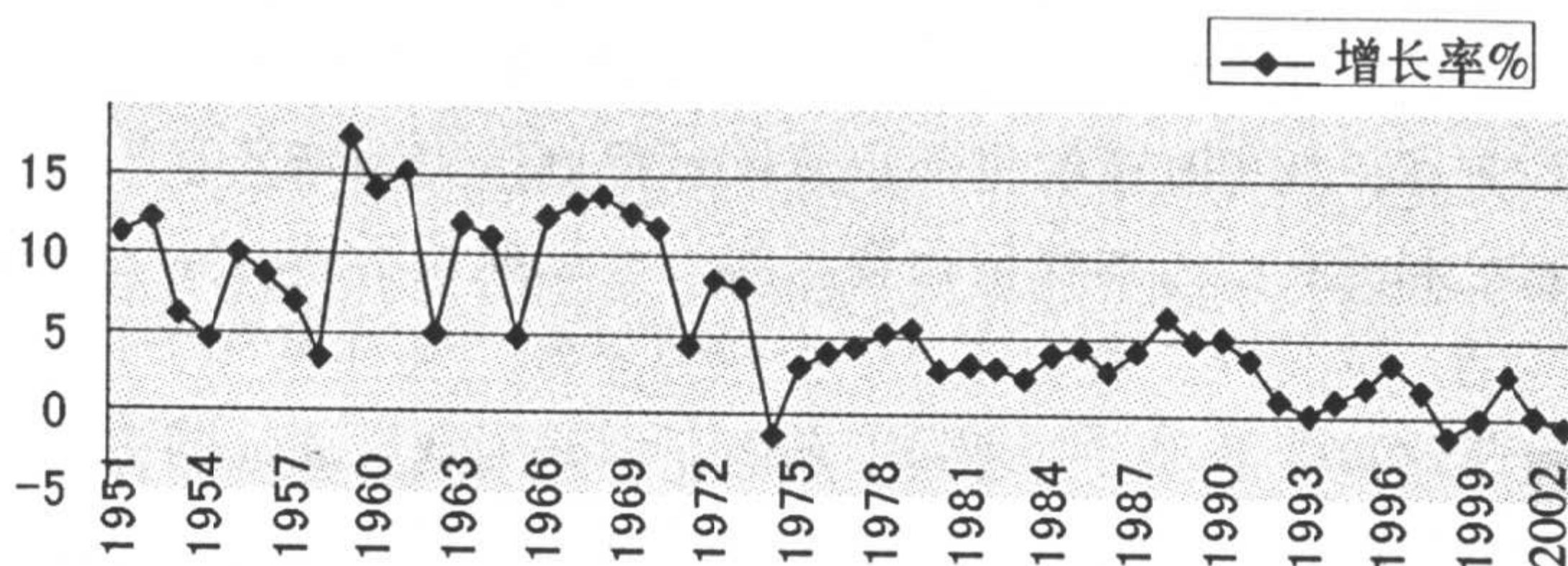
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自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状态十余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为了早日摆脱危机，日本政府启动了结构性改革。韩国迅猛崛起的经济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积攒数十年的财富毁于一旦，金大中政府坚定地推行经济改革，1999年韩国经济实现复苏，成为金融危机后较早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土地价格与股票价格的急剧上升，90年代初又开始急剧下降，这种异常的资产价格暴涨叫做泡沫，泡沫随时都有破灭的可能。1992-1994年，日本经济连续三年出现零增长，“迎来了战后50年以来较石油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经济萧条与低经济成长时期”。<sup>①</sup>泡沫经济破灭最直接的影响，是资产价格缩水。据日本经济学家计算，在1990-1997年间，日本的股票、土地价格的资产评价额约缩水1300万亿日元，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次空前的资产价格大缩水。<sup>②</sup>如此巨额的资产大贬值，导致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出现，其结果是大批银行倒闭。据日本金融监督厅公布的数字，截至1999年3月底，日本所有金融机构拥有不良债权金额为80.6万亿日元。这种情况削弱了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能力，使企业经营缺乏周转资金，负债比率提高，企业倒闭日益增加，由此引发的负债总额也随之攀升。

---

① [日] 橘木俊诏著，丁红卫译：《日本的贫富差距——从收入与资产进行分析》，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05页。

② [日] 斋藤精一郎：“日本经济危机的深化”，日本《经济学人》杂志，1999年3月16日。转引自孙执中主编：《日本泡沫经济新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1951 - 2002 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图<sup>①</sup>

严峻的经济现实迫使日本政府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一方面放宽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各种限制，给企业以新的经营机会，促进自由竞争。1994年3月，细川内阁确定了包括多项市场开放措施的《对外经济改革纲要》。1995年3月，村山内阁公布了《推进放宽限制五年计划》，放宽限制的项目共十一个方面，1091种。<sup>②</sup>但是，在政治改革陷于停滞之际，政府放宽限制的设想和实施计划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增加公共事业投资、促进民间设备投资、稳定金融体系、促进个人消费等措施，解决日益低迷的经济形势。1997年桥本内阁提出的以“变革和创造”为主题的六大改革，包括行政机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和教育改革。

桥本内阁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有：财政结构改革目标是在2003年前实现平衡财政，“没有禁区”地彻底压缩支出，将1998-2000年定为集中改革时期，力争将财政赤字的负担率降至50%以下；社会保障结构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稳定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适应少子高龄化社会的环境变化；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鼓励新兴产业

<sup>①</sup> 此图转引自陈乐一：《日本经济的增长与波动》，<http://www.cenet.org.cn/cn/CEAC/2005in/qt002.doc>

<sup>②</sup> 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的机制，消除日本特殊的商业惯例，改善创业环境和经营环境；金融体系改革的目的是实现金融国际化，建立自由、公正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市场，模仿英国金融体系改革，提出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方案；教育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发挥创造力和培养竞争意识，建立富足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这一改革抓住了日本经济结构问题的症结，重点解决监管体系、金融体系和企业体系等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改革生不逢时，遇到了东南亚、韩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只好暂时搁置起来。虽然上述改革没有在桥本任期内实施，但为此后历届内阁提供了改革的框架和思路。<sup>①</sup>

韩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发达制造业的现代工业国家——从1962年实行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至1994年，韩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的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87美元增至10 548美元，一举创造了“汉江奇迹”。1995年，韩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601.77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居世界第12位。1996年，韩国被经合组织(OECD)接纳为第26个成员国，意味着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1997年，韩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和轮船制造国之一，经济规模居世界第11位。

金融危机打破了韩国的经济神话。1997年3月开始，以韩宝、起亚为代表的一批韩国传统大财团纷纷倒闭，导致金融机构陷入严重的支付危机。11月10日，韩元兑美元的比率首次跌破1 000韩元大关，到12月底韩元贬值幅度高达40%以上。11月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并于12月3日获得条件极为苛刻的援助许可，但韩国经济形势仍不见好转。汇市、股市继续下挫，12月12日，股票综合指数跌至350.68点，是1987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23日，韩元对美元汇率跌至2 061:1的历史最低

---

<sup>①</sup> 参见裴桂芬：“浅析90年代以来日本结构改革”，《日本学刊》，2002年第4期。

点。韩元贬值导致外债大增，截至1998年2月，韩国外债已高达1570亿美元。<sup>①</sup>1997年韩国破产企业达16000家，1998年第一季度，每天有将近150家公司倒闭。企业倒闭使银行贷款无法收回，形成大量呆账死账。到1998年1月30日，韩国倒闭的商业银行已达10家，金融、经济形势极为严峻。1998年韩国GDP增长率为-5.8%，人均国民收入跌至6823美元，国内需求大幅度萎缩。

金融危机很快就波及到了日本，并引发日本早已潜在的金融危机。1997年11月，日本的金融风暴从中小型金融机构波及到金融系统的核心——城市银行和大型证券公司。一个月内，三洋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与德阳城市银行接连宣告破产。特别是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破产，负债总额约3万亿日元，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一起公司倒闭事件。日本股市、汇市出现下滑趋势，使原本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1997、1998年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在困难的经济形势面前，韩日均开展了自救行动。金融危机给韩国的教训极其深刻，国民经济濒临破产，IMF的援助又带有苛刻条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金大中痛定思痛，决心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改革，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运行方式的历史性转变。1998年初韩国政府确定了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劳动市场改革、行政改革等四大领域的改革任务。<sup>②</sup>在企业改革方面。1998年1月，韩国政府同五大企业集团达成了企业重组原则协议，内容包括编制联合财务报表和综合财务报告、逐步取消同一企业集团内各项系列公司之间的相互债务担保、降低大企业集团的债务资产比率、清理非主力产业与资产、加强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人员的责任等。在金融改

---

① 参见陈峰君主编：《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00页。

② 参见陈龙山等著：《韩国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324页。

革方面。韩国政府通过实施三项原则来恢复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即清除整个金融部门的不确定性以恢复中介功能；清算不良贷款和注入公共资金，从而迅速将不良金融机构清除出市场并及早使绩优金融机构标准化；严格实施公共资金的损失分担原则来防止败德行为。在劳动市场改革方面，韩国建立了市场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废除实际上近似于终身雇佣制的企业用工制度，激活企业与劳动市场，重新确立双向选择的新型劳资关系。

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实施后，韩国经济迅速恢复。1999年，韩国GDP年增长率达到10.7%的高水平，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80.6%，是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从而创造了经济恢复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韩国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精神尤其值得称道。公众节衣缩食以增加存款偿还外债，就连家庭主妇也慷慨解囊，拿出金银首饰甚至嫁妆来购买国债。国民在国家危难之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成为金大中政府战胜危机的坚强后盾。

日本也为克服危机采取了应对措施。小渊内阁为阻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果断采取了措施：将解决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作为首要问题，提出九项与金融重建有关的法案；把扩大内需、刺激个人消费的“景气对策”作为内阁的紧急课题；进一步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制定“生活空间倍增计划”和“产业重建计划”。<sup>①</sup>日本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公共开支，拉动内需增长，进而带动1999年上半年日本经济的低速增长，下滑趋势得以遏制。小泉上台后继续推行改革，主要内容有：（1）恢复金融职能，解决不良债权问题；（2）重视财政支出，削减控制公共事业费、控制医疗费、控制地方交付税等财政重建优先型经济改革；（3）旨在“政府撤出”的特殊法人改革，邮政三事业的修正与民营化；（4）旨在提高企业效益、个人

---

<sup>①</sup> 梁云祥、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

机会平等的税制改革；(5) 旨在纠正城市与农村的政府投资差别的“城市复兴”计划。<sup>①</sup> 其中的邮政民营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2005年新产生的国会上获得通过，民营化改革后，邮局可以将大笔储蓄资金引向市场力量主导的领域。

2002年初日本经济迎来了景气回升，尽管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但不可否认它仍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GDP总量仅次于美国，约占世界总量的14%，占亚洲的60%，相当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日本人均GDP在世界名列前茅，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同时也是世界最大债权国。这些都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要素，其发展潜力仍不可估量。

在东北亚地区，日韩无论是在传统经济领域还是在高新技术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在钢铁制造、造船、汽车、消费电子等领域遥遥领先，但“日本在这些领域的地位已经在下降，而且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已经饱和。为了确保未来，日本将眼光投向了IT业、因特网以及下一代技术”。<sup>②</sup> 为此，日本的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几乎占到了GDP的3%。日本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IT生产和销售大国，2002年日本IT产品销售收入达1600亿美元，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13%。韩国IT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97年的581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099亿美元，1996-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24.3%，IT产品的出口额从1999年的399.6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511.6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29.7%。

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日韩传统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日韩两国出生率下降，少子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衡量少子化的标准是妇女总和生育率，简单地说就是妇女一生平均生育

---

① [日] 小泽一彦：《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② Morris Low, "The reformatting of Japan for the peopl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new economy", in Javed Maswood, Jeffrey Graham and Hideaki Miyajima (eds.), *Japan—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 181.

的孩子人数。1998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降至1.38，而要保证人口不减少，必须维持2.09人的总和生育率。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了1.6~1.7的水平。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据预测，到201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2%，而韩国在2050年将有1/3人口进入老龄段。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养老金和老人医疗费等老人赡养负担的增大给社会保障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人口的减少，传统的大家庭结构也在瓦解，原来由家庭承担着的保护成员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功能转由社会部门来承担，“家庭功能的外部化使大家庭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sup>①</sup>。例如，韩国社会家庭变化的主要倾向，是由传统的直系关系转变为现代式的夫妻中心的核心家庭。据统计，1997年，在全国由夫妻与未婚子女组合而成的核心家庭类型占全体家庭数的79.8%。

### 二、中国（振兴东北）与俄罗斯（开发远东）

冷战结束以来的中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GDP缩水了一半，普京上台后，采取相应措施重振经济，俄罗斯经济才有起色。由于历史原因，两国位于东北亚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后劲不足的现象，为了改变该地区面貌，中国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俄罗斯也出台了开发远东地区的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4%的增长速度发展，是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直接折算约为2153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59878亿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直接折算约为19317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不足300美元增加到

---

<sup>①</sup> 李国庆编著：《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 400多美元。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比三年前翻了一番，达到11 548亿美元；进口总额为5 614亿美元，比三年前增长了近一倍。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7 453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五十多万个。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繁重。据相关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6.6%，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6%、日本的4.0%，在世界20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9位。中国农村2004年末还有2 61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年需要解决城乡就业的人口近2 400万人，并有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sup>①</sup> 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东北老工业基地曾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为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调整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转轨，东北老工业基地被边缘化了，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化改革进程都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基础和人才优势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成为制约东北发展的障碍和包袱。”<sup>②</sup> 1990年以来，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衰退，经济发展步伐相对缓慢，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GDP是广东的两倍，而现在广东是辽宁的两倍；1980年黑龙江省的GDP与东部六省市的平均值相当，现在为其46.2%，人均GDP仅是上海的1/4。

尽管有差距，但东北地区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资源相对丰富，

---

<sup>①</sup>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http://www.gov.cn/zwjk/2005-12/22/content\\_134060.htm](http://www.gov.cn/zwjk/2005-12/22/content_134060.htm)

<sup>②</sup> 王胜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2期。



## 东北亚史

全国已探明的主要矿藏储量中，东北地区的石油储量占45%，原煤储量占10%，金矿、钼矿、镍矿和铝土矿都居全国前列；东北地区的森林面积为8.67亿亩，约占全国森林面积总和的一半。东北在制造业领域也有一定优势：汽车产量占全国的1/4，造船产量占全国的1/3，钢产量占全国的1/8。东北地区还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其商品粮产量占全国的1/3。这些都将成为东北再度谱写新篇章的宝贵资源。

中国继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之后，出于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振兴东北也提上了日程。2003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把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列入重要议程，根据“东西互动，协调发展”的思想，着手开展这项工作。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成立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东北办”），国家发改委启动振兴东北的第一批一百个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2004年是东北振兴全面开展的一年，国家加大了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和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2004年国家东北的197个项目实施了工业结构调整改造，加上2003年提出改造的一百个项目，总投资达1089亿元。

在中央政策支持之下，东北振兴的第一年就取得了一定成效。2004年，东北三省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133.9亿元，同比增长12.3%，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完成增加值4869.6亿元，比上年增长19.7%，是连续多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8亿元，同比增长35.5%。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三省农民年均纯收入首次超过3100元，增长了16.7%，扣除价格因素外，增幅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招商引资成绩突出，民营经济发展迅猛，东北三省实际利用外资59.4亿美元，同比增长83.6%，绝对值和沿海相比，虽然还不高，但增幅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吉黑三省非国

有投资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55.8%，41.4% 和 34.5%，增幅分别高于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七个以上百分点。<sup>①</sup> 尽管东北振兴开局良好，但有学者认为其前景是喜忧参半，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东北问题本身的艰巨性，决定了不能指望短期内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战略实施传导机制方面容易出现失误；三是东北民众商业精神、市场观念培育绝非一日之功”。<sup>②</sup> 但无论如何，中国提出的振兴东北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将为中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积极效果。

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从 1992 年 1 月实行“休克疗法”开始的，基本点在于以强烈的金融财政紧缩和压缩消费硬性弥合社会供求之间的缺口，从而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然而 1992 年的稳定宏观经济未能实现预期的结果：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9%，三角债达 3.5 万亿卢布，通货膨胀在 2 000% 以上，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为两位数。进入 1993 年情况更加严重，生产大幅滑坡，居民收入骤减。“休克疗法”并没给俄罗斯经济注入活力，反而使俄罗斯经济“休克”了。1994 年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后，立即着手纠正以前改革中的过激倾向，以稳定和扶持国内生产为主要目的，调整有关政策。1995 年经济下滑幅度明显减慢。1997 年是俄罗斯独立以来经济情况最好的一年，不仅经济下滑的趋势停了下来，GDP 还实现了 0.4% 的微弱增长。但是好景不长，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俄罗斯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1997 年底，撤出的外资总额达 100 亿美元。为了回避风险，俄罗斯的内资也随着外资向国外流动。1998 年世界石油价格狂泻，给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又一沉重打击。直到 1999 年俄罗斯经济才止跌为升。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经济地位日益下降。在世界国民生

---

① 《经济日报》，2005 年 3 月 3 日。

② 徐文吉：“中国东北振兴战略及其对朝鲜合作展望”，《东北亚研究》，2004 年第 4 期。

## 东北亚史

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已下降至不到2%，国家开支和世界贸易额都只占1%，相当于荷兰或芬兰的份额。由于经济的持续危机，国库空虚，联邦财政预算非常低，并且还不得不指望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俄罗斯200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大约是250多亿美元，同美国纽约州的预算差不多，这就很难保证对关系国家安全的国防拨款和社会稳定的工资、退休金，更不用说由国家拨款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轨。

1990 - 1999 年俄罗斯主要经济指标表 (%，与上年相比)<sup>①</sup>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国内生产总值	-3.0	-5.0	-14.5	-8.7	-12.7	-4.1	-3.5	0.8	-4.6	1.5
工业产值	-0.1	-8.0	-18.0	-14.1	-20.9	-3.3	-4.0	1.9	-5.5	5.0

普京上台后，在保持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对俄罗斯经济进行彻底改革，措施主要有：(1) 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明确经济改革主攻方向。《2001 - 2010 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出 10 年内 GDP 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5%、到 2010 年使 GDP 恢复到转轨前水平的战略目标。(2) 进行产权改革，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力争甩掉包袱。将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减少 90%，只保留具有国防和社会意义的企业，其余全部实行股份制。(3) 启动经济结构改革，重塑经济发展的结构框架。根据本国实际，对相关产业重点扶持，并注重高新科技产业发展。(4) 积极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吸引外资。(5) 整顿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基础设施。(6) 循序渐进地实现俄罗斯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积极推动

<sup>①</sup> 参见徐坡岭：“中东欧与俄罗斯经济转型十年：对比与借鉴”，《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1 期。

“入世”进程。经过努力，俄罗斯经济改革初见成效。继1999年出现恢复性增长后，俄经济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年的GDP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8.3%，这一数字是俄罗斯与前苏联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随着中央财政状况的好转，基本消除了工资和养老金的拖欠现象，贫困人口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由于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需要，造成远东地区产业结构畸形，加工工业比较薄弱，但远东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从战略需要角度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西部、南部的战略屏障，战略重心总体东移，远东地区面积占全俄面积的36.5%，成为俄罗斯与亚太加强联系的桥梁，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从带动俄罗斯经济复苏角度看，俄罗斯经济对外贸依存度较高，外贸出口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燃料和原料出口一直是俄出口创汇的最重要来源，占出口总量的70%，占外汇收入的46%，仅能源就占出口总量的48%以上，占外汇收入的46%。“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约30%是由于能源出口所拉动”，<sup>①</sup> 远东地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可以用“三多”（矿多、树多、鱼多）来概括，被誉为世界上未被开发的最后一块“绿洲”。对于经济处于困境之中的俄罗斯来说，开发远东，通过增加出口能力来创汇，可以解决资金不足的窘境。因此，开发远东成为俄罗斯的现实迫切需要。

俄罗斯制定了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战略。1996年4月俄政府出台了《1996-2005年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和《1997-2005年西伯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两个纲要的宗旨是开放和开发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可以概括为：发挥远东地区的资源优势 and 地缘优势，加强与国内其它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利用市场经济的有效机制，根据该地区的具体特点，采取一

---

<sup>①</sup> 田春生：“俄罗斯转型：从叶利钦到普京的转折”，《读书》，2005年第8期。

切必要措施，全面进行社会经济建设，把远东建成以原材料供应基地和出口商品基地为特点的综合发展的发达地区。<sup>①</sup> 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最主要特点是注重开发中的国际经济合作，把借助外国力量开发远东作为重要手段，此举可以弥补俄罗斯自身资金的不足。目前，俄已经计划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筹建四个大型天然气基地，建成后，俄东部将形成统一的天然气运输体系，极大地提高俄罗斯向亚太市场的天然气出口能力。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在地理上相连，又迎来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双方的合作也不断增多。近年来，两地的地方合作发展迅速，边贸总额占中俄贸易额的 1/3；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出口接近其出口总量的 50%。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将利用东北亚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平台，促进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

### 三、朝鲜与蒙古

随着苏联援贷终止、经互会解散，朝鲜、蒙古经济的外部支柱崩塌，对两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对外经济依赖性极强的朝鲜、蒙古经济陷入空前的困境，GDP 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恢复经济增长、走出困境，成为两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朝鲜经济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陷入困境。朝鲜对外不再公布工农业产量，1987 - 1993 年期间的第三个七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均未能完成，1995 年起正式承认粮荒并向国际社会求援。据推算，朝鲜每年全国口粮、种子、饲料、工业原料所需的粮食至少 600 万吨，但朝鲜的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 300 ~ 400 万吨左右，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为 30% ~ 40%。<sup>②</sup> 朝鲜对外贸易额从 80 年代每年的 100 多亿美元，锐减到 1995 年的 25 亿美元。根据韩国有关部门推算，朝鲜国

---

① 周伟平：“略论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开发战略”，《当代亚太》，1998 年第 7 期。

② 李春虎：“朝鲜的经济现状及其改革趋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7 页。

民经济自1990年出现负3.7%的增长率之后，到1998年连续九年为负增长。1999年以后朝鲜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制约经济增长的粮食、原材料、能源、资金等方面的紧缺一个也没有缓解，金正日本人也承认“经济还没有步入正常轨道”，而且也看不到在短期内能够摆脱危机的迹象。<sup>①</sup>

长期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制约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而且也使朝鲜在同韩国的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国家政权受到的威胁加大。为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继承抗日游击队艰苦奋斗的传统，从1995年开始进行新的“苦难行军”和“强行军”，并大力倡导“土豆革命”，推广土豆种植，以此来弥补口粮的严重短缺。但是，“苦难行军”、“土豆革命”并非长久之计，要想巩固政权还得靠发展经济。

金正日正式掌权之后，认识到了重建经济、消除粮荒对稳定政权的重要性。1997年在国内视察期间，金正日多次发表有关经济建设的指示和谈话。1998年8月，朝鲜首次提出要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发展战略。在是年9月修订的宪法里，表明了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建立合资企业和开设经济特区的愿望。朝鲜官方媒体也不断出现“搞活经济，发挥自立经济的威力”、“重要的是把力量集中到解决实际为整个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问题上”等提法，反映了朝鲜重振经济的紧迫感。

2002年7月，朝鲜内阁以政令的形式颁发一项动作较大的经济举措，正式启动了经济秩序的调整，旨在刺激经济活力。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sup>②</sup>：（1）大幅度提高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农村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工资水平由90~260朝元提高到1500~6000朝元。

---

<sup>①</sup> 陈龙山：“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试论朝鲜近期经济改革”，《东北亚研究》，2002年第4期。

<sup>②</sup> 参见徐文吉：“朝鲜整治经济意义积极而举步维艰”，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

稻米收购价由原来的每公斤 0.08 朝元提高到 40 朝元，是原来收购价的 500 倍。(2) 在保持义务教育、公费医疗两种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全面而大幅度地提升包括公共设施、水、电、煤气、住房使用费以及外汇汇率等商品价格，变国家对商品价格的具体规定制为最高限价制，并实行重要商品价格基准制。(3) 取消商品分配领域的凭票证供应体制，实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自由交换。(4) 由国家在服务领域增设大批就业岗位，以满足由于工资提高而踊跃求职者的就业要求。

朝鲜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实行“三边带动战略”。2002 年 9 月和 11 月，朝鲜分两批在原有的一个特区基础上增设了三个经济特区，即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金刚山旅游区、开城工业园区。再加上 1991 年底成立的罗津 - 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朝鲜的“三边带动战略”正式形成。东北部通过罗津 - 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吸引俄罗斯的资本，重点恢复清津地区的钢铁工业生产和铁路设施；西部通过与中国毗邻的新义州，吸引中国资本；南部通过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旅游区，吸引韩国资本。<sup>①</sup> 朝鲜的做法明显地模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通过经济特区来吸引资本，以弥补自身资金不足。例如，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以拥有自己的区旗、区徽，甚至还可以另行发放特区护照，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众多迹象显示，朝鲜正在积极地推进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并确立了建设强盛大国的战略目标。“朝鲜的强国概念绝不仅仅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旗帜，而且确确实实是内容丰富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sup>②</sup> 但也应当看到，对于朝鲜来说，保证国家安全和政权生存

---

① 林今淑、金华：“论朝鲜对外开放的‘三边带动战略’”，《东北亚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② 朴键一：“朝鲜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当代亚太》，2002 年第 1 期。

很自然地放在第一的位置，防备美韩日（无论是武力进攻还是和平演变）始终是朝鲜推行一切政策的首要前提。一切改革措施也必须服从于安全利益，“在没有更安全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朝鲜能进行什么重要的改革”。<sup>①</sup> 因此，在险恶的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朝鲜的开放只能是“挂着蚊帐的开放”，即推行有限的改革与对外开放。

与朝鲜相比，蒙古的外部环境就好多了，但历史形成的薄弱的经济基础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蒙古同苏联原有的工业分工体系的解体，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加上蒙古国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真空”，使其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1990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代表大会确立了蒙古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的总统奥其尔巴特曾经预言，蒙古经过政治经济改革将在2000年成为一个亚洲新兴发达国家。然而，1991年蒙古国开始实施私有化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随着财产私有化、物价放开、外贸开放、改革银行体制等重大措施的实施，旧的经济体制完全解体，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大幅下降，经济全面滑坡。1990-1993年的GDP连续4年出现负增长，199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25%，1993年人均GDP不到1990年的1/4，1994年GDP才有所回升。但从1996年开始，受国际市场铜、羊绒价格下跌以及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经济又一次出现滑坡。据1998年初的统计，国内200多家企业中只有1/3盈利，其余全都亏损。1999、2000年夏天两次严重的旱灾，2000、2001年冬天的严寒，蒙古畜牧业遭到严重破坏。

蒙古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经济大幅度下滑，接踵而来的是失业率增加、贫困化加剧、贫富差距拉大、教育质量滑坡、犯罪

---

<sup>①</sup> Marcus Noland, "The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DPRK and Prospects for Reform", in Samuel S. Kim (ed.), *North Kore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05.



率上升、酗酒、卖淫嫖娼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991 - 1993 年，所有经济部门的实际收入减少，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收入减少 60%，企业员工的工资减少 20%，农牧业和服务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减少 30% 以上。由于生活困难，1995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乌兰巴托爆发了 6 000 多名教师罢课、集会，要求政府增加工资的事件。从 1998 年进行的生活水平抽查情况来看，全国的平均失业率为 19%，其中乡村为 12%，城镇为 30%。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蒙古国贫困人口比率保持在人口总数的 36% 左右。<sup>①</sup> 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机会成为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但是，蒙古国地广人稀，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不佳，资金短缺，人口流动性大，市场规模小，这对于投资兴办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不能提供更多的长期就业岗位。

2000 年 7 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选举中获胜重新组建新政府，采取了比以往更为务实、积极稳妥的政策。这届政府并没有局限于四年的任职期限，而是根据蒙古国中、长期发展需要，制定和批准了重大的政策文件，开始了坚决的改革步伐。即：“区域化发展方针”、“区域发展中期战略”、“关于建立动力统一网络纲要”、“千年路”项目、“关于预算部门管理和拨款法”、“国家公务和政府结构的改革”、“蒙古国土地私有化法”、“关于发展自由贸易区的方针”等。上述政策为完善市场关系，改善经济、预算、社会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sup>②</sup> 蒙古国政府还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区域化发展方针，并确定 5 大经济区，即乌兰巴托区、西部区、杭盖区、中部区和东部区，区内又设立了中心城市。沿着这些中心城市地理位置，将加快建设与国内外市场相连结的基础设施与公路。“千年路”项目已经成为具体的行动，正在实施当中。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蒙政府积极组织和召

---

① 图门其其格：“蒙古国的贫困问题及政府的扶贫措施”，《当代亚太》，2002 年第 3 期。

② 巴特尔：“蒙古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及发展趋势”，《东北亚论坛》，2004 年第 5 期。

## 第十章 冷战后东北亚各国发展的多样性

开国际援蒙例行会议，在巴黎、乌兰巴托举行了两次，由日本提议的国际援蒙会议于2003年11月在东京召开。恩赫巴亚尔在担任总理期间还成功解决了与俄罗斯的债务问题，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债务困扰，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2年起，蒙古国经济走出了低谷，出现持续增长的良好局面，整个经济环境明显得到改善，2004年GDP增长率高达10.6%，人均GDP达到610美元。这一切为蒙古国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走向全面复苏迈出了重要一步。

2004年东北亚各国经济实力比较

	日本	韩国	中国	俄罗斯	蒙古	GDP总数
GDP (亿美元)	46 711.98	6 804.09	16 536.86	5 817.83	15.16	75 885.92
人均GDP (美元)	36 595.9	14 150.9	1 272.0	4 086.6	601.6	约4 535.9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September, 2005, [www.imf.org](http://www.imf.org)

### 第三节 东北亚各国文化

人们一提及东亚（或者东北亚）文化圈，往往贴上“儒教文化”或者“中华文化”的标签，着重突出该地区各国之间文化的同源性。历史上，儒家文化向中国周边地区传播，并成为东北亚各国当代文化的基础，但各国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扬弃不尽相同，而且各国在吸收的同时也进行了再创造。同时，随着近代西方文明（包括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介入，东北亚传统文化又主动或者被动地吸收了西方的异质文化。再加上冷战期间的对峙与隔绝，东北亚各国文化的独特性变得更为明显。例如，东北亚各国曾共同使用中国的汉字，但是今天这个地区的书面语言已经变得五花八门，即使是

朝鲜文字，在半岛南方和北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北方全用谚文，南方则一半用谚文，一半用汉字。美国学者亨廷顿将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并列，是世界八大文明中的两个相互独立的文明。<sup>①</sup>“事实上，当人们把中韩日进行对比时，首先就会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很大差异而感到惊讶，甚至会认为相似点仅仅是表面的，其余恐怕都是差异。”<sup>②</sup>这种多样性表现在宗教信仰的繁杂、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等方面，而不同的文化特性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观察方式、评价方式和行为方式。

### 一、东北亚各国宗教

世界各大宗教在东北亚各国都有信徒，包括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例如神道教、萨满教等。该地区的宗教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外来宗教普遍实现了本土化，在吸收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传播发展。二是与世界某些地区因宗教差异而导致冲突的现象不同，东北亚各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带来冲突，异教徒之间相安无事。三是该地区宗教普遍与政治分开，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极其有限。

日本是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三个大的宗教和许多小宗教。据日本文化厅统计，截至2000年12月31日，日本共有神道教信徒1.05亿人，佛教信徒9419万人，基督教信徒174.5万人，其他宗教的信徒1021万人，合计共有各类宗教信徒2.09亿人。同年日本的人口总数为1.19亿人，宗教信徒的总数是人口总数的近两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人可以同时信

---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② [日] 长谷川启之：“东北亚经济圈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中心”，《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2期。

仰两种乃至多种宗教。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信仰，也是日本历史悠久的宗教。“神道教还保留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压制或消灭的大多数史前社会原始精灵崇拜的残余。神道教从未成为一种有条理的思想的主体，甚至也从不是可以称为真正宗教的现象；它也从未提出过明确的道德准则或自恰的哲学，但它确实保留了古代礼拜仪式的单纯。”<sup>①</sup> 佛教可以说是日本的外来宗教，但也有人认为佛教在日本已经实现了本土化，不应将其看作外来宗教。主要宗派有：日莲正宗、真宗大谷派、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日莲宗等。日本佛教僧侣允许结婚、食肉、喝酒。一般的信徒和普通人生活差不多，没有特别的清规戒律。日本的基督教是16世纪由荷兰耶稣基督会教士传入，随着信徒数量的增长，统治者担心基督教将动摇封建统治，于是下令镇压和禁止。1859年后，新教的传教士从美国来到日本传教，这些传教士一边传教一边从事社会活动和教育事业，为向日本输入欧美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时的日本统治者急于向西方学习便容忍了基督教的再次传入，并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现在日本各地都可以看见基督教教堂，很多日本人的丧葬、婚仪都采用基督教礼仪，各地也有许多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

韩国宗教主要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萨满教等，还出现了一些新兴宗教。其中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最多。公元4世纪时由传教僧侣从印度和中国传入韩国的佛教（称为大乘教），到统一新罗时代已经作为国教了。继之而起的高丽王朝时代，在遗族阶层的大力支持下，佛教文化仍很旺盛。至今，韩国国内还保存有众多建筑物、雕塑、绘画、工艺品等种类多、价值高的佛教遗产。韩国佛教徒大约有2 000万到3 000万，主要是曹溪宗。由于韩国佛教在日本占领期间，受日本佛教影响，1970年以蓄发带妻僧

---

<sup>①</sup> [美] 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为中心正式成立太古宗，从曹溪宗中分离出去。18世纪天主教、19世纪基督教传入韩国，早期信徒曾受到迫害，但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因此逐渐被大众所接受。目前韩国基督教徒大约占人口的25%，韩国教会还在海外进行传教活动，天主教拥有200多万信徒。有意思的是，基督教在韩国文化中获得了创造性的新发展，比如它把东方文化的家族特征等融入到了基督教当中。具有悠久历史的萨满教保留下来成为韩国人民的一种基础宗教，萨满教巫师是与神灵世界沟通的媒介，其仪式富于驱妖降魔的内容，融合了音乐和舞蹈，是一种多姿多彩的文化成份。此外，韩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产生了一些新兴宗教，例如天道教、大宗教、圆佛教等。据1991年统计，韩国现有新兴宗教共有240个，信教人口600多万人。<sup>①</sup>韩国学者还因为儒教有《四书》、《五经》作为经典，并有祭天、祭孔等宗教仪式，把儒教也归之为宗教。韩国虽有如此之多的宗教并立，但各宗教之间几乎没有摩擦，这是韩国宗教的一大特征。

蒙古国由于社会转型，意识形态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宗教在蒙古国的城市、牧区重新流行起来。蒙古国的传统宗教——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被禁锢了五十多年后开始复苏，1993年颁布的《国家与寺庙关系法》将喇嘛教定为国教。喇嘛教得以迅速发展，1990年之前全国只有几所寺院改建的宗教博物馆，到1998年全国共有寺庙162座，全国喇嘛人数也从十余人增加到2500多人。除占人口4%的哈萨克族信奉伊斯兰教，蒙古国居民多信奉喇嘛教。一些外来宗教也相继传入，并利用各种方式扩大影响，主要是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教的一些流派，如福音派、安提阿正教派、浸礼会、耶稣再生论派、圣徒工派、摩门教、长老会等。据统计，蒙古国现有6

---

<sup>①</sup> 金东勋：“韩国宗教文化略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个宗教的二十余种流派的二百多个宗教组织在开展工作。一些宗教利用蒙古社会的贫困化，吸引社会弱势阶层入教，非常见效，现在青少年信仰非传统宗教的比例正在上升，甚至出现了一个家庭中各成员信仰不同宗教的现象。<sup>①</sup>

俄罗斯远东地区属于东正教文明的边缘地带，由于地域上接近东北亚区域，在宗教信仰上也深受该地区的影响，主要宗教有东正教、藏传佛教、萨满教等。特别是在信仰萨满教方面，该地区与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居民具有共同之处。尽管中国和朝鲜都是奉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 二、东北亚各国民族特性与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传播到纵横数万里。一个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延续性和包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特征，其内涵包括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和谐统一等方面。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庭里，地域文化也极具特色。由中国东北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关东文化，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具有地域特色。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铸就了关东人民的坚强意志，勇于战斗、敢于进取的大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又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华文化弱化的现象。从整个东北亚区域来看，关东文化又处于其核心地带，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半岛的各种文化都在这里汇流交融。<sup>②</sup>

<sup>①</sup> 图门其其格：“蒙古国宗教见闻”，《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2期。

<sup>②</sup> 马毅、胡凡：“论关东文化”，《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日本文化是经过“和汉融合”、“和洋融合”的整合，构成具有融合性和创造性的“杂种文化”。提起日本民族，人们往往用“菊花与刀”、“樱花与祭”等反差极为强烈的字眼来描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这样评价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柔；黠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sup>①</sup> 日本民族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在世界民族之中，日本人可以说是最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之一。它具有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多方位、多层次地吸取先进文明，并加以选择、改造和融合，使日本从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强国。此外，日本人的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就在许多国家的公司苦于应对员工的迟到早退现象时，日本公司的员工却向来是早到迟退的，许多公司在下班时间已经过，灯火仍一片通明。

韩国现代文化在朝鲜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由三个要素构成：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积淀；西方价值观的涌入、冲击；日本殖民文化的传统、影响。<sup>②</sup> 在这其中，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至深至远，已经广泛渗透在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韩国的建筑、服饰、婚俗、节日风俗等方面，韩国还是个十分讲究礼仪和等级秩序的国家，服从长辈、服从上级、服从权威。也许正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引起了韩国人文化自尊心理的反弹。2005年1月18日，韩国汉城市议会正式决定将汉城的汉字名称改为“首尔”，以与韩语（拼音为Seoul）在发音上一致。理由是，汉城的名称是中国古代的叫法，是中国人给起的。而且，当代韩国对传统文化十分尊重

---

<sup>①</sup>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页。

<sup>②</sup> 王升：“文化心理因素对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1期。

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2005年11月24日，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此外，韩国人性格十分倔强不屈，具有十分强烈的团结爱国意识。例如，在东亚足球圈里，韩国队和日本队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针尖对麦芒的剧烈碰撞，非要拼个你死我活。过去，他们没能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

俄罗斯数千年以来，既受到亚洲文明的影响，又受到欧洲和斯拉夫文明的影响。俄罗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专制主义、国家至上、无个性的集体主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由此而产生的善良、诚实、人道、普济主义以及对国家和制度的忍耐精神等等”。<sup>①</sup>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俄罗斯远东地区文化构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中国东北传入的儒家文化，二是经过蒙古传入西伯利亚，形成的俄罗斯鞑靼—布里亚特和图互等民族的藏传佛教文化区，三是由俄罗斯主体文化传入的东正教文化。这三种文化在该地区相互融合，在远东地区形成了既不是纯斯拉夫、纯欧洲文化，也不是纯亚洲文化，而是一种欧亚混合型文化。

蒙古国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空间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草原文化——“逐水草而迁徙”的文化。其“流变性与主体性的统一，选择性与协调性统一”的思维方式；冲动性与竞争性的原始心理状态特征，绿色意识、中介贸易意识，尚武精神和重义守信伦理及“约孙·扎撒”的法治观念；主动性、包容性和实证性的文化传统；以此引申的开拓性、协调性、选择性、依附性的牧人意识的社会心理构成不同结构的传统文化。这一文化传统代代相传，发展成为高

---

<sup>①</sup> 雷丽平：“东北亚文化圈中的俄罗斯文化”，《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3期。



度成熟的具有巨大自我调节能力的高度稳定的文化系统。<sup>①</sup> 蒙古国在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七十多年里，强烈吸收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草原文化被割裂，随着蒙古国的转型，在文化方面则表现为对传统的回归。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蒙古全国上下掀起了成吉思汗热，一改几十年来受前苏联影响而不许谈论成吉思汗的状况，开始高度赞扬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饭店、宾馆相继出现，镌刻有成吉思汗头像的纪念币，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酒类、挂毯成为热销产品。蒙古在文化活动中也出现了复古的现象，如在新《宪法》中规定，“把蒙古统一后所建开国政权的传统大白纛作为蒙古国的象征”，国庆活动的礼仪、服饰全部模仿成吉思汗时代，并且重新使用成吉思汗时代的语汇。这些措施反映了蒙古国建立独立文化、追溯蒙古族传统历史、重树民族意识的努力。

正是由于东北亚地区业已存在的文化多样性，才给世人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区域世界，这种多样性应当是各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不是走向对抗的借口。“在这个世界上，承认那些产生不同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基本前提具有同等合法性既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就使得各种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成为可能：这是在一个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上保持和平和生存下去的基本的先决条件。”<sup>②</sup> 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文化在东北亚各国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对各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强烈挑战。日韩等国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更加西化，英语成为人们必须掌握的外语。蒙古政府为了进一步向西方文化靠拢，还计划放弃正在使用的西里尔文字，改用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字，为此出台了《拉丁文字国家计划》。因此，如何协调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

① 娜日斯、巴音吉日嘎拉：“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东北亚论坛》，1999年第4期。

② [美] E·拉兹洛著，李吟波等译：《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5~126页。

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 三、区域文化互动：“日潮”·“韩流”·“汉风”

从历史角度来看，东北亚文化是由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尽管当今各国在文化领域存在重大差异，但相似之处也很明显，比如各国普遍存在的集体主义、崇尚权威、勤劳勇敢、忍耐的民族精神，等等。从中也可以看到各国文化的根源——儒家文化，这构成了各国文化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日潮”、“韩流”、“汉风”成为存在于东北亚各国（主要是中日韩）的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并且推动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在文化方面无疑是强势的。当时随着一部平淡无奇的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日剧获得了当时尚未见过“世面”的中国观众的普遍好评。之后，《血疑》、《阿信》、《排球女将》（又译《青春的火焰》）接连上演，尤其是家喻户晓的《血疑》赚取了不少中国观众的泪水，轰动一时，影响深远。日剧在中国电视还不繁荣的情况下，填补了国内电视剧因生产量不足而留下的电视时段，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这一时期，在中国播出的日剧多为长篇电视连续剧，动则几十集，甚至上百集，如《阿信》长达297集，在题材上多以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为主，在主题上以励志为主，基调或煽情，或积极向上。90年代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日剧多是青春偶像剧，例如，《东京爱情故事》、《恋爱世纪》、《新闻女郎》、《美丽人生》、《悠长假期》等。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90年代以后日剧逐渐淡出中国主流电视荧屏，但中国年轻观众对日剧的热情仍有增无减，日剧在音像市场上因此热销。除了日剧之外，日本的漫画书及其改编的动画片、流行音乐也深受中国青少年的欢迎，甚至有人将喜欢日本流行文化、生活方式的一类人称为“哈日族”。此外，日本还吸引了众多的中国留学生。据统计，

2004年中国赴日本各类留学人员已达12万余人，在学人数居中国在外留学人员的第一位，自费留学人员占总数的90%以上。<sup>①</sup>

与日本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不同，日本文化在韩国却遭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封杀。韩国对日本大众文化的封杀可谓“滴水不漏”，政府明文规定对日不开放大众文化市场，而且民间自觉拒日本大众文化于门外。当时，哪位歌手要是在公开场合唱日本流行歌曲，将受到人们的指责和唾弃，甚至有被扔臭鸡蛋的危险。据韩国学者介绍，韩国封杀日本文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日本在殖民统治期间，利用文化侵略使韩国人的精神世界受到了巨大摧残。（2）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有彻底反省，歪曲历史，篡改教科书以及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不断发生，伤害了韩国人的感情。（3）韩国对宣扬“武士道”精神等日本文化产品具有抵触感，心灵深处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愈合。（4）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强国后，以实力为载体，向亚洲各国推销其文化，韩国对此心存戒备。<sup>②</sup> 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后，承诺从1998年10月至2000年6月分3次对日本文化实施开放政策。但是，日本的电视连续剧、综合娱乐节目及日语发音配有韩语字幕的日本动画片等影视广播节目仍然被禁。2002年6月，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为了增加友好气氛，韩国政府决定，允许国内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从2002年世界杯倒计时100天到世界杯结束后七天的这段时间播放日本歌曲。2002年7月，日本再次抛出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韩国政府和民众对此强烈不满，韩国决定无限期推迟第四次向日本开放文化市场的时间。尽管如此，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后，在两国年轻人中增加来往，建立互信已成为一股潮流。2003年6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日本期间做出承诺：韩国将努力扩大韩日交流，扩大对日本大众文化的开放。但也应当

---

① 中国驻日大使馆：《中日教育合作与交流简况》，<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lxsjl/jlxx/t199150.htm>

② 《环球时报》，2003年6月11日，第四版。

看到，日本文化要得到韩国人的认同并非易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何况一旦再发生类似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事件，这一进程将出现反复。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韩流”在中国迅速发展，“日潮”有所褪色。“韩流”自身的形成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金融风暴后，韩国政府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并于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国策方针。1999年，韩国政府首次制定了有关文化产业的综合性法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1999年至2001年又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同时，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并通过减免关税税收等手段，大力推进影视、音乐、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的出口，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下，短短几年时间内，韩国文化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3年韩国电视剧出口额达到4200万美元，比2000年增幅达47%。“韩流”还带动了旅游热，2004年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游客中，有27.1%直接或间接受到了韩国影视剧的影响，这些游客为韩国带来了7.8亿美元的外汇收入。<sup>①</sup>

“韩流”在中国的发展是从流行音乐起步的。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韩关系的稳定和不断发展，韩国流行音乐开始进入中国。最初进入中国的是早已红遍韩国的演唱组合HOT、酷龙、NRG等，他们演唱的歌曲大都是节奏感强、语速极快的劲歌，加上火爆的舞蹈、时尚的服饰和歌手们英俊帅气的外表，给中国广大的青少年以极大的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很快抓住了中国青少年追求新鲜、刺激的心理，并得到热烈地追捧。伴随着对韩国流行音乐和时尚服饰的喜爱，中国青少年中开始出现了“哈韩族”，这是一群喜欢染彩色头

---

<sup>①</sup> 齐晓峰：“韩国文化秀上APEC”，《世界知识》，2005年第4期。

发、嘴里哼着韩国歌曲、穿着打扮也极力模仿韩国人的年轻时尚一族。<sup>①</sup>紧接着，韩国影视剧登陆中国，对“韩流”在中国的升温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韩剧擅长于家庭生活剧，所表现的世情人伦、长幼之序、孝悌之义、夫妇之伦、儿女之道……，给中国人一种亲切感。《大长今》、《看了又看》、《人鱼小姐》、《明成皇后》等电视剧在中国获得了广泛欢迎。裴勇俊、宋惠娇、金喜善、李英爱等一些韩国影视明星成为众多中国观众的偶像。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海外剧场》栏目自2004年10月开展的两项网络调查中，“您最喜欢哪部电视剧”问题中排名前两位的都是韩剧，分别是：《人鱼小姐》（70.63%）、《明成皇后》（28.48%）；在“您喜欢哪个国家电视剧”问题中，韩国得票率为84.26%；日本以5.94%得票率居第二位。<sup>②</sup>可见中国观众对韩国电视剧的喜爱。在韩国文化热的同时，留学韩国热也悄然升温。从2004年开始，中国每年都有1000多人赴韩留学，年递增速度达到25%。目前在韩国的1.8万国际学生中，中国学生占一半之多。

日本的“韩流”势头也不亚于中国。2003年，韩剧《冬季恋歌》在日本播出时创下了20%的收视率，仅在日本一个国家，与《冬季恋歌》相关的销售收入就达到1.31亿美元，此剧也引起了日本对韩剧的高度关注，带动了日本观众对其他韩剧以及韩国文化的兴趣。而主演裴勇俊更是因之成为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增强，日韩等国兴起了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到中国旅游和留学的热潮，形成了所谓的“汉风”。2000年到中国留学的韩国留学生达到2万多人，首次超过日本，居各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之首。目前在中国各大学读书的韩国学生已累计四五万人，而且数量正在持续增加。大致有20多万韩国人在中国从事

---

① 李昕：“‘韩流’挡不住”，《世界知识》，2004年第16期。

② <http://www.cctv.com/program/hwjc/1/index.shtml>，此数据截止时间为2005年12月中旬。

商业、文化、教育等工作。留学生的专业也不局限于中文和医疗等少数专业，他们的专业扩大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趋向于多样化、专业化。<sup>①</sup> 据韩国方面统计，仅2003年就有200万人次的韩国人到访过中国，与建交前的1991年相比增长了25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公众出国旅游的首选地。<sup>②</sup> 目前，韩国300多所大学里，几乎都开设了中文系。韩国各种“中文学院”达1000多所，中文已与英文并驾齐驱成为人们最爱学的外语，据粗略统计，韩国学习中文的人数已达200万。其中参加全球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已超过2万人，居世界首位。韩国人不仅热衷学习中文，而且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书法绘画、剪纸、按摩、武术等也有浓厚兴趣。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挂牌，2005年1月，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院（也称中国文化中心）在韩国首都首尔落成，成为韩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以中国电影和民族音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日本也日益受到欢迎。2004年《十面埋伏》在日本取得了23亿日元的票房记录，中国的“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巡回演出30场，场场爆满。近年来，每年都有4万多名日本高中生到中国“修学旅行”，比去美国的将近多了一半。其中原因除中国离日本较近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自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累计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已有10万余人，2004年在华日本长短期留学生达1.6万人，居外国在华留学生的第二位。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中国展馆参观总人数超过560万人次，占整个博览会参观人数的1/4，表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总之，在政治纷争不断、经济合作迟缓的东北亚地区，文化往来恰好提供了一个消弥分歧、建立互信的纽带。“日潮”、“韩流”、

---

① 李英武：“‘韩流’与‘汉潮’——漫谈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中韩文化交流”，《唐都学刊》，2004年第1期。

② 李昕：“‘韩流’挡不住”，《世界知识》，2004年第16期。

## 东北亚史

“汉风”之所以能够在东北亚各国勃然而兴，其原因在于文化的共同性，各国人民都能够主动地加以接受，反映了中日韩人民相互间的关注和亲近。对于外来文化，不应该一味地排斥，而应当采取批判吸收的精神，互通有无，在促进本民族文化成长的同时，培育不同文化间的共同部分，使其成为未来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并为东北亚的地区整合提供强大的动力。

## 第十一章 东北亚区域互动及其前景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冷战格局结束，为东北亚区域互动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东北亚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冷战结构的遗留问题，但意识形态对立已不再是各国政治关系的首要决定因素，国家利益和经济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问题，各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入，国家间关系呈现发展互利的趋向。东北亚国际关系呈现出双边关系唱主角、多边合作机制缺乏的特征。有关各方围绕朝鲜核问题开展六方会谈，并使之机制化，有望成为该地区多边外交的雏形。美国作为一个外来力量与该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其利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深入到了东北亚地区，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及双边同盟关系，决定了它是东北亚事务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东北亚已经开启了地区合作之门，但地区内广泛存在着的领土领海争端、日本与邻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纠葛、朝鲜核问题等等，又影响了该地区的合作氛围。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区域化的目标显得若即若离。

### 第一节 冷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

冷战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韩国与俄罗斯、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朝鲜与美国、日本的关系仍处于僵持状态；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在2000年出现转机，但朝核危机的爆发又使局势变得扑朔迷离；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取得飞速进展，



但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倒退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与前苏联相比已大不如前，但出于开发远东的需要，仍然积极介入东北亚事务，参与地区经济合作；蒙古国也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努力开展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联系，希望能够在地区合作中分取杯羹。

### 一、东北亚各国外交战略

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得到普遍改善和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显著增强。中国对外战略的目的是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营造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为此，中国同一些邻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勘定边境界线、推动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东北亚战略可以概括为：以维护东北亚区域稳定为前提，构筑东北亚各国全新的合作体系，与东南亚区域战略相呼应，为中国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营造新的发展空间。<sup>①</sup> 具体说来，在政治领域，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努力构筑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与俄罗斯、韩国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以确立与发展。在安全领域，尽可能避免区域纷争或冲突，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能够实现。在经济领域，中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体的建构，加强与周边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以实现中国东北部的经济腾飞。

日本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以日美同盟作为基础，以经济外交为基本手段，全力推进日本“大国”外交战略的实践。其目标是“成为具有全面影响力的大国，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

---

<sup>①</sup> 金强一：“论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在安全、文化等领域发挥领导和主导作用，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一极”<sup>①</sup>。日本大国外交主要表现为：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变了“专守防卫”理念，力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成为普通国家，让自卫队走出国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反恐战争，向世界展示日本的“大国”实力。东北亚地区可以称得上是日本实施大国外交战略的“后院”，对日本成为“大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日本十分重视东北亚地区，在安全领域深化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并将双边军事合作范围扩大至日本周边；防止来自朝鲜的“威胁”，力争在半岛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力图主导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但是，日本在东北亚的外交行为却被自身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所抵消，周边国家不能不对日本的领导能力与“大国”企图产生怀疑。应当看到，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状态的根源在于日本国内对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而战后出生的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又很难同邻国在此问题上达成妥协与共识。“他们既因日本的经济成就而有民族自豪感，不满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地位；又由于没有经历过战争而缺少对侵略历史的负罪意识，更不愿承担上一代人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他们认为日本理应享受有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和发挥更大的作用。”<sup>②</sup>

俄罗斯独立后的外交经历了从对西方“一边倒”到“双头鹰”、“全方位”外交三个阶段，特别是在西部战略空间日见萎缩的情形之下，“向东看”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领导人满以为自己亲手推倒了西方的宿敌苏联，在政治上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在经济上搞私有化，西方会视俄为“自家人”，全力扶持，倾囊相助，俄将很快升入“资本主义的天堂”。叶利钦甚至认为俄罗

---

① 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② 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 东北亚史

斯已重新加入到西方国家的共同体，“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之间紧张的历史结束了”。<sup>①</sup> 因此，俄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西方却仍视俄为异己，对俄采取了防范、限制和削弱的政策，西方许诺的贷款多带有苛刻的条件，而且往往口惠而实不至。鉴于“一边倒”对外政策碰壁，俄领导人决定拉开同西方的距离，调整对外政策，实行兼顾东西方的“双头鹰”外交。1995年俄又提出“全方位”外交战略。普京就任总统后，积极参与东北亚事务，发展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重视中韩日对俄罗斯能源市场的需求，鼓励东北亚资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与开发，希望能够融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俄罗斯东北亚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引进外资，加强合作，促进远东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确保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稳定与边界安全。

韩国认为自己处于东北亚区域的核心位置，理应对东北亚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韩国来说首要的是要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形成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保障半岛安全。在对朝政策上，韩国刻意与美国拉开距离，不愿意同美国保持完全的一致，具有自己的独立性。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均推行与北方接触的“阳光政策”，反对采取强硬措施，避免过度刺激北方。在经济领域，韩国提出了东北亚中心战略，即充分利用韩国连接东北亚地区大陆和海洋的地理优势、经济优势，以韩国为中介、枢纽，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发展及合作。韩国政府提出的东北亚构想，“就是要通过改善东北亚各国间政治关系和扩大经济合作来逐步消除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不信任，缓解各国间的矛盾，同时，通过建立开放、灵活的市场机制来吸引区域外投资，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

---

<sup>①</sup> [美] 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并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sup>①</sup> 卢武铉政府计划力争在5~7年的时间里，把韩国建成东北亚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自由贸易中心。

蒙古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用睦邻友好、平衡大国、多元外交和“无核区”来概括。大呼拉尔1994年通过的《蒙古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构想》规定，奉行开放的、不结盟的、多支点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将巩固在亚洲的地位，参加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作为“对外政策的第三个方向”，强调以东北亚为重心。<sup>②</sup> 作为地处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国，蒙古把开展对中、俄关系放在其对外战略的首位，并极力强调在中、俄之间奉行等距离的睦邻友好政策。另一方面，蒙古又积极地引入区域外大国力量，将美国称为“第三邻国”，希望借重其力量来制约中俄，进一步增加平衡力度，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的地位，确保本国的独立与安全。但蒙古方面显然认识到，其最好的选择是与各大国保持友好、平衡与中立，不与任何大国建立同盟关系，并将蒙古建成“无核区”。即便如此，蒙古国还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区分出了外交层次：从现实和历史的需要出发，以俄罗斯和中国为最主要的外交对象；从制衡中俄的角度出发，以美欧为重要平衡力量；从获得资金、技术的角度考虑，以东北亚国家为重要外交区域；根据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注重与亚太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

朝鲜面对冷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调整了对外战略。在金正日执政之后，朝鲜的基本外交战略目标是摆脱美国对朝鲜的孤立和封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抵御韩国的“吸收统一”企图，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权。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朝鲜根据国际战略力量格局变化的总趋势，继续坚持金日成在冷战终结时确立的“自

---

<sup>①</sup> [韩]安炯徒：“韩国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及东北亚中心战略”，《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4期。

<sup>②</sup> 张秀杰：“蒙古的国家安全战略及中蒙安全战略关系”，《当代亚太》，2005年第11期。

主、和平、友谊”的对外关系基本原则。<sup>①</sup>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对周边环境比较敏感也比较关注。朝鲜对中俄两国与韩国改善关系，逐渐给予了理解，并继续保持同这两个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金正日出访过的国家只有中俄。在朝韩统一问题上，朝鲜坚持以联邦方案来实现半岛的统一。此外，朝鲜已经认识到朝美关系是朝鲜改善外部环境的核心问题，如果朝美关系不突破，其外部环境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只有让美国取消制裁，才能吸引到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来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进程。美日韩协调机制的存在，使得朝美关系的进展还决定着朝韩、朝日关系的走向。因此，朝鲜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

### 二、东北亚双边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冷战后的东北亚各国主要以发展双边关系为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多边合作的途径。其中，几组重要的双边关系构成了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中日关系在经贸领域的往来不断加强，但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的争端又使得双方的政治关系不断冷却。中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出现了良性发展的势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政热经冷”的局面。日俄关系则深受北方四岛问题困扰，出现政治经济均不热的现象，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对日本仍极具诱惑力。朝韩关系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扑朔迷离局面，朝核危机的爆发使得半岛问题已经突破了双边关系范畴，需要一个多边解决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美矛盾扩大，日本愿意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在“六四”风波之后率先打破对华经济“制裁”，是第一个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西方大国。1990年9月，

---

<sup>①</sup> 高连福主编：《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

日本政府宣布重开两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交往和合作。1992年10月23日，日本天皇明仁访华，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细川内阁一上台就承认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并在施政演说中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深刻反省和歉意，这样的表述为战后历任首相施政演说所仅见。<sup>①</sup>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在战后五十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愿正视历史，承认侵略，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居主流。

随着美日关系的调整与加强，日本对华关系也进行了重新定位。尽管中日间的经济互利依存关系进一步发展，高层政治往来持续不断，但两国关系中消极的一面也在发展。1997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本着“以史为鉴，开辟未来”的精神，双方决定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1993-2002年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合作的同时，两国关系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之音。1995年8月，为抗议中国进行核试验，日本决定冻结除人道和紧急援助之外的对华无偿援助。1996年7月29日，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开了冷战结束后首相参拜的先例。此外，双方在历史教科书、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方面的摩擦日益增多。更为恶劣的是，日本还别有用心地炒作“中国威胁论”，重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还有意将台湾包括在“周边事态”之内。

---

<sup>①</sup> 刘天纯：《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1992 - 2003 年中日贸易额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贸易额 (亿美元)	253.8	390.3	478.9	574.7	600.6	608.1	579	661.7	831.6	877.5	1 019.1	1 335.7
增长率 (%)	25.3	53.8	22.7	20	4.5	1.2	-4.8	14.3	25.7	5.5	16.1	31

数据来源：中日传播网，<http://www.jccnet.cn/jiu/shujuku/zrgxsj/1972zrmy.htm>。本表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制成，与日本方面的数据略有出入。

2001 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连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困难。2001 - 2005 年间中日两国领导人中断互访达五年之久，而双方即使在其他场合的会面也往往因为历史问题而收效甚微，这对于彼此有着紧密经济交往的两个邻国来说十分反常。中日关系“寒冬期”对两国经贸合作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政冷”在导致“经凉”。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17.5% 下降到 2004 年的 14.5%，日本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关系的“政冷”还导致一些较大的经济合作项目无法开展，使两国的互利合作受到制约。出于政治考虑，日本对中国的贷款金额也不断削减，由 90 年代末期的年均 2 000 亿日元减至 2003 年的不足 1 000 亿日元；援建的项目由过去的经济基础设施改为环境保护等。由于小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坚持顽固的错误立场，对中韩等国的批评充耳不闻，中日进行正常接触的气氛遭到严重破坏，2005 年 12 月在“东盟 + 3”峰会期间应当举行的中日韩峰会无限期推迟。有学者认为，中日关系已经走向了“强—强”类型，“这种关系类型意味着两国冷战后外交政策环境发生了重要的结

构性变化，但决策者却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sup>①</sup>

与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相反，中俄关系则出现了“政热经冷”的现象。中俄关系是在中苏关系中酝酿的，是在苏联解体、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后形成的。独立之初，俄罗斯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热衷于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使之不可能过于关注对华关系。中俄之间也有过一些高层往来，但俄罗斯与西方却是频频举行首脑会晤。1992年12月中旬，叶利钦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及24个有关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及部门间的协定或文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随着亲西方外交的失败，俄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关注对华关系。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及《中俄国界西段协定》等文件。这次高层会晤标志着中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确立。

随着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实行以及北约东扩压力的不断增加，中俄政治关系逐渐升温。1996年4月，叶利钦访问中国，两国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决心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既是两国关系的定性评价，也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方向。《联合声明》还指出，双方同意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性对话，并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热线联系。根据这一协议，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自1997年起实行年度会晤机制，并设立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2000年7月8日，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发表了《北京宣言》，对两国关系及合作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合作领域重新予以肯定。这意味着普京接受了叶利钦时期中俄关系所取得的一切成

---

<sup>①</sup> Jianwei Wang, “Adjusting to a ‘Strong - Strong Relationship’: China’s Calculus of Japan’s Asian Policy”, in Takashi Inoguchi, (ed.) *Japan’s Asian Policy: Revival and Respons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103.



果，中俄关系从叶利钦时期向普京时期的过渡顺利完成，俄罗斯对华政策的继承性得以保持。<sup>①</sup> 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确定了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迅速发展为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俄边界谈判历经四十多年，却在冷战后数年之内得以解决。1991年5月和1994年9月，中俄分别签署了两国边界东段和西段协定。2004年10月，中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就两个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达成协议，从而标志着中俄之间长达4300公里边界线的走向全部确定。

与政治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两国的经贸合作就有点相形见绌。1996年4月，在叶利钦访问中国期间，两国领导人提出到2000年使中俄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但在实施这一任务的第一年里，两国间的贸易额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即由1996年的68.45亿美元，下降到1997年的61.18亿美元，降幅达10.6%，到2002年，也只达到120亿美元，两国贸易额与领导人愿望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经冷”现象已经引起中俄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如何促进经贸合作成为历次两国总理会晤的主要话题，2002年底普京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将力争在双边经贸关系整体发展和质量提高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双方努力下，2004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12.3亿美元，同比增长34.7%，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开拓俄罗斯市场成效显著，中国产品在俄罗斯的销售数量和市场占有率也逐年扩大。

中俄经济合作的重头戏是能源领域。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恰可以满足中国的需要。

---

<sup>①</sup> 冯绍雷、相兰欣：《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1996年两国政府签署了《中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其中包括石油管道项目。2001年9月，两国总理签署铺设原油管道项目协议，决定共同铺设一条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石油运输管道，这一计划管线就是“安大线”。2002年底，承担“安大线”管道技术经济论证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突然声称要放弃“安大线”，改修一条从东西伯利亚经过远东地区到太平洋港口的石油管道，即“安纳线”，旨在将客户扩大到包含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诸多国家，而“安大线”的客户只有中国。俄国的变卦与日本从中作梗分不开，日本早就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垂涎三尺了，不会坐视中国“独享”远东能源。为此，日本表示要提供75亿美元，协助俄罗斯开发东西伯利亚新油田，并增加对俄罗斯的投资和经济援助，以换取俄罗斯优先修建“安纳线”，“安大线”在日本的金钱利诱下生变。俄罗斯经过一番权衡之后，于2004年12月决定由俄石油运输公司修建一条从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石油运输管道（简称“泰纳线”）。该管线经由西伯利亚原油产地伸展至日本海沿岸城市纳霍德卡，从而直接面向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美国的广阔市场。“安大线”的流产折射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未来的战略选择。<sup>①</sup>

日俄关系受北方四岛问题困扰，很难获得实质性进展。冷战时期，前苏联与日本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又有领土争端，关系较为紧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急需大量的经济援助，日本在对俄关系中处于有利位置。1993年10月，叶利钦访问日本，两国发表了《东京宣言》与《经济宣言》。俄方确认前苏联签署的所有日苏条约依然有效，双方同意就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进行认真谈判，根据历史事实，在法律和正义基础上早日解决领土问题，进而签署日俄和平友

---

<sup>①</sup> 田春生：“俄罗斯东北亚地区的能源战略与中国的选择”，《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

好条约，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但是，俄罗斯的“让步”并没有获得“实惠”，日本始终坚持政经不分离政策，即在领土问题没有获得实质解决之前，不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1994年10月发生的俄海防部队击沉日本渔船事件，使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外交政策的调整，俄罗斯在寻求对日合作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日本对此给予积极回应。1997年1月，桥本首相宣布了以“多层次接触”为核心的对俄新政策，即在不放弃领土主权要求的同时，在安全与国际合作等各个层次发展日俄双边交流，谋求在领土谈判、政治对话、安全保障、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同时推进日俄关系。7月，日本又提出“信赖、互利、长远观点”的对俄政策三原则。1997-1998年俄日两国领导人在一年之内举行了三次会晤，1997年11月举行的会晤中，两国决定将尽最大努力在2000年缔结和平条约，其中包括领土问题；日本保证提供6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和15亿美元的非联系性贷款；俄罗斯公开表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日虽然有合作意向，但运作实施起来却并不顺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油气及矿产资源，而日本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量又很大，两国经济结构具有很强互补性，原本应该开展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但效果并不理想。截止到2002年，日本对俄罗斯的投资累积达到6.4亿美元，仅占俄罗斯吸收外资总额的1.8%。“虽说日本是资金技术大国，但对俄罗斯来说，日本的资金技术作用只与列支敦士登公国或奥地利相同，日本对俄实际经济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sup>①</sup> 两国的贸易也是发展缓慢，2002年，俄日贸易额仅为27.72亿美元，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居第九位，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仅列第28位。

在日俄关系上，两国均十分重视对方，但却又都很难超越领土

---

<sup>①</sup> 冯绍雷、相兰欣：《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争端、推进合作走向深入。俄罗斯希望根本改善俄日关系，扩大经贸往来和技术合作，吸引日本对俄罗斯的投资。在亟需资金的时候，俄罗斯可以在领土问题上采取灵活做法，而当经济逐步好转，对资金需求不再那么迫切时，俄罗斯对日强硬的一面就表现出来了。同时，北方四岛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民众情绪都使得俄罗斯对它难以割舍。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回旋余地因此受限。日本也非常重视对俄关系，希望利用俄罗斯实力衰弱和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收复北方四岛，但俄罗斯并不为之所动。日本以政治为条件，推进对俄经济合作的策略也因此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没有日本的资金技术，俄罗斯可以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俄罗斯远东丰富的油气资源对能源紧缺的日本颇有诱惑力，于是日本希望能够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经济与政治挂钩的立场，只不过是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选择。总之，北方四岛已经成为了日俄关系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朝韩关系因其特殊性在东北亚地区格外引人注目。冷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冷战坚冰曾一度消融。实力日益壮大的南方在南北对话中采取主动进攻态势。南北双方自1990年9月到1992年9月共举行8轮总理会谈，从第六轮到第八轮总理会谈期间，南北双方组建了政治事务、军事事务和交流合作三个委员会以及和解、军事、经济交流与合作、社会和文化交流与合作、核控制五个联合委员会，还组建了南北联络处。南北双方甚至还确定了举行最高领导人会晤的时间（后因金日成逝世而未能实现）。从当时的气氛看起来，似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半岛就能实现统一了，但受美朝关系和突发性危机影响，朝韩关系又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1993年美国与朝鲜在核问题上发生争执；1994年12月美军直升机入侵朝鲜领空事件；1996年9月朝鲜潜水艇在韩国海岸搁浅事件；1997年7月朝韩军队在军事分界线中部金化地区发生严重交火事件。

1998年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之后，积极发展南北关系，提出了

阳光政策。它包括三项基本原则：（1）我们决不容忍阻碍朝鲜半岛和平的任何武装挑衅；（2）我们决不会去伤害或吞并北方；（3）我们决意推动同北方的和解与合作，可在最容易达成协议的领域内做起。该政策出台后遭到朝鲜方面的抨击与反对，但对于推动南北关系仍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sup>①</sup> 韩国逐步放宽了韩国企业为在朝鲜生产商品而运往朝鲜的机械设备的限制，并放松了在北方投资的限制。南北民间交流活动因此得以开展起来，韩国现代集团同朝鲜有关方面签订了金刚山综合开发合同，1998 - 1999 年韩国各界访朝人数超过 1989 - 1997 年访朝人数的总和。

2000 年 6 月 13 日，朝韩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南北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本着搁置问题（如驻韩美军、美日韩协调体、朝鲜核问题及导弹发射等问题）、求同存异的会谈原则，签署了《南北共同宣言》。主要内容包括：（1）南北双方决定，国家统一问题，要由其国家的主人——我们民族相互联合的力量自主地加以解决。（2）南北双方认为，南方提出的旨在实现统一的邦联制方案和北方提出的联邦制方案互有共同性，双方决定今后将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统一的进程。（3）南北双方决定，在 2000 年 8·15 之际交换离散亲属访问团，并尽早解决遣返未转变思想的长期在押犯等人道主义问题。（4）南北双方决定，通过经济合作均衡地发展民族经济，并加强社会、文化、体育、卫生、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以增进相互间的信任。（5）南北双方为早日将上述协议事项付诸实践，决定在近期开始当局间的对话。<sup>②</sup> 朝韩峰会改善了双边关系，半岛局势得到明显缓和。

峰会之后，双方共同采取具体行动落实《南北共同宣言》的基本精神，形成了对话、交流与合作的高潮。在政治领域，朝韩双方

---

① 孟庆义：“‘阳光政策’评析”，《东疆学刊》，2000 年第 2 期。

② 《人民日报》，2000 年 6 月 16 日。

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多层次会谈，形成部长级会谈基本框架及相关机制。南北双方先后进行了特使互访、国防部长会谈、南北经协务实接触及红十字会会谈等，三年之内双方共举行 80 次会谈，达成 67 项协议。在经济领域，双方合作成效显著。2000 年 8 月朝韩就建立开城工业园区等产业基地达成协议。9 月京义线连接工程开工，此工程不仅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而且还将把欧亚大陆桥延伸至朝鲜半岛。2000 年南北贸易额达到 4.25 亿美元，比 1999 年增加了 28%，韩国还加大了对朝人道主义援助，2000 年韩国对朝鲜援助总额近 1.14 亿美元，比 1999 年增加了 142.7%。在文化领域，文艺团体互访演出，南北双方人员往来也呈现急剧增长趋势。2000 年南北往来人员数达 786 人次（不含金刚山旅游），较 1999 年增加 30%。朝韩运动员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共同组成方队参加开幕式与闭幕式。

缓和之风吹拂下的朝鲜半岛并非春光一片，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朝鲜半岛和解之途注定是漫长而崎岖的。“峰会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特征仍然是互不信任、仇恨、缺乏相互合作以及意识形态冲突。”<sup>①</sup> 2001 年韩美举行了两次联合军事演习，“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韩国实行“非常警戒”措施。朝方认为，此举违反了《南北共同宣言》的基本精神，妨碍了双方达成的有关协议的履行。朝方据此拒绝或推迟了某些计划中的接触与协议，金正日也迟迟未能访韩。2002 年 10 月朝鲜核危机再度爆发，并引发美朝严重对峙，韩美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半岛局势再度恶化。

### 三、朝鲜核危机与多边外交架构

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大国利益相互交汇，区域内部很难出现像东南亚或者西欧那样的自主性发展动力来推动地区多

---

<sup>①</sup> Tae - Hwan Kwak, "The Korean Peace - Building Proc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ae - Hwan Kwak and Seung - Ho Joo (eds.), *The Korean Peace Process and the Four Power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 10.

边外交。朝鲜核危机的爆发则给东北亚开展多边外交提供了机遇。

1990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报界公布的一份材料称，根据军事卫星拍摄的照片，朝鲜在离平壤约80公里的平安北道宁边郡有一个核基地，正在研究发展核武器，并推测在1995年之前朝鲜将拥有核武器。根据美国的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按照其程序对朝鲜申报的核设施先后进行了六次核查，并没有发现朝鲜研制核武器的证据。但美国坚持认为朝鲜掩盖了开发核武器的真相，并要求对怀疑存有核废物的两个朝鲜军事基地进行特别检查。在遭到朝鲜拒绝之后，1993年初，美韩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则在3月12日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随后，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敦促朝鲜重新考虑退约以及核查问题，否则将给予制裁，朝鲜则声称如制裁即战争。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

为了化解危机，朝美双方举行了一系列高级会谈，美国前总统卡特还亲自前往平壤进行斡旋，经过艰苦的外交谈判，双方最终于1994年10月21日签署了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美朝核框架协议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两国间的相互谅解与包容，在当时所可能达到的水平上，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朝鲜核问题。然而，落实协议无疑要比达成协议更为关键，也更为复杂，美朝围绕如何落实协议展开了新的较量。美国承诺的核电站建设进展缓慢，10年只完成工程的25%，美朝关系正常化以及放宽制裁更是无从谈起。这就为核危机的再度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核危机爆发之后，半岛和平机制的缺失成为各方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国际法角度来说，朝鲜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停战协定，表明朝鲜半岛只是暂时的停战，还未结束战争状态。1996年4月，美韩首脑建议“无条件尽早举行由美国、中国、朝鲜和韩国参加的

四方会谈，以便在朝鲜半岛建立永久性和平体制”。<sup>①</sup> 1997年12月9-10日，第一次四方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四方会谈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朝鲜半岛新的和平机制，取代停战机制，缓和当地紧张局势，促进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1997-1999年间四方会谈先后共举行六次，议题涉及驻韩美军、美朝关系、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以及统一方案等问题。各方虽然都表示要通过四方会谈解决半岛问题，但一有机会它们又都想尽办法把四方会谈变为抬高己方削弱对方影响的场所。<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四方会谈很难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和进展，举行了六次之后就不了了之。

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再度凸现了半岛局势的脆弱。据称，美国早在1997年就发现朝鲜有秘密恢复核计划的迹象，2000年前后又掌握了朝鲜在国外进行“可疑”采购证据。但不知为何美国当时并未声张。直到2002年10月初，美国才派出总统特使赴平壤追究朝鲜“违约责任”。朝鲜则直接向到访的美国客人承认没有停止发展核计划，朝鲜核危机再度爆发并不断升级。11月14日，美国主导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作出自12月起停止每年对朝提供50万吨重油的决定。11月21日朝鲜宣布鉴于美方断油，1994年框架协议也就失效。为此，12月12日，朝鲜宣布重新启动其核设施。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则以大规模军事演习、加强驻韩日美军实力相威胁。

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朝鲜发展核计划无非是想敲诈美国，迫使美国等敌对国家取消对朝敌视政策，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解决粮食严重短缺、工业原料和能源供给紧张问题。“从平壤的角度看，它的行动并非是要赢得军事行动，而是要发起一个带有强制性

---

① 《人民日报》，1996年4月17日。

② 金正浩“‘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的前景”，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的讨价还价的进程，希望能得到比现状更好的结果。”<sup>①</sup>对朝鲜而言，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不可能轻易放弃核计划。若放弃这一王牌，意味着失去了制胜武器，失去了谈判资本，失去了改善外部环境的绝好机会，其结果只能是在美国的钳制下坐以待毙。

中国政府出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考虑，呼吁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在中国的积极撮合下，2003年4月24-25日，朝鲜核问题的主要当事国美国、朝鲜以及中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只是为处于僵持状态的美朝提供了一个对话机会。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朝鲜代表在会谈期间以非正式方式告诉美国：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并声称是否应该“展示其核武器或者出口核武器”取决于美国的立场。朝鲜的这一“新招”着实令国际社会措手不及，也令美国十分被动，它宣称“绝不容忍”，并反复强调决不排除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

在这危急关头，中国表现出理性的、负责任的大国姿态。5月下旬开始，中国领导人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阐述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主张，同有关国家进行沟通。7月初，中国派出特使或高级外交官先后出访俄、韩、日、朝、美等国，经过卓有成效的斡旋，终于促成有关各方坐到谈判桌前，启动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进程。8月27-29日，第一次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谈有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中美日俄四个重要大国参加，囊括了东北亚地区所有重要力量，朝鲜核危机被纳入了多边政治解决的轨道。截止到2005年11月，六方会谈共举行了五轮。第四轮六方会谈发表了《共同声明》，这是参与谈判的六方，首次用文字确认了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总体目标。

---

<sup>①</sup> Victor D. Cha, “Engaging North Korea Credibly”, *Survival*, Vol. 42, No. 2, Summer 2000, p. 142.

尽管六方会谈在中国的推动下，取得了一些共识，但离真正解决实质问题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各方确定的会谈日期往往被拖延，第二轮和第四轮会谈都未能如期举行，这些都说明了六方会谈的艰难性。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并不在东北亚其他国家手里，主要取决于朝美双方。然而，经过几轮的商谈，朝美的立场仍然相距遥远。从美国角度来看，它有了朝鲜前一次“违约”、同意朝鲜暂时冻结核计划的“教训”，因此在这次核危机中，美国坚决要求朝鲜彻底放弃核计划，别无商量余地，并一再强调在朝鲜让步（弃核）之前，不做出任何妥协。同时，为了避免被朝鲜束缚住手脚，美国要求东北亚各方共同参与和平机制的建构，反对与朝鲜一对一进行谈判。这样一来，朝鲜将来即使反悔违约，也有更多的见证力量来监督朝鲜的履约情况。朝鲜也有了前一次美国“违约”、没有按期建成轻水反应堆、没有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经历，因此对于美国的诚意怀有戒心。这正是朝核问题主要当事方矛盾的症结所在。要解开这个疙瘩，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并不容易，朝美双方还需要从点滴做起，构筑起相互信任的基础，才能在实质性问题有所进展。

在会谈的其他四国中，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最为接近，主张朝鲜半岛要无核化，同时朝鲜的安全也要得到保障；在对朝鲜半岛外交方面，中俄两国在保持同朝鲜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展对韩国外交。韩国反对过分刺激朝鲜，反对武力解决，因为一旦诉诸武力，韩国的灾难首当其冲。韩国首都距离非军事区仅45公里，人口上千万，如果美军攻朝，作为反击，部署在非军事区附近的朝鲜陆军的远程火炮可以直射韩国首都，这意味着朝鲜无需调兵遣将即可突袭韩国，韩国将承担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日本则试图把朝鲜绑架其国民问题作为会谈的一项议题<sup>①</sup>，朝鲜反对日本的做法，并称

---

<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朝鲜特工部门曾经从日本沿海绑架了一些日本人，据说是让他们帮助培训朝鲜特工。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访朝时，金正日承认了此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朝鲜去世，有5人与小泉一道回国探亲，并留在了日本。

如果日本执意这么做就反对日本参加六方会谈。但日本还是一直把此问题同日朝关系正常化挂钩，成为日朝邦交谈判的主要障碍。

历次六方会谈朝美立场比较

轮次	时间	朝鲜立场	美国立场
第1轮	2003年 8月27 -29日	半岛无核化是朝鲜总目标，拥有核武器不是朝的目标	美暗示可灵活变通，朝鲜冻结其核武研制，将对朝经济奖励
第2轮	2004年 2月25 -28日	若美放弃敌对政策，朝将冻结核计划	美方期望会谈能够打破僵局
第3轮	2004年 6月23 -26日	朝愿以“透明方式”放弃核武	朝鲜若三个月内开始解除核设施可换取经援
第4轮	2005年 7月26 日-8月 7日；9 月13- 19日	朝鲜承诺弃核，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方声明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美方确认在朝鲜半岛无核武器，无意攻击入侵朝鲜；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问题
第5轮	2005年 11月9 -11日	朝鲜表示若获得轻水反应堆就分阶段弃核；要求对韩国境内是否存在核武器进行核查、美国停止提供“核保护伞”、禁止核武器在朝鲜半岛通过或停留等	美国要求朝鲜立即弃核，认为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故意放慢速度

在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六方会谈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各方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场所，一个对话的平台。尽管2006年10月9日朝鲜进行了核试爆，引发东北亚局势的新一轮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六方会谈的失败，相反该问题最后还得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如果六方会谈能够成功化解朝鲜半岛核危机，那么它将有助于东北亚其他问题的解决，并可能发展成为促进东北亚稳定的多边合作机制。

### 第二节 美国与东北亚

从地理意义上说，美国并不是一个东北亚国家，但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东北亚的广泛存在使之成为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如果说，美国在冷战时代是把东北亚作为同苏联争霸的前沿，那么冷战结束后则把东北亚看成维护美国安全利益的战略重点地区，东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 一、美国与东北亚的经济联系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出人意料地持续增长，使一度甚嚣尘上的美国“衰落论”不攻自破，改变了美国人的“衰落”心理，也为美国霸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21世纪初美国一国所拥有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美国军事实力在世界上更是首屈一指，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单个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力量。<sup>①</sup>“如果说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世界的话，那么也就没有能够形成

---

<sup>①</sup> 参见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2～546页。

单极世界的了。”<sup>①</sup> 举世无双的美国经济实力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扩张力，在东北亚的经济发展中，美国的影响不可忽视。美国是大多数东北亚国家极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它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在这些国家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普遍很大。日本对美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26%，韩国为23%，中国则高达32%。“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多数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仍将以出口拉动为主，与美国开展贸易往来，特别是美国巨大的市场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sup>②</sup>

东北亚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1992年，该地区的GDP为4.5万亿美元，2004年超过7.5万亿美元，估计到2013年将达到10.7万亿美元，区域内贸易额届时将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伴随着东北亚地缘经济的增长，贸易的发展、技术和资本的转移将加速，这势必会促进区域内各国的相互开放，使双边和多边地缘经济联系加强和一体化进程加速。美国面对这么一个迅速崛起的区域，自然希望能够加强同该地区的经济联系，借东北亚经济腾飞之风，促进美国国内的就业与经济发展。因此，深化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对美国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

在贸易结构上，美国与东北亚区域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区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比较优势。例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仅相当于欧美等先进工业化国家的1/30左右，中国东北三省的工资水平又较大幅度低于东南沿海省市，其工资不足上海的45%，略高于广东和浙江省的50%。美国在战后经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就为中国等东北亚国

---

<sup>①</sup>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2.

<sup>②</sup> 李靖宇、曾祥正：“美国与东北亚关系：利益、政策与影响”，《长白学刊》，1998年第3期。

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了契机。东北亚地区质优价廉的产品,在满足进口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减少了进口国的支出和通货膨胀压力,增进了各国消费者的福利。“1997年以来,随着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每年至少节约数百亿美元的支出。过去十年,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 000多亿美元,仅2004年就节省了近1 000亿美元。”<sup>①</sup>东北亚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技术性产品上。东北亚广阔市场的需求以及美国对东北亚产品的青睐,使得东北亚国家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中日韩成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计算,2004年美国同中日韩三国的贸易额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1.3%,而美国与这三国的贸易逆差则占其外贸总逆差的39.5%。<sup>②</sup>从减少贸易逆差考虑,美国也将更为重视东北亚地区,进一步扩大美国商品对该地区的出口。

在投资领域,东北亚地区对资金的需求旺盛,为美国提供了前景广阔的投资市场。在东北亚各国中,除了日本经济高度发达、资金较为雄厚能够大规模实现对外投资之外,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东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而制成品的当地价格又较高;随着东北亚内需的增加,在东北亚投资,特别是以满足东北亚内需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可以获得比在其他地区投资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sup>③</sup>2004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实现销售约750亿美元,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市场约750亿美元。中国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http://www.gov.cn/zwgc/2005-12/22/content\\_134060.htm](http://www.gov.cn/zwgc/2005-12/22/content_134060.htm)

②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nual, Revision for 2004, JUNE 10, 2005, pp. 18 ~ 20. <http://www.bea.doc.gov/bea/newsrelarchive/2005/trad1305.pdf>

③ 李靖宇、曾祥正:“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 东北亚史

美国商会 2005 年调查显示, 约 70% 的美国公司在华赢利, 约 42% 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其全球的平均利润率。<sup>①</sup> 美国还积极投身于东北亚能源开发, 美国西部诸州对开展与俄远东地区的合作十分踊跃。美国已经参加了萨哈林 1 号油田的建设, 该油田从 2002 年开始采油, 连续开采 35 年, 到 2012 年采油量将达到 2 500 万吨。<sup>②</sup> 2005 年 9 月 2 日, 一艘装载着 6 万吨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抵达美国, 标志着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开始正式进入美国市场。俄罗斯还准备把位于俄北部巴伦支海的什托克曼气田作为未来向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基地。应当看到, 美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投资存在着单向性与非对称性, 从以下两个表格数据的比较来看, 美国对东北亚的投资远远多于东北亚对美国的投资。

2004 年美国与东北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 (单位: 亿美元)

国家	美国的出口	美国的进口	贸易总额	贸易平衡
中国	347.44 (5)	1966.82 (2)	2314.26	-1619.38 (1)
日本	542.43 (3)	1298.05 (4)	1840.48	-755.62 (2)
韩国	264.13 (7)	461.68 (7)	725.81	-197.55 (7)
俄罗斯	29.61 (38)	118.91 (24)	148.52	-89.30 (19)
蒙古	0.28 (165)	2.39 (107)	2.67	-2.11 (79)

说明: 为了增加可比性, 本表数据均采用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 括号中的数据为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排列位次。其中, 在中美贸易中, 美方对转口贸易的统计存在问题, 对华出口额忽略了经香港的转口货物, 进口统计又包括了因转口而产生的增值, 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包括在中国的出口额里, 这两项误差导致美方高估了对华贸易逆差。数据来源: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nual, Revision for 2004*, JUNE 10, 2005, pp. 18 ~ 20.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2005 年 12 月。[http://www.gov.cn/zwgc/2005-12/22/content\\_134060.htm](http://www.gov.cn/zwgc/2005-12/22/content_134060.htm)

② 薛君度、陆南泉主编:《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62 页。

## 第十一章 东北亚区域互动及其前景

1998 - 2004 年美国在东北亚的直接投资额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日本	64.28	106.02	42.95	-47.31	87.11	31.07	106.90
中国	14.97	19.47	18.17	19.12	8.75	14.32	42.28
韩国	6.31	25.57	23.38	12.06	16.81	10.30	37.68
俄罗斯	不详	2.96	-1.71	-4.04	-2.60	3.85	5.54

说明: 本表根据美国商务部有关数据制成,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负数为资金流出。数据来源: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Country and Industry Detail for Capital Outflows*, <http://www.bea.doc.gov/bea/di/usdiacap.htm>

1998 - 2004 年日韩两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数额(单位: 亿美元)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日本	80.24	115.55	78.20	-31.32	60.10	77.52	161.46
韩国	1.10	9.60	4.38	0.24	-2.70	-3.43	10.51

说明: 本表根据美国商务部有关数据制成, 负数为资金流出。数据来源: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 S. : Country and Industry Detail for Capital Inflows*, <http://www.bea.doc.gov/bea/di/fdi21web.htm>

美国与东北亚的经济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由贸易逆差而引发的贸易战, 美国希望东北亚市场能够更为开放, 减少贸易壁垒, 但自己却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际上, 美国与东北亚各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以中美贸易逆差为例, 即有统计数据上的技术问题, 例如 2004 年的逆差数据, 美方是 1 619.38 亿美元, 而中方统计是 803 亿美元, 相差一半。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高新技术出口的限制, 影响了美国对东北亚有关国家的出口; 而且美国还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曾经针对中国的纺织品、日本的钢铁采取进口限制措施。在贸易领域, 双方只有本着协



商互利的原则，避免贸易战，才能实现共赢目标。

### 二、美国在东北亚军事部署及其调整

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是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将美国与古罗马帝国进行比较，认为古罗马帝国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实现对帝国的统治，而美国则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设立军事基地的方法谋求实现对全世界的征服。<sup>①</sup> 美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地区安全形势的需要以及军事技术的演进，先后于1988年、1991年、1993年和1995年进行过四次大规模军事基地调整。美军基地调整主要是基于美国对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做出的新判断。随着俄罗斯力量的势微，美国没有了全球性对手，再加上北约在欧洲的两次成功东扩，更使得美国可以对欧洲的安全局势高枕无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可能的“轻举妄动”、中国的崛起以及台海局势的不明朗，使得东北亚地区“有幸”成为美国海外最为重要的基地群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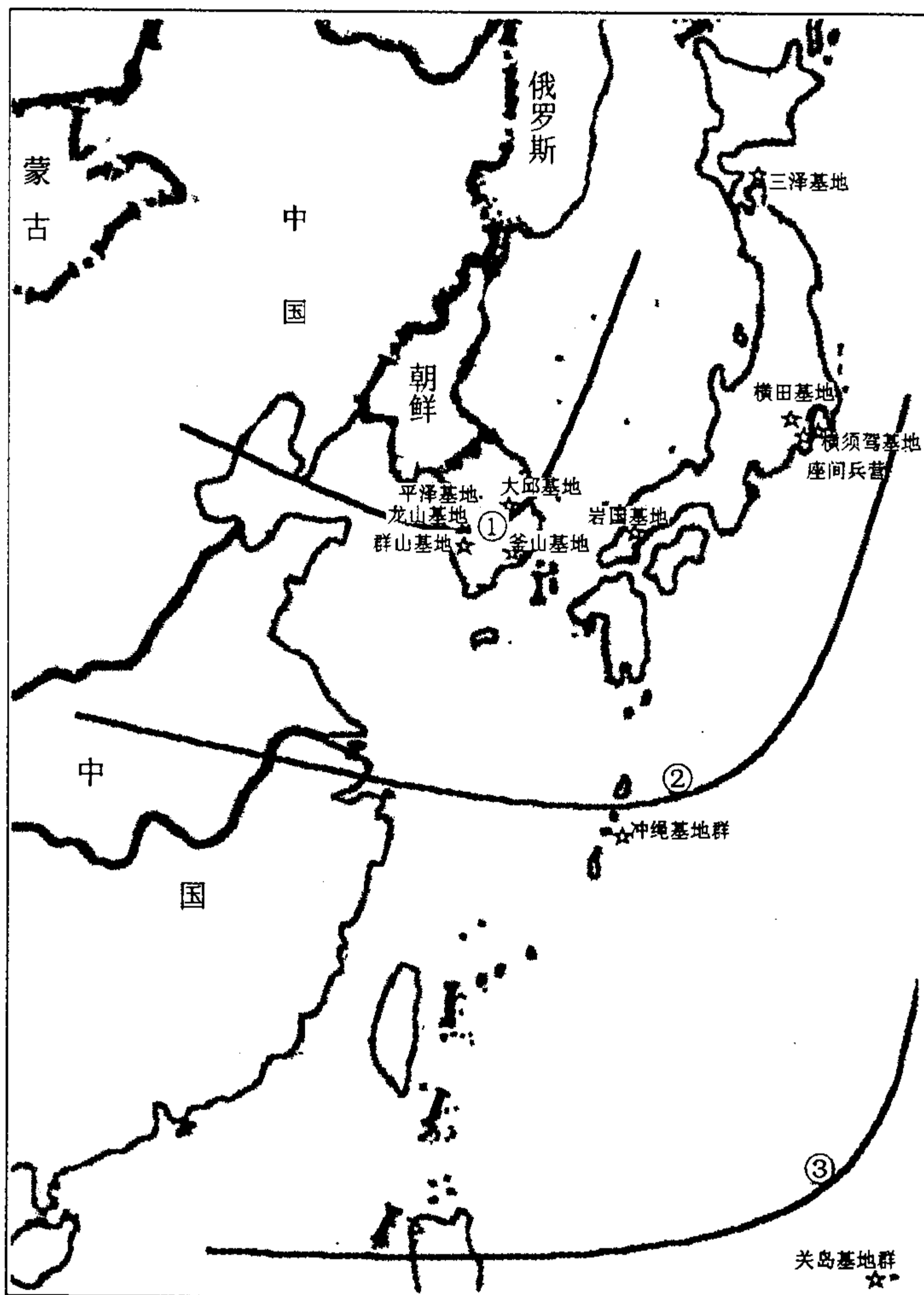
美国对东北亚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尽管该地区经济异常繁荣，形势表面上也是稳定的，但对和平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这些威胁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大幅度增长。”<sup>②</sup> 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威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建构起了三线配置的军事层次体系：第一线，由驻韩美军基地构成；第二线，由驻日美军基地构成；第三线，由美国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基地构成。其中，驻韩美军基地是其三线军事构架的最前沿和关键轴心，后两线依次为前一个层次提供安全保障。

---

<sup>①</sup> 《环球时报》，2005年10月28日，第十版。

<sup>②</sup> [美]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著：《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美国在东北亚主要军事基地分布及三线配置示意图



“9·11”事件后，美国根据新的形势需要，着手对军事部署与军事战略进行调整。五角大楼的战略决策者们认为，美国的威胁主

## 东北亚史

要来自一个“不稳定弧形区”——贯穿加勒比海沿岸、非洲、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和朝鲜。为了能在这些偏远的热点地区迅速出击，伊拉克战争之后，五角大楼决定逐步对海外军事基地的规模和分布格局进行相应调整，开启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外军事部署的调整。2004年8月16日，布什总统宣布，为适应21世纪战争的需要，美国在未来10年内将6~7万人的作战部队以及10万名文职人员和家属从驻欧亚两洲基地撤回本土。这是美国新国家军事战略的具体体现和深化，对全球军事态势以及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的东北亚基地群分布于日本、韩国，这些基地可对宗谷、津轻、对马三海峡形成控制，可应对朝鲜半岛的陆战与西北太平洋的海战，构成“岛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主要海军基地有：日本横须贺（美海军第7舰队司令部驻地）、佐世保海军基地、厚木海军航空基地，韩国镇海海军基地。主要海军陆战队基地有：日本岩国基地、冲绳基地群（普天间机场，巴特勒兵营）。主要空军基地有：日本横田基地、冲绳嘉手纳基地、三泽基地，韩国乌山基地、群山基地。主要陆军基地有：韩国龙山卫戍区、大邱基地、希亚莱兵营，日本座间兵营。在美军第五次基地大调整之前，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驻军数基本维持在7.7万左右，其中日本4万、韩国3.7万，日韩两国的美国驻军数量仅次于德国。

出于抚慰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以及增强美军机动性的考虑，美国着手对驻韩美军及基地进行调整。2003年6月，韩美双方代表在汉城举行韩美同盟未来政策构想第二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已就驻韩美军的重新部署问题达成一致，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把分散在汉江以北的美军基地，通过整合集中到东豆川和议政府一带，大约6000~7000名美军士兵迁出，实施这一计划至少需要三年时间。第二阶段，把汉江以北的美军，主要是第二机械化步兵师转移到汉江以南的新驻地——乌山和平泽。调整后的驻韩

美军基地将由 41 个减少到 23 个，部署将形成“两大中心和三大基地”的格局：两大中心为“乌山、平泽”中心和“大邱、釜山”中心。三大基地是：龙山基地（联合国军司令部、韩美联合司令部等指挥机关）、汉江以北的联合训练中心（美军循环训练场所）、群山美军基地。2004 年，美韩就重新部署以及裁减驻韩美军达成协议，在 2005 年年底前削减 1.25 万驻韩美军，兵力由 3.75 万减至 2.5 万。美国此举的目的首先在于增强美军的战略机动性，远离对方火力杀伤范围，提高驻韩美军的安全系数。其次在于平息韩国人的反美情绪，改善美韩关系。<sup>①</sup>为弥补驻军数量减少，美军又拨款 110 亿美元在韩国部署新型导弹、高速舰艇、攻击型直升机及装甲车，使美军战斗力增强至原来的两倍。此外，美国还在韩国部署了新型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并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部署 39 架 F-117A 型“夜鹰”隐形战斗机。

美国对驻日美军的部署与调整更为引人注目。这次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日本横田的驻日美军司令部移至座间兵营，第 5 航空队司令部移至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将驻美国本土的陆军第 1 军司令部移至日本的座间兵营，专门负责指挥远东地区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日本自卫队航空司令部入驻原属于美军专用的东京横田基地，这被认为是日美战后从未有过的首次“军事连体”，该基地成为第一个日美“连体”的军事指挥站；2005 年 10 月 26 日，日美就转移普天间机场问题达成协议，准备在位于冲绳的一个现有美军基地内新建一座军用机场，取代设在冲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普天间机场；美国将把 7 000 名驻冲绳海军陆战队士兵转移到关岛，这将使得驻冲绳美军的数量从 1.5 万人下降到 8 000 人；美日就在神奈川县美军横须贺基地部署核动力航母的问题达成一致，在现役航母“小鹰”号 2008 年退役后，将以核动力航空

---

<sup>①</sup> 李军：“2004 年的朝鲜半岛形势”，《国际资料信息》，2005 年第 2 期。

母舰作为其接替舰，这将是美国首次在日本部署核动力航母。据韩国媒体透露，美国政府还计划从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个以日本为据点的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把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基地连成一体，互成犄角，形成对东北亚的包围态势。<sup>①</sup>一旦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附近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立即可以调动部署驻扎在日韩的部队介入冲突，同时牵制俄罗斯向南延伸。

在对东北亚地区美军进行调整的同时，美国大力加强了驻关岛的军事力量，美军的战略进攻武器也不断进驻西太平洋地区。关岛俨然成为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实施监控的“战略岛”，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可以在12小时内抵达亚太地区各国的领空，到朝鲜半岛只要5个小时，到中国的台湾仅需3个小时（从美国本土起飞到朝鲜半岛和台湾需要20多个小时），而美军核潜艇从关岛出发，到中国大陆沿海、台湾和菲律宾周边只需两三天。在现代战争分秒必争的今天，美国海空军以关岛为部署基地，可节约大量时间，将使美军在未来战争中掌握较大的主动权。为此，美军已经计划重点建设关岛基地，将它打造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B-52、B-2战略轰炸机、战略核潜艇以及性能非常强大的F/A-22“猛禽”隐形战斗机等先进武器已经部署或者计划部署在关岛，以增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斗力。

总之，美国对东北亚军事部署的调整反映出了美国新的战略思想，那就是现代战争并不依靠大批士兵，而是依靠远距离的空中打击和高新科技武器。通过调整，美军在东北亚的机动性大大增强，达到了遏制中俄，看住朝鲜，操控日韩，进而掌控地区战略主导权的多重目的。

---

<sup>①</sup> 魏岳江：《驻韩美军为何进行二战以来最大规模调整》，[http://www. people.com. cn/GB/junshi/1078/3060889. html](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078/3060889.html)

### 三、美国的东北亚政策

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东北亚的政策尽管在具体内容上互有侧重，但总体原则仍具有延续性。抛开美国对东北亚各国的具体政策，我们可以将冷战后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强化与盟国的关系；防止新兴大国挑战美国的利益，对中俄的牵制加强；推进东北亚地区贸易自由化；“促进”民主与人权，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

第一，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美国的利益遍布全世界，而这种利益很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直接目标，推行防扩散政策就成为美国自然的选择。“9·11”事件后美国对防扩散更为关注，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后果不堪设想。美国政府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主张动用美国所有资源，必要时可“先发制人”，在全球范围内阻止和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的扩散。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防扩散目标主要是朝鲜。第一次朝鲜核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紧张不安，甚至还制定了对核反应堆进行军事打击的5027作战计划。<sup>①</sup> 朝鲜导弹技术的发展也令美国十分担忧。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弹头从日本上空飞过，此后，美日广泛散布“朝鲜导弹威胁论”，并将其作为加强军事合作的直接口实。同时，美国怀疑朝鲜向南亚和中东一些国家出售导弹、设备及相关技术。2002年12月10日，西班牙在美国的授意下，出兵拦截了一艘朝鲜开往也门的运送飞毛腿导弹的货船，用“行动”来证明了美国对朝鲜扩散敏感技术的猜测。在美国看来，朝鲜进行核试爆后，东北亚的防扩散任务更加艰巨。除了朝鲜之外，美国还担心前苏联解

---

<sup>①</sup> [美] 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8页。

体后，俄罗斯可能由于管理不善，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通到黑市。美国还指责中国把核技术以及相关导弹发射部件卖给了伊朗、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国。<sup>①</sup>但是，美国自己却毫无顾忌地在搞扩散，例如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联合日本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等等。

第二，极力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美日、美韩同盟进行调整。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与桥本首相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要对美日军事同盟进行“再定义”，即以日本本土安全为目的的传统的日美安保，在后冷战时代应该扩大为面向“东亚地区安全”，应该为“地区安全”承担共同责任。这无非是为日美双方扩展军事行动、在东亚维持美日所希望看到的地区秩序制造理由。1997年9月，两国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定了美日进行防卫合作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最后完成了对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调整。小布什上台后，更加重视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主张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发挥日本的作用，加强美日同盟，把日本作为“亚洲和平、稳定、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基石”。<sup>②</sup>美韩在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达成新的共识，即作为冷战后东北亚新的安全环境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韩美安全关系将保留它的价值和重要性。2000年朝韩首脑峰会之后，美国也表示即使朝鲜半岛实现统一，驻韩美军仍不会撤出。一个颇值关注的趋向是，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美韩同盟与美日同盟之间的战略协调，力图把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日韩三国联防体制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机制。在美国推动下，从1998年起美日韩三国每年

---

<sup>①</sup> Lawrence E. Grinter, "Northeast Asian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and U. S. Policy", in Tae - Hwan Kwak, Edward A. Olsen (eds.), *The Major Powers of Northeast Asia: Seeking Peace and Securit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 168.

<sup>②</sup> 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2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都举行“联合防卫政策协商会”，表面上看旨在协调和统一三国的对朝政策，实际上则是想通过强化美日韩三边机制来加强对朝鲜施压并排挤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sup>①</sup>

第三，防止新兴大国挑战美国利益，对中俄的防范与牵制加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因战略合作基础的消失而严重倒退，两国关系的定位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到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的“战略竞争对手”，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把中国作为“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无论哪一个提法，都无法掩饰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的矛盾：从“六四”事件后的全面制裁到知识产权纠纷，从人权对抗到指责中国扩散敏感技术，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从轰炸中国大使馆到撞机事件，两国摩擦不断，关系几度恶化。当然中美关系也有合作的一面，例如，1999年11月中美两国达成入世协议，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两国在朝鲜核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等方面也具有共同利益。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从历史经验来看，新兴大国崛起势必冲击现有秩序，<sup>②</sup> 尽管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的战略原则，但这能否为美国所认可并消除其疑虑似乎还是未知数。2000年6月美国防部发表的《2020年中国军力报告》认为，中国是二十年后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挑战的最大潜在对手。为此，美国通过调整军事部署、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限制、强化同盟关系等各种方式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尽管俄罗斯已经日薄西山，但美国对它仍不放心。美国支持格鲁吉亚、乌克

---

① 杨光海：“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态势、趋向及意图”，《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

② 1500年以来的历史表明，所有世界领导者在建立自己主导地位的过程中都对其他霸权力量进行过挑战，荷兰挑战西班牙、英国挑战荷兰、美国挑战英国正是这种大国争霸方式的反应。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84页。



兰、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采取街头革命的方式夺权，并期待着俄罗斯也爆发一场“颜色革命”，还别有用心地炒作“俄罗斯解体论”。2004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报告指出，十年后的俄罗斯将分裂成六至八个国家，将沦为美国、欧盟及日本的经济附庸。2005年12月，美国卡耐基基金会与和平基金会发表联合调查报告，将俄罗斯列入伊拉克等国之外的第三类可能解体的国家。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包括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主要和新兴大国的选择，将是决定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并将影响美国及盟友未来的战略地位和行动自由。”<sup>①</sup>

第四，推进东北亚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排序中，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位列美国本土防御、欧亚大陆国间和平以及石油通道安全之后，也属重要国家利益。<sup>②</sup> 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贸易组织中，也是极力倡导自由贸易。同时，美国还依仗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推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通过“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对它认定的违背自由贸易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如前所述，美国将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要求东北亚国家开放市场，扩大进口美国商品。东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对国内的产业进行保护，由此引发了美国的不满，其中美日贸易争端较为突出。“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越来越多，技术层次越来越高，经济领域越来越宽泛。美国对日本的要求从增加进口到开放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sup>③</sup> 美国在向个别国家施压的同时，还极

---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http://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② [美] 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③ 于永达：“美日贸易摩擦及各自的对策”，《当代亚太》，1999年第10期。

力主张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把东北亚国家纳入开放的亚太多边经贸体系之中，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通过区域内的自由贸易规则，对东北亚有关国家施加压力，促其进一步开放市场，一揽子解决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摩擦问题。

第五，“促进”民主与人权，以压促变，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美国每年都要发表批评他国人权状况的报告，却只字不提自身制造的和存在的人权问题，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对朝鲜、伊朗等被美国认为是“暴政前哨”的国家提出指责。同时报告还极力突出美国为“促进”这些地区人权状况所做的努力。2004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朝鲜人权法案》，不但规定将设立朝鲜人权专员职位，还将每年拨出2400万美元用于“改善朝鲜人权状况”。美国除了指责自己认定存在人权“问题”的东北亚国家之外，还对“民主样板”进行了“奖赏”。美国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赞赏蒙古的民主道路，将它奉为“亚洲民主的楷模”而大力援助。从1994年起，美国每年对蒙古的无偿援助包括物资约12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蒙古的议会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1996年开始，美国的“开放社会—索罗斯基金”平均每年在蒙投资3000万美元，主要用于蒙古的文化教育。2005年布什总统对蒙古的短暂访问，更被视为是对蒙古“民主价值观”的肯定。

综上所述，美国与东北亚地区的密切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这就决定了未来东北亚秩序的建构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

### 第三节 迈向区域化的东北亚

在雅尔塔体制下，东北亚各国依附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区域合作无从谈起。冷战的结束为东北亚区域合作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图们江开发计划”拉开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序幕并取得一定进展，但覆盖全区域的经济合作潜力则有待挖掘。另一方面，东北亚地区存在的诸多领土领海争端，不时撞击着东北亚的区域合作梦想。东北亚走向区域化的道路并不平坦，要想达到欧洲或者北美的区域化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东北亚地区可开发资源十分丰富，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东北亚各国都提出过许多地方性和次区域性经济合作设想，如“环日本海（东海）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俄罗斯与中国边境贸易合作、中朝边境经贸合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等。有的设想已经实现，有的还在酝酿。其中，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牵头的“图们江开发计划”成效最为显著，“这是由图们江地区的区位优势及东北亚各国在此具有共同利益等因素决定的”。<sup>①</sup>

图们江地区位于东北亚核心地带，在区域合作存在较大困难、合作机制缺失的条件下，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1991年10月，UNDP公布了由其协调的开发图们江流域计划，提出在二十年时间内，筹资300亿美元，把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的图们江三角洲地区建成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开发区，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鹿特丹或者第二个香港。UNDP为此与参加国协调，积极推动该地区国际经济合作进程。1992-1996年间，UNDP直接拨款350万美元用于前期的可行性研究，揭开了图们江开发计划的序幕。在这四年中，UNDP先后召开了6次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管理委员会（PMG）会议和多次有关国家政府间的会议。

---

<sup>①</sup> 陆建人：“东北亚经济合作：历史回顾与当前进展”，《东北亚研究》，2005年第1期。

图们江开发项目的启动，激发了东北亚各国的热情，尤其是与图们江毗邻的各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界的热情。

为落实 UNDP 开发计划，有关各国随即做了积极回应。1992 年 5 月，中国政府批准把位于黑龙江和吉林省的黑河、满洲里、绥芬河、珲春作为边境开放城市，并在国务院内设立了图们江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制定中国参加图们江开发项目上的具体政策；同年 12 月，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了《图们江下游暨珲春地区综合开发规划大纲》，并陆续投资 30 亿元进行铁路、公路及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朝鲜于 1991 年 12 月在罗津—先锋地区建立自由经济贸易区，面积达 746 平方公里，升格为中央直辖市，并通过元汀里—圈河桥同我国珲春联结起来；积极扩建清津港、罗津港，开辟了内连中国，外通日、韩等国港口的联运线。俄罗斯于 1992 年 1 月宣布海参崴市为开放城市，并制定“大海参崴计划”，将海参崴、纳霍德卡、东方港、扎鲁特港确定为自由港；1993 年，俄罗斯还建立了哈桑—图们江自由经济区。

在 UNDP 的协调下，图们江开发项目走向具体运作。1995 年 12 月，中、俄、朝、韩、蒙五国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中、俄、朝三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这两个协定和一个备忘录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工程正式启动。UNDP 和其他国家机构也继续给予资金支持。1997—1999 年，UNDP 提供 360 万美元用于图们江开发项目；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一些北欧国家和韩国政府等也捐款 320 万美元，作为配套资金用于这一期间的项目实施。另外，全球环境保护基金也同意提供 496 万美元用于图们江流域开发的环境保护。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中、俄、朝等国积极推进图们江流域开发，在基础设施和政策法规的制定等硬、软环境建设上均取得了显著成绩。除了各自自主开发外，还出现了

合作各方联合开发的局面，使图们江地区的交通、航运和港口建设出现了崭新的面貌。<sup>①</sup>

2005年7月24日，UNDP宣布，为了更有力地促进图们江区域内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该机构将扩大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的实施范围，使其再扩大到包括韩国的部分地区、中国的东北三省和俄罗斯的两个地区。9月2日，东北亚五国共同签署了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将1995年的协议延长了十年。

除了图们江流域开发外，东北亚各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也值得关注。随着东北亚各国间关系的普遍缓和，各国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地区合作。1993年，日本北九州市带头组织了“东亚环黄海区域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参加城市包括日本的北九州、下关、福冈；韩国的釜山、仁川、蔚山及中国的大连、青岛、天津、烟台等共十个城市，会议主要讨论环黄海地区的经济合作问题。1994年，中国吉林省、日本鸟取县、韩国江原道、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在韩国江原道发起成立了“环日本海地方政府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商讨区域合作与发展问题，成为讨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主要机制。2000年蒙古中央省也加入其中，该会议涵盖了除朝鲜外所有东北亚国家的地方政府。2005年9月，首届东北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中国长春举行，为东北亚各国的经贸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地方政府跨国交流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合作，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政府成为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地方政府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其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仍然是次要的”，<sup>②</sup>地方本身存在着诸多的局限性，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仍然需要各国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

---

<sup>①</sup> 参见陆建人：“东北亚经济合作：历史回顾与当前进展”，《东北亚研究》，2005年第1期。

<sup>②</sup> 陈志敏：《国际关系的次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与东北亚合作》，陈玉刚、袁建华主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方面,东北亚各国却是举步维艰。除了在 APEC 与“10+3”框架下的相关合作外,东北亚地区至今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白地带”。东北亚地区仅形成了若干个国际性、地区性推进经济合作的组织和机构,如:UNDP 图们江秘书处,东北亚经济论坛、东北亚经济会议组织委员会等。这些组织为推动区域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为成立区域性合作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总的说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仍缺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区域合作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更缺乏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有效的经济合作平台。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这种合作,应成立一个具有机制性的区域合作组织”。<sup>①</sup> 在该地区,尽管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韩国总统金大中就已提出构筑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而数十年来以中日韩三国为主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之迅速也引起了全球瞩目。但中日韩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却十分有限,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虽谈判经年,但至今未成正果。中日韩三国间地区内贸易额占它们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 19.3%,而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内贸易额占其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63% 和 54.1%。可见,东北亚区域内贸易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的确,制约区域经济合作的因素有许多,比如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定、日本对侵略历史的不负责任态度、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异、领海领土争端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差异等。但是,推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扩大民间交往,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应该有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从目前的国际趋势来看,经济发展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点,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经济利益是政府与非政府决策中更持久的主导因素,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面对欧盟和北美区域一

---

<sup>①</sup> 王胜今、王凤玲:“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想”,《东北亚论坛》,2003 年第 1 期。

体化迅猛发展的态势，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确实已到必须痛下决心迎头赶上全球步伐的时候了。

### 二、东北亚领土领海主权争端

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亚地区存在多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除了蒙古外，各国均牵涉其中。例如，日俄北方四岛、韩日独岛（竹岛）、中日钓鱼岛以及东海、黄海划界等问题。争端之所以如此复杂与棘手，一方面在于争端海域附近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各国的民众情绪，这就使得各国政府在解决争端问题时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

#### 1. 韩日独岛（竹岛）主权归属争端

“独岛/竹岛”是一座位于日本海（韩国称之为东海）中央的火山岛。它由东、西两个小岛和 34 块岩礁组成，总面积为 18.6 平方公里，两岛之间有一条 150 米宽、330 米长的水道相隔，该岛距韩国郁陵岛只有约 90 公里，而其距离日本最近的隐岐诸岛约为 160 公里。该岛领土主权之争是韩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根据韩国提供的资料，早在新罗王朝（公元 500 年）就有独岛的记载。朝鲜王朝成宗皇帝时（公元 1471 年至 1481 年），独岛叫做芋山岛，属于郁陵岛群管辖。1900 年朝鲜末代国君高宗颁布第 41 号法令，宣布郁陵岛等归江原道三陟县管辖。当时三陟县将独岛命名为石岛，后来又改名为独岛。而日本方面的记载也说，在宽文皇帝 7 年（公元 1667 年），日本渔民发现了这两个岛屿，编入了日本岛根县，称为“松岛”。日本自 1905 年入侵朝鲜半岛以后，即宣告对该岛拥有自主权。1905 年 1 月 28 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过去的“松岛”改称为“竹岛”，在行政上隶属于岛根县管辖。1946 年 1 月 29 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发布命令，把独岛移送给了驻韩美军政府管辖。1948 年 8 月 15 日随着大韩民国政府的建立，独岛与其他领土主权一同自动地归于大韩民国政府。日本政府对此并不承认。

1953年5月,日本趁朝鲜战争仍在酣战之际,曾派兵一度占领了该岛,并在岛上建立了领土标志碑。居住在郁陵岛上的韩国居民得此消息后,立即组成“独岛义勇守备队”。1953年7月12日,23岁的洪淳七率领韩国义勇守备队开赴独岛,将日本军人赶走。韩国获得了独岛的实际控制权。1956年李承晚政府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洪淳七结束了神圣的“守土护国大业”。自1957年开始韩国在独岛修建永久性建筑物,1981年底,韩国海军人员还在岛上修建了守岛工事。鉴此情况日本不能置若罔闻,自1954年以来,每年都向韩国政府递交外交抗议文件,共计五十多次,指出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韩国必须立即撤出该岛。而韩国政府则一再声明,独岛是韩国领土。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谁也不想领土问题上让步。

近年来,两国在该岛主权问题上的争端不断升级,多次酿成严重外交冲突。2004年初,韩国不顾日本的一再反对,按原定计划于1月16日发行了一套以独岛自然风光为背景的彩色纪念邮票。“独岛邮票”在韩国十分热销,但却遭到日本的强烈抗议,很快日本就“以牙还牙”了。2005年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2月22日定为“竹岛日”的条例,给日韩领土争端火上浇油。条例的通过引起日韩民众强烈反应,日本右翼极端分子对之大加吹捧,韩国方面则爆发大规模抗议、甚至出现断指抗议事件。领土争端给双边关系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 2. 日俄北方四岛领土争端

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已经成为影响日俄关系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所谓北方四岛,是指俄国千岛群岛以南与日本北海道东北部之间的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总面积5036平方公里。其中择捉岛面积最大,有海湾十余处,可停泊大型舰船;齿舞岛最小,上面只有俄罗斯边防军驻扎。据历史记载,日本最迟在17世纪已经发现并开始经营千岛群岛。18世纪初沙俄把侵略势力延伸到千岛群岛,最远到达择捉岛北面的得抚岛。1855年,日俄签订《日俄友好



条约》，以法律形式把得抚岛和择捉岛之间作为两国边界，得抚岛以北归俄国，择捉岛以南属日本。1875年，日俄签署《萨哈林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规定俄国把得抚岛以北的千岛群岛交给日本，作为交换，日本把萨哈林岛（库页岛）让给俄国。从此，整个千岛群岛归日本所有，而库页岛则归俄国所有。1904—1905年爆发日俄战争，俄国以失败告终，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库页岛南部（北纬50度以南）割让给日本。日俄仇恨的种子就此播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给俄国提供了复仇的机会，苏联参战后，不仅占领了包括择捉岛和国后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而且占领了北海道附属的色丹岛和齿舞群岛。1946年2月，苏联宣布将北方四岛并入其版图。1956年10月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在《日苏共同宣言》中指出，同意在两国缔结和平条约后把齿舞、色丹两岛交还日本，而国后和择捉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继续讨论。但由于1960年日本与美国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苏联当即宣布“只有从日本领土上撤走全部外国军队和签订和约，才能交还齿舞、色丹诸岛”。这种要求在两极对峙时期根本无法实现，从而使北方四岛问题在冷战时代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苏联解体后，日本利用俄罗斯经济困难，急需经济援助，于1993年与俄签署了表示尽快缔结和平条约和解决领土问题的《东京宣言》。俄罗斯作了让步，承认北方四岛是一个整体问题，称可以协商整体解决方案。但此后俄方坚持先缔结和平条约再解决领土问题的立场，而且只考虑归还齿舞、色丹两岛；日本的态度则是，签署和平条约之前，俄方必须将四岛一并归还日本。1956年的《日苏共同宣言》与1993年的《东京宣言》分别成为俄罗斯和日本各自领土主张的依据。双方在此问题上各执一词，立场迥异，两国围绕北方四岛的争端不断，致使两国缔结和平条约的计划变得遥遥无期。2004年9月2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乘坐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从北海道出发，用高倍望远镜从海上视察北方四岛，以此来宣示日本

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小泉的巡视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抗议。

### 3. 中日钓鱼岛争端

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 92 海里的东海海域，在地质结构上隶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钓鱼岛列岛总面积约 6.3 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 4.3 平方公里。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在岛上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明永乐年间（公元 1403 至 1424 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列岛的记载，这比日本人声称的琉球人古贺辰四郎 1884 年发现钓鱼岛要早四百多年。明朝以后，中国许多历史文献对这些岛屿都有记载。在日本 1783 年和 1785 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95 年 4 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以后日本才有了“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列岛）之说。1951 年 9 月，美国背着二战的战胜国中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约》第二条虽然写明日本放弃其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与要求，但第三条却错误地把日本所窃取的钓鱼岛等岛屿归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内。中国总理周恩来当时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和约》。

1968 年钓鱼岛周围被勘探证实埋藏有大量石油资源，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凸现出来。日本将岛上原有的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八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1970 年 9 月，日本琉球政府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1972 年 6 月 17 日，美国向日本正式移交琉球的行政主权，钓鱼岛也一并交给了日本。中国政府当时就此提出过抗议。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留待以后

条件成熟时解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多次在钓鱼岛问题上兴风作浪。1990年10月，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灯塔。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北小岛设置一座灯塔，企图使灯塔列于海图以便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又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阳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并命令日本海上保安厅随时准备用武力排除“干扰”。更为严重的是，中日争端的背后出现了美国的身影。“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不满足于已在冲绳驻军，还准备把军事力量延伸到钓鱼岛，既干扰中国维护钓鱼岛的主权，又构建其西太平洋军事‘岛屿锁链’更为紧密的一环，对台湾海峡施压。”<sup>①</sup>

面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的行径，中国政府和民众纷纷做出反应。中国政府一直对日本侵犯钓鱼岛主权的言行进行强烈抗议，历来主张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海内外民间的保钓运动持续不断。早在1970年4月10-12日，全美留学生及华人在华盛顿举行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岛示威大游行。此后全球各种形式的华人保钓组织在高潮时曾达200余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日本在钓鱼岛的活动愈演愈烈，中国海峡两岸和香港等地都掀起了民间保钓运动。2003年12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论坛在厦门召开，并通过了《保钓宣言》。2004年3月24日七名中国公民登上了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却遭到日本方面的非法扣留，在被非法扣留期间还受到非人道待遇。

钓鱼岛问题牵扯到数百年的历史、资源开发以及中、日两个民族的恩怨情仇，中日均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该岛屿被日本事

---

<sup>①</sup> 章晓：《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http://www. people. com. cn/GB/paper\\_2836/11730/1057574. html](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_2836/11730/1057574.html).

实占领的现实十分不利于中国，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争端时有发生，钓鱼岛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难解之结。

### 4. 东海、黄海海域划界争端

东海是一片由中、日、韩三国领土环绕形成的半封闭海域。东海大陆架位于三国之间，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在东海海域，由于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中日两国的管辖海域出现了重叠。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为200海里，不足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具体到中日间的东海海域，其大陆架最大宽度为325海里，最小宽度167海里，一般宽度为216海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两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部分重叠。再加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海洋划界原则过于笼统，且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中日两国分别提出了有利于己方的划界原则和主张。<sup>①</sup>在东海大陆架的东西两部分之间有一个冲绳海槽区，按“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中日两国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分界线应该是在冲绳海槽一带。这一划界原则对日本不利，于是，日本就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来划分中日两国之间的东海大陆架。依据日本的“中间线”划分法与依据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面积相差约30万平方公里。此外，中韩两国也存在东海划界争端。中国主张按自然延伸原则与其划界，而韩国则主张按中间线划分东海大陆架，两线之间便形成了1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

中国与韩国、朝鲜之间还存在对黄海大陆架的争议。黄海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为浅海大陆架。中国与韩国为相向共架国，其间有靠近朝鲜半岛一边、两侧底土不同的中国古黄河河道相区分，所以中国主张按自然延伸原则划界，即按古黄河河道与韩国划分黄海大陆架。但韩国主张按中间线原则划界。这样，中韩双方便产生了6

---

<sup>①</sup> 朱凤岚：“中日东海争端及其解决的前景”，《当代亚太》，2005年第7期。

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在大陆架划分问题上，韩国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它在处理与日本的海底底土时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而在处理与中国的海底底土问题时就“忘记”了这一原则。韩国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中国大陆边缘自然延伸的大陆架延伸到距朝鲜半岛较近的地方，以大陆自然延伸原则划分大陆架对其不利。另外，中国与朝鲜在黄海大陆架是相邻共架国，双方在大陆架的划分上也存在分歧。中国主张按中间线划界，朝鲜则主张以纬度等分线划界。这样，中朝便在黄海海域产生了3 000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区。

东海、黄海海域存在的划界争端还有待国际法的完善以及相关国家的协商，但由于在相关海域大陆架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水产、石油、天然气以及稀有矿产资源，韩日无视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争先恐后地占有资源。2004年7月，韩国还联合日本，在中国东海中方一侧的大陆架进行石油钻探，遭到中国的抗议。海域争端背后的能源争夺意味变得更为浓厚。

### 三、东北亚区域化：问题与前景

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着区域一体化持续深入地发展。欧盟的成立及其东扩的成功实现，使之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和地缘格局的重要力量。2002年7月，非洲联盟在原来的非统组织基础上宣告成立，标志着非洲在实现政治、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旦建成，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而此前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东盟的区域化进程也进展迅速，继1999年东盟扩大到10国，大东盟的梦想实现之后，在2003年的巴厘岛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然而，在其他地区合作组织不断巩固和加紧扩张之时，以地理联系为纽带的地区一体化或区域合

作，在东北亚地区还是一块空白。<sup>①</sup>也许将来不排除出现超越东北亚区域整合直接进入东亚一体化的情况出现，但不可想象的是，一个尖锐对立的东北亚怎么能够保证东亚一体化的实现。东北亚的区域合作已经展开，甚至有人提出了建构东北亚共同体的构想，但东北亚在走向区域化的征程中还需要战胜重重困难与阻力。

第一，主导权问题。任何一个地区的区域化都需要强大的核心力量来推动。欧盟框架下的区域一体化以法德联盟为主导，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即将出现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区域一体化以美国为主导。而法德联盟对于欧洲、美国对于北美和美洲，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所有重要层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当重任。在东北亚地区，尽管国家不多，但情况却要复杂一些。中日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强大过，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近代以来日本第一次不得不与一个强大的邻国相处，这对长期以来以“亚洲优等生”自居的日本来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利益上都是一个挑战。日本原以为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充当东北亚乃至东亚的“领头雁”，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坦诚的言行很难取信于周边国家，这就使别国对日本任何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倡议产生警惕，不免令人想起“大东亚共荣圈”的噩梦。也有人提出在中日两强争执不下之际，可以让东盟牵线搭桥，为增加地区信任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与中国、日本相比，东盟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等所有层面都有很大差距，明显处于劣势，很难真正担当起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任。而且东盟自身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分身乏术。从长远来看，东北亚的区域化需要中日两个大国的主动参与，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或者相互争夺主导权，东北亚一体化进程都将受阻。“为此，中日两国都要摒弃‘主导意识’、培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中日关

---

<sup>①</sup> 张宇燕：《评泽井安勇“‘东北亚大设想’研究的新进展”》，《当代亚太》，2004年第12期。

系的新基础。<sup>①</sup>

第二，途径问题。迄今为止，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东北亚各国政府还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构想或计划。受中日韩政府的授权，2000年11月，中日韩有关研究机构签署合作研究协议，就此问题展开研究。东北亚区域化究竟应该从哪个领域着手，应该怎么推进，各国学者纷纷建言献策。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提出了“东北亚大设想”，主张用二十年时间来实现建立包括中、日、朝、韩、蒙、俄六国的“东北亚共同体”，再用十年时间来实施具体的项目计划，从而深化这些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sup>②</sup>至于应该是从经济领域开始，还是从文化领域或者其他领域着手，大家也是见仁见智。上面提到的“东北亚大设想”的思路是以能源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出发点。<sup>③</sup>能源在东北亚地区确实是一个合作的突破口，中日韩对能源的需求量都很大，而俄罗斯恰好是能源输出国，如果有关各方能够在能源领域变竞争为合作，进而培养信任感，将有力推动地区合作。有学者主张，东北亚共同体与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可以同时推进，鉴于建立所有东北亚国家参加的经济共同体的条件较难成熟，中日韩三国必须先行一步，尽快建立中日韩经济共同体，可以借鉴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成立“中日韩钢铁共同体”，以局部促进全面的经济一体化。<sup>④</sup>还有的学者主张推动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欧洲统一运动之父”莫内曾经说过，如果重新开始欧洲一体化运动，将从文化开始。韩国学者罗钟一认为，形成东北亚地区政治共同体的前景虽然有些悲观，但至少可以努力在这一地区

---

① 包霞琴：《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陈玉刚、袁建华主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② 《盐谷隆英：构建东北亚共同体》，[http://www. people. com. cn/GB/shizheng/1026/2808425. html](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808425.html)

③ [日] 泽井安勇：“‘东北亚大设想’研究的新进展”，《当代亚太》，2004年第12期。

④ 陆建人：“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当代亚太》，2005年第6期。

建构“文化共同体”。<sup>①</sup> 上述中日韩学者基本上是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教训出发，为东北亚的区域一体化制定路线图，但应当看到，东北亚的现实情形与欧洲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时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亚需要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三，东北亚认同感的形成问题。“认同感是指不同国家和民族彼此接纳、理解和信任，对于共同利益有着相对一致的认识和追求，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相对一致的行动。”<sup>②</sup> 尽管东北亚各国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仍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并深受儒教文化圈影响，这应当成为构建东北亚认同感的文化基础。同时，随着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东北亚国家进行合作，共图发展的思想开始萌生。尽管大家提出来的合作构想不尽相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已经达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这是东北亚认同感形成的经济基础。至于政治基础，东北亚还欠缺。该地区各国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差异，但制度不同的国家同样能够走向合作，东盟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最为重要的是东北亚地区需要取得彻底的历史和解，建构政治互信，日本与中韩的和解、朝韩的和解、朝鲜与日本的和解都有待解决。尽管问题成堆，但东北亚各国完全可以从点滴做起，从构建民众间的认同意识抓起，辅之以政府间的互动，东北亚区域认同的形成是有可能的。

第四，外来因素。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始终对亚太地区任何形式的地区合作保持高度警惕，担心出现一个排斥美国的地区集团，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东亚有关国家提出的多种合作设想，如马来西亚前总理

---

① [韩] 罗钟一：《东北亚共同体的文化视角》，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② 郭洁敏：《论东亚认同感形成的条件与基础》，蔡建国主编：《21世纪的东亚：机遇、挑战与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圈构想”、日本政府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等，都因屈服于美国的强大压力而被迫流产。美国对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框架下的东亚合作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但其态度并不明朗。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亚非但区域内没能形成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却都分别对区域外大国美国的依赖性较强，日韩两国与美国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朝鲜要突破外交禁锢绕不开美国，俄罗斯也在积极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蒙古国更是把美国当作“第三邻国”。鉴于美国在全球、亚太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与东北亚地区的密切关系，东北亚各国在区域化乃至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而不能笼统地判定美国支持或者反对东北亚的地区整合。对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美国在东亚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客观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按区域合作的一般规律办事，加强域内各国的合作，同时也要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不排斥美国和其它域外国家，注重与它们加强对话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不断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汇合点。”<sup>①</sup>

总之，经过冷战后十几年的发展，东北亚地区正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安全形势受冷战遗产影响，错综复杂，但部分安全对话协商机制的启动已显端倪；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总体滞后，但民间经贸往来日益活跃；地区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仍显薄弱，但各国官方与民间正进行共同探讨和推动。无论如何，全面推动东北亚合作、形成以合作为基调的新地区秩序已是大势所趋。只要东北亚各国政府与民众通力合作、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尽早实现历史和解，东北亚共同体将不再是奢望。

---

<sup>①</sup> 王毅：“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区域合作”，《人民日报》，2004年4月30日，第三版。

## 大事年表

约 180 万年前 中国山西西侯度一带出现古人类。

60 - 40 万年前 朝鲜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一带出现古人类。

40 - 30 万年前 中国辽宁本溪庙后山一带出现古人类。

30 - 21 万年前 辽宁营口金牛山一带出现古人类。

约 4 万年前 一支古人通过白令海峡一带迁往美洲，其后裔发展成为美洲的印第安人。

3 - 2 万年前 日本岩宿一带出现古人类。岩宿遗址长期被认为标志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开始。

6000 年前 中国辽西地区和辽河下游已出现农业。

5000 年前 以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代的人群，可能已开始了向国家的演进。

约公元前 2070 年 夏王朝建立。此后不久，东北亚的夷人开始了向中原地区的第一次迁徙。

约公元前 1600 年 发源于东北亚西南部的商人最终取代夏人，建立商王朝。商人南迁是东北亚夷人向中原地区的第二次迁徙。

公元前 12 世纪下半叶 东北亚的夷人开始了向中原地区的第三次迁徙。

公元前 1046 年

周武王灭商纣王。箕子率殷民 5000 人迁往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

此后不久，西周分封诸侯，燕国建立，其势力开始向东北亚西南部渗透。

## 东北亚史

公元前 1044 年 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的箕子赴管地朝见周武王。

公元前 11 世纪末 生活在长白山以北的肃慎族向西周朝贡。

公元前 9 - 8 世纪 生活在蒙古草原的貊系民族东迁进入东北亚地区，并开始与当地土著民族秽系民族融合形成秽貊族系。

公元前 771 年 犬戎攻破镐京，周平王东迁，标志着西周结束、春秋时代开始。

公元前 551 年 孔子出生。

公元前 475 年 中国进入战国时代。

约公元前 300 年 燕国击败东胡和箕氏朝鲜，占领东北亚南部地区，建立辽东、辽西、右北平等三郡加以管理，燕国的势力东达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

公元前 226 年 秦军攻占燕国首都蓟城，燕王喜退保辽东。

公元前 222 年 秦军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东北亚南部地区被纳入秦的统治之下。秦王朝的势力达到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大同江以南的箕氏朝鲜主动表示臣服。

公元前 221 年 秦统一中国。

公元前 3 世纪末 匈奴帝国形成，并开始统一蒙古草原各游牧部落。

公元前 206 年 西汉建立。东北亚南部地区隶属于西汉。

公元前 194 年 燕人卫满依靠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的末代君主准，成为统治者，史称卫氏朝鲜。箕淮南下三韩地区建立了韩国。

公元前 133 年 汉王朝开始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

公元前 108 年 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中国在东北亚的郡县控制区达到极盛。

约公元前 2 世纪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公元前 82 年 汉昭帝将四郡并省为乐浪、玄菟两郡。乐浪、玄

菟此后长期成为中国控制东北亚地区的主要机构。

公元前 59 年 夫余族东迁，进入东北亚东部地区。

公元前 53 年 呼韩邪单于率部降汉，蒙古草原开始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公元前 37 年 夫余人的一支在朱蒙领导下进入浑江流域，建立了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县的高句丽国。

公元前 18 年 高句丽人的一支南下朝鲜半岛，建立了三韩 78 国之一的百济国。在公元 3 世纪以后，百济步入成熟国家，吞并三韩各部，成为朝鲜半岛上的强大国家之一。

25 年 东汉建立。

57 年 倭奴国遣使东汉。光武帝册封倭奴国的统治者为“汉倭奴国王”。这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中日之间的正式交往。

120 年 夫余国嗣子尉仇台赴东汉朝贡。

189 年 公孙度开始割据辽东。

220 年 中国进入三国时代。

曹魏遣司马懿灭公孙氏政权，将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北部纳入曹魏政权的统治。

邪马台女王卑弥呼遣使中国，魏明帝赐卑弥呼“亲魏倭王”印。

244 年 曹魏名将毌丘俭征高句丽。

245 年 高句丽出兵进攻新罗，开始了与三韩民族建立的新罗、百济的长期角逐。

280 年 西晋统一中国。

284 年 鲜卑人慕容廆于辽西建立前燕。

285 年 百济人王仁将《论语》、《千字文》传入日本，日本开始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方式。

慕容廆攻破夫余国都，夫余从此衰落。

316 年 西晋灭亡，东晋建立，中国进入十六国分裂时期。

## 东北亚史

- 341年 前燕讨伐高句丽，攻克其首都丸都城。
- 370年 前秦灭前燕。
- 372年 佛教传入高句丽。高句丽始立太学。
- 373年 高句丽始颁律令。
- 377年 新罗奈勿尼师令派使臣卫头随高句丽使臣向前秦朝贡，这是新罗第一次向中国派出朝贡使臣。
- 384年 慕容垂建立后燕。
- 5世纪初 高句丽攻占原乐浪、玄菟的辖区。
- 407年 后燕灭亡，北燕建立。
- 413年 倭王遣使东晋，从此不断遣使向中国朝贡。
- 420年 东晋灭亡，南朝宋建立，中国进入南北朝时代。
- 427年 高句丽迁都平壤，从此更多地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
- 436年 北魏灭北燕。
- 439年 北魏统一中国黄河流域。
- 450年 新罗军队袭杀高句丽边境将领，新罗与高句丽关系破裂。
- 454年 高句丽派兵侵入新罗北部边境。
- 468年 高句丽攻取新罗悉直州城。面对高句丽南下的压力，新罗开始与百济结盟对付高句丽。
- 494年 夫余国灭亡，其故地为高句丽与靺鞨诸部所分。
- 554年 新罗与百济在管山城一带展开激战。百济圣王战死，百济部队损失近三万人。从此，新罗、百济由联合对抗高句丽转为相互厮杀。
- 581年 隋朝建立。
- 589年 隋朝统一中国。
- 607年 日本小野妹子出使隋朝。
- 608年 小野妹子回国，隋使裴世清随行出使日本。
- 612年 隋炀帝第一次讨伐高句丽。

- 613年 隋炀帝第二次讨伐高句丽。
- 614年 隋炀帝第三次讨伐高句丽。
- 618年 唐朝建立。
- 630年 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此后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9次，其中有13次抵达中国。
- 645年 唐太宗征高句丽。
- 646年 日本开始“大化革新”。
- 648年 唐设松漠都督府管理契丹人、饶乐都督府管理奚人。
- 660年 唐灭百济，设熊津、马韩等5都督府管理百济故地。
- 663年 唐与救援百济的日本海军于白村江激战，日本大败，全军覆没。日本开始较少过问东北亚事务。
- 唐以新罗所辖地域为鸡林州都督府，册封新罗文武王为鸡林州大都督。
- 668年 唐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管理高句丽故地。迁高句丽族20余万人入中原。
- 669年 唐迁高句丽族38200户入中原。
- 698年 契丹人发动反唐叛乱。
- 大祚荣自营州出逃，率靺鞨诸部建立政权。
- 713年 唐王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祚荣改国号为渤海。
- 726年 唐于黑水靺鞨居住区设黑水州都督府。
- 727年 渤海遣高齐德等8人出使日本。这是渤海与日本首次通使。
- 735年 唐玄宗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土地赐予新罗，唐与新罗以大同江为界。
- 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
- 907年 唐朝灭亡。由此开始，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 916年 中国边疆地区的契丹人崛起，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称

## 东北亚史

帝，辽朝建立。

918年 王建被部将拥戴为王，定国号高丽。

926年 契丹灭渤海，其他部落相继投附契丹，随后中国东北地区实现了统一。

935年 高丽灭新罗。

960年 宋朝建立，史称北宋。五代十国结束。

967年 藤原实赖为摄政和关白，日本摄关政治获得发展。

1069年 王安石变法。

1086年 日本白河上皇实行院政，摄关时代衰落。

1115年 中国边疆地区的女真人崛起，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

金灭北宋。

宋朝重建，迁都杭州，史称南宋。

1130年 朱熹出生。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对日本、朝鲜产生了重要影响。

1192年 日本镰仓幕府建立。

1196年 高丽崔氏武人政权建立，是为崔氏幕府政治时代的开端。

1206年 中国边疆地区的蒙古人崛起，建立蒙古汗国。

蒙古灭金。

1258年 崔氏幕府亡，高丽国王亲政。

1271年 忽必烈正式定国号元。

1279年 元灭南宋。

1280年 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征东行省，直接委派达鲁花赤对高丽实行统治。

1292年 元朝设立东征招讨司于奴儿干。

1308年 库页岛酋长投附元朝。

1313年 元朝恢复科举考试，朱子学官方地位得以巩固。

- 1333年 日本镰仓幕府被推翻。
- 1336年 日本室町幕府建立，南北朝时代开始。
- 1368年 明朝建立。  
李成桂自立为王，次年改国号朝鲜，高丽亡。  
日本南北朝时代结束。  
明朝在黑龙江入海口设奴儿干卫。  
明朝与日本商定勘合贸易。
- 1409年 明朝把奴儿干卫升格为奴儿干都司，统辖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
- 1421年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朝鲜与日本实行“信牌制”贸易。
- 1446年 朝鲜颁行训民正音。
- 1468年 日本进入战国时代。
- 1471年 朝鲜颁行《经国大典》。
- 1549年 耶稣会士方济格·沙勿略来日本传教。
- 1573年 日本室町幕府亡，战国时代结束，织丰政权时代开始。
- 1581年 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 1590年 日本实现统一。  
日本侵略朝鲜。  
明朝军队两次入朝抗倭。
- 1601年 利玛窦来华传教。
- 1608年 朝鲜开始推行大同法，。
- 1603年 日本德川幕府建立。
- 1614年 日本全国禁基督教。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  
日本德川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又称“元和令”）。  
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日本颁布最初的锁国令。



## 东北亚史

- 1618年 伊凡·佩特林率领俄国使团首次出使中国明朝，他归国后写成《中国、蒙古见闻记》。是为中俄平等友好交往之开端。
- 1621年 荷兰殖民者侵入中国台湾。  
皇太极下令改女真为满洲。  
皇太极改汗号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清。
- 1644年 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山海关明朝守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清迁都北京。
- 1662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军进驻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中俄尼布楚条约》。
- 1723年 中国禁基督教。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与《中俄恰克图界约》  
俄国组织日本勘察队。
- 1791年 朝鲜禁基督教。  
英国特使马戈尔尼来华，要求自由通商和传教，被乾隆皇帝拒绝。
- 1811年 日本官方“兰书译局”创立，标志着兰学官方化。  
中国禁烟。  
日本萨摩藩改革。
- 1832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商船来到朝鲜，要求自由通商、传教等。
- 1839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
- 1840年 英国殖民者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1841年 日本天宝改革开始。
- 1842年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 1846年 英法舰队进入琉球，迫其开港。
- 1850年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 1853年6月 美国佩里舰队抵达浦贺。  
7月 俄国舰队抵达长崎。
- 1854年3月 《日美神奈川条约》。  
12月 《日俄亲善条约》。
- 1856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 1858年5月 《中俄璦琿条约》签订。  
6月 日本缔结《安政五国条约》
- 1860年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 1861年3月 俄国农奴制改革，第一次朝鲜海峡危机爆发。  
11月 中国辛酉政变。
- 1862年 朝鲜国王李熙即位、大院君李罡应摄政。
- 1864年 幕府征长州，美、法、英、荷炮击下关。
- 1868年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
- 1870年 日本设库页岛开拓使。
- 1871年 《清日修好条约》，日本岩仓使团赴欧美。
- 1872年 容闳带领中国儿童赴美学习。
- 1874年5月 日本入侵台湾。  
10月 中日签订《北京专约》。
- 1875年 日俄签订千岛、库页岛交换条约。
- 1876年 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
- 1878年 朝鲜在釜山的毛头镇设税关，日本以武力迫使其撤销。
- 1879年 日本侵占琉球，改冲绳县。
- 1882年7月 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8月 朝日签订《济物浦条约》。  
10月 《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签订。
- 1883年 中法战争爆发。
- 1884年 朝鲜发生甲申兵变。
- 1885年4月 中日签订《天津条约》。

## 东北亚史

- 5月 第二次朝鲜海峡危机爆发。
- 1889年 日本公布《帝国宪法》。
- 1891年 西伯利亚铁路动工。
- 1892年 俄法签订《军事同盟专约》。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 1895年4月 《中日马关条约》。
- 1896年 《中俄密约》签订。
- 1898年3月 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 6月 中国戊戌变法。
  - 9月 戊戌政变。
- 1899年8月 俄国在旅大设立“关东省总督府”。
  - 9月 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 1900年 日俄参加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
- 1901年 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 1902年 日英同盟缔结。
- 1903年 日中签订《通商行船续约》，东北的奉天及大东沟一带被迫开放。
-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
- 1905年 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 1906年10月 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
  - 11月 南满铁路公司成立。
- 1907年7月 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
- 1910年7月 第二次日俄密约签订。
  - 8月 日本吞并朝鲜。
- 1911年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 1912年1月 中华民国成立。
  - 2月 宣统帝退位，清王朝灭亡。
  - 7月 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

-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
- 1915年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 1916年 第四次日俄密约签订。
- 1917年 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
- 1918年7月 日本国内出现米骚动。  
8月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 1919年1月 巴黎和会召开。  
3月 朝鲜《三一运动》。  
4月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5月 中国五四运动。
- 1920年 远东共和国成立。
-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11月 华盛顿会议召开。
- 1922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 1923年 日本关东大地震。
- 1925年5月 中国爆发五卅运动，日本公布普选法。
-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 1928年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 1929年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 1930年 伦敦裁军会议召开。
- 1931年 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
- 1932年1月 日本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3月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4月 朝鲜抗日游击队诞生。  
5月 日本发生五一五兵变。  
10月 国联公布《李顿报告书》。
- 1933年2月 国联发表《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  
3月 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 东北亚史

- 1934年 日本发表试图独占中国的“羽田声明”。
- 1934-1935年 中国红军长征。
- 1936年3月 《蒙苏互助协定书》
- 7月 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
- 12月 发生西安事变。
- 1937年7月 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日。
- 12月 南京大屠杀。
- 1938年 张鼓峰事件。
- 1939年 诺门坎事件。
- 1940年8月 日本抛出“大东亚共荣圈”方案。
- 9月 日德意三国签订同盟条约。
- 1941年4月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
- 6月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
- 12月 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宣战。
- 1942年 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
- 1943年 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
- 1944年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垮台。
- 1945年苏英美雅尔塔会议。
- 1945年7月 波茨坦会议。
- 8月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 9月 日本签订无条件投降书。
- 9月 美苏在朝鲜半岛分区接受日本投降。
- 美国发表《战后初期对日政策》。
- 10月 蒙古宣告独立。
- 12月 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达成关于朝鲜问题的

协议。

1946年1月 中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

2月 蒙古和苏联签订《蒙苏友好互助条约》。

11月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署。

1947年5月 中共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

1948年8月 大韩民国成立。

9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 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交。

12月 联合国通过决议承认大韩民国政府为朝鲜唯一合法政府。

1949年4月 日本和韩国签订《日韩贸易协定》和《关于日韩贸易的财政协定》。

6月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中国与苏联建交。

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交。

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

1950年1月 美韩签订《共同防御协定》。

2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6月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介入朝鲜战争。

7月 安理会组成“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

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朝鲜。

1951年7月 - 1953年7月 朝鲜停战谈判。

1951年9月 召开片面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签署对日和约。

1953年7月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朝鲜战争结束。

10月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11月 《中朝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

1954年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0月 日本与苏联签署关于日苏恢复邦交的联合宣言。

12月 日本加入联合国。

1957年 中朝两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1958年 中朝两国签订《1959-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两项贷款的协定》。

1959年 苏联撕毁中苏两国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1960年 《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签订。

1961年5月 韩国朴正熙等人发动“5.16”政变。

7月 苏联同朝鲜签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8月 中国同朝鲜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1964年10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6月 《日韩基本条约》签订。

1966年2月 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苏联和朝鲜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

5月 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

1961年2月 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老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1969年 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

1971年7月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2年 蒙古和日本建交。

2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

7月 朝鲜和韩国发表《7·4南北联合声明》，提出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祖国统一的三项基本原则。

9月 中日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1973年 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有关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声明”。

1976年1月 周恩来逝世

9月 毛泽东逝世

10月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12月 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1月 中美正式建交。

1983年 日本中曾根首相正式提出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和口号。

1984年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7年 蒙古与美国建交。

1990年3月 蒙古与韩国建交。

5月 蒙古公布《政党法》，开始实施多党制。

9月 朝鲜和韩国总理举行45年来第一次总理会谈。

苏联和韩国建交。

1991年9月 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10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布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

12月 朝鲜和韩国签订《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

苏联解体。

朝鲜和韩国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1992年2月 蒙古人民共和国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蒙古国。

6月 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确认自卫队可赴境外协助联合国执行维和行动。

9月 蒙古国宣布该国为无核区。

10月 日本天皇明仁访华。



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12月 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

1993年3月 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第一次朝鲜核危机爆发。

7月 日本自民党下台，“五五体制”结束。

10月 叶利钦访问日本，两国发表《东京宣言》与《经济宣言》。

1994年4月 中国吉林省、日本鸟取县、韩国江原道、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在江原道成立“环日本海地方政府首脑会议”，2000年蒙古中央省加入。

7月 朝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9月 中俄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

10月 美朝签署关于朝核问题框架协议，朝鲜核危机暂告平息。

1995年1月 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3月 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成立。

8月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战后五十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

12月 中、俄、朝、韩、蒙五国签署《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中、俄、朝三国签署《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

1996年1月 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出任日本首相，持续仅29个月的非自民党执政结束。

4月 俄罗斯出台《1996-2005年远东和外贝加尔经济

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和《1997 - 2005 年西伯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发表。

7 月 桥本参拜靖国神社，开了冷战结束后日本首相参拜的先例。

1997 年7 月 朝韩军队在军事分界线中部金化地区发生严重交火事件。

9 月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签署。

10 月 金正日就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

11 月 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很快波及到日本。

12 月 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地实现了轮流执政。

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截止到 1999 年 8 月共举行六次。

1998 年6 月 克林顿访华，美国总统 10 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

8 月 朝鲜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引起美日韩恐慌。

9 月 日本宣布参加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计划。

11 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

1999 年6 月 朝韩在黄海水域爆发自停战以来首次大规模海上冲突。

8 月 日本国会通过“国旗国歌法案”。

11 月 中美两国达成入世协议。

12 月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辞职，普京出任代总统。

2000 年2 月 俄罗斯与朝鲜签署《俄朝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6 月 朝韩首脑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签署《南北共同宣言》。

9 月 连接朝韩两国的铁路开始动工修建。

## 东北亚史

10月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朝鲜。

2001年4月 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坚持连年参拜靖国神社。

7月 江泽民主席访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0月 日本参议院通过《恐怖防止法案》，为自卫队的远征铺平道路。

12月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

2002年6月 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

7月 朝鲜颁发一系列经济调整举措。

9月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双方签署《平壤宣言》。

12月 朝鲜宣布立即重启核设施，朝核危机再度爆发。

2003年3月 中国政府正式把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列入重要议程。

4月 美国、朝鲜、中国代表在北京就朝核问题举行三方会谈。

8月 第一次朝核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

10月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2004年9月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乘坐巡逻艇从海上视察北方四岛，遭到俄罗斯强烈抗议。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签署。

美国国会通过《朝鲜人权法案》。

11月 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挂牌。

2005年1月 韩国汉城市议会正式决定将汉城的汉字名称改为“首尔”。

9月 东北亚五国共同签署大图们江行动计划，将1995年的协议延长了十年；首届东北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中国长春举行。

11月 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蒙古国。

12月 在“东盟+3”峰会期间应当举行的中日韩峰会被无限期推迟。

## 参考文献

中文：

1. [朝鲜]《朝鲜建国始祖檀君》(论文集), 朝鲜·外文出版社 1994 年版。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94 卷), 故宫博物院影印抄本 1930 年版。
3.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4. 《李鸿章全集》(第 5 册), 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
5.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
8. [英] F·H·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9. [英] 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托因比:《大战前夕: 1939 年》(下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10. [日]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1. [俄]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第2卷), 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12. 白凤南、李东旭:《朝鲜经济史概论》,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13. 白新良:《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14. 柏福临、王作坤:《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15.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6. 包霞琴、臧志军:《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

17. [美]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8.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

19. [苏] 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20. [苏] 彼·伊·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1. [日]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2. [俄] 布莱特施奈德尔:《西辽史》, 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23.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朝鲜劳动党简史》,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4. [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25. [朝鲜]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全史》,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东北亚史

26. 车哲九：《南朝鲜四十年》，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年版。
27.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28.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9. 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0. 陈高华、史民卫：《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1. 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2. 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
33.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 - 1938）》，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34.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5. 程妮娜：《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6. 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7.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38. [日] 大平正芳：《我的履历书》，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
39. [美] 戴维·霍罗维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40. 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41. 都兴智：《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42. 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43. 杜士铎：《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2 年版。
44. [英] 恩斯特·乔治·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45. 樊树志：《晚明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6. [英]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47. [美] 费正清：《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48. [美]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49.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
50. [美]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51. [美]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
52. 冯绍雷、相兰欣：《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53. [日]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54. [日]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55.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56.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 - 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57. [德] 傅海波、[英] 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58. 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59. 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60. 傅斯年：《东北史纲》，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2 年版。
61. [日] 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



## 东北亚史

馆 2004 年版。

62.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 1982 年版。

63. 高崇云：《中共与南北韩关系的研究》，（台湾）大学联合出版委员会 1989 年版。

64. 高连福：《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65. [俄] 根·伊·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66. 耿铁华：《中国高句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67. 宫力：《跨越鸿沟：1969 - 1979 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68.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69. 管士光：《唐人大有胡气——异域文化与风习在唐代的传播与影响》，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2 年版。

70. [日] 广田弘毅传记刊行会：《广田弘毅》，广田弘毅传记刊行会 1966 年版。

71.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7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7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版。

74. [美]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 1、2 卷，三联书店 1974 年版。

75. 韩立民、吴刚、谭永春：《战后韩国经济与中韩经贸关系》，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76.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77. 韩儒林：《元朝史》（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78. 何春超、张季良：《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版。
79. 何劲松：《韩国佛教史》（上卷），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年版。
80. 何肇发：《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
81. [美] 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美日战争的来临》，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82. [美]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
83. 胡春惠、宋成有：《东北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台北：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84. [朝鲜] 黄道渊：《战后朝鲜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朝鲜外国文出版社 1957 年版。
85. 黄定天：《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86. [美]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87. 黄新亚：《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88.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89. 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90.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91.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92. [日] 吉田茂著：《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

93. 纪宗安：《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94. 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

95. 姜孟山、刘子敏、金荣国：《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第 1 卷），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96. 姜孟山：《朝鲜通史》（第 1 卷），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97. [韩] 姜万吉：《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98. 姜维公、高福顺译：《中朝关系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99. 蒋非非、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00.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108 页。

101. [韩] 金得槐：《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102. 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103. 金龟春：《中朝日关系史》（下册），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

104. 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新动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

105. 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06. 金熙德:《中国的东北亚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

107. [日]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 1 卷), 三联书店 1956 年版。

108. 李昌植:《朝日近代思想的形成及其比较研究》,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09. 李殿福、孙玉良:《渤海国》,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110. 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11. [韩] 李基白:《韩国史新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4 年版。

112. 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1-3 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2001 年版。

113. 李健才:《明代东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14.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115. [朝鲜] 李清源:《朝鲜近代史》, 三联书店 1955 年版。

116. 李文:《东亚:宪政与民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17. 李锡厚、白滨、周峰:《辽西夏金史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18. 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119. 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1-3),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 东北亚史

120. 李小白：《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21. 李兴盛：《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122.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23. [韩] 李元烨：《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从对抗走向协调（1945 - 2000）》，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124.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125.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26. 梁云祥、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27. 林干、再思：《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128. 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29. 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30. 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31.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132. 刘金质、杨淮生：《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 - 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133. 刘金质、张敏秋、张小明：《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34. 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35. 刘天纯：《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36. 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137. 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38.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139. [日]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140. 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141. 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42. [苏]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143. [韩] 罗钟一：《东北亚共同体的文化视角》，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44. [美] 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2004 年版。
145.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146. 马大正、李大龙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47. 马大正、杨保隆：《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148. [美]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
149.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
150. [美] 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151.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52.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1958

## 东北亚史

年版。

153. 孟古托力、冯继钦、黄凤歧：《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154. 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第 1 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55. 米庆余：《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56.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57. 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158. [美] 牟复礼、[英] 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59. [日]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160. [日] 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161. 潘石英：《深厚的友谊》，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162. 朴真奭、姜孟山等：《朝鲜简史》，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63.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164. 齐思和、林樹惠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165. 钱江：《“乒乓外交”内幕》，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

166. [美]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167. 任晓、胡泳浩：《中美日三边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68.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69. [日]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5·开战外交史》，朝云新闻社 1963 年版。
170. 商传：《明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71.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72. [日]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173. 石曙光等：《东北亚国家（地区）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黑龙江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
174.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 - 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175. 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76.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77.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178.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179. 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180. 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81.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82.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83.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184. 孙晓郁：《中日韩经济合作的新起点》，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185.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名汇编·东北卷》，中央



## 东北亚史

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186.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 - 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187. 陶文钊等：《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88.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189. 佟冬：《中国东北史》（1 - 6 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190. 佟冬：《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年版。

191. [日] 土屋乔友雄：《日本资本主义史上的指导者们》，岩波书店 1941 年版。

192. [苏] 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193. [日]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194. 汪向荣：《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195.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196. 王承礼：《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197. 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198. 王传剑：《双重规制——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199.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00.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 2004 年版。

201. 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202.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03. 王金林：《邪马台國と古代中國》，学生社 1992 年版。
204. 王可宾：《女真国俗》，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205. 王绵厚：《秦汉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06. 王胜今：《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07. 王胜今：《现代朝鲜经济》，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08.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七、八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209. 王斯德：《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20 世纪的世界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10.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211. 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版。
212. 王彦威、王亮：《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 16 卷），故宫博物院 1933 年版。
21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1 卷），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214. 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15. 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216.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17. 魏源：《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218. 吴杰：《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19.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12 卷），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20.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221. 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东北亚史

1997年。

222. 武玉环：《辽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23. [日] 西川俊作、阿部武司：《产业化的时代》，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224. 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225. [美] 小 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26. [日] 小泽一彦：《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227. [苏] 谢·宾·奥孔：《俄美公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228. [俄] 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
22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30.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231. [日]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吕万和、熊达云译：《日本政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32. 雄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33.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
234. 徐景学：《西伯利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235.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
236. 徐天新：《世界通史（当代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237. 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238.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83 年版。

239. 薛虹、李澍田：《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240. 薛君度、陆南泉：《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241. 杨保隆：《渤海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242. 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43. 杨军、张乃和：《东亚史》，长春出版社 2006 年版。

244. 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 - 1989）》，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45. 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46. 杨孝臣：《日本政治现代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247. 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年版。

248. 杨余练等：《清代东北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249.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50. 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251. 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252. 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253. 杨昭全：《关内地区朝鲜人民独立斗争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7 年版。

254.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255. 杨正光：《中日关系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东北亚史

256.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7. [苏] 伊·亚·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258. [美] 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

259. [日] 依田憇家：《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260. [日] 依田憇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61. 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文集出版社1993年。

262. 于建胜、刘春蕊：《落日的挽歌——19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

263. 袁明、哈里·哈丁：《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45-195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64. 远东军事法庭裁判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265. [美] 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66. [美]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267. [美]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8. [美]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美国与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269. [美] 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70. 张博泉、程妮娜：《中国地方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271. 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72. 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73.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274. 张博泉：《箕子与朝鲜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275.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76.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77. 张博泉：《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278. 张博泉：《鲜卑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279. 张博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80. 张高、姜华昌、关颖：《渤海国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81. 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82. 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283. 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284. 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285. 章百家等：《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286. 赵虎吉：《揭开韩国神秘的面纱：现代化与权威主义：韩国现代政治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
287. 赵建民、刘予苇：《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88.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东北亚史

289.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90.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29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292.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

29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近代史资料》（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29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296. 周惠泉：《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297. 周启乾：《日俄关系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98. [美] 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O·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99.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 1964 年版。

300.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301. [日]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日文：

1. [日] 依田千百子：《朝鮮神話伝承の研究》，琉璃書房 1991 年版。

2. 明治文化研究会：「明治文化全集」，第 2 卷，日本評論社

1928年。

3.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7巻、日本国際聯合協会  
1938年。

4. 小野俊一：「大東亜ものがたり」、新潮社1944年版。

5. 大畑篤四郎：「日独伊三国同盟」、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  
《日本外交史研究：昭和時代》、有斐閣1960年。

6. 信夫清三郎：「日ソ中立条約」、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  
本外交史研究：昭和時代》、有斐閣1960年。

7. 英修道：「明治外交史」、至文堂1960年。

8. 下村富士男：「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4巻、風間書房、  
1962年。

9.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の道路・5・開戦外交史」、  
朝雲新聞社1963年。

10. 井上清：「条約改正」、岩波書店1963年。

11. 吉田茂：「世界と日本」、番町書房1963年。

12. 広田弘毅伝記刊行会：「広田弘毅」、広田弘毅伝記刊行会  
1966年。

13. 吉村道男：「日本とロシア」、原書房1968年。

14. 日本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外務省の百年」、原書  
房1969年。

15. 植田捷雄：「東洋外交史」、上、東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

16. 推理史話会：「古代史への挑戦 謎の女王國」、新人物往来  
社1973年版。

17. 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1巻）、岩波書店1975年版。

18.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創文社1977年。

19. 吉田常吉：「吉田松陰」、岩波書店1978年。

20. 横井小楠：「国是三論」、「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  
1981年。



## 东北亚史

21. 細谷千博：「日英関係史 1917 - 1949」，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2 年。
22.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原書房 1984 年。
23. 小林幸男：「日ソ政治外交史」，有斐閣 1985 年。
24. 山本進、安原和雄、山村喜晴、山本剛士、石丸和人、松本博一：「日本外交の課題」，三省堂 1985 年。
25.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 1986 年。
26. 井上光貞：「日本の歴史 1 神話から歴史へ」，中央公論社 1987 年版。
27. 下田勉：「古代日本海文化と邪馬台國」，近代文艺社 1991 年版。
28. 依田千百子：「朝鮮神話伝承の研究」，瑠璃書房 1991 年版。
29.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辞典編纂委員会：「日本外交史辞典」，山川出版社 1992 年。
30. イアン・ヒル・ニッシュ：「日本の外交政策 1869 - 1942——霞が関から三宅坂へ」，ミネルヴァ書房 1994 年。
31. 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研文出版 1994 年。
32. 麻田貞雄：「両大戦間の日米関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5 年。
33. 猪口孝：「冷戦後の日米関係——国際制度の政治経済学」，NTT 出版株式会社 1997 年。
34. 木畑洋一、イアン・ニッシュ、細谷千博、田中孝彦：「日英交流史 1600 - 2000」，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0 年。
35. パトリック・クローニン、マイケル・グリーン：「日米同盟——米国の戦略」，勁草書房 2000 年。

36. 坂本一哉:「日米同盟の絆——安保条約と相互性の模索」、有斐閣株式会社 2000 年。

37. 有田八郎:「人の目の塵を見る、馬鹿八と人はいう」、ゆまに書房株式会社 2002 年。

38. 来栖三郎:「日米外交秘話」、ゆまに書房 2002 年。

39. 関栄次:「日英同盟: 日本外交の栄光と凋落」、学習研究社 2003 年。

英文:

1. Alexis Dudden, *Japan's Colonization of Korea: discourse and powe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2.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 - 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Christopher M. Dent and David W. F. Huang (eds.):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lessons from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5.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6. Javed Maswood, Jeffrey Graham and Hideaki Miyajima (eds.), *Japan - 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7. J. J. Suh,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Allen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8. Jonathan D. Pollack, *Straddling as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Santa Monica: Rand, 2000.

## 东北亚史

9. Kim Hakjoon, *Korea's Relations with Her Neighbors in A Changing World*, Seoul: Hollym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1993.
10. Myung Hyun Cho, *Korea and the Major Powers: 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 Seoul: The Research for Peace and Unification of Korea, 1989.
11. Samuel S.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12. Samuel S. Kim, *Inter - Korean relations :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3. Syngman Rhee,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 primer of Korean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14. Tae - Hwan Kwak and Edward A. Olsen (eds.), *The Major Powers of Northeast Asia: Seeking Peace and Securit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6.
15. Tae - Hwan Kwak and Seung - Ho Joo (eds.), *The Korean Peace Process and the Four Powers*,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16. Tae - hyo Kim and Brad Glosserman (eds.), *The Future of U. S. - Korea - Japan Relations: balancing values and interests*, Washington, D. C. : CSIS Press, 2004
17. Takashi Inoguchi, *Japan's Asian Policy: Revival and Respons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8. Takashi Inoguchi and Grant B. Stillman (eds.),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 Tsuneo Akaha,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ortheast Asia: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Contenti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20. Victor D.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

- *Korea - 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 Yangseon Kim and Chang Jae Lee (eds. ),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spects for a Northeast Asian FTA*,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2003.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东北亚史

作者 = 刘德斌主编

页数 = 533

SS号 = 11807325

出版日期 = 2006.12